

俄罗斯研究

汪道涵 题

目 录

当代俄罗斯外交专辑

俄罗斯与金砖国家

- 3 潘兴明 / 俄罗斯与南非关系的历史考察
——以苏联与非国大关系为视角
- 21 肖辉忠 / 试析俄罗斯金砖国家外交中的
几个问题
- 43 李冠杰 / 一种正常的战略伙伴关系——
印俄战略合作的成效与前景

俄罗斯与大国关系

- 67 封 帅 / “双向失衡”结构与欧洲导弹
防御议题中的美俄博弈
- 94 林精华 / 陌生的邻居——后苏联时期俄
国民族主义潮流下的中俄关系
- 156 阎德学 黄灏 / 日本与俄罗斯远东地区
的二手车交易研究

非传统安全与俄罗斯外交

- 192 姜 睿 / 气候政治中的俄罗斯因素——
俄罗斯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立场、
问题与前景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 冯绍雷

副 主 编: 陈大维 (常务)

杨 成

刘 军

封面设计: 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电话: 021-62233816; 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 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12 年 8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2 年第 4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Пань Синмин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с Южной Африкой---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и АНК(3)

Сяо Хуэйчжун

Анализ некоторых вопросов дипломатии России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странам БРИКС(21)

Ли Гуаньцзе

Нормально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ндии и России (43)

Фэн Шуай

Структура «двунаправленного дисбаланса» и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США и России в вопросе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ПРО..... (67)

Линь Цзинхуа

Незнакомый сосед---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условиях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тенденции рус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94)

Янь Дэсюэ, Хуан Хао

Изучение торговли подержанными автомобилями между Японией и Дальним Востоком России (156)

Цзян Жуэй

Россий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климат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Позиция,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участия России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климатическ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192)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2 年第 4 期 (双月刊)

Contents

Pan Xingming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Russia-South Africa Relations: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oviet Union and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3)

Xiao Huizhong

An Analysis of Russia's Diplomacy Towards the BRICS Countries (21)

Li Guanjie

A Normal Strategic Partnership---Effectiveness and Prospects of Indian-Russian Strategic Cooperation (43)

Feng Shuai

"Bidirectional Imbalance" Structure and the Contest between the U.S. and Russia over the Issue of European Missile Defense..... (67)

Lin Jinghua

Strange Neighbors---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rend of Russian Nationalism in Post-Soviet Period (94)

Yan Dexue, Huang Hao

A Study on Used-Cars Trading between Japan and Russian Far East..... (156)

Jiang Rui

Russian Factor in Climate Politics---Position,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f Russia'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192)

俄罗斯与金砖国家**俄罗斯与南非关系的历史考察**

——以苏联与非国大关系为视角*

潘兴明**

【内容提要】俄罗斯与南非关系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初发轫的苏联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关系。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苏联向非国大提供了重要的道义和物质上的援助，尤其是武器装备的援助。8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与非国大关系出现新的变化，苏联的同盟军战略和非国大的多元化战略产生了良性的互动，为南非的民主改革创造了较适宜的环境，但对苏联在新南非创建中的作用不宜高估。事实上，苏联与非国大的关系在80年代末趋冷，直接影响到此后的俄南关系。

【关键词】苏联 俄罗斯 南非 非国大 民主改革

【中图分类号】K512.6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4-0003-(18)

近年来，作为金砖国家成员国的俄罗斯与南非之间的双边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俄南两国关系可以直接追溯到1994年新南非诞生之前。这不仅是指两国在1992年建交，更重要的是，南非目前唯一的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与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曾有过十分密切的关系。苏联对非国大等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俄罗斯与新兴市场国家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1JJDGJW009）的阶段性成果。

** 潘兴明，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提供了重要的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援，有力地推动了非国大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和争取建立民主平等的新南非的斗争。本文将对苏联与的非国大关系作专门的考察，以期对俄南两国关系有纵向的深入理解和认识。

—

非洲人国民大会创建于 1912 年，起初是南非黑人与其他种族的中产阶级争取黑人民权的组织，遵从非暴力原则，在南非政治中的影响力不大。1940 年代，随着曼德拉(Nelson Mandela)、坦博(Oliver Tambo)和西苏鲁(Walter Sisulu)等一批富有才华和意志的青年一代的加入和跻身于非国大领导层，非国大的社会基础扩大，力量明显加强。50 年代，为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非国大加强了争取所有南非人支持的非暴力反抗运动。1955 年，非国大发布《自由宪章》，明确宣布要建立一个包括南非所有种族在内的新南非：“南非属于所有生活于此的人，无论其肤色如何。”^①非国大内以索布克韦(Kobert Sobukwe)为首的激进派则主张南非只属于黑人。这一派别于 1959 年退出非国大，组建泛非主义大会，发动大规模抵制和反抗运动，遭到南非政府的血腥镇压。1960 年“沙佩维尔惨案”发生后，南非政府宣布非国大和泛非大非法，非国大领导人曼德拉和西苏鲁等人被捕入狱，坦博等则转移到国外继续斗争。1961 年，非国大建立了自己的军事组织——“民族之矛军”(简称“姆克”，Umkhonto we Sizwe)。从此时起，非国大开始进行暴力斗争。

为了加强和协调反种族隔离斗争，非国大与南非共产党建立起了联盟关系，一些南非共领导成员兼任非国大领导职务。正是从这时起，非国大开始寻求苏联的支持，苏联也开始认真地考虑对非国大提供必要的支援。苏联方面认为，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正义的事业，同时也有助

① 潘兴明：《南非——在黑白文化的撞击之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44 页，转引自 T. Karis and G. Gerhart, eds., *From Protest to Challenge*, vol.3, *Challenge and Violence, 1953-1964*, Stanford, 1977, p.205.

于在冷战中对抗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具体而言，苏联在南部非洲的战略目标有两个：其一，控制当地的战略和经济资源，遏制西方的资源供给。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后来对此作了这样的归纳：“我们的目标是控制西方所依赖的两大宝藏——波斯湾的能源宝藏和中南非的矿产宝藏。”^①其二，夺取地缘战略的优势，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不过，苏联在具体操作时显得较为谨慎，援助的力度也较为有限。1961年10-11月间，非国大和南非共决定与苏联联系，以征询有关非国大进行武装斗争的可行性的方式，了解苏联的立场。于是，南非共及非国大领导人科坦(Moses Kotane)和达多(Yusuf Dadoo)前往莫斯科，会见了苏共负责国际事务的书记波诺马廖夫(Boris Ponomarev)。波诺马廖夫代表苏共中央表达了对非国大和南非共武装斗争的支持，建议将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并指出，发动群众是关键所在：

考虑到(南非的)局势，我们同意科坦和达多同志所表述的意见。与此同时，南非共产党有关进行武装斗争的主张使得贵党肩负起重大的责任。决不要以一种形式的斗争形式来抵消其他形式的斗争，而是要熟练地将这些斗争形式结合起来。武装斗争是一场广大群众的斗争。这就是说在准备武装斗争时，赢得群众支持的政治工作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如果不能在群众中开展持之以恒的政治和组织工作，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赢得群众和武装斗争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两个任务需要在密切结合的情况下完成。^②

显然，苏联方面的立场十分明确，还提供了意见和建议。不过，援助问题似乎并未涉及。1963年1月，姆克领导人戈德瑞奇(Arthur Goldreich)和皮雷(Vella Pillay)来到莫斯科，首次商谈苏联对南非解放运动的援助问题。苏联方面重申了对非国大武装斗争的支持，指出了提供援助的重要性，甚至还建议具体运送和移交的方式，即通过有关非洲独立国家转交，而不是在公海

① Richard Nixon, *The Real War*,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80, p.23.

② RSAMH (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Modern History), “Decisions Taken by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CPSU Central Committee without Recording in the Minutes”, N.478, November 28, 1961, collection 4, inventory 18, file 1017, p.61. In: Vladimir Shubin, “The USSR and Southern Africa during the Cold War”, Occasional Paper, n.1, November, 2008, p.2.

上直接移交，但对援助的范围和规模的讨论不够深入，成果有限。^①三个月之后，非国大副主席坦博(Oliver Tambo)访问苏联，方才正式启动了非国大与苏联之间的合作和援助。

苏联决定为非国大培训军事人员，第一批受训人员是 328 名姆克成员。1963-1965 年间，这些姆克军事人员分两批前往苏联，分别在莫斯科和敖德萨两地受训。从此，苏联对非国大援助的一个重要方面——人员培训——正式启动。苏联方面提供师资、场地和相关经费，培训地点起初在苏联境内的军事院校。培训课程包括游击战术、陆军系列课程，后在 80 年代增加了空军和海军系列课程，培训时间加长。据参加过培训的姆克指挥官西贝科(Archibald Sibeko)的回忆，他在莫斯科学习的课程情况为：“我们学习的课程有军事战略和战术、地形学、操练、兵器使用和游击战。我们还学习政治课程，特别重视炸药制造及使用、车辆维护、野外炊事和医疗救护方面的技能，这些与游击战条件下生存相关的所有课程都要学。”^②

此外，数百名非国大成员进入苏联高等学校接受学历教育，大都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在苏联科学院和工会、青年学校学习的非国大成员也超过两百人。苏联的医疗机构还为数百名非国大成员提供了医疗和疗养服务，另有非国大医护人员到苏联受训，包括在新南非政府中担任卫生部长的茨哈巴拉一姆西芒(Manto Tshabalala-Msimang)。至于苏联为南非非国大及共产党培训的军事人员数量，俄罗斯媒体的统计数字是 1501 人（1963-1991 年）。但这个数字并不包括所有南非受训人员，实际数字应当超过两千人。而非国大武装力量的兵员总数约为 7000 人，^③可见受训比例之大。^④1978 年，应非

① 西方学者称这次争取援助的行动收到实际效果，南非解放运动从苏联及盟国方面得到 280 万美元的援助。参见 S. Davis, *Apartheid Rebels: Inside South Africa's Hidden War*, Craighall: A.D. Donker, 1988.

② Archie Sibeko, Joyce Leeson, *Freedom in Our Time*, Indicator Press, University of Natal, 1996, <http://www.anc.org.za/ancdocs/history/congress/sactu/zzl.htm>. Archie 为“Archibald”的昵称。——作者注

③ Peter Vanneman, *Soviet Strategy in Southern Africa: Gorbachev's Pragmatic Approach*, Stanford: Hoover Press, p.21.

④ 另据南非问题研究专家洛奇(Tom Lodge)的说法，接受过苏联培训的非国大军事人员多达一万人。参见 Alan Cowell, “Wild Card in South Africa: Communist Party”,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6, 1986.

国大方面的要求，苏联同意在安哥拉为非国大的姆克培训干部。1979年10月，苏联派出的首个军事专家团到达安哥拉，团长为海军上校谢雅耶夫（Vyacheslav F. Shiryaev），被称为“伊凡同志”（“Comrade Ivan”）。此后，苏联每2-3年轮换专家团成员。到1991年解体前，苏联先后共派出超过200名军事专家到安哥拉培训姆克干部。^①另外，东德和古巴的军事专家也参加了在安哥拉的培训。

另一方面，苏联对非国大的武器装备援助也同时启动。武器类别以游击战所需轻武器为主，如数千枝AK-47自动步枪、3362枝斯莫诺夫卡宾枪、6000枝手枪、275个榴弹发射器、90个P级导弹发射器、40多个斯特莱拉对空导弹发射器、20个马优卡反坦克火箭发射器和60多门迫击炮等。以援助款计算，1963-1990年间，苏联提供给非国大的各项援助总额约为6100万卢布，其中5200万卢布为物质援助，其余为技术援助。^②不过，苏联共产党和诸如亚非团结委员会之类的组织提供的援助并不包括在内。而且，由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对物资价格，特别是军用品价格的定价偏低，所以实际援助规模应当要大得多。此外，尽管北欧的瑞典等国也给非国大提供了财政援助，但苏联的财政援助尤为重要。第一，苏联的援助启动早，确保了非国大的生存和延续。1960年代初，苏联在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尚未提供财政援助的情况下，率先采取行动。这些援助来得十分及时，非国大和南非共得以生存下来。第二，苏联的援助并不附加任何条件和限制。根据苏宾所述，“基于苏联共产党与其他友好政党之间的互信关系，对这些捐助从未查过账”。^③因此，非国大可以自由支配援助款项的使用，这与来自西方国家的严格规定使用范围和严格执行财务制度的援助完全不同。而且，西方国家也从未向南非共产党和姆克军事组织提供过援助。

此外，苏联的支持和援助还体现在其他一些方面。首先，苏联协助非国大成员受训后从海上返回南非作战，帮助非国大寻找合适的登陆地点，提供

① *Segodnya*, no.3, 1993. In: Vladimir Shubin, *op. cit.*, p.14.

② *Nezavisimaya Gazeta*, Moscow, August 8, 1992. In Vladimir Shubin, “The Soviet Union/Russian Federation’s Relations With South Afric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Since 1980”, *African Affairs*, 1996, 95, p.15.

③ V. Shubin, *ANC. A View from Moscow*, Cape Town: Mayibuye Books -UWC, 1999, p.37.

必要的设备，协助获取登陆船只和培训登陆要领等等。1960年代后半期，非国大通过莫桑比克和南罗得西亚进入南非的通道受阻，因此非国大方面请求苏联提供以上援助。这次援助行动称为“J行动”，但实施效果不佳。不过，非国大领导人、后来任南非共总书记的哈尼(Chris Hani)就是通过这项行动，在苏联接受培训后成功地潜回南非的。其次，苏联为非国大成员提供战略大后方。1969年，坦桑尼亚政府突然决定关闭非国大在其境内的营地，而其他非洲国家都没有表示愿意接纳非国大在本国设立营地。非国大在国外的姆克领导层一时竟无法在非洲找到落脚之地。于是，苏联伸出援助之手，让这批姆克干部在苏联停留约三年时间，并提供有关进修课程。苏联对非国大的盟友——南非共的支持更是不遗余力，1984年的南非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莫斯科举行。再次，苏联协助非国大在南非境内建立地下活动网络。1980年代，非国大展开“乌拉行动”(Operation Vula)，目的是在南非布置地下活动网络。非国大需要找一个安全地点安排坦博等领导人会见负责乌拉行动的指挥官尼安达(Siphiwe Nyanda)和马哈拉吉(Mac Maharaj)等人。结果，苏联同意他们到莫斯科会面，商定有关行动计划。再次，苏联在国际场合坚决支持非国大和南非共领导的解放运动。苏联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严厉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支持包括非国大在内的非洲解放运动。这不仅符合苏联国家利益和目标，也是其在冷战中的总体战略的要求。苏联政府认为非洲解放运动的斗争是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与民族解放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立场一致，应共同战斗。^①

关于苏联援助在非国大所得到的援助中的重要性，美国国务院曾在1982年作过这样的估计：非国大所得到的财政援助的60%、武器援助的90%以及军事培训援助的绝大部分均来自苏联以及东德和古巴。^②非国大和南非共领导成员、后来接替曼德拉担任非国大主席和南非总统的姆贝基(Thabo Mbeki)公开表示，苏联的援助对于南非共产党的生存而言是不可或缺的。^③

① Vladimir Shubin, *The Hot "Cold War": The USSR in Southern Africa*,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p.3.

② Peter Vanneman, *Soviet Strategy in Southern Africa*, p.20.

③ Ibid, p.24.

二

苏联与南非非国大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1-1979年），为外部支持阶段。非国大与苏联的接触始于1961年，1963年开始接受苏联的援助，包括物资援助和技术援助。苏联从非洲以外向非国大提供武器装备，在本国为非国大培训军政干部和其他技术人才，同时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支持非国大反对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在总体上，苏联提供的是一种外部支持，并未进入非洲本土进行直接干预。

第二阶段（1979-1985），为直接介入阶段。苏联对非国大的支持和对南部非洲事务的介入由国内推进到南部非洲。1979年，应非国大主席坦博的邀请，苏联军事专家团抵达安哥拉，在当地培训非国大军事组织指挥官和其他作战人员。非国大发动群众斗争的能力和影响力得到较明显的提高，在南非境内发动袭击的频率和规模也明显增加。非国大打击的重点是那些在黑人市镇担任市政委员和警察的黑人“通敌者”，目的是避免黑人中的温和派倒向种族主义政权，以保持武装斗争的强大压力和震慑力。1983年8月，团结南非各界进行反种族隔离制度斗争的组织——联合民主阵线成立，其成员包括575个工会、社区团体、体育组织、妇女组织和青年团体。尽管非国大因遭到政府查禁而未能参加，但非国大的斗争路线得到该组织主流派——“民族主义派”的完全接纳。联合民主阵线组织推动群众抗议和罢工行动，并在1985年达到高潮。^①联合民主阵线也被西方贴上了非国大“合法派”（“legal wing”）的标签。^②

第三阶段（1985-1991年），为全面变革阶段。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总书记。在对外政策方面，戈尔巴乔夫推出“新思维”，即“各国和各民族相互依存、利益均衡、选择自由、连带责任、共同解决当代全球问题。”^③缓和并改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放松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和支

① 潘兴明：《南非——在黑白文化的撞击之下》，第196-197页。

② *The Economist*, May 10, 1986, p.11.

③ 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45页。

持。其“新思维”是基于他对世界的新认识：

我们认识到了必须破除对外部世界的扭曲概念，它几十年来使我们与外部世界对立，这不仅仅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对社会意识，对科学和文化，对国家的知识潜力，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当代相互依存的世界，一个闭关锁国、思想封闭、与全球的发展隔绝的社会，是不可能进步的。今天，任何一个社会，只有在和其他社会互动又保持本色时，才能得到充分发展。^①

苏联的南非战略和政策出现重大调整，推出了相应的新战略：在坚决支持非国大等解放运动反对种族主义政权的同时，苏联主张分化南非统治阶级，号召政治反对派联合起来，不再主张进行不成熟的暴力斗争。^②于是，苏联与非国大的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其中非国大激进派不再愿意听从莫斯科的指挥棒，主张继续暴力反抗。

苏联的南非新战略的核心，是动用暴力和非暴力手段，联合一切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力量和种族成员，包括联合白人中的政治反对派，共同争取反种族隔离制度的胜利。1986年5月，戈尔巴乔夫在招待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Jose Eduardo Dos Santos)的晚宴上公开表示：“南部非洲存在着一个有别于流血、紧张和对抗的理性和现实的抉择。其预想步骤为：结束针对安哥拉和其他解放运动国家的侵略，尽快给予纳米比亚独立——必须是真正的独立，而不是美国和南非共和国所希望看到的虚假的独立，最后消灭非人性的种族隔离制度。”^③到1988年，苏联方面认为，南非人民的斗争取得胜利已经“非常可能”，因为白人统治集团正在分崩离析，而“解放运动的同盟军——知识分子、商界人士、教会首领和青年的力量正在日益壮大之中”。^④苏联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阿索扬(Boris Asoyan)指出：

我们认可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实现主要目标——建立一个消除种

① 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245页。

② Peter Vanneman, *Soviet Strategy in Southern Africa: Gorbachev's Pragmatic Approach*, Stanford: Hoover Press, p.14.

③ *Pravda*, Moscow, May 9, 1986. In Vladimir Shubin, "The Soviet Union/Russian Federation's Relations With South Afric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Since 1980", p.15.

④ Boris Asoyan (Second Deputy Chief of the African Department, Foreign Ministry, Soviet Union) on South Africa, in Peter Vanneman, *op. cit.*, p.15.

族主义的民主社会——的必要性，赞同在此进程中政府与占人口多数的黑人的真正代表之间的谈判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与此同时，我确信在此进程中对比勒陀利亚施加压力，包括解放组织进行武装斗争，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实施制裁同样是必要的。^①

苏联增强了对南非国内事务的影响力度，推进其同盟军战略。比如，为争取阿非里卡人（荷裔南非白人）加入反种族隔离制度的阵营，莫斯科电台在 1980 年代中期开设了阿非里卡语的播音时段。副外长阿达米辛 (Anatoly Adamishin) 还在 1989 年表示：如非国大决定与南非政府举行谈判，苏联有兴趣扮演调停者的角色。^②非国大的政策原则是继续坚持武装斗争道路，组成最广泛的反种族隔离制度的联合阵线。这在非国大于 1988 年 2 月发表的优先重大政策声明中表达得非常清楚：“我们反复强调的正确信念是只有通过一场群众运动，即最大限度地团结民主和爱国力量，使其加入自己的阵营，使用包括革命暴力在内的多元化战略，才能够推翻种族隔离政权。”^③此时苏联的同盟军战略与非国大的多元化战略具有一定的同步效应，产生了良性的相互作用。

非国大的多元化战略，就是在继续坚持暴力斗争的同时，对其斗争策略作重大调整，增加了非暴力斗争的路径，即加强了与联合民主阵线等反种族隔离制度的民族爱国力量的联合，与反种族隔离制度的白人自由派建立联系，甚至开始与南非政府方面进行接触。1988 年，非国大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白人自由派开了两次意义深远的会议，表明了非国大正在着力落实多元化战略。第一次会议于 1988 年春在法兰克福秘密举行。非国大领导人在会上首次表明了在南非实行多党制民主的立场，敦促议会内外的自由派联合起来。1988 年 10 月，在南非民主抉择研究院 (Institute for a Democratic Alternative for South Africa) 的倡导下，一个由苏联代表（代表团长是苏联原驻赞比亚大使索洛多尼科夫，Vasily Solodovnikov）、非国大重要领导成员（如斯洛沃，当时任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南非共总书记、姆克前总参谋

① Peter Vanneman, *Soviet Strategy in Southern Africa*, p.18.

② Ibid, p.35.

③ Ibid, p.18.

长)和自由派人士参加的会议在西德的勒沃库森召开,讨论南非的现状与前途问题。这是非国大与南非自由派首次在公开场合一起商讨国家大事。与会者的身份表明了这次会议的重要地位,斯洛沃是非国大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和南非共领导人;索洛多尼科夫此时担任苏联亚非团结委员会的副主席,具体负责苏联与亚非国家及组织的关系,而且该委员会是苏联对南非事务的主要负责机关之一,担负着对非国大援助与合作的重要任务;而南非自由派人士中有英裔白人,也有阿非里卡人,其中部分人曾在博塔政府中任职。此外,尚在狱中的曼德拉甚至与南非总统博塔(Pieter Willem Botha)在1989年7月5日举行了历史性的会面。

同时,由于涉及在安哥拉和纳米比亚军事冲突中被南非军队俘获的苏联人员等问题,苏联与南非早在1984年8月就开始了政府间的秘密接触。苏方将与南非政府的接触情况及时通报给非国大方面,这是苏联与非国大之间紧密关系的证明。1986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会见坦博时说,博塔(南非总统)已经“通过第三方、甚至第四方多次敲了我们的门”,但“我们并不着急”。他作出保证:今后只有在与非国大方面事先磋商的情况下,苏联才会在这方面采取新的举措。坦博对此表示满意,称“苏联应我们的要求决定要竭尽全力援助非国大、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和南部非洲地区人民去实现目标,我们对此感到十分满意和莫大的鼓舞”。^①

在这个阶段的前期,苏联与非国大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1986年11月4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正式会见了非国大主席坦博,这是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会见非国大的第一把手(因曼德拉等仍在狱中,所以坦博是非国大主席)。此后,坦博率非国大代表团多次访问苏联。1987年1月,在亚非团结委员会的帮助下,非国大驻莫斯科代表处宣布成立。该代表处享有所有外交特权,象征着非国大与苏联正式关系的建立。

但从1989年初开始,由于苏联、东欧局势的重大变化,戈尔巴乔夫的政策重心和注意力发生明显变化,与非国大的关系受到忽视。1989年的南非共七大也移至古巴首都哈瓦那召开。在南部非洲,苏联与美国就纳米比亚

^① Oliver Tambo, *Preparing for Power: Oliver Tambo Speaks*, London: Heineman, 1987, p.233.

独立问题作出安排，南非政府同意从纳米比亚撤军，古巴则从安哥拉撤军。虽然非国大在安哥拉设有营地，但苏联并没有就此项安排事先征求非国大的意见。结果，非国大被迫撤离安哥拉的营地，驻扎在安哥拉的苏联空军的运输机提供了运输方面的帮助，但非国大对此突然变故感到措手不及。对此，南非共发言人明确表示了不满：“阿索扬将我们的解放斗争贬低为国际上为和平而战中的一个令人厌恶的角色。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们的解放战争是争取世界和平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①

然而，当1989年3月坦博率非国大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就此事磋商时，苏共领导人卢基扬诺夫(Anatoly Lukyanov)一面声称苏联要确保西南非洲平稳地实现独立，一面又表示苏联坚决拒绝了南非政府讨论两国关系的提议，同时保证：苏联在就苏南两国关系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都将事先征求非国大的意见。但就在同一个月，苏联、英国和南非学者在英国举行了一个学术会议，而非国大方面并未受到邀请。

1990年2月，南非民主进程出现重大转机，非国大、南非共和泛非大等组织重获合法地位，非国大领导人曼德拉和其他解放运动领导人获释出狱。非国大与国民党政府开始举行谈判。苏联方面亦开始与南非政府公开接触。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A. Shevardnadze)在出席纳米比亚独立庆典时，会见了非国大领导人曼德拉和南非总统德克勒克。此后，苏联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拉近了与南非政府的关系，与非国大的关系却进一步趋冷。1990年8月，一家苏联国营公司——Ekoprom邀请南非贸易、工业与商务部长德尔(Kent Durr)赴苏联访问。尽管此时针对南非的国际制裁尚未解除，但谢瓦尔德纳泽批准了这次访问，只是在德尔启程前的最后时刻才通知了非国大方面。对此，非国大驻苏联代表处主任马卡纳(Simon Makana)明确表示了不满，指责苏联方面背着非国大与南非政府打交道。1991年11月，就在苏联解体前不久，南非外长博塔(Pik Botha)到莫斯科进行“非正式的”访问，却磋商安排了两国建交和德克勒克顺访莫斯科两大事宜。访问期间，南非与苏联签署了恢复领事级外交关系的协议，苏联同意德克勒克在下个月出访时中转顺访莫斯科（后因苏联国内原因而未能成行）。

^① Argus, August 11, 1989. In Peter Vanneman, *Soviet Strategy in Southern Africa*, p.35.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继续了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势头，于 1992 年 2 月与南非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一次，俄政府既没有事先征询非国大的意见，也没有顾及仍然有效的国际制裁。俄政府没有对自己的行动遮遮掩掩，而是明确宣布俄罗斯对南非的政策“完全是基于俄罗斯的国家利益”。^①俄罗斯与非国大的关系不再紧密，就此打开了新的一页。

三

苏联与非国大的关系以 1989 年为转折点，之前是不断的加强和提高，之后逐渐趋冷，这对两国关系的后续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苏联的新思维外交政策原则和南非国内的民主改革进程。在新思维政策原则之下，苏联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坚决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做法，戈尔巴乔夫甚至提出：中东欧国家有选择的自由，苏联不会干涉其的内政。^②他进一步对此作了阐述：

既然我们在自己国内决定改革和民主化的方针，我们就有责任把这个方针推广到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上。不光是在口头上，而且是在实际行动上，要承认他们的自决权。承认他们有选择发展道路的自由。不再利用盟国的关系把自己的思想方式、自己的模式、自己的政策强加于人。^③

基于这种外交新思维，戈尔巴乔夫大幅调整了苏联对于南部非洲解放运动的立场，致力于结束该地区的武装冲突，具体举措包括从安哥拉撤出古巴军队、推动纳米比亚独立和推出针对南非的新战略。

南非政府主导的民主改革进程，始自沃斯特 (Balthazar J. Vorster, 1966-1978 年任总理) 时期。博塔 (1978-1984 年任总理, 1984-1989 年任总统) 统治前期，继续了民主改革进程，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颁布

① Nicholas Anderton, *From Gorbachev to Yeltsin: Moscow-South Africa Relations at a Time of Change*, Stellenbosch: 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 1994, p.1.

② 参见潘兴明：“帝国视野下的苏联解体研究”，《俄罗斯研究》，2011 年第 6 期，第 10 页。

③ 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 315 页。

新宪法，设立三院制议会，大幅度修订种族政策，将有色人和印度人纳入享有政治权利的种族范围之内，打破了白人垄断政治资源的局面，这是改变种族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次，承认黑人工会的合法地位。^①第三，进一步放松对黑人迁徙的限制。第四，给予黑人某些处理地方事务的权力，准许他们在本种族聚居的市镇、村庄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②第五，废除某些重要的种族隔离法律和规定，扩大放松种族隔离的范围，改善黑人的处境。^③1985年以后，非国大领导的黑人暴力反抗和有组织的斗争再掀高潮，博塔政府予以严厉镇压，并基本上控制住了局势。即使如此，博塔并没有完全摒弃民主改革，没有将非国大完全排除在这个进程之外，他与曼德拉的秘密会见便是明证。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苏联与非国大相互的重要性均不如前。从苏联方面来说，苏联大力缓和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对非洲解放运动的支持虽然依旧，但更加倚重联合国这样的国际安全机制和苏美两国的协调来解决非洲地区的冲突问题。在南非问题上，苏联也改变了拒绝与种族主义政权打交道的做法，而是将南非视为西方的一部分，开始秘密地与其进行实质性的接触。1987年，苏联官员与南非官员就有过接触，而且前者的级别要高于后者。1989年，苏联副外长阿达米辛在南非某地会见了南非政府的代表。^④1990年，苏联政府不顾国际制裁的有关规定，与南非最大的钻石公司——戴比尔斯公司签订了为期五年的钻石贸易协议。协议规定，苏联方面向戴比尔斯公司销售钻石，价值为10亿美元。^⑤由此可以看出，苏联政府在对待南非的问题上已经显示出战略和政策选择上的灵活性和开放姿态，更为重要的是，还有两边下注的深刻含义，希望无论是南非白人政权继续掌权还是非国

① *Race Relations Survey*,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 1986, pp.231-290.

② 参见 A. Lemon, ed., *Homes Apart: South Africa's Segregated Cit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1.

③ 参见潘兴明：“南非种族冲突的化解与现代化之路”，《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潘兴明：“南非民主进程的顿挫与延续——略论博塔的改革总战略”，《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

④ Peter Vanneman, *Soviet Strategy in Southern Africa*, p.23.

⑤ Vladimir Shubin, “The Soviet Union/Russian Federation’s Relations With South Afric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Since 1980”, p.24.

大赢得政权，苏联都能保持主动，在最大程度上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影响。

从非国大方面来说，维持与苏联的密切关系和继续获得苏联援助十分重要。同时，南非政府实施的民主改革措施既对其施加了压力也向其提供了新的机会。因此，在80年代中期，支持和加入民主改革进程已经成为非国大领导层纳入视野的现实选择之一。非国大领袖曼德拉的思想和斗争策略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在1990年获释后表示：“在监狱里，我对白人的愤怒已经有所缓和，但是，我对这种制度的仇恨却变得越来越强烈。我要让南非人明白，尽管我仇恨这个使我们相互仇恨的制度，但是，我甚至对我的敌人也不乏爱意。……我们不希望这个国家还没有得到解放就先遭到毁灭，而驱赶白人无疑将使这个国家毁于一旦。”^①此后，在德克勒克当政期间，南非民主进程进入了第三阶段，毅然进行了具有重大变革意义的改革。他与曼德拉共同推动和完成了民主改革进程，实现了以黑人种族为主的多数人统治的建立，同时也结束白人政权数世纪以来的统治。德克勒克本人也由“一国之主”变为反对党的领袖。对此，贝纳特在《20世纪的南非》中指出：“这实在是旷世罕见之举，即在一个种族、财富和文化上存有如此巨大差异的国度，南非实现了民主政治和权力移交；同样在没有出现更为激烈的冲突或外来干预的情况下，一个非民主的统治集团放弃了手中的权力。”曼德拉在1995年对此的评论更是广为人知，他将这场民主改革及其成果称之为“小小的奇迹”（small miracle）。^②新南非的建立，表明了曼德拉宽容和解的化解冲突的精神及其支持和参与民主改革进程的路线在非国大中的主导地位 and 支配性影响力。

四

在1961-1991年的三十年里，苏联与非国大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苏联对非国大反种族隔离制度斗争的支持和援助上，而非国大对苏联的回馈十分有限，在双方的互动中呈现较明显的单向性特征。当然，在冷战的大背景下，

① [南非]曼德拉：《勇者曼德拉自传：漫漫自由路》，谭振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76-477页。

② Daryl Glaser,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South Africa*,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1, p.200.

苏联对非国大的援助具有更广泛和深刻的含义，即壮大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壮大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力量。而支持非国大这样的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组织，也能为莫斯科赢得道义上的制高点。在此，我们有必要对苏联援助的作用和结果及其相关因素作进一步的考察和评估。

首先，苏联的援助具有相当大的力度和规模，如超过四分之一的非国大成员接受了苏联的各种培训。武器援助对于姆克这样一支不足一万人的武装力量来说，也是十分充裕。不过武器类别主要是轻武器和防御性武器，适用于游击战，却难以与武器装备精良、规模大得多的南非军队相抗衡。而且，非国大自身武装力量的实力不足，通过武装斗争直接夺取政权的前景并不乐观。因此，苏联援助的作用主要是确保了非国大作为与种族隔离政权相对立和抗争的最主要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存在，而对于非国大后来获取国家统治权只起到辅助性的次要作用。虽然苏联的多元化战略与非国大介入民主改革进程具有相关性，对南非共产党的政策调整发挥了影响力，但以曼德拉为首的非国大领导层作出与德克勒克政府谈判和共同推进民主改革的决定，更多的是一种自主选择的结果。曼德拉在漫长的被囚禁期间，通过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冷静思考和对非国大反抗路径的理性审视，产生了新的感悟和认识，主动做好了改变原有的斗争路径及改变对白人政权立场的准备。况且当德克勒克的民主改革启动时，苏联与非国大的关系已经转趋冷淡，难以施加以往那种影响力。因此，当德克勒克决定释放曼德拉和其他非国大领导人、宣布非国大合法之时，曼德拉果断决定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宣布放弃武装斗争，建立包括南非所有种族在内的民族团结政府。显然，南非的民主改革是非国大能够建立新南非和获取政权的决定因素。再者，曼德拉新政府没有实行苏联式的制度和政策导向，没有在南非实行“民族民主革命”（National Democratic Revolution），^①也没有采取清算方式来惩处政敌，而是通过宽容和解的方式来化解南非的种族冲突和仇恨，树立了通过和平方式化解国内冲突的新典范。简言之，苏联对于新南非的建立及其政策原则和治理理念及模

^① “民族民主革命”指殖民地人民通过民主革命，推翻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参见 Irina Filatova, “The ANC and the Soviets”, 10 August 2011. <http://www.politicsweb.co.za/politicsweb/view/politicsweb/en/page71619?oid=250154&sn=Detail>

式的影响微乎其微。对此，一位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任教的非洲裔南非问题专家诺鲁茨逊格（Sam C. Nolutshung）在1985年下半年指出：“它（南非）过去和现在都从来没有面临来自苏联的直接压力。假如所有邻国均与苏联结为紧密盟友的话，毫无疑问，种族隔离政权的日子会过得不那么舒服。但这个政权也能明白无误地发现，一个反共的南非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存在相当长的时间。”^①

其次，苏联援助的作用和影响受制于非国大与南非共的关系。苏共与南非共的关系密切，南非共是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一手打造的最早一批共产党之一，而南非共与非国大是联盟关系。当时，一批南非共领导人在非国大担任要职，其中包括南非共总书记斯洛沃（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历任姆克总参谋长等职）、宣传部长姆贝基（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历任国际部长、新闻办主任等职）、主席特鲁姆（Dan Tloome，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皮拉索（Mzwai Pilaso，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1981年起主管非国大情报和人事工作）和德拉米尼（Stephen Dlamini，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任非国大的南非工会大会主席）。但非国大基本上是一个民族主义政党组织，其目标是将南非建设成为一个多种族国家，争取黑人的平等地位和权利。对南非共与苏共的密切关系，非国大持猜疑态度，更不愿成为莫斯科全球战略中的一枚棋子。非国大中的马克思主义派甚至将南非共视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认为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要突出所谓的“比勒陀利亚—华盛顿轴心”，将美国妖魔化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帝国主义同盟者。因此，以下事实并非巧合：在非国大的领导核心成员中，最高领导人曼德拉、主席坦博、总书记恩佐（Alfred Nzo）和姆克司令莫迪斯（Joe Modise）均非南非共党员。

再次，苏联国内僵硬的官僚体制和其他因素对非国大的内部建设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苏宾对此有这样的表述：“人们不得不承认的是，苏联社会的某些方面，诸如领导人（个人）崇拜、教条主义、重大决策前缺乏广泛讨论的做法、限制党内民主的做法等，都不是最值得仿效的方面。”^②应该说，

① Sam C. Nolutshung, “Soviet Involvement in Southern Afric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481, September, 1985, p.144.

② V. Shubin, *ANC. A View from Moscow*, pp.400-401.

这些负面影响至今在非国大的内部运作中仍然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另外，苏联还与南非的其他黑人组织建立和保持关系，其中包括非国大的主要政治竞争对手——泛非大和布特莱齐 (Gatsha Buthelezi) 的因卡塔自由党。这也令非国大感到不快。

总之，苏联与非国大的关系对俄南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苏联援助的作用主要是确保了非国大的生存及其武装斗争的延续，而对于非国大后来获取国家统治权的作用不大。其主要原因在于非国大的武装力量有限，难以通过武装斗争直接推翻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同时苏联对非国大的政策改变以及对南非前途的两面下注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苏联对南非政局演变的影响力。

【Abstract】 Russia's relations with South Africa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rly 1960s, when 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of South Africa establishe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Within next 30 years, the Soviet Union provided ANC with important moral and material assistance, especially weapons and equipments. From the mid-1980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viet Union and the ANC had gone through new changes, there was a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united-front strategy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of the ANC, which created a more suitable environment for democratic reforms in South Africa. However, the Soviet Union's role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majority-ruled South Africa should not be overestimated. In fact,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NC cooled down in the late 1980s, which directly impacted the Russia-South Africa relations thereafter.

【Key Words】 Soviet Union, Russia, South Africa, ANC, democratic reforms

【 Аннотация 】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Южной Африкой можно проследить ещё в начале 1960-х гг., когда начали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и Африканским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Конгрессом. В

почти 30-летний перио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редоставил АНК важную моральную и материальную помощь, особенно оказал помощь в форме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я оружия и снаряжения. Начиная с середины 1980-х гг.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и АНК произошли нов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произошло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совет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я союзников и стратегии диверсификации АНК, что создало благоприятные условия дл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реформ в Южной Африке, однако роль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создании новой Южной Африки не следует переоценивать.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в конце 1980-х гг. наблюдалась тенденция охлажд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и АНК, что оказало прямое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на последующ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Южной Африко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Россия, Южная Африка, АНК,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е революци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

试析俄罗斯金砖国家外交中的几个问题*

肖辉忠**

【内容提要】从严格意义上讲，金砖国家不是高盛集团概念的产物，而是在某种程度上的俄罗斯外交努力和智慧的“成果”。正因为如此，俄罗斯对金砖国家，以及对自身的金砖外交有着深入的思考。可以说，金砖外交既是俄罗斯在21世纪的一次典型的“智慧外交”，也是俄罗斯传统的大国均势外交思维的体现。对于俄罗斯的金砖外交思想和行动，值得加以关注。

【关键词】俄罗斯 金砖外交 内政与外交 “智慧外交” 大国协调

【中图分类号】D50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2) 04-0021-(22)

金砖国家从高盛集团的投资概念到国际政治的现实存在，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所起的推动作用，最为突出。在俄罗斯一系列举动的背后，有必要探究其针对金砖国家的外交战略。“战略”这个词，在严格意义上，通常是指为了实现某种目标（如政治、军事、经济或国家利益方面的目标）而制定的大规模、全方位的长期行动计划。俄罗斯有无针对金砖国家的外交战略？如果说俄罗斯接近欧洲，面向欧洲的社会文化定位与发展，是其“不需要重新审视”的一贯路线^①，即发展与欧洲的关系是俄罗斯的长期战略；而俄罗斯对于亚太，包括与金砖国家的关系，还没有一致的定论。在一些西方学者眼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俄罗斯与新兴市场国家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1JJDGJW009）的阶段性成果。

** 肖辉忠，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讲师。

① 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中俄分组俄方报告提纲（主要报告者卡拉加诺夫、博尔达切夫、巴拉巴诺夫）：“俄罗斯与亚洲共同进入太平洋还是俄罗斯作为亚洲的一部分进入太平洋？”，转引自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21世纪的中国与俄罗斯：地区挑战与机遇——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提纲”，《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

中，“克里姆林宫的官员推动金砖国家机制的举动，很可能是机会主义的做法，而不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举措。”^①俄罗斯学者发表的文章，也很少以“战略”这个词汇来形容俄罗斯对金砖国家的思考。因此，用“俄罗斯的金砖国家外交”而不是“俄罗斯的金砖国家战略”可能更为恰当。但这并不否认俄罗斯对于金砖国家的考虑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一些俄罗斯学者从金砖国家身上看到了“目前出现了最有可能改变对俄罗斯不利的国际力量对比的机会。虽然这个进程才刚刚开始，但是俄罗斯应该积极参与，以便在将来取得有利的地位。”^②无论金砖国家能够走多远，它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现实，并在俄罗斯的外交中占有了较为重要的一席之地。

一、简要的研究综述

目前西方、中国和俄罗斯学者对于金砖国家的相关问题，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研究，但对于俄罗斯的金砖外交问题，除了俄罗斯本国学者之外，关注者还相对较少。

西方已有一些学者发表文章分析俄罗斯在金砖国家中的地位，以及俄罗斯的金砖外交，但多数带着批评和嘲讽的口气。如，认为俄罗斯虽然积极，但是不够资格^③；西方学者在谈论国际治理时，更倾向于使用刺激俄罗斯的“BIC”（没有“R”）^④；也有将俄罗斯称为“后金砖国家”（Post-BRIC Russia）这样讽刺性的话语^⑤；瑞典学者赫德兰认为，在金融危机之后，俄罗斯已经跟不上金砖国家的发展步伐了，虽然俄罗斯在2009年6月主办了第一届金砖国家首脑峰会，但是东道国不再有资格充当这一杰出团体的成员了^⑥。然

① Cynthia Roberts, “Building the New World Order BRIC by BRIC”, *The European Financial Review*, February-March 2011.

② Давыдов В.М. Пробуждающиеся гиганты БРИК//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 5. Май 2008. С. 131-142.

③ S. Neil MacFarlane, “The ‘R’ in BRICs: is Russia an emerging pow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82: 1, Jan. 2006.

④ Amrita Narlikar, “New powers in the club: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 86, Issue 3, May, 2010.

⑤ Ben Judah, Jana Kobzova and Nicu Popescu, “Dealing With A Post-Bric Russia”, ECFR, November, 2011.

⑥ 斯蒂芬·赫德兰：“金融危机之后的俄罗斯”，《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6期。

而也有部分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俄罗斯的一次“聪明外交”，指出，当高盛集团提出“金砖国家”这个概念以后，克里姆林宫敏锐地感受到了其背后的意义，并巧妙地加以利用。^①

整体而言，西方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研究金砖国家外交，包括俄罗斯金砖外交的学术共同体，研究成果也较零散。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设立的金砖国家信息中心。^②这是一个开放的研究中心，与金砖国家的相关组织，特别是与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研究大学（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Высшая школа экономики,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的国际组织研究中心，有着比较密切的学术合作和资源共享，同时也进行了一些联合项目研究。就在2012年新德里峰会前夕，两个中心联合公布了“2011年三亚峰会执行评估”的研究报告。^③他们通过数据和跟踪分析，总体上评估了金砖国家提出建议的能力，以及执行的情况。他们的研究表明，金砖国家整体而言，制度化程度在加强，对话质量在提高，协调能力也在上升。他们更细致的分析表明，在金砖国家内部，对决议执行的情况有差别，如对2011年三亚峰会的一些决议，按执行程度高低，分别为：印度（100%，印度得分高的主要原因是2012年金砖峰会在印度举行），巴西、中国（并列，80%），俄罗斯（60%）和南非（50%），该研究对于认识金砖国家的制度建设，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是关注金砖国家的整体问题，对于俄罗斯金砖外交的分析相对较少，总体而言，有如下的一些特点：（1）大量研究集中在金砖国家的金融和经济方面，其中涉及一些俄罗斯的经济问题^④；（2）关于金

① Cynthia Roberts, “Building the New World Order BRIC by BRIC”; Тома Гомар. Два ориентира для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6. Том.008. 2010. С. 113-121.

② BRICS Information Center,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www.brics.utoronto.ca/>

③ The BRICS Research Group, a joint undertaking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Russia) and Trinity College of University of Toronto(Canada), “2011 Sanya BRICS Summit Compliance Report, 15 April 2011 to 12 March 2012”, 27 March 2012.

④ 例如林跃勤：“金砖四国：经济转型与持续增长”，《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10期；张国强，郑江淮，崔恒虎：“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异质性与路径选择——基于金砖四国比较视角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年第4期；张聪明：“金砖四国：国家竞争力比较”，《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9年第10期；王信：“金砖四国国际金融实力提升对国际金融及其治理的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1期。

砖国家定位,代表性观点认为,金砖国家是当代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的重要载体^①,也有涉及金砖国家全球治理这个议题的^②; (3) 对各国参与金砖国家的动机、战略有一些分析文章,其中包括对俄罗斯金砖外交的初步分析^③。总体而言,分析俄罗斯金砖外交的文章相对缺乏。中国学者对金砖国家,包括俄罗斯金砖外交的关注度在不断提升。在2011年3月举行的金砖国家智库会议(北京)期间,《当代世界》编辑部形成了一份整合金砖国家学者文章的英文版论文集。^④ 相比而言,俄罗斯学界对于其金砖外交问题的关注,起步早,参与研究的机构水平高,也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思考和成果。

在俄罗斯,针对金砖国家的主要研究机构和部门有:俄罗斯世界基金会(фонд «Русский мир»,以该基金会主席、杜马议员尼科诺夫为代表,В.А.Никонов)、俄罗斯外交部下属国际关系学院(МГИМО МИ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АН академик,以季塔连科所长为代表,М.Л.Титаренко)、俄罗斯科学院拉美所(Институт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РАН,以达维多夫所长为代表,В.М.Давыдов)、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研究大学(以该校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研究所所长拉利奥诺娃为代表,М.В.Ларионова),等。这些部门在金砖国家问题以及俄罗斯金砖外交的研究上,非常活跃,且与政府立场比较一致。他们大多对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持积极态度,认为金砖国家不是一个“虚拟的现实”(не виртуальн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俄罗斯参与这个机制十分有利,金砖国家的机制在形成之中,而且制度化水平正在不断上升^⑤,俄罗斯有很好的机会来塑造和影响金砖国家机制。^⑥ 这些机构也发起、组织了一系列高水平的针对金砖国家问题的学

① 杨洁勉:“金砖国家合作的宗旨、精神和机制建设”,《当代世界》,2011年第5期。

② 黄仁伟:“金砖国家崛起与全球治理体系”,《当代世界》,2011年第5期。

③ 蔡同昌:“俄罗斯人如何看待‘金砖国家’?”,《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年第1期;徐国庆:“南非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探析”,《西亚非洲》,2011年第8期;王永忠:“金砖国家经济利益的交汇与分歧”,《亚非纵横》2011年第3期。

④ “发展 合作 共享——金砖国家智库会议”会议论文集,2011年3月24-25日。

⑤ Marina Larionova, Mark Rakhmangulov, Andrey Shelepov, “BRICS in the system of global governance”, 27 March 2012, <http://www.hse.ru/org/hse/iori/news/50107827.html>

⑥ Нов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займётс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и БРИКС. 13.09.2011. <http://www.russkiymir.ru/usskiymir/u/news/fund/news0686.html>

术会议。^①2011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金砖国家智库会议上，应邀前来的大都是这些机构的代表。这些机构和学者著书立说，发表研究成果和观点。^②特别是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研究大学，其网站上有比较丰富的金砖国家研究资料信息。^③在俄罗斯，对金砖国家研究的积极与政府的支持有密切的关系。

2011年9月13日，根据俄罗斯总统的指令，在莫斯科成立了“金砖国家研究国家委员会”（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п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БРИКС）。该机构由俄罗斯世界基金会和俄罗斯科学院牵头，俄罗斯外交部协助成立。任务是协调分散在俄罗斯各地、各部门和研究机构中的研究力量，以及国外学者的力量，开展针对金砖国家在国际政治与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并希望借此机制，凝练出俄罗斯的立场和专家建议。该委员会的主席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俄罗斯世界基金会主席尼科诺夫负责委员会的管理工作。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研究大学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研究所所长拉奥诺娃也在其中担任重要职位。该机构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④

在俄罗斯也有反对将金砖国家机制化的声音，如叶夫根尼·亚辛（Е. Ясин）。这位俄罗斯著名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研究大学的学术带头人认为，“金砖国家的差异过大，特别是存在着文明上的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类似于八国集团那样有效的联合。另外，不能以经济的增长速度，来判断说新兴国家超越了发达国家。金砖国家可能在经济上成

①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оссия в группе БРИК: проблем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роекция на внешний мир»,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ой совместно Институтом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РАН и Российски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м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ноябрь 2009 г.); «Круглый стол: БРИК Как Нов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Многовекторн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организован Институто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МГИМО (У) МИД России при содействии журнал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2 ноября 2009).

② 例如 *BRICS: The 2012 New Delhi Summit*, the inaugural publication of the BRICS Research Group, published by Newsdesk, Edited by John Kirton and Marina Larionova, 2012, London; Давыдов В.М., Мосейкин Ю.Н. БРИК: предпосылки сближения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Пробуждение БРИК. The Awakening of BRIC.

③ <http://www.hse.ru/org/hse/iori/bric>

④ России создан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п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БРИКС. 14 сентября 2011. <http://www.hse.ru/org/hse/ori/news/35140813.html>; В Москве создан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п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БРИКС//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13.09.2011. <http://www.rg.ru/2011/09/13/brics-anons.html>

为世界的火车头，但是金砖国家未必能成为举足轻重的国际组织。”^①虽然这是比较典型的西方自由主义的观点，但在俄罗斯国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已有资料研读的基础上，围绕着几个问题进行的初步思考：首先，俄罗斯如何看待金砖国家；其次，俄罗斯的金砖外交是如何展开的；金砖外交与俄罗斯内政、与八国集团外交的关系如何。

二、俄罗斯眼中的金砖国家

俄罗斯同时是八国集团（富国、发达国家俱乐部）和金砖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组织）的成员，俄罗斯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其他金砖国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俄罗斯对自身的定位

国家的身份定位，历来都是困扰俄罗斯的重要问题，其根源在于俄罗斯的文明属性与地理空间之间的反差。不论怎样，俄罗斯总在摇摆之中。

金砖国家身份给俄罗斯提出了另外一个定位问题：俄罗斯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叶利钦把俄罗斯带入了西方八国俱乐部，可以说是其与西方关系中的主要功绩之一。俄罗斯也认为自己是“欧洲”、“发达”国家；特别是 2007 年以来直到金融危机之前，俄罗斯甚至提出了要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口号。即便是在金融危机之中，俄罗斯虽然遭受重创，但是在一些俄罗斯著名的经济专家和学者以及俄罗斯领导人看来，俄罗斯仍然是与其他金砖国家不同的“向国民负责的”，“西方式的福利、民主和发达国家”。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金砖国家日益成为俄罗斯在讨论国内问题时的一个参照，但其形象，或者用于形容的言语，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是“落后”于俄罗斯的。2011 年 2 月，普京总理与俄罗斯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就 2020 年前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紧迫问题进行了讨论。俄罗斯国民经济研究院院长、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马乌（Vladimir Mau, rector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residential Government Service）

^① Евгений Ясин. Страны БРИК очень разные для созд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10 июня 2009. <http://www.hse.ru/news/8364926.html>

说，“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我想强调的是发达国家，不是发展中国家，也不是金砖国家（俄罗斯除外），即所有的发达国家和俄罗斯，正在进行着新的发展模式的讨论。”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研究大学校长库兹明诺夫（Yaroslav Kuzminov, rector of the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在发言中认为，“俄罗斯的主要开支是用于承担社会责任，这一点与金砖国家不同，金砖国家承担的社会责任要远远小于俄罗斯。俄罗斯正在朝着社会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而其他金砖国家很容易集中资金，投资于现代化的更新中”。普京在回应发言中说，“其他金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俄罗斯在居民福利、保险和城市化等方面，远超过金砖国家；他们（金砖国家）面对自己的民众没有这些义务和责任，他们可以牺牲民众的利益来达到目标，但俄罗斯不能……我们不完全是一个金砖国家，虽然我们在形式上是金砖国家，我们与巴西和中国不同。”^①

从这些对话中可以感受到，俄罗斯并不甘心与金砖国家为伍，俄罗斯更认为自己是一个欧洲的、文明的发达国家。这种观点在俄罗斯国内有很大市场。当有声音说要把俄罗斯开除出金砖国家的时候，俄罗斯认为自己并不是金砖国家的薄弱环节，相反，俄罗斯不属于这个国家集团，俄罗斯是一个比其他金砖国家更发达的国家。^②一些俄罗斯学者指出，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这些国家在近代以来，一直处于落后的状态，只是近几十年来才发展迅速。对于俄罗斯而言，更确切地讲，是恢复刚刚失去的曾经的地位。俄罗斯经济问题专家海费茨（Б.Хейфец）指出，“俄罗斯与中国、印度和巴西不同，这些国家进入金砖国家是由于近 15-20 年的快速发展，而俄罗斯则是从超级大国‘跌入’到这个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集团之中。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俄罗斯的国内产值在世界中的比重，就超过了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份额了。只是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才逐渐落后于中国。”^③

①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В.Путин встретился с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ми экспертных групп по подготовке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по актуаль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стратеги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 16 февраля, 2011. <http://www.premier.gov.ru/events/news/14155/>

② Выгнать Из Брикса!// Профиль.08.04.2012. <http://www.mid.ru/brics.nsf/WEBNovstart/C325786100462DFE432579DA0048EC69>

③ Хейфец Б. Брик: 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 9. Сентябрь 2010. С.72-80.

俄罗斯一方面表现出对其他金砖国家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又以自己是金砖国家为荣。这与金砖国家的特殊性，以及俄对金砖国家的整体定位有关。

（二）俄罗斯如何看待其他金砖国家

总体而言，俄罗斯方面主流的认识是：金砖国家不是“南南合作”；金砖国家之间虽然存在着分歧，但是有稳固的合作基础。

俄罗斯之外的金砖国家，基本上视金砖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的联合，是某种程度上的“南南合作”。但在俄罗斯看来，俄罗斯加入的不是一个南南合作的组织，对于这一点俄罗斯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和定位。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希望金砖国家成为一种新型的国际组织，超越以往的‘东—西’，或‘南—北’的障碍；金砖国家的总人口近 30 亿，这样一个组织，不能被南北之间桥梁的角色、或者是被南南政治空间所限制；如果这样定义金砖国家，那么会限制金砖国家在国际政治事务中追求独立政策的目标和机会。”^①也就是说，在俄罗斯看来，金砖国家不是南南合作，也不是南北之间的桥梁，而是独立的、不被意识形态和经济地位所束缚的新型国际组织。

关于金砖国家之间的差异和合作的基础，尼科诺夫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他指出，“能否认为金砖国家是天然的盟友？从外表看，是不能的，因为他们的差别实在太太：没有共同的文化和文明背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情况十分不同；政治体制、金融体制和经济模式不同；每个国家的外交战略重点也不同。虽然整体而言，金砖国家在同美国的关系中都有紧张的因素，但是金砖国家不可能形成一致的针对西方的议事日程。然而，金砖国家也有共同点，即都想成为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②此外，相当大部分的俄罗斯学者，从“中、俄、印”三边机制来看待金砖国家的合作基础，认为中俄印之间的三边合作机制，已经走过了 10 余年的历程，相当具有建设性，是金砖国家合作的核心与基础；这是俄罗斯看待金砖国家的重要视角。

以上这些看法，大致代表了俄罗斯对于金砖国家整体上的观点，即相对

① Sergey Lavrov, “BRICS: a new-generation forum with a global reach”, in John Kirton, Marina Larionova ed., *BRICS: The 2012 New Delhi Summit*, pp.12-13.

② Пробуждение БРИК. The Awakening of BRIC. М., 2009. Текст подготовлен В. А. Никоновым по итогам перв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экспертов и политологов БРИК, состоявшейся в Москве в декабре 2008 г.

比较超脱，能够抓住合作中的关键因素。但在面对每一个具体的金砖国家的时候，也就是说从内部来看金砖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不那么容易了。

俄罗斯很清楚自身的优势在于政治、军事、资源等领域：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八国集团的成员；在核武领域内与美国平起平坐；丰富的资源等等。这些不是其他金砖国家所同时具备的。也有俄罗斯学者据此指出，俄罗斯是金砖国家中的领头羊，特别是俄罗斯的八国集团成员身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巩固了其在金砖国家中的地位。^①劣势在于经济方面。俄罗斯在整体上的实力（经济方面）实际上要逊色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有俄罗斯学者甚至指出，中国成为世界力量的一个中心毋庸置疑，印度也会因自己的经济，人才和文化的资源，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大国；而俄罗斯需要现实地衡量自己在未来世界格局、甚至是在金砖国家中的地位。^②还有俄罗斯经济学家从其他方面比较金砖国家。例如，认为在金砖国家之中，俄罗斯的人口最少（南非除外），俄罗斯的经济也更依赖于外国的投资，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不如其他三国，腐败程度高，商业环境差。在一些创新指标上，俄罗斯也落后，特别是相对于中国而言。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中国远远超过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也超过了俄罗斯。2008年，美国在国际刊物上发文是33.29万篇，中国是11.23万篇，印度是3.84万篇，巴西是3.09万篇，而俄罗斯只有2.76万篇。^③

关于中国。西方学者的观点认为，虽然中国的上升令俄罗斯不舒服，但是俄罗斯除了接受之外，很难有别的选择，俄罗斯只能把中国作为其外交的优先方向之一。^④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俄罗斯的金砖外交显然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俄罗斯外交部门对金砖国家的通常说法是：金砖国家是俄罗斯推行多边外交、实现多极世界构想的重要途径和工具。显然，俄罗斯无意通过金砖机制成就中国，而是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面对中国不断上升的地

① Сергеев В.М., Алексеев Е.С.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ации БРИК (включая расширение повестки дня). Институ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Мгимо (У) Мид России, 03/20/2011. <http://www.mid.ru/brics.nsf/WEBforumBric>

② Кива А.В.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Страны БРИК в мечтах и реальност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5. 2009. С.26-36.

③ Хейфец Б. Брик: 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

④ Adam Balcer, Nikolay Petrov, "The Future of Russia: Modernization or Decline", *demosEUROPA*, Centre for European Strategy, Warsaw 2012.

位，俄罗斯的不安也是存在的。俄罗斯学术界，也包括俄罗斯外交部门的一个基本共识是，金砖国家内潜在的领导国，只可能是中国。俄罗斯也承认，中国已经成了金砖国家的参照系（reference point）：俄罗斯在金砖框架内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托于中国的；对于巴西而言，最重要的也是中国；中国对于印度也很重要；考虑到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南非无疑会把中国视为参照系。^①俄罗斯远东所副所长卢贾宁明确提出，中国在金砖国家中将逐渐成为客观上的主角。俄罗斯应该努力不要让金砖国家变成“中国项目”（китайский проект），不要让中国因素主导一切。^②

俄罗斯面对中国，心态比较复杂。一方面，金砖国家需要中国的力量，缺了中国，就几乎不会有什么意义；另一方面，俄罗斯需要面对中俄实力对比的不断拉大，而且这样的趋势可能还会持续较长时间。目前看来，俄罗斯还是能够比较平静地看待中国的地位。首先，中国对于俄罗斯的尊重，使得俄罗斯较为坦然。其次，俄罗斯方面对中国的短板很清楚，即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印度也在金砖国家“内部”制约着中国。第三，用俄罗斯前外交部长伊万诺夫（Игорь Иванов）的话说，俄罗斯的优势是智慧，俄罗斯要在国际关系中承担设计者的角色，这样即或生产者（中国）人数多、阵势大，主导权仍在设计者那里。^③

关于巴西和印度。俄罗斯方面高度评价巴西在金砖国家中的积极表现。俄科学院拉美所所长达维多夫指出，在金砖国家中，俄罗斯和巴西最为积极，当俄罗斯提出金砖国家的合作倡议之后，在巴西得到了积极正面的回应。^④特别是在俄罗斯承办第一次金砖国家峰会之后，巴西同意在本国举行第二次峰会，俄罗斯对此感激不尽。俄罗斯对巴西参与金砖国家的动机也分析得很

① Итоги семинара «Роль и место БРИКС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ее развит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внешних вызовов и долгосрочных приорите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внутренней 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17 ноября 2011 г. <http://www.hse.ru/org/hse/iorg/news/38513291.html>

② Китай в мировой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Вып. XVI ежегодное издание/ отв. Редактор-составитель Е.И.Сафронова. М. ИДВ РАН, 2011. С.24.

③ Игорь Иванов. Ка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нужна России в XXI веке?//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 6. Ноябрь/Декабрь 2011.

④ Цветкова Н. Н. Страны Брик: 30 Лет Спустя// Восток. Афро-азиатские общества: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1. 2011. С.157-160.

清楚：巴西领导人希望借助金砖国家机制实现自己的外交抱负，使其地区领导国的地位得到国际上的承认，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以及寻求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位置。俄罗斯方面也明白，巴西在金砖国家范围内的活动，不会牺牲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关于巴西的实力，俄罗斯学者总体上认为在金砖国家之中，巴西不如俄罗斯，金砖国家的薄弱环节和“另类”是巴西，而非俄罗斯。^①

在俄罗斯学者看来，金砖国家这个术语，对于印度而言，首先是政治意义上的，即体现了发展中国家不再被发达国家任意宰割的历史性进步。俄罗斯专家认为，印度取得金砖国家的地位，是帮助其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舞台的难得机遇。但印度实现金砖国家计划的政治意愿，仍然有很大的摇摆，取决于政治领导人，以及印度与金砖国家之外的其他大国的关系。^② 俄罗斯学者对印度的判断是，印度目前太过于分化，加之与中国之间存在矛盾，因此在短期内无法成为金砖国家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印度在金砖国家中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巨大的潜在实力，以及与俄罗斯的传统友好、与中国的长期纷争；印度的这些特点，可以帮助俄罗斯维持金砖国家内部的某种有利于俄罗斯微妙局面。但是俄罗斯也无意为平衡中国而扶持一个强大的印度；未来印度的走向如何，对于俄罗斯是好是坏，俄罗斯也不清楚。

虽然俄罗斯宣称支持巴西和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这未必是它的真实想法。在 2011 年 3 月举行的金砖国家智库会议上，俄罗斯的一位学者指出，“巴西和印度，他们把金砖国家看做是走向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要一步，但是中国和俄罗斯却不希望如此。”^③

以上初步分析了俄罗斯对自身和其他金砖国家的定位与判断，下面将探讨俄罗斯的金砖外交。

① Мартин Гилман. БРИК: почему Россия может стать «восходящей звездой». 15 декабря 2009. <http://www.hse.ru/news/1163619/13386855.html>

② Давыдов В.М.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формате БРИК и роль России., in Давыдов В.М., Мосейкин Ю.Н. БРИК: предпосылки сближения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 ИЛА РАН. 2010. – 232с.

③ Georgy Toloraya, “Global Governance Dilemmas and Russia’s Place in BRICS”, “发展合作 共享——金砖国家智库会议”会议论文集。

三、俄罗斯的金砖外交分析

（一）内政与外交的关系

关于俄罗斯国内转型、发展及其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中国国内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①。独立以来的俄罗斯，其内部发展，看起来总是与西方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梅德韦杰夫总统提出的“俄罗斯现代化”战略，其外部依托仍然是西方，特别是欧盟。卡耐基莫斯科中心主任特列宁，在评价梅德韦杰夫总统的外交时指出，“在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明显地体现出要为国内现代化服务的迹象。”^②标志性的举措是，俄欧现代化伙伴关系计划。在2010年的瓦尔代俱乐部会议上，俄罗斯方面进一步推出了与欧洲结盟的计划，这个联盟的基础，是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加上欧洲的技术，^③目标也是指向俄罗斯的现代化。

但是大多数欧洲国家对此反应不积极，他们更认同的是大西洋联盟，而不是与俄罗斯的联盟。有学者直接指出，“到2011年底，俄罗斯与欧盟的现代化伙伴计划，基本上是失败的，仅仅是一些多边或者双边的宣言而已，只有个别的小项目在进行。”^④在面对俄罗斯时，欧洲分裂为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该更深地接纳俄罗斯，另一种认为必须限制俄罗斯，因此很难就俄罗斯问题形成统一的政策^⑤。还有短期内难于解决的俄罗斯与波兰之间的难题。普京总统在2012年2月发表的“俄国与变动中的世界”一文中，没有提及与欧洲的现代化联盟，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的失望。

欧洲方面的不积极，客观上推动着俄罗斯的战略“东进”。欧洲改革中心主任格兰特的看法是，“俄罗斯领导人，看到了国际权力和影响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他们想把俄罗斯经济的现代化与亚太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

①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参见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② Dmitri Trenin, “True Partners? How Russia and China see each other”, 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 February 2012.

③ Sergei Karaganov et al., “Towards an Alliance of Europe”, Valdai Discussion Club, October 2010.

④ Arkady Moshes, “Russia’s European policy under Medvedev: how sustainable is a new compromis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8, Issue 1, Jan 2012, pp.17-30.

⑤ Ibid.

起。虽然言语多于行动，但俄罗斯还是加入了许多亚洲的外交机制。”^①金砖国家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一个亚太机制，因为两个主要的大国中国和印度都在这个区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俄罗斯的新闻频道中说，“金砖国家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一个非常有前景的合作方式”，同时强调，“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从属于整个俄罗斯现代化战略，必须为之服务。”^②拉夫罗夫明确提出，“俄罗斯高度重视金砖国家机制，希望充分利用这种合作，加快俄罗斯经济的现代化进程。”^③法国学者戈马特（Thomas Gomart）也认为，“莫斯科积极地加强金砖国家合作，其用意是解决国内问题；俄罗斯内部的现代化，需要一个对俄罗斯而言更良好的国际环境。”^④

金砖国家与俄罗斯现代化战略之间的关系如何？俄罗斯的金砖国家外交，是服务于俄罗斯的现代化战略吗（从金砖国家吸引资金，技术；拓展金砖国家市场等）？在综合阅读俄罗斯学者关于金砖国家的文献之后，本文认为，俄罗斯对金砖国家的期盼，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更主要的是获得政治支持。政治方面的支持，分为在国际政治中对俄罗斯地位与立场的支持，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俄罗斯国内政治体制和主权的认同。这两点，都是俄罗斯亟需的。

俄罗斯展开金砖外交，主要还不是俄罗斯现代化战略所推动的，金砖国家也未必能够很好地服务于俄罗斯的此项国家战略，金砖国家相互之间甚至还存在着直接的竞争关系。关键在于，其他的金砖国家有意愿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主张；同时，不追随西方批评俄罗斯的内政，尊重俄罗斯的主权和政治制度选择。俄罗斯《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Russia in Global Affairs*）杂志主编卢基扬诺夫在2012年4月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俄罗

① Charles Grant, “Russia, China and global governance”,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CER), February, 2012.

② Сергей Лавров.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не может оставаться вне сферы задач по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стран. Из интервью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В. Лаврова телеканалу «Россия – 24»,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ого на официальном сайте МИДа РФ. 31.12.2010. Фонд «Русский мир». <http://www.ruskiymir.ru/ruskiymir/ru/publications/articles/article0660.html?print=true>

③ Sergey Lavrov, “BRICS: a new-generation forum with a global reach”, pp.12-13. in John Kirton and Marina Larionova ed, *BRICS: The 2012 New Delhi Summit*, Newsdesk, London, 2012.

④ Тома Гомар. Два ориентира для России.

斯未来的总统普京认为，金砖国家联合的基础，不仅仅是这些国家对多极世界有着共同的观点，最重要的是金砖国家都认为当今世界体系的基础仍然是主权国家，这才是金砖国家联合的基础。”^①

除非俄罗斯和其他金砖国家的内部体制发生大的变迁，否则俄罗斯与金砖国家的合作，可能将有一定的持续性动力。金砖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竞争，不足以构成俄罗斯金砖外交的羁绊。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以及西方对俄罗斯内政和外交的批评，都有可能进一步推动俄罗斯的金砖外交。

（二）俄罗斯 21 世纪的“智慧外交”

俄罗斯前外长、现任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②主席伊万诺夫撰写的“21 世纪俄罗斯需要什么样的外交”一文，发表在《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2011 年第 6 期上^③。伊万诺夫在此文中的观点，基本上也是俄罗斯的官方立场，以下摘译部分要点：

第一，伊万诺夫认为，俄罗斯很难确定外交的优先方向，欧洲，还是亚洲？因为俄罗斯的利益点实在太多了，在世界的不同的地区，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来说，都有自己的利益。

第二，在回顾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时，伊万诺夫指出，俄罗斯所关切的问题，没有得到西方的重视，这不能不引起俄罗斯的失望。普京的慕尼黑讲话，在某种程度上是俄罗斯无可奈何的选择，大部分的责任应由西方负责。俄罗斯已经度过了最羸弱的阶段，俄罗斯采取积极外交的资源与日俱增，最终，莫斯科能够与西方平等对话。

第三，伊万诺夫承认，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俄罗斯有的时候被迫采取过一些机会主义的做法，这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或者无力进行别的选择，但是例外的做法不应成为习惯和原则。

① Fyodor Lukyanov, “Sovereignty as the Foundation of BRICS Unity”, *RIA Novosti*, 5 April, 2012.

②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2010 年 2 月由俄罗斯总统下令成立，是非商业性的研究机构，由俄罗斯外交部和国防部出面建立，联邦政府拨款，目标是进行科研，同时培养外交和地区事务专家。参见 <http://kremlin.ru/news/6779>

③ Игорь Иванов. Ка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нужна России в XXI веке?//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6. Ноябрь/Декабрь. 2011.

第四，伊万诺夫也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俄罗斯外交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使用软实力。伊万诺夫指出，从世界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俄罗斯使用传统外交工具的能力，如军事和经济，将逐渐降低。原因很简单，其他的世界政治参与者正在以超越的速度在发展；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上，数百年来第一次遇到了超过自己的对手，主要是中国和印度，他们比俄罗斯更具有发展的态势，也更成功。这就意味着，俄罗斯外交政策物质向度的力量在相对下降，因此，俄罗斯不得不发掘自己非物质向度的优势。俄罗斯的未来外交应是“聪明型的、智慧型的”，而不是建立在对军事力量和能源工具的运用上。伊万诺夫指出，聪明、智慧的外交政策（«умн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俄罗斯的不足。伊万诺夫还举了一个例子，“iPad”和“iPhone”是在中国组装的，但是其概念却是苹果公司提出的，因此，市值成为世界头号的是苹果公司，而不是中国的组装企业。在全球政治中也完全相同，即理念，而不是物质资源，将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地位的主要因素。

从俄罗斯前外长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俄罗斯将更为主动地发挥软实力和开展“智慧外交”，以消弭由于其他国家迅速发展而造成的俄罗斯实力的相对下降，金砖外交就是例证之一，部分西方学者也对此表示认同。发表在《欧洲财经评论》上的一篇文章^①认为，“金砖国家被证明是一个精明的设计，成本极低，机制灵活，可能也是莫斯科近年来最为聪明的外交政策之一。”这篇文章的作者还指出，“俄罗斯发动组建了一个团队，来实现改革国际机制的目标；这种方式与莫斯科依靠武力和强权对待邻国的名声大不相同。金砖外交也巧妙地利用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来帮助提升四国的地位，特别是俄罗斯的地位，并把俄罗斯自身置于一个发展中的明星的地位。”是俄罗斯把高盛集团的金砖国家概念，通过外交智慧和行动，演绎成了一个政治现实。

第一次金砖峰会于2009年6月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正值金融危机之际。事后的很多研究表明，是金融危机成就了金砖国家，但不可否认的是，俄罗斯抓住了机遇。当然，俄罗斯此前的外交准备与铺垫也很重要，毕

^① Cynthia Roberts, “Building the New World Order BRIC by BRIC”, *The European Financial Review*, February-March 2011.

竟机遇对于有准备者更垂青。^①第一次峰会之后，“金砖国家”这个术语开始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新名词，但还不意味着金砖国家平台的搭建成功。俄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当很多学者和观察家纠缠于金砖国家中谁的经济发展得更好，谁更好地度过了金融危机，谁是金砖国家中的领头羊等问题的时候，俄罗斯领导人却清醒地指出，“这不是值得去比较的问题”。^②俄罗斯领导人真正关注的是平台的成功搭建。事实上，2009年6月在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峰会之后，俄罗斯最关心的不是谁成为金砖国家的领袖，而是金砖国家能否持续下去，即俄罗斯的主动倡议能否得到中国、印度和巴西的支持。很多人质疑，在俄罗斯举行了第一次峰会之后，金砖国家也就结束了。俄罗斯对此也没有信心。2010年第二次金砖国家峰会举办之后（巴西承办），梅德韦杰夫在回答俄罗斯记者提问时指出，他对于金砖国家的第二次峰会，“非常，非常满意”。不仅是因为峰会的结果，而是峰会能够召开这件事情本身就令俄罗斯总统很满意。梅德韦杰夫还特别指出，“中国主席胡锦涛邀

① 俄罗斯学者很热衷于谈论金砖国家的形成过程。如尼科诺夫的叙述：“金砖国家的实际合作开始于2006年9月，当时在普京总统的倡议下，在纽约的联大会议期间，举行了四国外长的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四方都对发展四方会谈表示了兴趣。2008年5月16日，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了四国外长的正式会晤。这次会议之后发表了共同宣言，这是金砖国家第一次就国际问题发表宣言。2008年7月，在日本举行八国集团会议期间，在俄罗斯方面的倡议下，举行了四国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只有短短的20分钟，但是却达成了在2009年举行正式的首脑会议的决定。在巴西方面的倡议下，2008年11月7日，在圣保罗市举行了金砖国家第一次财长会议。2009年6月在叶卡捷琳堡举行了四国的首脑会议。”参见 Пробуждение БРИК. The Awakening of BRIC. M., 2009. Текст подготовлен В. А. Никоновым по итогам перв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экспертов и политологов БРИК, состоявшейся в Москве в декабре 2008 г. 季塔连科的叙述：“金砖国家的前身和基础，是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的三边关系。金砖国家的机制是逐步形成的。起初是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的提议下，俄罗斯的专家同印度的中国学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进行对话。经过3年的准备和协商，从2001年开始进行专家会谈，2002年开始有外交官加入。2005年开始了外交部长的会见，是在联合国的平台上进行的非正式会见，之后是独立的会见。然后是普京的连续出访。应该注意到俄罗斯在金砖国家组织中的积极作用。苏联解体造成了俄罗斯的衰弱，但这种衰弱在一定程度上被俄罗斯的外交经验和艺术所弥补。俄罗斯发起的金砖国家组织的倡议，以及俄罗斯学术界对金砖国家计划的支持，都体现出了外交的艺术和经验”。参见 Давыдов В.М., Мосейкин Ю.Н. БРИК: предпосылки сближения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 ИЛИА РАН.2010. – 232 с.

② 梅德韦杰夫总统回答记者问，俄罗斯总统网站，<http://news.kremlin.ru/transcripts/10940>（2011年4月14日）

请金砖国家领导人在 2011 年到中国开会。”在梅德韦杰夫看来，“当胡锦涛邀请在中国举行第三次峰会的时候，金砖国家的某种机制形成了。”^①2012 年 3 月新德里峰会成功举办，南非也将于 2013 年承办第五次峰会。而早在 2011 年 7 月 7 日，俄罗斯就以总统令的形式，组建了俄罗斯 2014 年承办金砖国家会议的组委会，主席是总统顾问普里霍季科（Сергей Приходько）^②，俄罗斯方面的热切和推动可见一斑。

这个平台的搭建，俄罗斯付出的代价很小，却是最大的获益者之一（或者说就是最大的获益者）。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金砖国家之于俄罗斯，类似于上海合作组织之于中国，只要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无论谁是领头羊，无论组织内部的等级次序如何，本身就是利益所在。关于这一点，在 2011 年 11 月 17 日举行的一次有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С.А. Рябков）、俄罗斯外交系统的研究部门以及俄罗斯科学院知名学者参加的研讨会所形成的会议纪要中，明确提及：“即便金砖国家的行动仅仅是在具体的金融和经济领域内，金砖国家在可见的未来，对俄罗斯非常重要；金砖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是俄罗斯的巨大财富”。^③接下来的问题是，俄罗斯如何使用这笔财富。

（三）俄罗斯的大国协调（Concert）

俄罗斯是“多极世界”口号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俄罗斯所构想的多极世界，是由主要大国主导的、其中有俄罗斯位置和发言权的世界秩序。但是显然，与美国、欧盟相比，俄罗斯的实力远远落后，特别是美欧的战略压力和态势，使得俄罗斯感到自己的声音和利益不被重视；同时，在欧亚大陆上，中国和印度的实力也超越了俄罗斯，对此俄罗斯也有不安。因此，如何在实力有限的情况下成为有影响力的世界一极，缓解战略压力，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利益，是俄罗斯面临的棘手问题，更是对俄罗斯外交智慧的考验。

2012 年 2 月，在莫斯科新闻报上发表了普京的文章“俄国与变动中的

① 参见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ответил на вопросы российских журналистов.16 апреля 2010 года. <http://kremlin.ru/news/7479>

②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07.06.2011 N 708 «Об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м комитете по подготовке и проведению саммита БРИКС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③ Итоги семинара «Роль и место БРИКС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ее развит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внешних вызовов и долгосрочных приорите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внутренней 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17 ноября 2011 г.

世界”^①。这篇文章特别提及了中国和金砖国家，用了与形容西方国家不同的语句，带有某种期望的意味。这至少表明，金砖国家已经进入了俄罗斯大国外交视野之中。显然，对于俄罗斯这样谙熟均势的国家而言，其外交是不会错过这个由自己一手“栽培”出来的、可以平衡西方压力的这块“金砖”的。当然，也不排除俄罗斯有通过其所参与的八国集团，来平衡金砖国家的考虑。

俄罗斯在全球治理中的特殊地位在于，它同时是八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的成员，如何看待和运用这样的双重身份，俄罗斯也在积极地思考着。

俄罗斯于1998年正式成为八国集团成员，并在2006年担任八国峰会的主席国。随着经济危机对八国集团的打击，以及非西方力量的上升，也有一些声音唱衰八国机制。普京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出席2012年5月的八国峰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将放弃八国机制。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位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并不想放弃，或者取代八国集团机制。相反，俄罗斯想保留住自己在八国集团内的地位，因为这个组织的议事日程，在金融经济（包括能源价格）、国际安全领域内，仍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时，在八国集团中的身份，能够巩固俄罗斯在金砖国家中的地位”^②；俄罗斯方面的认识是，八国集团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并未失去^③。西方学者的判断也证实了俄罗斯对八国集团的态度。欧洲改革中心主任格兰特分析说，“虽然俄罗斯口头上提改革、改变国际秩序，但是俄罗斯希望保持八国集团的机制。”^④波波·罗教授也指出，莫斯科并不认为与中国（或与其他金砖四国之一）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能够代替其与西方之间的伙伴关系。^⑤保持这个俱乐部的地位，对于俄罗斯是有益的。

但是俄罗斯对这个俱乐部的兴趣在下降（俄罗斯无法有效地利用这个机

① Путин В.В. Россия и меняющийся мир//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27 февраля. 2012.

② Панова В.В. Роль и место «Группы восьми».

③ Итоги семинара «Роль и место Группы восьм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ее развит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внешних вызовов и долгосрочных приорите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внутренней 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9 декабря 2011 г.

④ Charles Grant, “Russia, China and global governance”.

⑤ 波波·罗：“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过去、现在及未来”，《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4期。

制)，或者说这个俱乐部对俄罗斯的兴趣在下降，将俄罗斯开除出八国集团的声音在西方时有发出。同时，俄罗斯对金砖国家的兴趣上升，因为金砖国家能够给予俄罗斯所需的利益（或潜在利益）。俄罗斯的金砖国家问题专家达维多夫指出，对于俄罗斯的外交人员而言，需要明白的一个逻辑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对俄罗斯的政策越消极，俄罗斯将越积极地推动金砖国家的机制；俄罗斯与金砖国家的合作越推进，华盛顿和西方对俄罗斯的态度会越客气。”^①

俄罗斯对金砖国家的兴趣还在于，客观上国际权力重心正转向亚太地区，西方力量相对下降，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不断增强在地区和国际上的影响力；因此，俄罗斯希望借助金砖国家的平台，促进一个新的建立在大国势力与利益均衡基础上的世界和平秩序。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和欧洲安全所，曾于2010年9月发表了“2025全球治理”的报告，其中提出未来世界的四种前景：（1）保持现状；（2）地区主义上升（全球化受阻）；

（3）欧洲协调再现（Concert of Europe Redux）；（4）全球冲突（冲突超过合作）。^②俄罗斯世界基金会主席尼科诺夫认为，“在这四种未来场景中，对俄罗斯而言，最佳的情况是第三种，即欧洲协调再现。”尼科诺夫认为，这实际上是“全球协调”（global concert），而且存在着实现的条件。尼科诺夫指出，“全球协调之下的和平，是建立在主要权力中心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平衡的基础之上；而每个金砖国家都是一个权力中心。”^③

需要指出的是，“2025年全球治理”报告中所提及的全球协调者，是美国、中国、欧盟和印度；而在俄罗斯世界基金会主席尼科诺夫观念中的全球协调，显然要有俄罗斯的地位，金砖国家是其依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副所长卢贾宁也明确指出，俄罗斯有很大的机会来参与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在地区层面可以通过“俄罗斯—印度—中国”机制和上合机制；在全球层面，

① Давыдов В.М. Пробуждающиеся гиганты БРИК.

② “Global Governance 2025: at a critical junctur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and the EU Institute of Security Studies, September 2010.

③ Vyacheslav Nikonov, “Main Trends in Global Development and the BRICS”, “发展 合作 共享——金砖国家智库会议”会议论文集。

是依托于金砖国家。^①问题是其他金砖国家，很少有俄罗斯的这种大国协调的动机和经验。^②但是俄罗斯方面很清楚，只要金砖国家的机制能够继续下去，全球性的政治问题就一定会被列入到其议事日程之中来。^③俄罗斯对金砖国家的构想和期盼，体现在其对金砖国家的功能定位上：（1）限制美国和其他国家在联合国框架及国际法准则之外的行动自由；（2）在国际组织中协调立场，以一个声音说话；（3）解决世界上的冲突与危机；（4）对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施加影响；（5）帮助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如粮食安全等；（6）通过南非这个窗口进入非洲大陆，不仅是援助，同时也与非洲国家开展互利的合作。^④从中可见俄罗斯希望借助金砖国家的实力所达成的目标。

此外，俄罗斯借助金砖国家进行全球协调，还有其他的考虑。即希望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其大国抱负和国际体系的转型，降低俄罗斯的风险和代价。在俄罗斯一些战略家的构想中，金砖国家“可以使得朝向多极世界的转化，能以最小的代价和风险来完成。因为历史反复证明，从一个体系向另一个体系的转换，通常是伴随着严重的全球危机和战争。金砖国家是一个减少从一种国际体系转换到另一种国际体系的风险的工具。另外，该机制也有助于消除金砖国家之间的矛盾。”^⑤ 俄罗斯方面的意图是，通过金砖国家，而不是自己，来表达自身对国际制度改革的声音^⑥，以此降低俄罗斯的代价和风险。

① Китай в мировой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Вып. XVI ежегодное издание/ отв. Редактор-составитель Е.И.Сафронова.---М. ИДВ РАН, 2011. С.24.

② Charles Grant, "Russia, China and global governance".

③ Georgy Toloraya, "Global Governance Dilemmas and Russia's Place in BRICS", "发展合作 共享——金砖国家智库会议"会议论文集。

④ Итоги семинара «Роль и место БРИКС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ее развит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внешних вызовов и долгосрочных приорите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внутренней 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17 ноября 2011 г. <http://www.hse.ru/org/hse/iori/news/38513291.html>

⑤ Vladimir Davydov, "The BRICS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ycentric regime", "发展合作 共享——金砖国家智库会议"会议论文集。

⑥ Итоги семинара «Роль и место Группы восьм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ее развит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внешних вызовов и долгосрочных приорите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внутренней 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9 декабря 2011 г.

结 语

目前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程度，还没有达到俄罗斯所期望的目标。普京在当选总统前发表的文章中，论及金砖国家时，也提及“俄罗斯一贯，并将继续把与金砖国家的伙伴关系放在一个优先的位置……我们才刚刚开始金砖国家框架下的合作，我们还需要在外交方面有更为紧密的合作和协调。只有当金砖国家之间全面展开实质性的合作的时候，其国际经济和政治中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①普京的讲话对金砖国家充满着期待，但是也很清楚，这个合作才刚刚开始，而且还缺少俄罗斯所希望的全面的、实质性的合作。在制裁叙利亚的问题上，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否决票，其他金砖国家却支持制裁。尼科诺夫明确提出，这是金砖国家内部存在的最大分歧。^②

可能也与此相关，俄罗斯对金砖国家扩员的立场非常明确：俄罗斯不支持金砖国家的扩大，而是希望加深现有的关系。从中也可以看出，俄罗斯在意的还不是金砖国家在经济金融上的合作或者分歧，而是关心是否与俄罗斯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保持一致，以增加俄罗斯的影响力。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俄罗斯冷静而清楚的金砖国家的发展目标与定位。

今后几年，俄罗斯将担任几个重要国际机制的会议主席国：2013 年的 20 国集团会议、2014 年的八国会议和金砖国家会议，都将在俄罗斯举行。俄罗斯学术界和相关部门也加大了对国际组织、国际治理的研究，并积极准备提出俄罗斯方面的日程。对于这三个重要的机制，相比较而言，俄罗斯更在意的是，如何保持并提高自身在金砖国家中的位置，以及取得其他金砖国家的支持。在俄罗斯国内讨论 2014 年八国会议的日程时，俄罗斯的一些专家表示，在提出日程之前，俄罗斯应该与金砖国家事先沟通。^③俄罗斯对于金砖国家外交的探索，也将逐渐进入更为活跃的时期。总之，在关注金砖国

① Путин В.В. Россия и меняющийся мир//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27 февраля.2012.

② О приоритетных вопросах предстоящей встреч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ах расширения альянса рассказал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правл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п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БРИКС, президент фонда «Политика», депутат Госдумы Вячеслав Никонов/ радио «Голос России». http://rus.ruvr.ru/radio_broadcast/no_program/69739980.html

③ Итоги семинара «Роль и место Группы восьм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ее развит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внешних вызовов и долгосрочных приорите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внутренней 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9 декабря 2011 г.

家整体发展的时候，需要关注俄罗斯的金砖国家外交。在这方面，本文仅是在文献阅读和观察的基础上，对其中几个问题所作的一些初步思考。

【 Abstract 】 Strictly speaking, the BRICS countries are not the “achievement” of the Goldman Sachs Group concept, but are closely linked with Russia’s diplomatic efforts and wisdom. Therefore, Russia is equipped with its own profound thinking about BRICS countries and its diplomacy towards them. It can be said that Russia’s diplomacy towards the BRICS countries is both a typical Russia’s “wisdom diplomacy” in the 21st century, as well as a manifestation of Russia’s traditional mentality of a great power — balance of power diplomacy. Russia’s BRICS-diplomacy thoughts and actions are worth of our attention.

【 Key Words 】 Russia, diplomacy towards the BRICS countries, domestic politics and diplomacy, “wisdom diplomacy”, coordination of actions of great powers

【 Аннотация 】 Страны БРИК, строго говоря, отнюдь не результат концепции Goldman Sachs Group, а тесно связаны с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ми усилиями и мудростью России. Из-за этого Россия глубоко размышляет над странами БРИК и своей дипломатией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ним.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дипломатия БРИК является типичной «мудрой дипломатией» России в 21 веке, а также проявлением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для России менталитета дипломатии — баланса сил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ы.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мышление и действ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БРИК достойны еще большего внимания.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БРИК, внутрен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и дипломатия, мудр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координация действий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责任编辑 封 帅)

一种正常的战略伙伴关系 ——印俄战略合作的成效与前景*

李冠杰**

【内容提要】“战略伙伴关系”是个相对含糊的概念。2000年印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1年，俄总统梅德韦杰夫把这种关系提升到了“优先对待”的地位。随着印俄关系的不断深化，双方在交往机制、军事合作、经贸合作、核能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突出成效。印俄战略伙伴关系存在着对等、信任、互补等优势，但也面临着贸易额相对低迷、其他行为体的吸引力等重要挑战。印俄战略伙伴关系能否更进一步，这要看双方能否应对众多挑战。

【关键词】印度 俄罗斯 战略伙伴关系 认知 合作

【中图分类号】K512.6**【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2) 04-0043-(24)

自2000年印俄战略伙伴关系正式建立以来，国内外学者一直关注其发展变化。印度学者非常关心这一关系，出版了一些专题书籍。^①国内学者对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俄罗斯与新兴市场国家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1JJDGJW009）的阶段性成果。

** 李冠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联合培养博士后。

① 如 Padma Lochan Dash and Andrei M. Nazarkin, eds, *India and Russia: Strategic Synergy Emerging*, Delhi: Authorspress, 2007; P. Stobdan, ed., *India-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Common Perspectives*, New Delhi: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 2010; Nivedita Das Kundu, ed., *India-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New Delhi: Academic Foundation, 2010.

印俄战略伙伴关系也有相当关注。^①从研究状况看，国外学者的研究较为深入和广泛，国内研究尚未系统了解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嬗变。

从印俄关系发展看，其战略合作稳中有进。到 2011 年，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认为印俄伙伴关系已发展到了新层次，称它为“优先对待的战略伙伴关系”。^②那么，如何理解印俄战略伙伴关系？如何看待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发展？印俄战略合作的前景如何？想要准确把握这些问题，必须对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建构和发展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

本文首先尝试给出“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义，之后从印俄双方的认知和合作成效考察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和演进，接下来分析印俄战略合作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最后对其未来加以展望。

一、何谓“战略伙伴关系”？

20 世纪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人类渴望和平。随着冷战结束，世界步入相对和平的时代，国家间关系也从密谋、对抗转变为开放、合作，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从 21 世纪初，“战略伙伴关系”成为表达国家间关系的“常用语”。

“战略伙伴关系”这一用语流行之根源，可以追溯到美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1992 年 2 月，美俄发表《联合声明》，声称美俄关系是一种“建立在互信、尊重、以及共同致力于民主和经济自由之上的朋友关系和伙伴关系”。^③至 1994 年 1 月，美俄发表“莫斯科声明”，称“美俄关系已发展到了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它建立在平等、互利和承认各自国家利益的基础上”。^④

① 如马加力：“印度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和平与发展》，2001 年第 2 期；马嫒：《当代印度外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马加力：“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发展”，《当代亚太》，2009 年第 1 期。

② Vladimir Radyuhin, “Medvedev calls Indo-Russian relations a ‘Privilege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Hindu*, 14.07.2011.

③ “Joint Declaration”, 17.05.2012.//www.bits.de/NRANEU/US-Russia/A%20Official%20Docs/Bush%20Yelt%201st%20sum%20.htm

④ “Moscow Declaration”, 17.05.2012.//www.bits.de/NRANEU/US-Russia/A%20Official%20Docs/Clint%20Yelt%202nd%20sum%20dec%20exc.htm

既然曾激烈对抗的美苏/俄都能成为战略伙伴，其他国家为何不可？美俄间关系表达的措辞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从此各国积极寻求“伙伴”，建立这种“特殊”关系。

实际上，我们无法准确定义“战略伙伴关系”的真正含义。其原因在于，大多数情况下，“战略伙伴”是一种外交辞令，它只是表达友善的措辞，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从字面意思和美俄关系的经验看，“战略伙伴”首先应是一种“伙伴”，然后才谈“战略”。就“伙伴”而言，几乎任何一方都可以成为伙伴，伙伴关系的维系会随时变化，有可能变成敌人，所以才会有“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样的格言。因此，伙伴是变化的。就“战略”讲，一个大国会有大战略、全球战略，但战略“一定要有敌人的存在”^①，否则便漫无目的。而且，“有效的战略总是深思熟虑地为一个政治目的运用武力和权术”。^②因此，“战略”带有明显的目的性。

由此可见，战略伙伴关系是指**两个以上的行为体为某一目的公开达成的较为松散的合作关系**。战略伙伴关系追求的目标较为宽泛，超越了政治领域。从各种实践看，其合作关系不一定非常强烈。

战略伙伴关系是一对松散的矛盾体。伙伴之间讲究合作，战略有种针锋相对的意味，两者结合起来让这种关系更加模糊不清。到底是双方协作还是各有目的，从战略伙伴关系的术语中很难辨别。毕竟，战略伙伴关系不是同盟关系，也不是完全独立的没有关系。虽然如此，战略伙伴关系依然被人们采用，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发挥着特定作用。即使战略伙伴关系的含义模糊不清，但它至少是国家之间善意的表达。这种表达随着双方不断强调，会形成一种对方易于理解的政治意愿。因此，战略伙伴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双方的信任感，降低了强烈度对抗的可能性。

① [英]肯·布思著，冉冉译：《战略与民族优越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

② [美]戈登·A·克雷格、费利克斯·吉尔伯特：“关于当今和未来的战略的思考”，载于[美]彼得·帕雷特主编、戈登·A·克雷格、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847页。

在国际社会的实践中，战略伙伴关系一般是指双边关系，但也可以是多重，亦即，一个国家可以和这个国家、也可以和那个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双边意愿让双方远离了结盟的状态，从而趋于多边合作。

二、认知的变迁：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

印俄双方对世界认知的变化是其战略伙伴关系确立的关键。冷战期间，印苏形成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特殊关系”。冷战后的十年，俄罗斯从“一边倒”走向“欧亚主义”；印度则通过核战略拥有了核力量，并多方拓展对外关系。在此情况下，印俄关系逐渐从原来的特殊关系发展到战略伙伴关系。

冷战伊始，苏联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对峙，印度则坚持不结盟政策。但这种认知随着后来的实践发生了变化。美国在南亚的冷战战略目标在于争取巴基斯坦。^①1954年5月2日，美国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巴基斯坦被视为“美国在亚洲最协力的盟友”。^②这一关系变化改变了印度和苏联的认识。

面对密切的美巴关系，印度向苏联靠近，以寻求自身安全。而此时苏联意在亚洲开辟冷战“第二阵线”，其与印度的修好“反映了这种谋算”。^③对国际局势的认识为双方走到一起奠定了基础。

1955年，印苏双方领导人互访。60年代起，苏向印提供相应的军事援助。1971年，印苏签署《和平友好合作条约》。自此，双方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印度把苏联看作自己安全战略的可靠后盾和对外政策的有力支柱、可靠的战略伙伴和武器供应者。苏联则把印度视为自己在发展中国家中最亲密的盟友及其亚洲政策的基石”。^④苏联和印度通过这一关系的建立各自获得了相应的力量。

① Robert J. McMahon, “United States Cold War Strategy in South Asia: Making a Military Commitment to Pakistan, 1947-1954”,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75, No.3, 1988, pp.812-840.

② Mohammed Ayub Khan, “The Pakistan-American Alliance: Stresses and Strains”, *Foreign Affairs*, Vol.42, No.2, 1964, p.195.

③ Vojtech Mastny, “The Soviet Union’s Partnership with India”,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12, No.3, 2010, p.53.

④ 马嫒：《当代印度外交》，第75页。

随着冷战结束，印俄特殊关系进入了一段平淡期。1993年1月，俄总统叶利钦访印，印俄签署《友好合作协定》。与1971年达成协定的不同之处在于，该协定未包含任何有关共同安全的条款。这种特殊关系的光芒正在消失。

然而，北约东扩给俄罗斯带来很大压力。为抗衡美国的单极世界，俄罗斯主张建立多极世界。经历了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外交从“一边倒”走向“双头鹰路线”，^①亚洲再次进入俄罗斯视野。印度也再一次成为俄罗斯改善和加强关系的对象。

1995年10月22日，叶利钦在联合国年度会议上向印度总理拉奥提议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②，但这一进程并未得到迅速推进。

冷战后俄罗斯推动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其抗衡美国单极世界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但对印度而言，与俄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则更多地出于核战略考虑。1998年5月，印度进行了几次核试验，从有核能力的国家进入核武国家。美国公开反对印度进行核试验，对印武器供应也一度停滞。^③世界银行向印度提供的价值10亿美元的贷款也终止了。^④面对美国的制裁，印度通过加强对俄关系寻求支持。

俄对印度核试验表示支持。1998年12月，俄总理普里马科夫访印，双方把印俄长期技术合作延长至2010年。12月22日，印俄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迅速迈向战略伙伴关系。^⑤这一举措蕴含着重要内涵，一方面，俄罗斯明白印度不可能退回到无核状态；另一方面，印度积极与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可以抵消美国的反对所造成的影响。

由于印度核地位不可变更的事实，美国逐渐放弃了反对的立场和态度，开始从实际出发对待印度。2000年3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印。9月，印总理瓦杰帕伊回访。克林顿指出，美印“共同努力，使我们的关系从太少接触

① 冯绍雷：《20世纪的俄罗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10-214页。

② Jayanta Kumar Ray, *India's Foreign Relations, 1947-2007*,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548.

③ Ibid, p.688.

④ B. M. Jain, *Global Power: India's Foreign Policy 1947-2006*,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8, p.87.

⑤ Jayanta Kumar Ray, *India's Foreign Relations, 1947-2007*, p.549.

和太多怀疑向真正努力建立长期伙伴关系迈进”。^①美印紧张局势有所缓解。

普京上台后，迅速推进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设。2000年10月，普京访印，两国共同签署了《印俄战略伙伴关系声明》，正式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印俄战略伙伴关系声明》称，“必须在各国和各民族的主权平等、民主价值和正义的基础上建立多极化全球格局”，“对于多层面的双边关系，谋求新的性质和长远规划，并在未来几年和21世纪里，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和其他领域积极发展这些特性”。^②印俄双方有着很多相似的观念，基于长久以来的和睦关系，双方的战略合作更进一步。

从印俄关系的发展历程看，双方的认知和战略发生了显著变化。总体而言，在国际战略上，俄罗斯从攻势变为守势，印度从守势变为攻势。在印俄双边关系上，俄对印表达了更多的平等，印对俄的依赖性有所降低。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创造了一个新平台，从此印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三、建构与深化：新世纪印俄战略合作的成效

2000年《印俄战略伙伴关系声明》就政治、经贸、防务、科技、文化、反恐和法治等达成一致看法。其中，政治领域的条目为7项，经贸为11项，防务2项，科技5项，文化3项。^③从条目数量看，双方偏重于经贸和科技方面的合作。但从实际运作看，双方在交往机制化、军事领域、经贸领域、核能领域、文化交流和国家利益上均取得重大进展。

（一）交往机制化

制度化和机制化对于双边关系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化也体现在各类交往的机制化上。

① David E. Sanger and Katharine Q. Seelye, “Gore meets with India leader and Prods Senate on Test Ban”, *New York Times*, 16.09.2000.

② “Declaration on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Republic of Indi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2.05.2012.//www.rusembassy.i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12%3Adeclaration-on-strategic-partnership-between-republic-of-india-and-the-russian-federation&catid=12%3Aofficial-documents&directory=1&lang=en

③ Ibid.

在所有交往机制中，国家首脑的定期交流起着关键作用，它保持了最高层级的对话，有利于以国家力量的优势推进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印俄确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也正式确立了双方首脑互访机制。两国最高领导人于岁末举行峰会，今年俄总统到印度去，明年印总理到俄罗斯来，双方保持着礼尚往来。

首脑峰会的主要目标是确立总体发展方针。自首脑互访机制建立以来，印俄间签署了大量的文件、声明、协定等，在军事技术合作、反恐、航天、能源等方面的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表 1 2000 年以来印俄首脑年度峰会状况

| 时间 | 地点 | 主要内容 |
|---------|----|---|
| 2000/10 | 印 | 签署《印俄战略伙伴关系声明》。 |
| 2001/11 | 俄 | 签署《国际反恐的莫斯科声明》、《关于战略问题的联合公告》，以及其他领域合作的双边文件。 |
| 2002/12 | 印 | 签署两个俄印声明，分别是《进一步加强战略伙伴关系的声明》，《加强和提升经济和科技合作的声明》。 |
| 2003/11 | 俄 | 签署 10 项文件，如《对世界安全稳定的全球挑战和威胁的印俄政治声明》、《印空间研究机构和俄航天局在和平开发利用外太空合作上的谅解备忘录》、《印科技部和俄科学院关于科技合作和科技交流的协定》、《俄外贸银行和印出口信贷担保机构的谅解备忘录》等。 |
| 2004/12 | 印 | 签署 11 项文件，如《共同发展、长期合作、和平利用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协定》、《圣彼得堡行政机构与孟买市合作协议》、《俄天然气公司和印天然气当局战略合作协议》等。 |
| 2005/12 | 俄 | 签署数项协议，涉及航天、格洛纳斯导航系统、知识产权等。 |
| 2007/1 | 印 | 普京发表讲话，称赞“现代战略伙伴关系”。 |
| 2007/11 | 俄 | 签署 3 项政府间协议。普京和辛格指出，俄印在重要的国际问题有共同或相似的立场。 |
| 2008/12 | 印 | 签署 1 项政府间协议。军事技术合作和能源合作成为这次峰会的重要主题。 |
| 2009/12 | 俄 | 这次峰会关注的问题是印俄经济合作，如能源、运输、冶金、信息技术、医药业、生物技术、军事技术合作。 |
| 2010/12 | 印 | 签署 30 个双边文件。本次会谈关注油气部门、核能、高新技术等合作。 |
| 2011/12 | 俄 | 签署《深化印俄战略伙伴关系以适应不断变化世界挑战的联合声明》。 |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俄罗斯驻印大使馆网站和印度总理网站整理，参见 06.06.2012.//ru.embassy.in/index.php?option=com_alphacontent&view=alphacontent&Itemid=171&lang=en; 06.06.2012.//pmindia.nic.in/press-details.php?nodeid=1335

在国家首脑互访机制外，各类政府间委员会的设立起着重要作用，它们

使各类政策变得实质化。从印俄交往实践看，最重要的政府间合作机构是印俄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IRIGC-MTC）和印俄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IRIGC-TEC）。

印俄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成立于 2000 年，由印度防长和俄罗斯副总理共同领导。^①2001 年 6 月，印俄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会议，此后每年举行一次。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由两个事务委员会构成，一个是军事技术合作事务委员会，另一个是造船、飞机制造和陆军车辆生产事务委员会。^②在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多年推动下，印俄间的军事合作不断深化。

印俄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成立于 1992 年，它是指导经济合作的主要机构。2011 年 11 月 18 日，该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第 17 次会议，现已有 6 个事务委员会。^③印俄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深化了印俄间的经济交往。

此外还有其他各类论坛和会议，如 2007 年成立的印俄贸易投资论坛、2008 年成立的印俄首席执行官会议等，这些机构推动了印俄间的合作。

首脑互访机制、政府间委员会的建立、以及其他类型机构的设立，这些都奠定了印俄合作的基础，丰富了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推进了双方的战略合作深度。

（二）转变军事合作方式

军事合作是印俄关系中最为重要的领域。长期以来，苏/俄一直是军事合作的主导者，印度在双方军事合作中呈现出强烈的依赖性。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建构与深化，使这种“买卖”的合作关系转变成共同研发生产的关系。

长期以来，印度从俄罗斯获得先进武器装备，以增强印度的国防力量。印度的军事硬件近 70%源自苏/俄系。近年来，印度从俄进口的武器包括苏 30 战机，米 171V 军用运输机，R77 空对空导弹，基洛级 877E 潜艇，卡 31 预警机，戈尔什尼科夫海军上将号航母，T90 坦克，火控雷达，反坦克和反

① Baidya Bikash Basu, “Putin’s visit and future of India-Russia defence cooperation”, *Strategic Analysis*, Vol. 24, No. 9, 2000, p. 1765.

② “Press Release on the 11th session of the India-Russian intergovernmental commission on military technical cooperation”, *FSMTC*, 21.08.2012.//www.fsvts.gov.ru/materialsf/A9A3EA541CD0D65D4425798F003CF95E.html

③ “India-Russia Relations”, *MEA*, 21.08.2012.//meaindia.nic.in/mystart.php?id=50044518

舰导弹等。^①这些武器装备构成了印度国防的主要力量。近几年，印度每年向俄国防工业部门提交约 20 亿美元左右的订单。^②一直以来，印度从俄罗斯进口武器的比重非常之大。

此种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军火买卖交易，印方出钱，俄方交货，且俄方提供相应的维修服务。这种“买卖”关系令印度感到担忧^③，它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为摆脱对俄军购依赖，印度采取的方式是军购多元化。2000—2011 年，印度多方采购武器，除从俄罗斯进口外，其军购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从图 1 中可见，这种购买额度正在逐步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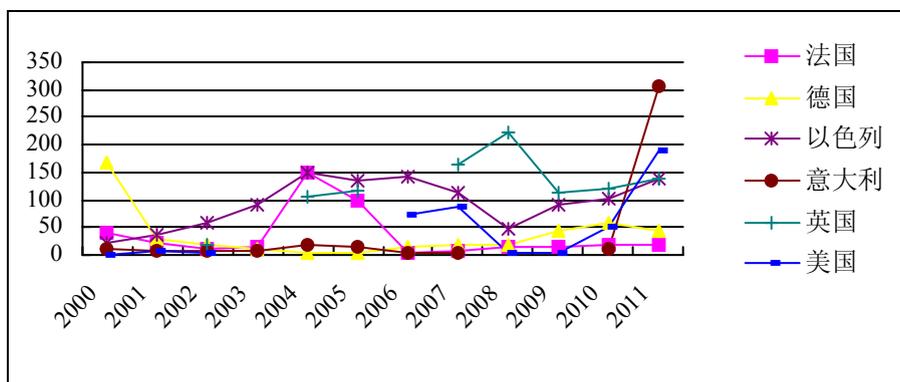


图 1 2000-2011 年印度军购多元化状况

注：单位为百万美元。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公布数据自制，详细数据参见 20.08.2010.armstrade.sipri.org/armstrade/page/values.php

然而从实践看，虽然印度对俄罗斯的武器采购比例呈现下降趋势，但短时期内，印度采取多元化军购的策略并未明显改变这一趋势。

① Arun Sahgal, “India-Russia Defence Cooperation: Perspectives and Prospects”, in Nivedita Das Kundu, ed., *India-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New Delhi: Academic Foundation, 2010, p.26.

② Anuradha M. Chenoy, “India and Russia: All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in P. Stobdan, ed., *India-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Common Perspectives*, New Delhi: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 2010, p.139.

③ 2012 年 8 月 26 日笔者与印度陆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莫妮卡·詹索妮亚（Monika Chansoria）博士的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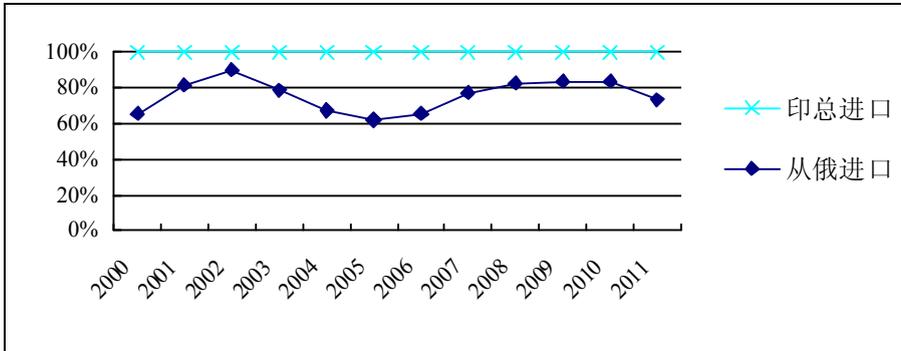


图 2 2000-2011 年印度从俄进口武器比例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公布数据自制，详细数据参见 20.08.2010.//armstrade.sipri.org/armstrade/page/values.php

但是，印度的多元化军购的策略似乎给了俄罗斯一些压力。在与印军事合作、特别是在武器买卖上，俄罗斯通过更改合作方式牢牢抓住印度这个军事贸易大市场，这种变通方法就是共同研发生产。

2008 年，印俄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把双方合作期限延长至 2020 年。印度防长安东尼（A.K. Antony）称，印俄已从买卖关系变成了在设计、发展和科研领域的合作生产者。^①12 月 5 日，梅德韦杰夫总统访印。军事技术合作的发展成为这次俄印年度峰会的主题。梅德韦杰夫指出：“军事技术部门的首要目标是从传统的买卖方式转变为联合发展和生产的方式。”^②双方高层均在关注合作方式的转变。

实际上，利用共同研发的合作方式，俄罗斯能够进一步插手和影响到印度的国防事务，印度也不得更加“依赖”俄罗斯。虽然如此，这种关系的相互变动也见证了印俄关系的不断深化，它们都有自身的利益诉求，都有不同的侧重点。

军事合作中共同研发的观念也表现在印俄双方共同使“维克拉玛蒂亚”号（Vikramaditya）现代化、T90 坦克的技术转让、“布拉莫斯”（BrahMos）

① Arun Sahgal, “India-Russia Defence Cooperation: Perspectives and Prospects”, p.25.

② “Official visit to Indi of the President Dmitry Medvedev”, 05.12.2008.//rusembassy.in/index.php?view=article&catid=13%3Avisits-and-summits&id=1773%3Aofficial-visit-to-india-of-the-president-dmitry-medvedev-december-5-2008&format=pdf&option=com_content&lang=en

巡航导弹的生产、以及后来第五代战机的共同研发等事务上。印俄军事合作涉及到防务的主要方面，也体现了双方在这些领域进行合作的不断深入。

这种合作关系也表现在卫星导航系统的使用和对外太空领域的探索上。印俄空间合作始于1994年。到了2004年，普京访印，印俄签署了《共同发展、长期合作、和平利用俄罗斯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协定》。印度搭乘了俄罗斯的空间体系。对于这一策略，印度研究者阿扎以·勒利（Ajey Lele）指出，印度的确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因为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和欧洲的伽利略（Galileo）卫星导航系统并不能为商业用户提供军事功能。^①无论是印度被迫无奈选择俄罗斯全球导航卫星体系，还是出于自愿，事实证明，印俄关系正在这一领域稳步前进。此外，印俄还联合培养宇航员。

如今，印度虽仍依赖俄罗斯的武器系统，但形势发生了变化。印度已是拥有核力量的国家，国防安全性有了显著提升。印俄均感到需改变合作方式，于是联合研发生产代替了原有的“买卖”方式。合作方式的转变使印俄间的军事关系更进了一步。

（三）拓宽经贸合作渠道

印俄经贸合作是双方长久以来较为稳定、但也感到不足的领域。随着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和双方经济力量的兴盛，印俄不满足于传统的经贸关系，正在努力寻找经贸合作的突破口。1992年，印俄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成立，力图改变苏联时代的经贸关系。2000年《印俄战略伙伴关系声明》非常关注双方的经贸合作。该声明提出，印俄双方“在印俄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框架内增强密切合作”，“深化和扩大部门和产业间的合作”，“在银行和金融方面增进合作”，“简化关税”，“为印俄实体交往建立有效机制”，“增进共同发展和共享最新技术”等。^②这些协定通过相应的机制建设保障了印俄贸易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使印俄间贸易更加自由化和规范化。事实上，印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印俄贸易量有了很大提升。

^① Ajey Lele, “Indo-Russian Space Cooperation”, in Nivedita Das Kundu, ed., *India-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New Delhi: Academic Foundation, 2010, p.43.

^② Declaration on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Republic of Indi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表 2 2000-2011 年印俄贸易状况

| 年份 | 印从俄进口 (10 亿美元) | 印向俄出口 (10 亿美元) | 总贸易额 (10 亿美元) | 年度增长 (%) |
|--------|-------------------|-------------------|------------------|-------------|
| 2000 年 | 1.081 | 0.555 | 1.636 | |
| 2001 年 | 1.117 | 0.543 | 1.660 | 1.47 |
| 2002 年 | 1.628 | 0.515 | 2.143 | 29.10 |
| 2003 年 | 2.735 | 0.584 | 3.319 | 54.88 |
| 2004 年 | 1.554 | 0.631 | 2.185 | -34.17 |
| 2005 年 | 2.314 | 0.784 | 3.098 | 41.78 |
| 2006 年 | 2.987 | 0.968 | 3.955 | 27.66 |
| 2007 年 | 4.011 | 1.309 | 5.320 | 34.51 |
| 2008 年 | 5.231 | 1.715 | 6.946 | 30.56 |
| 2009 年 | 5.936 | 1.523 | 7.460 | 7.4 |
| 2010 年 | 6.392 | 2.142 | 8.535 | 14.41 |
| 2011 年 | 6.094 | 2.799 | 8.893 | 4.19 |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印度驻俄大使馆网站整理，参见“Russia: Economic and Financial Indicators”，06.06.2012.//www.indianembassy.ru/cms/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715&Itemid=691;23.08.2012//indianembassy.r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06&Itemid=706&lang=en

从表 2 看，印俄贸易量除 2004 年出现负增长外，其余年份均为正增长，且增幅较大。从进出口情况看，印度从俄罗斯进口远远大于对俄出口，基本保持在 3 倍左右。而且随着贸易额的增加，这种差距将越来越大。由此可见，俄罗斯能从印俄贸易中获取实际的、直接的利益。

因此在印俄交往中，俄方特别关注经贸关系。在 2003 年 11 月瓦杰帕伊访俄时，普京对印俄贸易的发展势头表示满意。他说：“在政治领域，在国际舞台上，我们的关系正在发展，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和整个经济领域正在加强。我们见证了经济关系中的正面增长。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最好的岁月里，在印俄贸易额中，俄罗斯约有 35 亿美元。2003 年的前 9 个多月，我们的贸易额达 20 亿美元。还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且增幅良好。”^①

鉴于 2004 年印俄贸易额的下滑，俄罗斯非常着急。2005 年 5 月印度总理辛格赴俄参加战胜纳粹德国 60 年庆祝活动，普京就试图寻求印俄经贸合作的新突破口。他指出：“在拓展经贸关系上，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想您

^① “Visit of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Atal Bihari Vajpayee to Russia”, 12.11.2003.//rusembassy.in/index.php?view=article&catid=13%3Avisits-and-summits&id=1787%3Avisit-of-the-prime-minister-of-the-republic-of-india-atal-bihari-vajpayee-to-russia-november-12-2003&format=pdf&option=com_content&lang=en

（辛格）同意我的观点——很不幸，印俄贸易量并非它应有的那样。我们会对这些关系进行实质性的推动，更多去关注，在科技密集型领域的合作上给予更大支持。”^①12月，辛格访俄，普京再次督促说：“贸易量在增长。可我们都明白，也已多次说道——当前数量与其全部潜力不相符。我们经济交往的数量和质量均应得到改善。”^②

虽俄罗斯多次提及印俄贸易问题，但实现印俄经贸合作的迅猛增长存在很大困难。首先，印俄主要以军事贸易为主，这种结构短期内很难改变。俄罗斯一直是印度军事装备的主要供应者。2012年，俄罗斯准备向印度出口大约77亿美元武器，这将占俄罗斯武器出口的60%，占印度进口的80%。^③这种以军事贸易为主的状况在未来或许会有所改变，但短期内不会有很大改观。因此，如若欲使印俄贸易实现飞速提升，其他领域必须加大力度。

其次，俄罗斯先前并非世贸组织成员国，俄印就贸易合作而言很难跨越一些既定的界限，例如关税等问题。有学者认为：“除非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否则印俄签署任何双边经贸合作协议都毫无可能。”^④2011年12月16日，俄罗斯被正式批准加入世贸组织，2012年8月22日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俄罗斯的入世对印俄贸易有积极作用，大约有700多种产品的关税将会被取消或削减，平均进口关税有望从10%下降到7%。^⑤但俄加入世贸

① “Visit of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India Dr Manmohan Singh to Russia to participate in celebrations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ver the nazi Germany”, 10.05.2005.//rusembassy.in/index.php?view=article&catid=13%3Avisits-and-summits&id=1785%3Avisit-of-the-prime-minister-of-india-dr-manmohan-singh-to-russia-to-participate-in-celebrations-of-the-60th-anniversary-of-the-victory-over-the-nazi-germany-may-8-10-2005&format=pdf&option=com_content&lang=en

② “Official visit of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Dr Manmohan Singh to the Russian Federation”, 07.12.2005.//rusembassy.in/index.php?view=article&catid=13%3Avisits-and-summits&id=1784%3Aofficial-visit-of-the-prime-minister-of-the-republic-of-india-dr-manmohan-singh-to-the-russian-federation-4-7-december-2005&format=pdf&option=com_content&lang=en

③ “Russia to Export Arms to India for \$7.7 bln in 2012”, 20.01.2012.//rusnavy.com/news/navy/index.php?ELEMENT_ID=14097

④ Gulshan Sachdeva, “Indo-Russian Economic Linkages: A Critical Assessment”, in Nivedita Das Kundu, ed., *India-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New Delhi: Academic Foundation, 2010, p.119.

⑤ “Russia’s WTO entry positive impact for India trade, say officials”, *The Economic Times*, 18.12.2011.//article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2011-12-18/news/30531106_1_russia-s-w-to-bilateral-trade-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

组织后，印俄贸易是否得以很快提升，仍需双方的不懈努力。

（四）共同研发核能

核力量在国家关系中占据特殊位置。印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印度核试验带来的负面效应。自印俄确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从提供反应堆发展到了共同研发，在核能领域的合作范围不断扩大。

早在 1961 年，印度和苏联就已签署第一个核科技合作的协议。1974 年 5 月印度进行了核试验，结果遭到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制裁，此后印度核试验沉寂了 20 余年。但显而易见，对进一步核试验的制裁并未阻止印度科学家进行核研究。1998 年 5 月，印度连续进行几次核试验，向世界表明了自身的核国家地位。

1998 年印度核试验后，俄罗斯并未暂停履行正在进行的库丹库拉姆（Kudankulam）核电站协定。显然，俄罗斯支持印度发展“核三角”（nuclear triad）。^①有了俄罗斯的支持，印度将解决这一问题的球踢到了美国一边。

美国也明白让印度放弃核地位和核开发是不现实的，因此它只有寻求通过协商解决、而非打压来解决问题。2000 年，美印双方领导人相互访问，旨在寻求相关的解决方案。但“9·11”事件改变了美国的战略重心，此后反恐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议题，印度核试验带来的外部压力逐渐得以缓释。

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印度的外交努力使核试验带来的负面效应慢慢消散。2006 年 12 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海德法案》（Hyde Act），使美印民用核能合作成为可能。在印度承认支持核不扩散协议后，美印于 2008 年 10 月 4 日签署了关于民用核能的协议。这份协议实质上能够提升美印两国的军事合作，“能够减少印度对俄罗斯的过度依赖”。^②

在美国公开表示与印度进行核合作后，法国也与印度签署了一份民用核能合作协议。^③这种态势显然给了俄罗斯一定的压力，促使它在与印度的核能合作方面更进一步。

2009 年 12 月 7 日，印总理辛格与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克里姆林宫签署

① Jerome M. Conley, *Indo-Russian Military and Nuclear Cooperation*,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1, pp.114-115.

② Jayanta Kumar Ray, *India's Foreign Relations, 1947- 2007*, p.760.

③ Ibid, p.758.

了一份核合作协议。辛格称，“这份协议拓宽了我们的合作范围，从提供核反应堆发展到研发领域和整个核能领域”。^①辛格的话语表明，印俄核合作较其他国家更加深入，双方正在步入合作研发的轨道。

在签署核能合作计划后，印俄加快了这一研发进程。2010年12月，梅德韦杰夫访印。其间，俄罗斯国家原子能机构与印度原子能部门达成谅解备忘录，就反应堆技术合作研发问题达成了协议。^②

2011年12月，辛格访俄，双方签署《深化印俄战略伙伴关系以适应不断变化世界挑战的联合声明》。其中在能源合作方面，“双方强调能源领域的合作已成为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双方重申在民用核能领域中进一步长期合作，在碳氢化合物领域亦如此”，并对库丹库拉姆核电站的建设达成一致协议。^③

从印度的核战略看，1998年的核试验的确给印度带来了巨大利益。印度通过外交努力不仅使美国变更法案与印度开展合作，而且它与其他国家的多方合作给了俄罗斯一定的压力，使俄罗斯与印度的核能合作不得不更进一步。对于俄罗斯而言，在印度获得核国家地位后，俄罗斯可以通过共同研发这一方式增强其在印度对外核能合作上的优势地位。

（五）加强文化交往

观念和认知对于国家战略决策起着重要作用。虽然罗伯特·杰维斯告诫决策者要“意识到经常出现的错误知觉”，而且“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完全消除错误知觉，也没有任何方式可以表明什么认识是正确的”^④，但交往可以改变认知状况，长期的文化交流能够改变固有观念。因此从长远看，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离不开双方的文化交往，它也是战略合作的重要部分。

印俄文化交流有着深厚的根基。事实上早在1958年，苏联就在新德里

① “India, Russia sign nuclear deal”, *The Times of India*, 07.12.2009.

② “Majors deals between India and Russia”, 22.12.2010.//www.rusembassy.in/index.php?view=article&catid=12%3Aofficial-documents&id=2122%3Amajor-deals-between-india-and-russia-new-delhi-december-22-2010&format=pdf&option=com_content&lang=en

③ “Joint Statement furthering the India- 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a changing world”, 16.12.2011.//pmindia.nic.in/press-details.php?nodeid=1335

④ [美]罗伯特·杰维斯著：《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432、448页。

设立了大使文化部。1982 年更名为苏联科学文艺部。苏联解体后变成了俄罗斯科学文化中心,它成为俄罗斯国际科学文化合作中心的分支。迄今为止,印度有 5 个俄罗斯科学文化中心,是俄在国外设立这一中心最多的国家。^①印度在苏联时代就在莫斯科举办了印度节。1988 年印度节的成功举办,为印度向苏联展示自身文化奠定了基础。

在印俄文化交往中,官方的文化交流机构、通讯媒体、书籍等为其提供了便利。1989 年在莫斯科成立的尼赫鲁文化中心(Jawaharlal Nehru Cultural Centre)在推介印度古典舞蹈、音乐、瑜伽、语言、哲学等方面起着核心作用。^②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和广播曾用印度的好几种语言播音,印度出版商也把俄罗斯文学作品用印度语言出版。^③

2000 年印俄确立战略伙伴关系,为提升文化关系,双方认为要“进一步促进文化合作,更多展示双方的文化遗产和成果;推动人民和组织机构(包括文化、教育、大众传媒、青年和体育等)之间的交流;促进两国间的旅游交流和旅游组织间的合作。”^④自印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以来,双方不断加强文化交流,从原有的“文化日”发展到“文化节”,从“莫斯科年”、“新德里年”发展到“俄罗斯年”和“印度年”。

2003 年 11 月,俄罗斯文化节在印度的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三大城市盛大举行。一位印度旅游文化部官员称赞说:“这是两国传统关系史上的新篇章。”^⑤2005 年 9 月,印度文化节在俄罗斯举行,100 余名印度优秀艺术家展示了印度古典舞、民间舞和现代舞,唱响了印度流行音乐和歌曲。^⑥

① Fyodor Rozovskiy, “The New Delhi connection”, *Russia and India Report*, 31.03.2010.//Indrus.in/articles/2010/03/31/the_new_delhi_connection.html

② Nivedita Das Kundu, “India-Russia: Old Friends, New Focus”, in Padma Lochan Dash and Andrei M. Nazarkin, eds, *India and Russia: Strategic Synergy Emerging*, Delhi: Authorspress, 2007, p.190.

③ Ibid, p.186.

④ “Declaration on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Republic of Indi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www.rusembassy.i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12%3Adeclaration-on-strategic-partnership-between-republic-of-india-and-the-russian-federation&catid=12%3Aofficial-documents&directory=1&lang=en

⑤ Yuri Sidorov, “Russian Culture Festival rounds off in India”, *Itar-Tass Weekly News*, 09.11.2003.

⑥ Olga Svistunova, “Festival of India culture opens in Russia”, *Itar-Tass Weekly News*, 22.09.2005.

2008年，印度俄罗斯年在印举行。2009年，俄罗斯印度年在俄举行。2011年，印度文化节在俄举行，同时开展了纪念泰戈尔诞辰150周年的活动。2012年，印方组织了印俄外交关系65周年学术文化活动，而且俄罗斯文化节将在印度举行。

双方开展文化展示与交流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交流内容进一步深化。在交往过程中，双方都在大力展示自身极富特色的传统文化，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如今，在俄罗斯境内的印度人社区大约有15,000个，有大约500名印度商人定居俄罗斯，在俄注册的印度公司有300家左右。有4,500名印度学生被俄罗斯医药、科技机构录取入学。^①

近年来，文化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研究者称，“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②在印俄文化交往中，政治推动文化发展，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正在促使双方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六）实现双赢

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建构与深化符合双方的利益，有利于印俄实现各自的国家战略，实现双赢。在现实主义看来，国家战略也是在追求权力。“一项政治政策所追求的，或是保持权力，或是增加权力，或是显示权力”。^③鉴于印俄力量的现状，从双方达成战略伙伴关系这一战略而言，印度旨在通过这种关系增加和显示权力，俄罗斯则在保持权力。

首先，印度在增加和显示权力的背后是印度的大国梦想。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有助于这一梦想的实现。

一方面，通过与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印度在两国关系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印俄军事合作已从买卖关系变成共同研发生产的关系，这种关系转变的确增加了印度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印俄战略伙伴关系使印度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增强。与世界军事强国的俄罗斯开展密切合作，并搭乘俄罗斯全

① “India-Russia Relations”, 29.08.2012.//meaindia.nic.in/mystart.php?id=50044518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8页。

③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6页。

球导航卫星系统和空间开发，这均使印度的国际影响力得到提升。

印俄坚实的战略伙伴基础使印度有条件处理与西方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印度采取了一种“贴近现实主义原则的、更具实际主义的外交政策”^①，使印度在处理核试验问题上应对自如。它通过与美国的磋商逐渐摆脱了多方制裁，还吸引着西方国家到印度投资核电站。

如今，印度经济迅速发展，据IFM统计和预测，2004-2011年，印度的实际GDP增长率保持在6.2%-10.6%不等，2012-2017年，其增长估计会在6.9%-8.1%之间浮动。^②印度还大量吸引外资，2007年已超过350亿美元。^③在知识经济方面，印度也表现出强劲势头。印度还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俄罗斯对此一直表示支持。

其次，俄罗斯在保持权力的背后是俄罗斯的全球战略和国家利益。

印俄战略伙伴关系是俄罗斯追求世界多极化战略的具体表现。冷战后的世界格局“是单极的。世界权力中心属于美国这个不可挑战的超级大国”。^④面对单极格局，俄罗斯并不示弱，它极力主张建立多极世界。在俄罗斯看来，印度是其多极化战略的伙伴之一。在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时代，印度曾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者，这种传统与多极化世界的思维有相似之处。加上印俄间“久经考验的”特殊关系，印度自然便成为俄罗斯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力量。2000年《印俄战略伙伴关系声明》指出，双方确信“建立多极世界体系是必要的”。^⑤印俄战略伙伴关系有利于俄罗斯的多极化全球战略。

当然，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化为俄罗斯带来了实质利益。军事技术方面占据优势的俄罗斯通过与印深化合作保持了对印优势，增强了对印吸

① Sumit Ganguly, Manjeet S. Pardesi, “Explaining Sixty Years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 *India Review*, Vol.8, No.1, 2009, p.4.

② IFM,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12: Growth Resuming, Dangers Remain”, p.195, 22.05.2012.//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2/01/pdf/text.pdf

③ Krishna Chaitanya Vadlamannati, “Indian Economic Reform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ow Much Difference Do they Make to Neighbours”, *South Asia Economic Journal*, Vol.10, No.1, 2009, p.49.

④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70, No.1, 1990/1991, p.23.

⑤ “Declaration on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Republic of Indi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www.rusembassy.i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12%3Adeclaration-on-strategic-partnership-between-republic-of-india-and-the-russian-federation&catid=12%3Aofficial-documents&directory=1&lang=en

引力，使印度对俄武器采购并未迅速下滑。在核能领域的共同研发也已涉及到双方的技术交流，使俄罗斯在印度与其他国家的核能合作中占据优势地位，保持了权力。从现实利益看，这些方面合作的深化，的确让俄罗斯有利可图，在印俄双边贸易中，俄罗斯保持着贸易顺差。

综上所述，在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发展与深化中可以看到，在强弱对比非常明显的状况下，印度能够以独立之声与俄罗斯对话，使双方合作保持着健康、平稳发展之势。十余年过去了，对于印俄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新层次，梅德韦杰夫用“优先对待的战略伙伴关系”来表述。^①这种定位再次表明了印俄战略合作的健康与正常，也表明了印俄关系的稳定与长久。

四、优势与挑战：印俄战略合作的未来

印俄战略伙伴关系是一种正常的战略伙伴关系，它体现了战略伙伴关系原有的内涵。在这对正常、健康的伙伴关系中，既有合作优势又存在重大挑战，印俄战略合作的未来取决于双方的共同努力。

（一）三大优势

印俄战略伙伴关系有三大优势，即对等、信任和互补。

首先，印俄战略伙伴关系改变了传统的印对俄的强烈依赖性，俄罗斯则努力改变政策，增强对印的吸引力，从而使这一关系显得更加对等。

双边关系常出现不对等状况。一方对另一方的严重依赖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产生这种依赖性的原因有很多，但大体上是因为一方力量较弱，不得不依赖强者。冷战时期的印苏关系便是这种依赖性关系。弱勢的印度出于安全考虑不得不依赖强大的苏联。但这种不对等状态不利于双边关系的长期、健康发展。

冷战后，特别是印度核试验后，印俄关系有了新发展。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建构与深化使这一关系趋向对等。印俄在 2000 年《印俄战略伙伴关系声明》中指出：“双方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基于主权、国家平等和领土完整、

^① Vladimir Radyuhin, “Medvedev calls Indo-Russian relations a ‘Privilege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Hindu*, 14.07.2011.

不干涉国内事务、相互尊重和互惠互利的原则之上。”^①这些原则表明了双方合作的关键意愿，即平等相待。

在双边关系中，关系对等的主要表现是：任何一方的改变不会受制于另一方施加的强大压力，而任何一方的改变会引起对方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在现实中，印度是推动印俄关系对等的主要力量。在军事合作方面，印度试图摆脱对俄过度依赖，寻求军购多元化。在民用核能合作方面，印度加强与西方联系，寻求不同的合作者。印度还大力吸引外资，寻求多元化发展。

印度的多元化政策均引起俄罗斯的关注。俄无法对印施加压力，让印改变这种多元政策。俄罗斯的应对策略是进一步与印进行合作，根据以往的有利条件牢牢把握住对印关系。俄罗斯通过让印参与合作领域的研发、生产，以增进对印关系，吸引印度对其“依赖”。在印俄关系的发展中，双方能够及时协商，调整政策，既能让对方有所关注，又能在和睦声中增进合作。

其次，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信任度很强，这是双方能够稳步合作的保障。

相互信任是国家间关系稳定与发展的保障。对于信任的评估，目前尚未有一种较为理性的测量方式。大体而言，“信任是一种变量，而不是一种常量”。^②就印俄间的信任度而言，笔者认为它们的信任度很强。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信任？对信任的一种简单阐释是，“信任主体对客体的预期包括对方行为的可预测性、对方意图的善意，即不会‘加害’于自己，不会在合作中‘背叛’自己”。^③

依据这种理解，在俄罗斯看来，印度不会危及俄的安全。第一，印度一直处在弱势地位，它没有能力危及俄罗斯的安全。苏联时期，印度受苏联协助，其国防力量大部分由苏式武器装备。后冷战时期，虽然印度努力实现军购多元化，但至今仍以进口俄系武器为主。印度的核武器虽有一定的发展，但不能与俄罗斯相比。在这种硬实力强弱分明的状态下，俄不会视印为主要

① “Declaration on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Republic of Indi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www.rusembassy.i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12%3Adeclaration-on-strategic-partnership-between-republic-of-india-and-the-russian-federation&catid=12%3Aofficial-documents&directory=1&lang=en

② 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的形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8页。

③ 同上。

威胁。第二，就地缘状况来看，印俄边界并不相邻，它们之间没有领土纠纷，更不需布置边境防线。第三，就社会宗教来看，印俄信仰冲突的可能性很小，东正教传统与印度教传统并不相互为敌。第四，从多极化战略和经贸关系看，印度也是顺应俄罗斯的需求的。

对于印度而言，它在武力强大的俄罗斯面前并未感到有任何生存压力。从印苏时期的“特殊关系”发展到新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印俄积累了丰富的交往经验，具有深厚的友谊。在印度追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问题上，俄罗斯积极支持。在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印度也大力支持。这些客观和主观因素使印俄战略伙伴关系更为可信，更加实质化。

虽印度也致力于军购多元化，但在关键领域，如在搭乘俄罗斯的卫星导航系统、第五代战机的合作研发上，印度的选择均倾向于与俄罗斯合作。这些先进科技领域的合作表明，双方的信任度很强，双方的交流更加真诚。

再次，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潜力在于双方有很强的互补性。在资源、技术等方面，印俄的互补性强，其合作有很大潜力。

在军事上，俄罗斯在很多方面都优于印度，印度一直依赖于俄罗斯的武器供应。印度有 70% 的武器装备均为苏俄系统，虽近年来军购多元化，但短期内不会改变军备现状。战略伙伴关系的建构与深化，使印俄军事技术合作变成了共同研发的关系，这也是因为印度有研发的潜力。在军事技术合作方面，硬件是俄罗斯的优势所在，印度的优势在于软件业。“印度的软件业与俄罗斯的科研成果相结合将有很大的发展潜力。”^①通过技术优势的互补，印俄合作将会保持良好势态。

在能源领域，印俄有很大的供需空间。俄罗斯是能源大国，印度的能源短缺。2008 年后，能源合作已成为印俄交往中的主题。虽然有学者指出“俄罗斯从来不是印度主要的能源合作者，印度也不会成为俄罗斯能源的关键目标”^②，但随着印度能源需求的增加，印俄能源合作会不断提升。

由此可见，印俄战略伙伴关系在传统的“久经考验的”伙伴关系上发展

① 马嫫：《当代印度外交》，第 88 页。

② Devika Sharma, “India-Russia Energy Cooperation”, in Nivedita Das Kundu, ed., *India-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New Delhi: Academic Foundation, 2010, p. 83.

成了具有对等、信任、互补等特质的新型关系。其中，对等是双方合作的根基，信任是深入合作的保障，互补是长久合作的动力。印俄战略伙伴关系有很大的、良性的发展潜力。

（二）两项挑战

由于印俄关系本身固有的特性和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印俄战略伙伴关系面临着两项重大挑战，即贸易额相对低迷和新兴关系圈子的吸引力。

首先，印俄战略合作重点在于军事武器和技术领域以及反恐合作等，而在经贸领域的合作相对较弱。以印俄贸易额为例。一直以来，双方领导人纠结于相对较低的贸易额。虽然印俄贸易保持了持续增长，但其额度相对较低。

以 2011 年印俄与中国的贸易为例，中印贸易额达到 739 亿美元，中国继续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中俄贸易额达 792.5 亿美元。而 2011 年印俄贸易量只有 88.9 亿美元。^①相比之下，印俄经贸关系显得低迷。因此，如何提升和促进双方贸易的发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其次，世界其他国家或集团有着更大的吸引力，这种外部因素给印俄关系带来更大压力。无可置疑，当前美国的力量仍是首屈一指的。它在政治、军事、科技、经贸、文化等领域对印度和俄罗斯都有很大的吸引力，印俄都需花费很大精力来关注对美关系。另外，欧盟的大市场亦有很强的吸引力。此外，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也让印俄感到有必要转移关注点，融入到更大的集团和圈子中去。印俄战略合作本身存在着急需解决的问题，还受到国际上其他集团或圈子的吸引，或许是时候扩大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范围了。近年来，中印俄战略伙伴关系越来越深受学界的关注，在金砖国家中实现中印俄战略合作有很大可能性。^②当前的国际环境正在为印俄关系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在多边战略合作中，印俄的发展或许会更好。很有可能，这个多边战略伙伴关系就是倡议已久的中印俄战略三角。

① 印度驻华大使馆网站，23.08.2012.//www.indianembassy.org.cn/Chinese/DynamicContentChinese.aspx?MenuId=3&SubMenuId=0；中国商务部网站，23.08.2012.//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1 /m/201201/20120107925527.html；印度驻俄大使馆网站，23.08.2012.//indianembassy.r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06&Itemid=706 &lang=en

② 2012 年 8 月 26 日笔者与印度陆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莫妮卡·詹索尼亚（Monika Chansoria）博士的访谈。

五、结论

对于世界形势的认知变迁是印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的关键。冷战后，印俄从传统的特殊关系转变成战略伙伴关系。在此后的战略合作过程中，印俄交往逐渐机制化；军事合作方式从传统的买卖关系转变成了共同研发、生产的关系；双方在经贸领域也不断发展，并努力寻求发展的突破口；在核能领域，印俄进入了共同研发阶段；在文化交往方面，双方在广度和深度上更进一步；通过各领域合作，印俄实现了双赢，印度增加和显示了权力，俄罗斯则保持了权力。

印俄战略合作存在着众多优势。对等、信任和互补等特性让印俄关系在稳定发展的基础上蕴含着很大的发展潜力。印俄战略合作也存在重大挑战，例如双方贸易额相对低迷、更加诱人的外部因素等。印俄战略合作想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是时候考虑融入到更广泛的关系网络中，进入到更多行为体参与的平台。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中印俄战略伙伴关系会逐渐成形。也或许，金砖国家平台能够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Abstract】 “Strategic partnership” is a relatively ambiguous concept.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India and Russia was established in 2000. In 2011 Russian President Dmitry Medvedev elevated this relationship to the status of “priority relations”.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Russia, the two sides have achieved outstanding results in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s, military cooperatio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nuclear cooperation, cultural exchange and so on. Indian-Russ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is characterized by equality, trust and other advantages, but is also facing such important challenges as a relative downturn in trade volume, attractiveness of other actors and so on. The prospect of Indian-Russ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depends on the ability of the two sides to deal with a variety of challenges.

【Key Words】 India, Russia, relationship of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identification, cooperation

【Аннотац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являетс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расплывчатым понятием. В 2000 г. были установлены отнош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между Индией и Россией. В 2011 г.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возвёл эти отношения в статус «приоритет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С углублением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Индией и Россией обе стороны добились заметны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в механизмах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 военн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ядерной области, культурных обменах и т.д.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Индии и России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равенством, доверием и иными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ми, однако оно также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 такими важными вызовами, как относительный спад объёма торговли, 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ость других субъектов и т.д. Способность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Индии и России двигаться вперёд зависит от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справиться со многими проблемам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Индия, Россия, отнош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артнёрства, признани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责任编辑 孙超)

俄罗斯与大国关系

“双向失衡”结构与 与欧洲导弹防御议题中的美俄博弈

封 帅*

【内容提要】在冷战后国际力量对比和冷战遗产的共同作用下，后冷战时代的欧洲安全体系已经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双向失衡”结构。在这一特殊背景的影响下，从2002年开始的欧洲导弹防御议题最终演变成为一场美俄两国围绕着未来欧洲安全体系建构而展开的政治博弈。在布什政府执政时期，美国凭借自己在国家实力和导弹防御技术方面所具有的优势，通过单边行动，利用欧洲导弹防御议题同时向俄罗斯和西欧国家施压，最终引发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弹。奥巴马政府执政以后，改变了布什政府在欧洲导弹防御议题上的政策，放弃了布什政府时期的东欧导弹防御计划，推出了新的“分阶段适应性方案”，将欧洲导弹防御系统重新纳入北约框架，并且邀请俄罗斯参与导弹防御合作。美国的政策调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不仅推动了美俄和美欧关系的好转，而且以2010年北约里斯本峰会为标志，使美俄两国在欧洲导弹防御合作的大方向上基本达成了共识。虽然在2011年底，备受期待的美俄导弹防御谈判最终未能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合作局面的终结。“双向失衡”结构的存在限制了双方选择的空间，美俄导弹防御谈判对于未来欧洲安全体系的建构将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任何合作的结果都远远好于谈判失败所带来的损失。可以预见，两国总统选举结束之后，新任领导人

* 封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

在 2013 年必然将继续就此问题展开磋商，虽然谈判的过程仍将困难重重，但两国最终达成合作协议的可能性不应被低估。

【关键词】“双向失衡” 欧洲导弹防御 博弈 合作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 (2012) 04-0067
-(27)

引 论

作为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 2002 年开始，美国开始了在东欧国家部署预警雷达和导弹拦截装置的尝试。这种行动毫无意外地触及了俄罗斯和欧洲国家敏感的神经，从而开启了美俄双方围绕着欧洲导弹防御议题而进行的长达十年的政治博弈，迄今为止，谈论最终的结果仍然为时尚早。

这场政治博弈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从 2002 年至今，先后经历了完全不同的两个时期，博弈的内容和特征也呈现出微妙的差异，欧洲国家的态度在不同时期出现了很大转变，而俄罗斯的立场也已进行了多次调整。这场博弈的结果也将是影响深远的，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冷战后由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国家所构成的欧洲安全体系的走向，也将对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北约的发展和美俄关系的变化产生重大的影响。正因为该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而备受世界各国学者和舆论界的关注，也成为新世纪国际关系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

目前，国外学者对欧洲导弹防御问题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且出版了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其中以美俄两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最为突出，但他们的关注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相对而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者的研究范围较广，既有对于导弹防御系统的技术分析，也有围绕着美国国内和国际政治状况展开的研究。他们主要从美国导弹防御计划本身出发，对于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可行性、有效性，以及将面临的国内国际困难与挑战进行分析。其主流观点大多强调东欧导弹防御系统主要是针对伊朗日益增长的导弹能力，并非指向俄罗斯。但西方学者也普遍承认，导弹防御系统的建立将增加俄罗斯的不安全感，并将俄罗斯的态度作为影响导弹防御系统

最终完成的重要变量。^①与此相对应的是，俄罗斯学者则更多地将研究重点集中于欧洲导弹防御问题博弈对俄美关系的影响。有俄国学者认为，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将极大地损害俄罗斯的战略地位，并给俄罗斯国家安全带来巨大隐患；但也有学者提出，美俄双方最终可以通过谈判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并可以在导弹防御问题上开展更为深入的合作，开启俄美关系的新局面。^②

多年以来，欧洲导弹防御问题同样也是中国学者非常关注的研究课题，近年来也不乏上乘之作。例如，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的朱强国在他的《美国战略导弹防御计划的动因》一书中，较为全面地总结了美国导弹防御计划的发展进程，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背景知识。华东师范大学的卿文辉所著的《霸权与安全——美国导弹防御史话》则从战略文化视角讨论了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清华大学访问学者吴日强从导弹技术的角度，讨论了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对于俄罗斯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视角可谓新颖独特。但总的来说，目前中国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仍然无法与美俄学者相提并论。由于双方谈判过程大多处于保密状态，提供给研究者的信息资料比较有限，而国内大部分研究

① 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参见 Victoria Samson, *American Missile Defense: A Guide to the Issues*, Santa Barbara: Praeger, 2010; Richard Burns, *The Missile defense system of George W. Bush: A Critical Assessment*, Santa Barbara, CA: Praeger, 2010; Natalie Bormann, *National missile def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US identity: A poststructural critique*,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ristian Reus-Smit, Nicholas J. Wheeler (eds), *Justifying Ballistic Missile Defence: Technology, Security and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Erin Causewell (ed.),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Issues and Developments*, New York: Novinka Books, 2009; Alexander Lennon(ed.), *Contemporary Nuclear Debates: Missile Defense, Arms Control, and Arms Rac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2.

② 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参见 Андреев И. И. Оружие противоракетной и противокосмической обороны. Ордена Трудового Красного Знамени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СССР, 1971 г.; Белоус В. С. Противоракетная оборона и оружие XXI век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ече, 2002 г.; Кашафова Л. Меч и щит России. Ракетно-ядерное оружие и системы противоракетной обороны. Калуга-пресс, 2007 г.; Малафеев В. П. Противоракетная оборона. События и участники. Принтер-99, 2008 г.; Маронов П. Противоракетная оборона. Компания ООО «Книга по Требованию», 2011 г.; Фитуни Л. Российски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Логос, 2002 г.; Dmitry Trenin, “A European Missile Defense System to Replace the Great Game: How Russia and the U.S. Could Start Demilitarizing Their Relations”,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April/June 2011; Andrey Kortunov, “Does missile defense derail the ‘reset’?”, *Russia Today*, July 29, 2011; 本文的俄文资料整理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崔珩博士的协助，特此致谢。

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有效的切入点，大部分研究是对现象的描述，不仅难以把握双方微妙的博弈过程，对欧洲导弹防御系统未来的发展前景也缺乏有说服力的展望，应该说，深入的分析 and 独到的见解相对不足。^①

事实上，如果要分析欧洲导弹防御问题，研究者必须明确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怎样的背景和环境决定了欧洲导弹防御议题目前的形态？第二，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欧洲导弹防御问题的实质是什么？第三，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一议题的意义是否有所变化？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真正把握欧洲导弹防御议题对于美俄双方所产生的复杂影响，也才能够对其未来可能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

基于以上考量，本文的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后冷战时代欧洲安全体系的特征，提出“双向失衡”结构的判断，并以此作为理解欧洲导弹防御议题的切入点。第二和第三部分，根据时间顺序对布什时代和奥巴马时代的欧洲导弹防御问题的发展过程进行详述，并且结合安全结构因素分析在此博弈过程中美国与俄罗斯不同时期的政策与心态变化，着重把握不同时期欧洲导弹防御议题在性质和内容方面的微妙差异。最后，根据前三个部分的研究结论，剖析和勾勒欧洲导弹防御博弈的未来前景。

冷战的遗产与“双向失衡”结构

1991年，随着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和苏联的解体，笼罩在欧洲大陆上

① 目前我国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包括：朱峰：《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与国际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吴菀思：《威慑理论与导弹防御》，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年；朱国强：《美国战略导弹防御计划的动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卿文辉：《霸权与安全——美国导弹防御史话》，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葛立德：“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及战略反导系统的发展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4期；吴日强：“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针对谁？”，《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3期；苗华寿：“试析美俄关于东欧反导防御系统的争论”，《和平与发展》，2007年第3期；胡丽燕：“俄罗斯、欧盟和美国在中东欧国家的竞争与合作”，《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2期；王海滨：“俄美关于反导问题的斗争及其对世界军事安全的影响”，《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1期；张万里：“欧洲反导问题与美俄关系‘重启’的前景”，《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1期；李巧英：《美国的东欧导弹防御计划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空的冷战阴霾终于以一种和平的方式消散。与此同时，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欧洲两极对抗体系土崩瓦解。然而，旧体系的崩溃并不意味着冷战影响的完全消失，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对抗为后冷战时代留下了丰富的物质与精神遗产，时至今日，仍然左右着欧洲安全体系的建构，也对欧洲导弹防御议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冷战最重要的物质遗产便是在两极对峙时期美苏两国积累下来的庞大的武器装备。由于冷战的终结并未经历战争与全面冲突，苏联和美国巨大的武器库几乎毫发无损。作为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依然拥有与美国接近的核打击能力，常规军事实力虽然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仍然拥有相当强大的力量，并且保持着相对于欧洲国家的明显优势。^①

与物质遗产相比，冷战在精神层面的遗产对于欧洲国家的影响更为深远。冷战时期的经历已经成为东欧国家难以抹去的历史记忆。加上地缘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以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为代表的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俄罗斯对外政策和本国的安全始终怀有深切的担忧。这种担忧在外交实践中便体现为东欧国家更加激进的反俄立场，以及更加倾向于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为自己提供安全保障。^②

同时，对于冷战结局的不同理解也造就了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完全不同的战略心态。美国和西方国家将自己视为冷战的胜利者，在他们眼中，俄罗斯应该遵循西方国家所提供的发展道路，通过调整本国政策，以参与者的身份加入并适应既有的地区安全秩序。然而，俄罗斯却从未将自己看作是冷战的失败者。他们认为冷战的终结是苏联与西方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自己也是冷战的胜利者。因此，俄罗斯认为西方国家应该尊重俄罗斯在体系中的地位，并且通过与俄罗斯的对话与协商共同构建新的地区安全体系。在心态

① 后冷战时代美国、俄罗斯和欧洲的军事实力对比，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历年的年度研究报告中有过较为详细的分析，参见 <http://www.sipri.org/yearbook>；关于冷战时期军备竞赛的遗产，美国学者大卫·霍夫曼曾有过非常精彩的研究，参见 David Hoffman, *The Dead Hand: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Cold War Arms Race and its Dangerous Legacy*,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10.

② 关于俄罗斯与东欧国家之间的安全认知，参见 Roger Kanet, *The New Security Environment: the Impact on Russia,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ldershot, Hants: Ashgate, 2005; Michael Kraus, Ronald Liebowitz,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after Communism: the Search for New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Syste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和认知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最终导致了后冷战时代欧洲安全体系建构的困境。^①

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国家对于后冷战时代欧洲安全体系都有过积极的设想。俄罗斯最初的想法，是建立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为核心的安全合作体系，赋予欧安组织更多的执行权力。在受到西方冷遇之后，进而转向发展俄罗斯与北约建立框架性协议。2008年，俄方提出签署“欧洲安全条约”的倡议，其核心内容始终是强调俄罗斯在欧洲安全格局中的重要位置，试图通过某种制度性安排来保持俄罗斯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发言权。但这种要求并不能为美国所接受。对于美国而言，保持北约在欧洲安全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无疑是保持其在欧洲安全问题上拥有最大发言权的最为便利的方式。西欧国家虽然试图建立以欧盟为核心的欧洲安全体系，但由于其军事与防卫力量有限，基本上只能作为北约力量的附庸而存在，短时间内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而对于俄罗斯“另起炉灶”的想法也始终敬而远之。更为重要的是，在冷战遗产的影响下，大部分东欧国家仍希望美国在欧洲安全体系中扮演关键角色，限制俄罗斯的作用。结果，从1994年开始，“北约东扩”就成为欧洲安全领域最为重要的事件。众多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先后成为北约新成员国，进一步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然而，这种方式最大的缺陷是不仅没有将俄罗斯纳入体系，反而越来越将其排除于体系之外，这样的安排不仅无法使俄罗斯成为欧洲安全的积极力量，而且使得整个欧洲更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对抗局面，直接影响到欧洲，尤其是东欧地区的战略稳定。^②

当前的欧洲安全体系正处于这样一个尴尬的两难局面之中：一方面，俄罗斯对于美国政府的长期的战略目标和对其政策表现出强烈的担忧。在这种环境下，它将北约东扩、颜色革命、支持格鲁吉亚等所有的行为都看作是

① 关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对冷战终结的认知差异研究，参见 Robert English, *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 Gorbachev, Intellectual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② 关于战后欧洲安全体系的研究参见 Andreas Wenger, Vojtech Mastny, Christian Nunlist,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System: the Helsinki Process revisited, 1965-75*,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Tuomas Forsberg, Graeme Herd, *Divided west: European security and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Chatham House, 2006; Gulnur Aybet, *A European security architecture after the Cold War: questions of legitimacy*, Basingstoke: Mamillan, 2000.

计划、有目的，持续打压俄罗斯战略空间，并直接影响俄罗斯国家安全的行动，因而对美国提出的所有涉及欧洲安全的计划都表示出足够的怀疑。

然而，另一方面，东欧各国对于俄罗斯也表现出类似的担忧。这种担忧既源于不愉快的历史记忆，又源于他们对俄罗斯重新崛起过程中所秉持的对外政策的警惕。他们将俄罗斯在石油和天然气管道问题上的强硬和霸道、俄罗斯对于原苏联地区“特殊利益空间”的认知、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部署导弹的计划、以及俄罗斯对于格鲁吉亚的军事行动，都理解为俄罗斯重新走上扩张路线的证据。他们以警惕的心态留神俄罗斯的一举一动，这种不安全感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寻求新的安全保障。

这两种互不信任的心态是互相促进，相互加强的。由于东欧国家与俄罗斯之间力量对比存在严重的失衡，因此东欧国家对于安全的焦虑几乎无可改变，他们强烈渴望美国能够对其安全提供足够的保障，最好能够通过协议予以确定，以避免自己成为大国利益交换的牺牲品。但反过来看，由于美国与俄罗斯在力量对比方面也处于失衡的状态，美国对于东欧国家所提供的安全保障，又会进一步加剧俄罗斯对于美国威胁的担忧。为了避免这种不安和忧虑，俄罗斯往往会全力阻止美国与东欧的接近，然而，这样的举动在东欧国家眼中再次成为明显的刺激，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东欧国家的恐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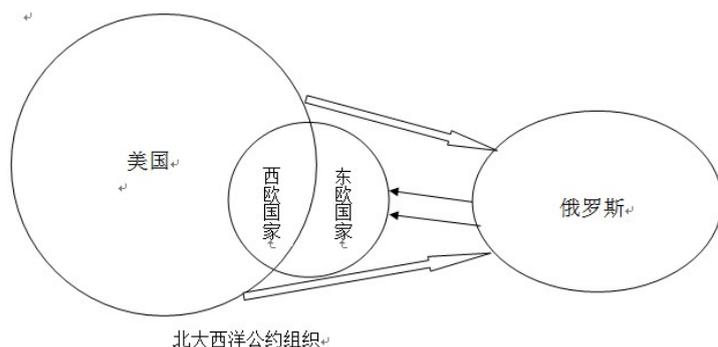


图 1 欧洲安全体系中的“双向失衡”结构

也就是说，在目前欧洲的安全结构中，“美国问题”是俄罗斯对于自身安全最大的忧虑。而在东欧国家眼中，“俄罗斯问题”才是欧洲安全最大的

障碍。如图 1 所示，三方力量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组联系的力量失衡状态，使得当代欧洲安全格局形成了一种“双向失衡”的结构。

“双向失衡”格局是后冷战时代的产物，是冷战遗产与各国互动的结果，但这显然不是一种稳定的结构。由于政治、经济和常规军事力量对比的失衡，美国在现有的安全结构中占据着优势地位，它能够更加主动地设置政治议题，也有更多的手段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相对而言，俄罗斯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应对可能出现的战略与安全威胁，比如在面对北约东扩的局面时，俄罗斯就始终难以拿出有效的遏制策略。与此同时，这种结构对于东欧国家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由于实力和意图的限制，东欧国家往往会根据美国的战略构想顺势而为，常常成为挑战俄罗斯安全利益的先锋。单以 2008 年格鲁吉亚战争为例，一旦美国不愿意承担战争风险时，格鲁吉亚完全没有力量应对俄罗斯的行动。因此，这种结构对于所有行为主体都是非常危险的，体系内各主体之间相互敌视，很难建立起足够的政治互信。更重要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双向失衡”结构中，稳定的基础维系于“确保相互摧毁”为原则的核力量平衡。只有在核力量相对平衡的条件下，这种结构才能免于崩塌。所以对于欧洲安全来说，这种结构是相当脆弱的。对这一原则的任何冲击都会让俄罗斯感到极大的威胁，而欧洲导弹防御问题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直接挑战“双向失衡”结构基础的政治议题。

在“双向失衡”结构的大背景下，欧洲导弹防御议题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一般政治争端的范畴。这场围绕着导弹防御问题展开的博弈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美俄双方关于国家利益的争论，更有可能直接影响到未来欧洲安全体系的走向。就导弹防御系统本身而言，一旦防御技术发展成熟，现存的美俄双方核力量平衡将被打破，“双向失衡”结构的根基将不复存在，各国将不得不开始重新建构欧洲安全体系；而就议题博弈的过程而言，如果美俄能够围绕欧洲导弹防御议题开启对话和谈判，那就意味着双方有可能在安全领域展开新的战略合作，这也将成为建构更稳定的欧洲安全新秩序的契机。

脆弱性与不稳定性兼备的特征，决定了“双向失衡”结构注定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欧洲安全体系在未来必然会寻找这种结构的替代方案。但无论怎样，解决“双向失衡”的路径只有两个：一个是建设性的方案，即通过

某种战略性合作的方式，建立新的欧洲安全共同体，将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国家共同纳入其中，重新建立新的稳定的安全结构。另一种则是破坏性的方案，即通过单边行动，瓦解“双向失衡”结构的核平衡基础，形成压倒性的战略优势，迫使对方以某种新的方式接受新体系的原则并重新审视自己的国际地位。而在近十年的欧洲导弹防御议题博弈中，这两种解决路径及其后果都在实践过程中获得了充分的展示，堪称未来欧洲安全体系的试金石。可以说，欧洲导弹防御议题的本质就是美俄双方在现存的“双向失衡”结构的背景下，围绕着欧洲安全结构的重构而开展的博弈。由于美国所拥有的力量和技术优势，使其始终能够以主动的姿态主导议题的变化，而俄罗斯则处于守势，在博弈过程中略显被动。然而，俄罗斯最终的选择虽然可能无法改变欧洲导弹防御系统部署与否，但却能够对未来欧洲安全体系的构建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分析和解读欧洲导弹防御议题的过去与未来，就是在描绘后冷战时代欧洲安全体系的发展轨迹，并且梳理贯穿其间的美俄关系。

布什时期：单边主义的“一石二鸟”

欧洲导弹防御问题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早在 1994 年 9 月，当时的美俄两国领导人就曾讨论过北约与俄罗斯共同应对导弹威胁的可能性。1996 年，在北约框架内，美国曾与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共同建设了名为“中程防空系统”（medium extended air defense system, MEADS）的小型联合导弹防御系统，但由于资金投入和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并未取得预期中的进展。^①因此，欧洲导弹防御问题从 2002 年起才真正获得国际社会的注意。

2002 年 12 月 17 日，已经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布什政府开始在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部署导弹防御系统（Missile Defense, MD）。几乎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开始了和波兰、捷克的非官方接触，探讨在两国领土上设置

^① Victoria Samson, *American Missile Defense: A Guide to the issues*, Santa Barbara, CA: Praeger, 2010, pp.110-117.

预警雷达和导弹拦截装置的可能性。^①2003年，导弹防御计划的直接执行机构美国导弹防御局（Missile Defense Agency, MDA）就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可能的选择向白宫提出了报告。^②但这一时期，几乎所有西欧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都不赞成美国退出《反导条约》的单边行动，更担心由于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引发新的军备竞赛。而美国国内的导弹防御系统建设也刚刚启动，完成尚需时日。因此，这一时期美国对于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基本上都还停留在纸面上。

2004年，随着伊拉克局势渐趋稳定，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在美国2005财政年度预算案中，布什政府正式要求为“在一个潜在的第三地（继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之后）建立陆基导弹拦截装置的长期行动”拨款。而导弹防御局（MDA）的罗纳德·卡迪什将军（Ronald Kadish）则公开表示，“美国将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在国外建立第三个导弹拦截基地。”^③很快，美国正在与波兰、捷克和匈牙利进行秘密谈判的消息也获得了官方证实，欧洲导弹防御系统正式成为敏感的国际政治议题。

美国选择2004年这样一个时机触发欧洲导弹防御议题，显然是一个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一石二鸟”行动。一方面，布什政府试图进一步利用由于伊拉克战争而引发的“老欧洲”与“新欧洲”的分歧，拉近东欧国家与美国的战略关系。重新调整北约内部的关系结构，提高与美国靠拢的东欧国家在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同时向法、德等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老欧洲”国家施压。另一方面，继续向俄罗斯施压，利用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担忧进一步打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巩固北约东扩的“战果”。然而，尽管设计巧妙，但这种行动本身仍是美国利用自身的战略优势，在拉拢少数东欧国家的同时，向欧洲大国和俄罗斯双向施压。这无疑是一种相当危险的行为。其实，在欧洲“双

① 相关信息参见美国外交部相关网站 http://prague.usembassy.gov/md_faq.2html 此外也可参考 Richard Burns, *The Missile defense system of George W. Bush: A Critical Assessment*, Santa Barbara, CA: Praeger, 2010, p.79.

②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Action Needed to Improve Planning and Information on Construction and Support Costs for Proposed European Site”, GAO-09-771, Aug 6, 2009. <http://www.gao.gov/products/GAO-09-771>

③ Richard Burns, *The Missile defense system of George W. Bush: A Critical Assessment*, p.82. 此外还可参见美国2005财年导弹防御预算情况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space/library/budget/fy2005/index.html>

向失衡”结构的背景下，东欧国家能够为美国提供的帮助极其有限，而施压行为则不仅有可能导致俄罗斯的强烈反弹，也容易加剧北约内部业已存在的裂痕，甚至威胁到整个欧洲的安全。

2006年5月，捷克政府正式对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提议作出积极回应。不久，波兰也作出类似表态，2007年1月，美国要求与波兰、捷克就此问题展开正式谈判，美国与两国的双边谈判于2007年5月正式开始。

美国单边主义的行动引发了俄罗斯与欧洲各国的普遍反对。2006年12月13日，俄罗斯第一次正式对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问题表态。俄罗斯总参谋长尤里·巴卢耶夫斯基（Yuri Baluyevsky）表示，“美国建立一个反导基地并不能被看作是美国军事存在的大规模重组……但问题在于美国反导计划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它可能对俄罗斯和欧洲产生怎样的影响？”但同时，他也对这一部署对于俄罗斯战略环境的潜在破坏表示关切，并暗示俄罗斯有可能退出1987美苏两国签订的《中导条约》。^①相较于俄罗斯绵里藏针的态度，欧洲各的表态则更加直率。以希腊、土耳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为代表的东南欧国家认为，这一体系根本无法保护东南欧地区的安全。而2007年3月13日，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警告说，这种部署可能会使欧洲分裂。德国总理默克尔则表示：“德国希望能够将这一问题拿到北约内解决，并且同俄罗斯进行公开对话。”时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认为：“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不应该鼓励在欧洲内部制造新的分界线，或者回归那些过时的旧秩序。”^②

虽然反对声音极大，但布什政府却在单边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尽管华盛顿官方表示愿意向盟国和俄罗斯通报计划的进展，但始终坚持与波兰、捷克进行双边谈判，反对北约介入其中。相比美国的强势，俄罗斯在2007年以前，对于欧洲导弹防御问题的表态仍然是相对谨慎的，或者说普京政府此时仍然试图通过试探性的行动试图摸清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底线和目的。

2007年6月在德国海利根达姆召开的八国峰会上，普京的试探行动使

① Wade Boese, “US Europe Anti-Missile Plan Upset Russia”, *Arm Control Today*, March 2007, pp.47-48. http://www.armscontrol.org/act/2007_03/AntiMissile

② Oliver Meier, “European Split over US Missile Defense Plans”, *Arms Control Today*, April, 2007, pp.36-38. <http://www.armscontrol.org/print/2333>

得欧洲导弹防御问题的博弈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在这次会议上，俄罗斯与美国就欧洲导弹防御系统问题进行了对话，同时，普京向美方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将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地点由东欧移至阿塞拜疆。普京建议美俄可共同使用设在阿塞拜疆的加巴拉（Qabala）的雷达站，如果伊朗试射长程导弹，则可在该地进一步部署导弹防御设施。^①

俄罗斯的这一提议显然是经过了认真的分析与准备。即使在美国专家看来，在技术上，这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按照美国政府的说法，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目标是防御伊朗可能的导弹威胁，那么相较波兰和捷克而言，阿塞拜疆相当接近伊朗边界，可以更好地监控伊朗导弹。同时由于阿塞拜疆雷达站地处欧洲东南部，可以使导弹防御系统的功能覆盖整个欧洲地区，满足了东南欧国家的要求。而且一旦出现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威胁，在阿塞拜疆地区进行拦截可以避免核武器遗骸落入俄罗斯境内。当然，最重要的是，由于地理方面的原因，位于阿塞拜疆的防御系统无法对俄罗斯导弹进行侦测，从而保证了俄罗斯的战略安全。^②

从政治上看，俄罗斯通过这一提议，展示了自己欧洲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的务实立场。普京意识到，美国在欧洲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绝非一时冲动，而是有意识的战略举动，直接影响着未来欧洲安全体系的建设。由于美国自身拥有庞大战略资源，俄罗斯没有足够的力量对其加以阻止。因此，通过这种合作式的提议，既可以展示本国在欧洲导弹防御问题上的合作态度，也可以凸显美国现行方案的内在缺陷。

平心而论，在欧洲当前“双向失衡”结构的背景下，俄罗斯的这一提议称得上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在保证美国对于导弹防御系统的基本要求的基础上，维护了本国的核心战略利益，同时将导弹防御问题与东欧国家的要求加以区别对待，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德法等主要欧洲大国的地位，甚至对东南欧国家的安全利益也有所照顾。几乎满足了“双向失衡”结构中主要各方的利

① The Russian Information Agency, Russia, U.S. agree on missile defense dialogue, *RIA Novosti*, June 7, 2007. <http://en.rian.ru/russia/20070607/66865660.html>

② The Russian Information Agency, Gabala radar can detect cruise missile, *RIA Novosti*, June 8, 2007. <http://en.rian.ru/russia/20070608/66917850.html>, Victoria Samson, *American Missile Defense: A Guide to the issues*, pp.58-61.

益诉求，而又没有触动该结构的基础。但很显然，俄罗斯提出这一提议的目的绝非是天真地认为美国会认真考虑这种方案。由于阿塞拜疆的雷达站由俄罗斯控制，如果美国接受这一提议，就必然接纳俄罗斯作为伙伴参与导弹防御系统的管理活动。双方的正式谈判会涉及到一系列复杂问题，在一年时间内绝对不可能完成。而一旦将时间拖到 2008 年秋季，则美国大选的结果就将成为欧洲导弹防御议题最大的变数。这对于一直在执行单边主义、利用自己的战略优势强行推动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布什政府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实际上，俄罗斯此举除了要试探美国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并且为自己后续的强硬表态制造舆论准备以外，也是向外界，尤其是未来美国政府展现俄罗斯在欧洲导弹防御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可以看到，俄罗斯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在欧洲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而且愿意就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与美国开展合作，但坚决反对将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在东欧国家、限制本国战略力量的防御计划。这种态度为日后美俄双方可能进行的合作埋下了伏笔。

尽管布什在峰会会场上称普京的提议是个“令人感兴趣的建议”（interesting suggestion），但很快在 6 月 8 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就明确表示阿塞拜疆雷达站可以成为东欧导弹防御系统的补充，但不能够取代东欧防御系统。^①这种拒绝式的表态使俄美在欧洲导弹防御问题上的对话难以形成共识。10 月 12 日，双方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由于分歧过大，未能达成任何协议。12 月 12 日，俄罗斯宣布暂停执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2008 年 11 月，俄罗斯宣布在加里宁格勒部署导弹。欧洲安全形势迅速恶化，“新冷战”的风险笼罩整个欧洲。^②

尽管美国在 2008 年 6 月和 8 月先后与捷克和波兰签署了建立导弹防御

① Matthew Lee, Rice, “Russia’s Softening on Missile Defense Won’t Alter US Plans”, *USA Today*, June 8, 2007. <http://www.deseretnews.com/article/660227958/Russias-softening-on-missile-defense-wont-alter-US-plans.html?pg=all>

② 2008 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战争之后，关于“新冷战”问题的讨论曾盛极一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俄]卡拉加诺夫：“新冷战，怎么办”，《俄罗斯研究》，2008 年第 5 期；[英]理查德·萨克瓦：“是‘新冷战’，还是‘20 年危机’？——俄罗斯和国际政治”，《俄罗斯研究》，2008 年第 5 期；潘兴明：“‘新冷战’问题探析”，《俄罗斯研究》，2008 年第 5 期；王铁军：“‘新冷战’与中俄美三边关系——身份、国际权力结构与国内进程”，《俄罗斯研究》，2008 年第 5 期。

系统的协议，但该议题已经无法在布什任期内继续推进了。到了 2008 年 10 月，美国与东欧国家的各种谈判全部暂停，等待着新政府的产生，而布什时代单边主义的冒险也终于画上了句号。

纵观整个布什时代，美国政府都在奉行单边主义的行动逻辑。它毫无顾忌地根据自己设定的国内安全的需要确定行动路线，抛开欧洲盟国，利用东欧国家对于俄罗斯的担心和对自己的依赖，通过双边谈判的方式强行推动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试图以这种方式提升东欧国家在欧洲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同时削弱俄罗斯的战略潜力，甚至不惜撼动整个欧洲安全结构的根基。美国这种鲁莽举动所产生的风险在欧洲脆弱的“双向失衡”结构中被空前放大，无限制地挤压俄罗斯的战略利益，不惜诱发新的冲突；而为了惩罚西欧大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选择而在北约组织内部人为制造分裂，几乎可以说是在摧毁自己在欧洲的战略支柱；即使是表面上得到利益的东欧诸国，也将被迫被拉入更加严重的导弹威胁之中，整个体系中几乎没有任何单元能够在这种行动中获利。这种看似“一石二鸟”的单边行动，最终却使导弹防御问题形成了一个死结，也造就了美国这一时期在战略上的孤立局面。其行动遭遇了战略竞争对手和盟友的共同阻挠，虽然雄心勃勃，却始终步履维艰。这种结果也充分显示了布什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的巨大缺陷，为欧洲安全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奥巴马时期：退一步，进两步

2009 年 1 月，奥巴马就任美国新总统，欧洲导弹防御议题的博弈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早在 2007 年，时任参议员的奥巴马就曾经对布什政府的导弹防御计划提出过有趣的评论：“在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之前，我们必须确保这一防御系统是有效的”^①。可以说，布什政府倾向于通过防御系统的部署达到抑制俄罗斯和西欧国家的政治目的，而奥巴马政府则更加强调导弹防御系统的实

^① Richard Burns, *The Missile defense system of George W. Bush: A Critical Assessment*, p.90.

际有效性。在选举胜利之后，他的执政团队曾这样描述奥巴马对导弹防御系统的态度：“奥巴马—拜登政府将支持导弹防御系统，但必须确保这一系统的发展符合实用主义（pragmatic）和成本效益（cost-effective）的原则”。^①这种态度上的差异为奥巴马时期美国在欧洲导弹防御问题上的政策调整提供了可能。

调整的契机很快便出现了。2009年2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CBO）在重新审定导弹防御系统的预算时，从经济角度出发，提出了欧洲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地点的四个可能性替代方案，巧合的是，其中恰恰包括了在阿塞拜疆加拉巴部署预警雷达，以及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Krasnodar）边疆区的阿尔马维尔（Armavir）^②部署雷达的选项，而且所有四个替代地点都要求与俄罗斯合作或者邀请俄罗斯参与。^③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计划完全根据奥巴马所说的“成本效益”原则制定，但却与2007年普京在八国峰会上的提议非常接近。这种巧合为美国新政府提供了一个新的政策选项：让俄罗斯直接加入欧洲导弹防御计划，或者通过合作的方式参与欧洲导弹防御计划。

奥巴马政府的这种姿态虽然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改变，却也可以看作是应对国际环境深刻变化的无奈之举。在2009年，奥巴马所面对的局面要比布什时期复杂得多，本已相当危险的欧洲“双向失衡”结构的崩溃风险迫在眉睫。在布什任期内，北约不顾俄罗斯反对的持续东扩最终在格鲁吉亚引发了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而且导致俄罗斯在伊朗核问题以及中亚问题上采取了越来越强硬的对抗立场。雪上加霜的是，1991年美国与苏联政府签订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 START）将在2009年12月5日到期。在美国退出《反导条约》以后，《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已经无疾而终。如果届时无法就该问题展开新一轮谈判的话，美俄之间在安全领域就将面临没有任何限制性条约作为安全基础的窘境，不仅美俄双方可

① Richard Burns, *The Missile defense system of George W. Bush: A Critical Assessment*, p.94.

②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位于高加索地区，地处黑海沿岸，紧邻格鲁吉亚，索契即是其境内的城市。阿尔马维尔是卡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东部城市。

③ Richard Burns, *The Missile defense system of George W. Bush: A Critical Assessment*, p.136.

能重新陷入军备竞赛的困局，欧洲安全体系也将名存实亡。如果说在布什时期，美国政府可以不顾多方反对，强行推动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的话，那么在奥巴马时期，形势就迫使其必须同时处理削减战略武器和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两方面的问题，才能维护欧洲安全局势的稳定，而与俄罗斯重新开始对话与合作也几乎成为奥巴马政府唯一合理的选择。

美国立场的转变迅速成为欧洲导弹防御困境的转折点。2009年初，导弹防御局开始就在地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合作、联合信息交换、联合应对潜在威胁等问题与俄罗斯方面进行对话。^①2009年2月，刚刚上任的奥巴马写信给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提出美国将重新考虑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以换取俄罗斯停止对伊朗远程导弹工程的支持。^②2009年3月6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布鲁塞尔表示，美俄两国可以在导弹防御问题上展开合作。在希拉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共同按下“重启”按钮之后，美俄关系的氛围已经与之前完全不同了。

2009年4月5日，奥巴马在布拉格发表了著名的“无核世界”（a world without unclear weapon）演讲。在这场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出色演说中，奥巴马明确提出：“只要伊朗的威胁仍然持续，我们就将继续建设符合成本收益原则、并且可靠的导弹防御系统……如果伊朗的威胁消失，我们将拥有一个更加坚实的安全基础，在欧洲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驱动力也就消失了”。^③虽然导弹防御系统并不是这篇演讲的中心内容，但这种表态对于俄罗斯来说几乎已经是一个明确的暗示了。奥巴马提出的条件是，欧洲导弹防御

① Missile Defense Agency,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Program Briefing*, Jan 28, 2009, Approved for Public Release 09-MDA-4234 (Jan 23, 2009) 转引自 Pavel Zolotarev, “Missile Defense: A Sphere of Competition or an Instrument for Jointly Combat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July 21, 2009, Carnegie Council for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http://www.carnegiecouncil.org/publications/articles_papers_reports/0026.html

② Laura Rosen, “US missile-defense policy under review”, *Foreign Policy*, Mar.3, 2009, http://thecable.foreignpolicy.com/posts/2009/03/03/us_missile_defense_policy_under_review_0

③ 演讲原文为“As long as the threat from Iran persists, we will go forward with a missile defense system that is cost-effective and proven. If the Iranian threat is eliminated, we will have a stronger basis for security, and the driving force for missile defense construction in Europe will be removed.”布拉格演讲全文内容参见<http://www.whitehouse.gov/thewhitehouseoffice/Remarks-By-President-Barack-Obama-In-Prague-As-Delivered>

系统只针对伊朗的导弹威胁，如果俄罗斯能够与美国合作，缓和伊朗核问题，那么欧洲导弹防御系统是否部署也可以重新考虑。事实上，这种表态已经将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地位从布什时期导弹防御系统不可或缺的“第三地”，降为可以通过谈判和协调而重新考虑的政治议题。这种表态再次为美俄在欧洲导弹防御问题上开展合作提供了空间。同时也给了美国的欧洲盟友一个明确的信号，即美国新政府将以新的形象出现，在欧洲导弹防御问题上也将重新思考更加有效的行动方式。

在经过数月的评估和充分准备之后，2009年9月17日，奥巴马政府的欧洲导弹防御计划终于正式出炉。在这份名为“分阶段适应性方案”（Phased Adaptive Approach, PAA）的新计划里，奥巴马将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分为可以调整的四个阶段，计划部署时间将延续到2018年。在新计划中，美国政府强调通过“部署已经过验证的能力与技术应对当前威胁”。^①这一计划实际上放弃了布什时期在波兰和捷克部署拦截装置和雷达的方案，照顾到了俄罗斯对此问题的核心关切。更重要的是，新计划使得欧洲导弹防御部署重新回到了北约框架内，美国将通过北约的指挥和控制网络，与欧洲国家共同管控整个防御系统。同时，新计划充分利用了海基导弹防御武器，并且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可以根据形势更加灵活地部署陆基防御系统。当然，波兰与捷克仍然是计划的一部分，但他们将被纳入一个更广泛也更分散的北约拦截体系之内。

计划公布以后，俄罗斯立即表示了欢迎，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更进一步建议：“我们应该探讨将美国、北约和俄罗斯的导弹防御系统在适当时机贯通的可能性”。^②随后，作为回应，俄罗斯放弃了在加里宁格勒部署导弹的计划。^③

以“分阶段适应性方案”的出台为标志，美国迅速完成了自己在欧洲导弹防御议题上的政策调整。我们惊奇地发现，尽管面临着更加复杂和困难的

① “Fact Sheet on U.S. Missile Defense Policy: A ‘Phased, Adaptive Approach’ for Missile Defense in Europe”,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Sep.17, 2009. 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FACT-SHEET-US-Missile-Defense-Policy-A-Phased-Adaptive-Approach-for-Missile-Defense-in-Europe

② 相关信息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9/20/content_12081706.htm

③ 相关信息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9/19/content_12080908.htm

局面，但布什时期美国与欧洲、俄罗斯在导弹防御问题上的“死结”确实被解开了。奥巴马通过调整计划，将导弹防御系统重新纳入北约主导的轨道，重新肯定了北约作为欧洲安全体系的核心地位，美国也重返多边外交舞台。这种安排使得原本担心被边缘化的西欧各国打消了顾虑，重新调整了对美关系，老欧洲与新欧洲的矛盾很快便成为明日黄花，北约内的欧洲国家重新站在了美国一边，积极推动新的导弹防御部署。

同时，奥巴马政府在导弹防御问题上的调整也使得俄美关系获得了巨大的改善，双方开始围绕着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安全合作展开充分对话。欧洲导弹防御议题的谈判内容已经从布什时期的“如何向俄罗斯和西欧国家施压”转变为奥巴马时期的“如何开展北约内部以及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在不放弃核心主张的前提下，美国的战略调整使得作为政治议题的欧洲导弹防御问题的性质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一场可能引发严重冲突的单边施压行动已经被转化为欧洲安全体系重建的契机，这无疑是奥巴马政府在外交领域的巨大成果。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俄两国由于力量对比和对外战略的差异而存在的矛盾和不信任，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因此，在美国放弃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兴奋感慢慢消退之后，俄罗斯逐渐意识到，围绕着合作的讨论也并不见得会让谈判变得轻松。2009 年底，摆在俄罗斯面前的既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非常严峻的挑战。

尽管在形式上放弃了优先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但奥巴马的新方案并没有完全抛弃布什方案中的内容。新计划中仍然重视对于陆基导弹拦截装置和雷达站的部署，只不过将时间安排在以 2015 年为时间节点的第二阶段。在奥巴马的“分阶段适应性方案”中，并没有明确说明陆基导弹防御装置的部署地点，这给俄罗斯带来了更大的潜在威胁。除了波兰和捷克以外，美国政府有可能在更多的东欧国家部署新的导弹防御系统，从而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战略优势。事实上，从 2009 年底至 2010 年 3 月，除了同波兰和捷克的已有协议之外，波兰同美国又签署了新的导弹部署协议，罗马尼亚也同意美国在其境内部署导弹防御装置。奥巴马从布什时期强硬立场

上的退却，反而为导弹防御系统换来了更大的前进空间。^①然而，对于俄罗斯来说，它所面对的局面却比 2008 年时更加复杂。在 NATO 框架内，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将得到整个欧洲盟国的支持。而缺少了美欧之间的矛盾，俄罗斯凭借自身力量几乎不可能制止美国部署的实现。而且，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了未来欧洲安全体系的建构。如果不想被排除在未来的欧洲安全体系之外，参与美国在欧洲的导弹防御系统几乎已经成了一个必然的选择。而且随着美俄“重启”进程的深入，俄罗斯在加入世贸组织和北约停止东扩等问题上也获得了很大的利益。继续促进美俄关系的发展，对于俄罗斯来说无疑也是很好的选择。当然，俄罗斯对于美国的行动始终保持着足够的冷静，毕竟无论是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还是欧洲安全体系的重构，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在此过程中，俄罗斯仍然希望能够通过多种方式，保持自己在未来欧洲导弹防御系统乃至整个欧洲安全体系中相对特殊的地位。因此，他们将怀着审慎与警惕的态度，在导弹防御合作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这种态度首先体现在削减战略武器谈判的过程中。从 2009 年 5 月 19 日开始，美俄双方重新启动削减战略武器谈判。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2010 年 4 月 8 日，在布拉格正式签署了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但出于对未来导弹防御系统可能对俄罗斯导弹力量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俄罗斯的支持下，条约的序言中特别强调，“双方都承认战略进攻性武器与战略防御性武器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随着战略核武器的削减，这种相互关系将变得越来越重要。战略防御武器不应该损害到双方战略进攻性武器的生存能力和有效性。”^②这一条款的存在，将《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执行与欧洲导弹防御系

^① “Romania to Host US Missile Interceptors”, *Washington Post*, Feb.4, 2010, http://www.alloexpat.com/romania_expat_forum/romania-to-host-us-missile-interceptors-washington-post-t3503.html; “Romania ‘to host US missile shield’”, *BBC NEWS*, Feb.4, 2010,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8498504.stm>; Tom Collina, “US Taps Romania for Missile Defense”, *Arms Control Today*, March 2010, pp.44-46.

^② 条约原文为“Recogniz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strategic offensive arms and strategic defensive arms, that this interrelationship will become more important as strategic nuclear arms are reduced, and that current strategic defensive arms do not undermine the vi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strategic offensive arms of the parties.” 条约全部内容见 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40035.pdf

统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虽然不免给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未来的前景埋下了隐患，但确实给自己在未来的欧洲导弹防御谈判中增加了筹码。

在各种政治条件都已就位的情况下，欧洲导弹防御议题的博弈迎来了第二次高潮。2010年11月19日，北约峰会在里斯本召开，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也成了欧洲导弹防御议题的重要里程碑。在此次会议上，根据最新批准的战略新概念，北约成员国同意将现有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BMD）进一步扩大，并且与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整合在一起，从而形成完整的领土导弹防御系统（Territorial Missile Defense），将防御范围覆盖所有北约成员国，同时也邀请俄罗斯参与导弹防御系统。

会议最后一天，梅德韦杰夫抵达里斯本。和2007年的普京一样，他也不希望让对手掌握议题的主动权，因此同样带来了俄罗斯的欧洲导弹防御新计划，即所谓的“区段性”（sectoral）导弹防御系统。尽管这份计划的信息并没有被完全披露，但研究者已经可以从现有的信息看到它的基本内容。其核心是由北约和俄罗斯共同建立一套导弹防御系统，而在体系内部，俄罗斯和北约将拥有自己负责的区域。“如果导弹在俄罗斯上空飞向美国或欧洲，那么俄罗斯反导系统将把它击毁；如果导弹经过西方国家责任区飞向俄罗斯，西方也同样将它击毁。”^①在这种提议背后，实际上表达了潜在的双重意义：其一，俄罗斯并不认为伊朗是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唯一目标。其二，俄罗斯不仅希望获得分享信息的权利，更要求分享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指挥权。

俄罗斯的计划显然大大超越了美国和北约期望的底线。美国和北约对于合作的认知，是由北约和俄罗斯各自形成一套完整的导弹防御系统，这两套体系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进行合作，并且进行“信息交换”（Information exchange）。^②然而在美国的计划中，绝对没有接受与俄罗斯分享导弹防御系统控制权的内容。俄罗斯当然清楚这一点，他们也不可能真的认为美国和北

① 关于提议的部分内容参见 <http://chinese.ruvr.ru/2010/12/16/37009530.html>；相关分析还可参见 Dmitry Trenin, “A European Missile Defense System to Replace the Great Game: How Russia and the U.S. Could Start Demilitarizing Their Relations”,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April/June, 2011, pp.81-83.

② 相关情况可参见瓦尔代辩论俱乐部提供的信息 Mesut Hakki Casin, “New horizons in Transatlantic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July.25, 2011, <http://valdaiclub.com/usa/28841.html>

约会轻易接受梅德韦杰夫的提议。提出这项建议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希望在即将开始的谈判中率先提出方案，从而掌握谈判的主动权。

美俄两国围绕着导弹防御系统的谈判和磋商从 2010 年 11 月 23 日就已经开始。正如所有人所预料的那样，这场谈判旷日持久，而且由于缺乏足够的政治互信，谈判进展得非常不顺利。由于谈判的内容大多没有公开，我们只能根据一鳞半爪勾勒这场谈判的进程：在谈判之初，俄罗斯始终希望以平等的身份参与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建设，但由于双方在实力和导弹防御技术上存在明显差距，美国拒绝给予俄罗斯这样的地位。而针对俄罗斯提出的“区段性”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议，美国也以《北约宪章》第五条为由，表示北约框架内的安全责任不能授权于非北约国家，对此提议加以拒绝。^①更为关键的是，在谈判过程中，美国已经开始了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2011 年 3 月，美国军舰开赴地中海，执行“分阶段适应性方案”的第一阶段任务。5 月，罗马尼亚宣布将本国南部的空军基地用于执行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这些行动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谈判举步维艰。尽管谈判过程中也不乏两国领导人直接会面的机会，2011 年 5 月的多维尔 G8 峰会和 7 月初的俄罗斯—北约领导人索契峰会都曾被寄予很大希望，但最后均未能取得突破。^②

从 2011 年 7 月开始，双方已经不再就区段性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加以讨论，俄罗斯转而要求美国对于欧洲导弹防御系统不针对俄罗斯提供法律和技术上的保证。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要求，因为它所要求的既不是声明也不是某种承诺，而是要求提供有约束力的法律保证。但目前导弹防御这一领域尚未出现过任何类似文件，美国方面自然也予以拒绝。双方的谈判再次陷入僵局。2011 年 11 月，美俄领导人在亚太经合组织檀香山会议上最后挽救谈判的努力仍然没有获得任何成果，双方的谈判也无果而终。2011 年 11 月 23

① Dmitry Trenin, “A European Missile Defense System to Replace the Great Game: How Russia and the U.S. Could Start Demilitarizing Their Relations”, p.76; Mesut Hakki Casin, “The Russian Perspective on missile defense: cooperation or a new arms race, in ‘New horizons in Transatlantic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http://valdaiclub.com/usa/28841.html>

② Jacop W. Kipp, “NATO-Russian Discussions Fail on Missile Defense: Implications for Negotiations on Non-Strategic Nuclear Weapons”,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8, Issue.119, June 21, 2011, http://www.jamestown.org/single/?no_cache=1&tx_ttnews%5Btt_news%5D=38076

日，在美俄开展对话整整一年之后，梅德韦杰夫以发表电视讲话的方式声明终止了美俄导弹防御谈判，^①曾经备受期待的对话也在这种对抗的氛围下偃旗息鼓，他在电视讲话中展现出的强硬态度似乎使两国关系的前景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从 2009 年到 2011 年期间，奥巴马政府成功地将欧洲导弹防御问题纳入了新的发展轨道。他放弃了布什时期通过双边谈判的方式强行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缓和了俄罗斯和东欧地区的紧张形势，随后将导弹防御系统重新纳入北约框架，重新获得了欧洲各国的支持。同时，在导弹防御领域向俄展示了合作的姿态，为美俄关系“重启”提供了条件。

美国退让了一步，放弃了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这一步的退让换取了俄罗斯在签署《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开展新的导弹防御合作方面的积极配合，实际上使整个欧洲导弹防御议题前进了两步。这两个方面的进步几乎奠定了欧洲导弹防御议题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

以里斯本峰会为标志，俄罗斯事实上承认了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合法性，也展现了希望在导弹防御系统中扮演某种角色的意愿。美俄之间谈判的启动，意味着两国有可能以合作的方式构建覆盖整个欧洲的导弹防御系统。一旦这一设想变为现实，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就将成为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国家共同参与的战略合作体系。在该体系中的三方将通过谈判的方式重新建构新的关系模式，从而取代目前的“双向失衡”结构，确立未来欧洲安全体系的基础。

然而，合作的意向与最终的结果之间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双向失衡”结构的存在决定着美俄之间注定缺乏足够的政治互信。尽管合作的方向体现了双方共同的意愿，但由于谈判涉及到美俄两国在导弹防御系统乃至未来欧洲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双方都不可能轻易作出让步。随着 2012 年俄美总统大选的大幕拉开，两国领导人的主要精力都转向国内，俄美外交的活跃期也暂时终结。由于国内选战的压力，美俄两国领导人在选举结束之前几乎都不

① 梅德韦杰夫关于反导系统的特别声明，参见“俄罗斯之声”的相关报道<http://chinese.ruvr.ru/2011/11/23/60904545.html>其他详细报道参见<http://chinese.ruvr.ru/2011/11/24/60968249.html>

可能在任何敏感问题上示弱，各种为了竞选所作出的强硬表态几乎充斥了2012年1月至8月的外交舞台。2012年5月，由于种种原因，重返总统宝座的普京没有出席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俄罗斯—北约峰会，而奥巴马也同样决定杯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两国关系从“重启”的良好氛围中迅速跌落。^①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在2012年5月20日北约正式宣布启动第一阶段导弹防御系统时，仍然邀请俄罗斯参与导弹防御合作，但我们几乎仍不能期待欧洲导弹防御谈判在2012年会出现任何新的进展。然而，从很多方面来看，欧洲导弹防御问题的基本发展方向并没有改变。对于谈判的最终结果，我们同样并没有理由过分悲观。

结论：等待更好的时机

以2011年11月23日梅德韦杰夫的电视讲话为标志，欧洲导弹防御谈判再次进入了一个13-15个月的沉默期。^②双方的在导弹防御问题上的表态仍然较为强硬，但大多都是在为总统竞选和未来谈判争取主动。事实上，美俄双方都在等待，等待更好的时机。

美俄在欧洲导弹防御领域的谈判，实际上是在“双向失衡”结构的背景下展开的一场决定未来欧洲安全体系建构的博弈。这种深刻的时代和现实背景决定了谈判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但这种复杂的背景同时也限制了双方的选择空间。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双方立场的差异都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首先，从欧洲安全体系的角度看，美俄合作的欧洲导弹防御系统是目前唯一有可能顺利消解“双向失衡”结构、推动新的欧洲安全体系建构的国际机制。建立新的安全结构的政治议题，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其一，具有战略意义，能够对欧洲安全产生直接的影响；其二，能够提供取代“确保相互摧毁”的新原则，从而提供新的欧洲安全体系的基础；其三，必须能够获

^① Dmitry Suslov, “Cancellation of the Chicago summit suits Russian, U.S. interests”, April.19, 2012, <http://valdaiclub.com/usa/41380.html>

^② Andrey Kortunov, “Does missile defense derail the ‘reset’?”, *Russia Today*, July 29, 2011; Fyodor Lukyanov, “Missile defense-is the end nigh for the reset?”, Nov.25, 2011, <http://rt.com/politics/columns/unpredictable-world-foreign-lukyanov/defense-reset-us-russia/>

得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国家的普遍认可。

在此之前，俄罗斯曾经尝试推动欧安组织的发展，试图建立以它为核心的欧洲安全体系，但由于欧安组织自身性质和关注议题的局限，无法对于欧洲安全问题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俄罗斯近年来尝试的“欧洲安全条约”，也无法获得美国和欧洲国家积极的反应。当然，美国推动的“北约东扩”模式则更加糟糕，不仅不能获得支持，反而引发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弹，严重威胁了欧洲安全局势的稳定。最终就使得维系于“确保相互摧毁”原则上的“双向失衡”结构至今仍是欧洲安全体系的基础。

然而，2010年里斯本峰会之后，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已经使其初步具备了构建新体系的所有条件。导弹防御系统直接影响到欧洲的安全防御能力，其目的是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导弹威胁，对于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各国的安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构建导弹防御系统是欧洲安全战略的重要选择。从里斯本峰会开始，美俄两国实际上已经就合作构建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大方向达成了共识，欧洲导弹防御系统有可能成为覆盖整个美国和欧洲的大型安全防御网络。这一层面的战略合作将为参与者提供构建新的安全共同体的空间，从而取代“双向失衡”格局中的美俄核平衡原则，成为欧洲安全新的基础。因此，一旦美俄双方在欧洲导弹防御问题上的具体合作能够达成，涵盖美、俄、欧诸国的安全体系的建构就将出现全新的局面。

其次，从俄罗斯的角度看，与美国达成合作协议，顺利参与欧洲导弹防御系统，是俄罗斯最佳的战略选择，但事关本国未来的战略地位，俄罗斯也不会有一些关键问题上轻易让步。

根据对俄罗斯实力和利益的分析，当前的局势提供给它腾挪的空间实际上并不太大。目前的俄罗斯，无论是国家综合实力还是导弹防御技术，都与美国相去甚远。尽管俄罗斯不断强调自己在导弹防御领域的进展，但所有的观察者都明白，俄罗斯的导弹防御技术仅仅处于起步阶段，并没有能力建立另一套导弹防御系统与美国分庭抗礼，更无力与美国展开新一轮军备竞赛。

正因为没有力量另起炉灶，所以加入美国和北约主导的欧洲导弹防御系统，是俄罗斯参与欧洲导弹防御网络的唯一渠道。如果谈判无法取得成果，俄罗斯就将被排除在欧洲导弹防御系统之外，而防御系统的每一步发展都将

对俄罗斯未来的战略地位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俄罗斯就将在新的欧洲安全体系中处于极其尴尬的地位。对于俄罗斯来说，对抗和制衡美国和北约的选项过于沉重，在奥巴马时期美国政策调整的背景下，美欧之间在导弹防御领域曾经存在的裂痕基本上被弥合，俄罗斯很难找到外交政策的发力点。可以说，这场围绕着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谈判一旦失败，俄罗斯将面对比布什时期更加严峻的战略压力。当然，正是因为美俄导弹防御谈判涉及到未来俄罗斯在欧洲安全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俄罗斯才更加不会轻易作出让步。从谈判伊始，俄罗斯就不断提出建设性提议，试图掌握谈判的主动权。尽管以俄罗斯目前的实力，追求在导弹防御系统中与美国对等的地位并不现实，但由于其在导弹防御领域也有丰富的技术积累，它仍然可以成为美国在欧洲导弹防御领域重要的“合作者”，从而为自己在新的安全体系的建构中赢得一个不同于一般欧洲国家的特殊角色。所以，从俄罗斯的利益来看，与美国达成合作协议无疑是其最佳战略选择，但谈判过程必定会复杂而持久。

最后，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对抗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将远远大于对俄施压所能带来的利益。

由于在国家实力和导弹防御技术领域都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美国始终掌握着欧洲导弹防御议题上的主动权，主导着博弈的过程。凭借着自身优势，美国可以在谈判中对俄不断施压。但对于美国而言，这些优势只有在美俄双方达成共识、并最终完成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的情况下才能够真正转化为现实的利益。只要美俄在导弹防御问题上达成共识，俄罗斯就能够被纳入新的欧洲安全体系之内，欧洲导弹防御系统也才能够真正成为欧洲安全的屏障。

无论基于何种理由，只要将俄罗斯排除在外，那么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就将在欧洲安全体系重构中扮演“破坏者”的角色。它将人为地把欧洲再次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而且“迫使”俄罗斯庞大的核力量成为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敌人。此外，一旦双方的谈判破局，美国在导弹防御领域的推进还将破坏美俄双方在《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中业已达成的成果。也就是说，美国正处于一个逆水行舟的十字路口，如果能够在导弹防御谈判中取得突破，有可能在欧洲安全领域取得巨大的进展，但如果谈判最终失败，美俄将在导弹防御议题上重启对抗格。这样的前景不仅不会给欧洲带来安全，反而会使整

个欧洲安全环境趋于恶化。这种形势也将使美国在对俄施压时有所顾忌。

归根到底，对于博弈双方来说，任何形式的合作都要比谈判失败更为有利。迄今为止，双方希望开展合作的意愿并没有改变，双方所争执的是合作的方式，以及俄罗斯在未来导弹防御系统和安全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从双方的力量对比看，俄罗斯无法在导弹防御领域获得与美国平等的地位，但完全可以成为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合作者。只有加强双方战略层面的合作，才能真正提高双方的相互信任。俄罗斯虽然不会放弃自身独立的战略地位，成为类似于英国、日本那样的美国盟国，但完全有可能在实现战略合作和不针对第三国的条件下成为美国的重要合作伙伴，这可能是美俄关系最为乐观的前景。^①

作为一场复杂的政治博弈，双方都不会在很短时间内亮出自己所有的底牌，尽管双方都愿意合作，但仍然通过不断的示强以增加自己在谈判时的筹码，从而使自己在未来的导弹防御系统中获得更好的地位。从 2011 年底开始的暂停是一种聪明的做法，它可以将 2012 年双方领导人在选举时所作出的强硬表态对谈判的影响降到最低，对于问题的最终解决有利无害。^②目前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都已经被明确摆上了桌面，欧洲导弹防御议题也已经逐渐成为影响美俄关系“重启”的核心问题。无论美国大选的结果如何，新领导人都无法回避这一议题。

可以预见，从 2013 年开始，美俄双方就将重新就该议题再次展开对话。经过十年的碰撞与磨合，双方的立场和理念方面远较 2007 年时更为接近，加上欧洲安全体系和利益关系的多重限制，谈判很难偏离合作构建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大方向。尽管谈判的过程仍将困难重重，但双方最后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绝不应该被低估。毕竟对于美国和俄罗斯来说，这场博弈是他们超越“双向失衡”结构、建构欧洲安全体系、并且重塑美俄关系的绝佳机会，他们都不会轻易放弃。

① 关于这一观点，莫斯科卡耐基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曾有过非常出色的阐述，参见 Dmitry Trenin, “A European Missile Defense System to Replace the Great Game: How Russia and the U.S. Could Start Demilitarizing Their Relations”, pp.81-85.

② Dmitry Suslov, “Cancellation of the Chicago summit suits Russian, U.S. interests”, April.19, 2012, [http:// valdaiclub.com/usa/41380.html](http://valdaiclub.com/usa/41380.html)

【Abstract】 European security system in post-Cold War period has evolved into a delicate structure of “bidirectional imbalance”. In this context, the issue of European Missile Defense, which began in 2002, has become a political contes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which was link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uture European security system. After the policy adjustments of Bush and Obama Administration ,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established general direction of the cooperation marked by the 2010 NATO Lisbon summit. It can be predicted that after the end of the 2012 presidential elections, new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will continue to negotiate the issue and the there is a great possibility to reach agreement in their negotiations.

【Key words】“Bidirectional imbalance”, European Missile Defence, game, cooperat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Пос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в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систем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формировалась тон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двунаправленного дисбаланса», в таких условиях сформировавшийся в 2002 г. вопрос ПРО в Европе превратился в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борьбу между США и Россией, связанную с построением будущей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осле корректировок политик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 Буша и Обамы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и Россия установили общи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отмеченные Лиссабонским саммитом НАТО в 2010 г. Можно предсказать, что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х выборов 2012 г. новые лидеры двух стран продолжат вес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по дан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и вероятность успеха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елик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Двунаправленный дисбаланс»,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ПРО,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责任编辑 阎德学)

陌生的邻居

——后苏联时期俄国民族主义潮流下的中俄关系*

林精华**

【内容提要】自彼得大帝改革以降，历代沙皇就强行且快速引进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以期强盛俄国。此举刺激了俄罗斯帝国上流社会励精图治，却给社会下层和知识界以巨大压力，孕育出深沉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诉求。然而，庞大的俄罗斯帝国是17世纪以后大规模扩张而迅速形成的，这导致其疆域内族裔构成多元和宗教成分复杂。为了有效治理这样的国家，俄罗斯民族主义又被帝国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俄国民族主义”。而俄罗斯帝国在融合一部分现代欧洲文明因素之后变得更为强盛，在疆界上和中国发生越来越多的争端，在文化归属、价值观念、精神追求等方面也和中国之间产生复杂的碰撞，俄罗斯民族主义随即成为帝俄时代和苏联时期理解中国问题、处理中俄关系的重要根据之一。在后苏联俄国重建历程中，这种民族主义是其重要推动力之一，同样延及到俄中关系领域：俄罗斯民族主义之于当代俄国对中国的认知、态度、情感、评价等，远不是临时的情绪表达，而是有着历史根据和理论基础的自觉行为，包括大众媒介关于中国形象塑造、知识界关于汉学研究、政界关于俄中双边关系的理解和处理等。这些行为既不能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所限定，又在文化结构和精神深处导致俄国人折损中国所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早期俄国思想史”（项目批准号：11JJDGJW007）的阶段成果。

** 林精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文学院比较文学系主任和博士生导师、外语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

期待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效力。

【关键词】民族主义 俄罗斯帝国认同 汉学研究 双边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9.12(51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4-0094-(62)

不能否认，近 20 年来，在与世界大国的双边关系中，中俄关系相对是比较稳定的，没有较大冲突，甚至最早开始了一系列“互办”活动，包括互办国家年（2006 年中国举办“俄国年”、2007 年俄国举办“中国年”）、互办语言年（2009 年中国举办“俄语年”、2010 年俄国举办“汉语年”还穿插“中国文化节”）、互办旅游年（2012 年俄国举办“中国旅游年”、2013 年中国举办“俄国旅游年”）等，出现了俄国科学院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Михаил Титаренко, 1934-）院士和科学院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库济克（Борис Кузык）院士的《中国—俄国 2050 年：共同发展战略》（2006）所说的情形：苏联解体以来，俄中双方在行政管理、经济、科学、教育、军事等九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好的交流成果。^①正因为如此，在俄联邦重建过程中，俄知识界和政界有更多的人越来越正面地看中国。

进入 21 世纪，由原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Большевик, 1924-1952）—《共产党人》（Коммунист, 1952-1991）脱胎而来的《自由思想》（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杂志^②常刊载有关中国问题的文字。其中，2000 年第一期开篇，时任主编比科宁（Наиль Биккенин, 1931-2007）就在“致读者”中称，中国共产党人受益于列宁的教导（“可怕的不是贸易，而是贫困和饥饿”），在保留社会主义社会成果的同时，利用市场机制为社会服务，创造出大批有别于“新俄罗斯人”（即为数甚少的新贵）的“新中国人”（即数目庞大的富裕起来的中国人）。

1802 年创刊且持续了百年的《欧洲通报》（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一向以欧洲视角观察俄国和欧洲的事情。2001 年复刊后第二期就刊发了曾任戈尔

① 参见 Борис Кузык и Михаил Титаренко. Китай-Россия 2050: стратегия соразвития. М: 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тратегий, 2006.

② 《自由思想》类似于《中国社会科学》，是俄国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刊，进入 21 世纪后更名为《自由思想-21 世纪》，由俄国后工业社会研究中心主办。

巴乔夫时期《共产党人》杂志第一副主编、时任《新消息报》(Новые известия)常务副主编的经济学家拉齐斯(Отто Лацис)的文章《为何俄国不是中国》(2001年第2期),明确指出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奇迹(китайское чудо)是在中共领导下取得的,而戈尔巴乔夫和苏共的改革与市场经济毫不相干,俄共书记久加诺夫显然不是邓小平,中国奇迹对俄罗斯是可取的,由此赞叹道,“中国是一个值得钦佩的国家,其人民是智慧的,这样国家和人民一定值得交朋友”,虽然承认每个国家情况不同^①。

主要讨论俄国本土历史和欧洲文化问题的著名杂志《祖国笔记》(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21世纪伊始就关注中国问题。其中,2005年第3期刊登俄国人文大学东方文化中心主任伊利亚·斯米尔诺夫(Илья Смирнов,1948-)教授之作《关于“中国仪式”、中国的先人和长者崇拜》,认真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存在、特殊作用、世界性意义,这种论述显然有别于俄国重要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Владимир Соловьев,1853-1900)的力作《中国与欧洲》(1887)——把儒家文明视为对欧洲基督教文明的威胁。^②

一向只关注本土和欧洲文学理论的苏俄最重要文学理论和批评杂志《文学问题》(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21世纪伊始就关注中国文学的存在和发展问题,如伊戈尔·斯米尔诺夫(Игорь Смирнов)之作《翻译中的中国诗,或学者与诗人的小争执》(2009年第2期),还原1932年苏联时代重要文学研究家博布罗夫(Сергей Бобров,1889-1971),和著名汉学家、中国唐末诗论家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俄文翻译者阿列克谢耶夫(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еев,1881-1951)院士,在书信中讨论中国诗歌、诗论翻译等话题,重现汉诗及其美学价值。^③

第三次总统大选临近之时,普京在俄罗斯特别流行的《莫斯科新闻》报发文“俄国与变化中的世界”,更是把俄中关系置于重要位置来讨论,声称

① Отто Лацис. Почему Россия не Китай// 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 2001. №2.

② Илья Смирнов. О «китайских церемониях», культе предков и старости в Китае//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2005. №.3(24). С.287-300.

③ Игорь Смирнов. Китайская поэзия в переводе, или Размолвка ученого с поэтом//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2009. №.2.

“一个繁荣昌盛而稳定的中国需要俄国，同样可以确信，一个强有力而成功的俄国需要中国——这就是我的重要想法”。^①

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远东问题》杂志也发生转化，常刊载正面看待中国的文章，如莫克列茨基(А. Мокрецкий)《中国和平发展范式》(2012)称，中国和平发展范式包括科学探索、独立自主发展、透明公开、与世界和平共存、与世界各国合作并共同发展等。^②

……自 1990 年代中期以降，俄罗斯各大城市稍有规模的书店，总有关于中国文化的专架，包括风水、气功、功夫、医药、建筑、饮食、旅游等。艾克斯莫(ЭКСМО)和埃克特(АСТ)等著名出版社再版了俄国文化史上涉及中国问题的一些名著，如列宁格勒大学著名史学和民族志学教授古米廖夫(Лев Гумилев, 1912–1992)博士的《三个中国王朝》(苏联国家地理学会报告 1968 年)等。^③相应的，“中国”也日益成为超出汉学领域的审美元素，进入后苏联一些文学艺术家的视野，他们的创作中被作为不可或缺的资源得到积极应用，并且这样的叙述还能得到公众认可。其中，后现代主义作家阿库宁(Борис Акунин, 1956–。原名 Григорий Чхартишвили，苏联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人)的试验剧《阴阳》(2005)，演绎道家人生观，在俄罗斯科学院青年剧院上演就轰动一时，作者在此基础上改编成小说，畅销至今。^④同样，另一位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维克多·佩列温(Виктор Пелевин, 1962–)，其《恰巴耶夫和虚空》(1996)、《百事一代》(1999)、《数目字》(2003)、《反过来的圣书》(2004)、《帝国五》(2006)等著名小说，无一不常涉及中国元素。而奥尔洛夫(А. Орлов)的《哈尔滨的快车》(2008)之所以成为近年来的畅销书，就因其讲述了 1918 年发生在满洲里(哈尔滨)的奇闻逸事，——俄国青年医生多赫图洛夫知道一种包治百病的药，便和骑兵大尉、警察局密探、

① Путин В. Россия и меняющийся мир//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27 февраля. 2012.

② Мокрецкий А. Парадигма ми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я//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12. №.2.

③ Лев Гумилев. Три китайских царства. М.: Алгоритм, 2008, 2012. 该书论述公元前 200 年至公元 150 年间，秦汉和匈奴、西域之关系。

④ Борис Акунин. Инь и Ян. М.: Захаров, 2006. 该剧讲述莫斯科郊区大富翁西吉斯蒙德·鲍列茨基的遗产继承人——其侄女阴加(Инга)和外甥阳(Ян)在财富、爱情、人生观等方面所存在“阴”与“阳”之别。

退役将军等一道冒险探寻，路遇地方教派、日本警察、反间谍机构等的联合抵抗，他们越是接近秘密就越发陷入危险境地，情节的中国背景，使小说叙述过程妙趣横生。著名观念主义诗人和雕塑家普里戈夫(Д. Пригов, 1940-2007)曾在苏联地下出版物上发表过许多讽刺僵化的苏联帝国意识形态的诗篇，在后苏联时期获得了普希金奖，但其绝笔之作《中国的卡嘉(另类叙述)》(2007)却是关于中国题材的，叙述一个俄罗斯侨民家庭及其女儿卡嘉在中国的奇特经历，也成为俄罗斯近年来的畅销书之一。当代俄罗斯文学容纳中国元素的案例，不一而足。^①

然而，如此动人的学术景观、审美现象、政治期待等，俄罗斯自视为世界优秀民族，却未产生如中美关系那样彼此相互影响对方生活之效应，也没能参照中国或其他国家经验，从中走出一条能让本国居民普遍满意的独特发展之路。相反，当俄联邦和西方关系密切时，将俄罗斯定位为欧洲文明家族成员便成为俄罗斯重建的国家导向，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边际效益自然会进一步降低；当俄国继续维持苏联遗留下来的国际战略利益时，必然地和西方关系紧张，俄中关系则成为平衡这种矛盾的力量，中国也就成了俄国用来反对西方的借重。事实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至今的历程，并未促使俄罗斯去积极塑造中国形象。相反，根据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发布的《俄罗斯人在社会变革时期的大众意识》(1996)、俄联邦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发表的《2001年10-11月抽样调查》(2002)所提供的数据，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认同度甚低，对中国的否定则远高于其他国家。这种情形和《星火》(Огонек)周刊常公布的调查数据虽不尽一致，但整体上相当，并且此情至今未有根本性的改观，虽然俄中双边贸易数据显示中国是参与俄联邦重建的最重要国家之一。

这种相互矛盾的情形，与中国对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②之期待相去甚远。全球化时代真正到来的标志，不仅仅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更有东欧

① 关于使用中国题材的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参见刘亚丁：“回归‘哲人之邦’套话——近30年来俄罗斯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利用与想象”，《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5期；“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对中国智者形象的建构”，《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3期。

② 关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论述，可参见刘古昌：“不断迈上新台阶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1期。

剧变和苏联解体。在这种变化中，俄联邦在政治上实行有限的民主制，经济上推行政府介入的资本主义，并于2011年12月16日获得完全加入WTO的资格（2012年8月22日正式成为WTO成员），因而理论上俄罗斯就不应该在制度层面上和西方对抗、在意识形态上视中国为潜在威胁。然而，横跨亚欧大陆、与东西方均有交接的俄联邦，并不因和世界交流不再有制度性障碍就能与国际社会顺畅沟通、合作，即便中俄之间存有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体的实施过程也困难重重。造成如此矛盾情形的原因很复杂，如各主权国家之间的战略利益博弈、西方对俄联邦仍不能充分信任等，但基于强烈的俄罗斯国家认同的俄国民族主义，可能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

论及俄罗斯民族主义，国际学界和俄国社会已有基本共识——苏联解体，在相当程度上是原苏联境内各加盟共和国的主体族裔分别诉诸主权国家的结果，尤其是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加入其中，最终迅速促成了如此结局。^①这种学术观点，和俄国民众的感受非常一致。借助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势，以锐意改革和推行民主而获得声望的叶利钦，于1990年5月当选为俄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次年6月成为共和国首任总统。借此，他极力推动苏联进行激进改革，使原本需要稳健变革才能挽救苏联的危机有增无减。继而，

①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拉皮德斯(Gail Lapidus)，和扎拉夫斯基(Victor Zaslavsky)、戈尔德曼(Philip Goldman)合作的《从苏联到联邦：苏联诸共和国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From Union to Commonwealth: Nationalism and Separatism in the Soviet Republ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贝辛格(Mark Beissinger)《苏联政治和社会中的民族主义因素》(*The Nationalities Factor in Soviet Politics and Society*, Westview Press, 1990)、《民族主义动员和苏联国家解体》(*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等，据1980-1990年代之交的民意数据，认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主体族裔各自推行的民族主义，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力量。在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5-6期刊发了一批讨论苏联解体问题的精彩文章，如E·普里马科夫：“苏联为什么会终结”，《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5期；C·卡拉-穆尔扎：“苏维埃制度崩溃的原因之初步分析”，《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5期；Д·谢泽：“从勃列日涅夫的‘干部锻炼’到戈尔巴乔夫的‘迭次更换’——苏联1985-1989年间罗名制的动荡不稳”，《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5期；潘兴明：“帝国研究视角下的苏联解体研究”，《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6期；李永晶：“苏联解体与文明进程——马克斯·韦伯‘俄国革命论’的视点”，《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6期；M·坎加斯普罗：“苏联改革的两面性：从改革走向崩溃”，《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6期；K·彼得罗夫：“建构、重建与解构：从概念史视角看苏联解体”，《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6期。其中不乏新的视角与看法，但无疑并不否认民族主义在此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境内的居民担心整个苏联的危机会殃及俄罗斯的利益。由此，俄罗斯民族主义复兴和苏联民主化进程自然合流，于是出现俄罗斯利益至上论、宣扬俄罗斯人对俄国发展壮大历史过程有特殊的伟大贡献、热烈讨论俄罗斯文化名人关于俄罗斯问题的论述等等，这些都成了重新衡量苏联的根据。如此一来，民选的加盟共和国总统叶利钦就敢挑衅苏联宪法，大胆签署诸多法令，将其所辖领界内的苏联利益收归其加盟共和国所有，甚至终止苏共中央机关在其共和国行使权力。在如此情势之下，苏联解体无可避免，且解体速度加快：1991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各共和国苏维埃修改通过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随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等会晤决定，该条约将于8月20日由各加盟共和国签署实施，只是因“八一九事件”突然发生，使苏联分解或继续存在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逆转——1991年12月8日，舒什科维奇、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分别代表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明斯克郊外的别洛韦日国宾馆签署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定（别洛韦日协定）。协定声称：“我们，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是苏联的创始国，签署了1922年联盟条约。我们现在指出，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将要停止其存在”，就此决定了苏联和平终结的命运：12月10-12日，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议会）纷纷通过表决，同意各自的共和国加入这个协定；戈尔巴乔夫于12月25日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苏联终止存在。

有意味的是，在俄联邦进程中，民主制度建设艰难，国民的个人主体性诉求实现程度在降低，但俄罗斯民族主义却能超越个人的自主认知，演化成社会重建的重要力量：在苏联末期民主化浪潮中合法化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在后苏联时期因不断掺入俄国历史诉求、俄罗斯帝国意识、俄联邦国家认同等因素，变得更为复杂、敏感、强大，甚至被营造成社会氛围、国家政策和法律必须仰赖的共识和基础。任何参与俄国社会进程的外来因素，都必须经过深深扎根于大多数俄国人情怀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意识的过滤。因而，中国作为俄罗斯最重要的邻居、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重建过程中事实上的参与者，在这期间所期望的中俄关系发展、与俄罗斯的互利合作，却是在强烈的

俄联邦国家认同及其一系列配套政策、俄罗斯缺乏拥抱世界的胸襟以及成为全俄社会氛围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潮流等语境中艰难前行、曲折扩大的。

由此，问题就来了：既然俄联邦重建过程与强大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潮流纠结在一起，而俄罗斯民族主义原是俄国在西化过程中反遭西方压力的结果，那么它为何会指向希望与之合作的中国呢？既然俄国是充满着民族主义之国度，中俄如何会建构起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对有俄国参与的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充满着期待，在实际操作中又将怎样面对俄国民族主义的挑战呢？

源自历史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伴随当代中俄关系进程

在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的重建过程中，能广泛动员的资源，就特别包括了俄罗斯帝国认同及俄罗斯民族主义。而俄罗斯帝国认同是从18世纪初开始的西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其基础就是俄罗斯民族主义意识。但是，从罗斯到俄罗斯再到苏联的过程中，俄罗斯族裔的比重是持续下降的。学习西欧虽然能激起国民对欧洲式民主的期待，但不同于法国或英国或德国的民族主义乃国民的个人自主意识、民主诉求之结果，俄国民族主义主要是渗透着国家观念、去个人主体性、主张俄罗斯化的官方意识形态，因为“沙俄统治不但要以专制政体和东正教信仰为依据，也要有民族为依托，承认积极诉诸俄国的就是俄罗斯人这样的事实”^①，因而得到政府的支持，最终演化成社会潮流。这种不完全是由于西方进步和强大之压力而催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有意无意地指向因为俄国扩张版图而边境接壤的中国，也就变得自然而然了。去世不到20年就开始被普遍视为俄罗斯民族诗人的普希金，1831年得知波兰爆发大规模反抗俄国殖民统治的起义、欧洲各国谴责沙皇政府派兵弹压波兰起义的事件时，不是批评和反思俄国的暴行，而是写下了著名的政治抒情诗《致诽谤俄罗斯的人》：

①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帝国的年代》，贾士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6页。

斯拉夫人的细流岂不汇成俄罗斯的大海，……
难道我们要同欧洲重新争论？
难道俄罗斯人不再善于取胜？难道我们人少？
难道从佩尔姆到达夫利，
从芬兰寒冷的山崖到火热的科尔希达，
从受到震惊的克里姆林宫
到不动的中国长城脚下，
俄罗斯大地再不能崛起？^①

迄今为止，这首支撑俄罗斯读者民族自豪感的诗篇，不留痕迹地把长城之外的中国版图纳入俄国疆域，然而俄国知识界从未有人对这种字里行间所洋溢的民族主义情绪、违背历史地理之事实，提出过任何异议和批评。在后苏联时期，普希金获得更大的尊重（如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的1999年被定为“普希金年”），该作自然更被视为必读经典。此非学界的疏失，而是俄国人普遍的民族主义情怀的反映，因而还出现了比这更严重的现象——著名诗人和思想家丘特切夫（Фёдор Тютчев，1803-1873）之诗篇《俄罗斯地理》（1848），因其书写的內容大幅扩展了俄国地理空间，抒发的情感包容了更为广大的帝国情怀，为当时的俄国人，尤其是后苏联时代俄国人所津津乐道：

“莫斯科、彼得之城和君士坦丁堡—
那是俄罗斯王国的珍贵之都……
但哪里是它的尽头，哪里是它的边界？
在北方，在东方，在南方，在日落的地方？
这些地方的命运将由未来决定……
这里有七大内海，七条大河……
从尼罗河到涅瓦河，从易北河到中国，
从伏尔加河到幼发拉底河，从恒河到多瑙河……
都属于俄罗斯王国……而且将永世长存，
一如神灵和但以理的预言。”^②

这种把中国和世界都纳入俄国版图的诗篇，是成就丘特切夫作为俄国至尊诗人的力作之一。他之所以在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重新获得声望，例如进入《俄罗斯文学》教材和必读诗篇，就因他能用豪迈的诗句，深切表达强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诉求，让当代俄国人找到了自我认同的根据。

在俄联邦重建进程中，不单是这类有着强烈民族主义情怀的诗人之诗篇成为必读经典，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俄罗斯民族主义诉求的诗篇，甚至成为国家的法律、共识：2000年12月底，俄联邦杜马通过决议，将苏联杰出音乐家亚历山德罗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 1883-1946)作曲、苏联著名文学家米哈尔科夫(Сергей Михалков, 1913-2009)作词的《俄国，我们神圣的国家》(Россия—священная наша держава, 1944)作为俄联邦国歌，显示出民族主义之于俄国的伟大意义。它有这样的歌词：

俄国，我们神圣的祖国，
俄国，我们可爱的家园。
坚强的意志，巨大的荣耀
是你亘古不变的财宝！
自豪吧，我们自由的祖国，
各民族兄弟联盟世代相传，
先辈们赋予人民以智慧！
自豪吧，祖国！我们为你而骄傲！
从南方的大海到北极疆域
到处是我们的森林和田野。
你举世无双！
你是上帝护佑的唯一沃土！

而这种和基督教相关联的民族主义情绪、世界大国的帝国意识，却获得了国家审美形式的认可，自然也就使得中国这个非基督教信仰者的邻居，成为和其不一致的“他者”。

① 《普希金文集》，乌兰汗等译，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313-315页。

② Тютчев Ф.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1). Москва.: Правда, 1980. С.104.

潜藏着忽视中国和其他国家之意识的俄国民族主义，远远不只是停留在这类审美、意识、情感的层面。俄联邦从未放弃的以俄罗斯帝国方式重振世界大国雄风之愿望，并且这种愿望是主导后苏联时期俄国内政外交的思想基础。因此，哪怕俄联邦是在解构苏联帝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且实行总统普选和杜马议员民选，但事实上并没有出现西方国家所期待、大多数国民所追求的那种真正开放的、民主的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现代民族国家。普京第三次参选总统所引发的一系列动荡，更证实了现代民主制度在俄国的不足。而这是俄国政治文化结构和历史所决定的：普京在担任代总统前夕所发表的著名篇章《千年之交的俄罗斯》（1999）就声称，“俄罗斯过去是、未来也还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其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不可分割地决定了这一点。在俄罗斯整个历史进程中，这些因素还决定了俄罗斯人的思想和国家政策。现在，这些依旧是前提因素。但是，现在这种思潮应该增添一些新的内容。当代世界，大国实力与其说是表现在军事方面，还不如说是表现为以下这些方面，即能够成为研究和运用先进技术的先锋，能保障人民有较高的生活水平，能可靠地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在国际舞台上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①而且，这并非普京临时见解，在上述提及的“俄国与变化中的世界”一文中他再次声称：“我确信，只有和俄国在一起，而不是推倒俄国、减弱其地缘政治作用、损耗其国防能力，世界才可能是安全的”。^②可以说，要把俄国锻造成世界特殊之国，是普京参选成功的理由之一。

实际上，俄联邦社会正是沿着这一路径前行的，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更是重新看到了自身的优势，即作为世界上的资源富国、核大国、军事强国、政治大国（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GDP 全球八强之一的经济大国（金砖国家之一、G8 组织成员）、世界上少数几个能独立处理世界事务的大国之一等，从而敢于继续和西方对抗。^③然而，由于俄联邦践行帝国诉求，

①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 //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30 Декабря 1999. 下文引不再注。

②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и меняющийся мир //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27 Февраля 2012.

③ 2003 年普京在联邦会议上发表的国情咨文基本上持这样的主张，同时声称，“我们周围是一些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他们处处在排挤俄国，要把俄国排挤出有前途的世界市场”。参见《普京文集（2002-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

原本的自然禀赋、世界大国地位和已有的经济基础、曾经取得的文化成就等优势，并没促使俄国人自信地从后殖民批评角度，深刻反思自己的国家为何经常剧烈动荡、帝国历史背后的文化结构等重大问题，而是激发出国民继续一浪高过一浪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诉求。正是由于看到了苏联解体最初9年所累积的民族主义能量，普京执政伊始便重新构建《对外政策构想》，对叶利钦时代制定和实施的外交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强调要保障俄国成为世界“大国”（великая держава）和“当代世界有影响的力量中心之一”。

而且，普京这种执政目标，的确激活了本来就蕴藏于意识深处的俄罗斯帝国理念、强大的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怀，从而与后冷战时代各民族国家会谨慎利用民族主义的潮流相背离。现代意义上的欧洲各主要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与民族化过程、现代化进程基本上呈同步趋势，但俄国则不尽然：其从原本地域性的莫斯科公国发展到地跨欧亚的帝国的过程，并没有促成民族国家化、国家现代化、社会民主化，而是出现了如出生于俄属拉脱维亚犹太人家庭的英国哲学家和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民族主义”（1972）所描述的情形，“所谓民族主义是指在意识形态上更重要也更危险的东西，即这样一种信念：首先，人们属于某个特殊的人群，这个群体的生活方式不同于其他群体；组成群体的个人特征是由该群体的特征所造成的，离开这个群体便无从理解，因此对其定义要根据共同的疆域、风俗、法律、记忆、信念、语言、艺术和宗教、人种等特征”，“民族主义是受到伤害的社会做出的反应……只有认识到彼得大帝在国内推行的剧烈而迅速的现代化所造成的后果，才能理解俄国的斯拉夫主义和民粹派运动”。^①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俄国既有种族主义、沙文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为特色的进攻型民族主义，也有以乡土、语言、共同记忆、习俗为标准的非进攻性或防御型民族主义。

斯拉夫民族意识在俄罗斯帝国的生成过程中，在成功抵抗鞑靼蒙古统治的过程以及其后的历史发展中，促成了原本的村社制度、集体观念和乡土认同等，这些与经由拜占庭而来的东正教信仰、因拜占庭帝国衰落而兴起的“莫

^① [英]以赛亚·伯林著：《反潮流：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407、416页。

斯科—第三罗马”信念相融合，形成了要拯救世界的俄罗斯弥赛亚意识。而彼得大帝的改革，并不是基于俄国的生产力水平所需或自身的文化欲求，而是由于外来的诱惑和要成为强大帝国的愿望，强制性地以行政动员的方式推进国家现代化，从而成为世界现代化史上典型的外源性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out)。对于这种外源性的现代化，虽然也伴有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的争论，但在1812年成功地反击拿破仑强行推行西欧价值观之后，俄国人就开始自认为俄罗斯帝国是强盛的大国、现代文明的强国。而这样的定位，当然激发起俄罗斯民族主义浪潮，引发俄国知识界怀疑西方的价值观，试图以俄国弥赛亚对抗西方文明。尤其是在斯拉夫派知识分子视野中，“西方”成为俄国的他者，不再是学习的榜样、追赶的目标。即便是西欧派，也并非主张俄国复制西方，而是要用西方的工业化方式去改造俄国，使尽快建立强大的俄罗斯帝国成为可能。这些造成俄国知识分子把俄罗斯帝国认同视为思考俄罗斯问题的理所当然基础。这种俄国主体论，随着帝国地位的提升、国力的增加，更是有增无减，变成了进攻性民族主义，以至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列宁及布尔什维克果断地建立起了反对西方及其资本主义制度的苏维埃政权，并努力向世界强行推广这种制度设计，孕育出有效维护苏俄的国际共运。

与这个过程相适应，在俄罗斯帝国的生成和扩张中，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区被强制性地纳入俄罗斯帝国版图，分布于这些地区的族裔自然被置于斯拉夫—俄罗斯化的进程中，俄罗斯理念被强行提升为俄国境内各族裔的共同价值观。^①就这样，随着岁月的流淌，俄罗斯民族主义(рус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被用来改造纳入其版图的其他族裔之手段——使非俄罗斯族裔俄罗斯化；又因为在与西欧的对抗中不断获胜，1830—1840年代俄罗斯民族主义演变成了声势浩大的斯拉夫主义运动，并在实践中被提升为判断世界和建立国际关系的标准，发展成超越境内族裔和不同阶层、不同时代及其制度的俄国民族主义(россий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也成为1850—1870年代泛斯拉夫主义运动的基础。自以为文明的俄罗斯人，在这种不断把其他

^① 有关俄国对高加索的认识及政策参见刘亚丁：“19世纪高加索战争的文学再现——以莱蒙托夫和托尔斯泰的行旅和创作为例”，《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2期，第30—46页。

非斯拉夫—俄罗斯族裔居民纳入其版图的帝国化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俄罗斯民族中心论。他们不承认其他族裔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不能有效地融合少数族裔，更无法同步有序地改善相互间的关系，引发境内少数族裔的强烈抵抗。进而，俄罗斯族裔在帝国人口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俄罗斯族裔和其他族裔之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对此，法国作家和旅行家居斯蒂纳(Marquis de Custine, 1790–1857)《1839年的俄国》(1840)说，“俄罗斯帝国虽幅员辽阔，其实是一座牢狱，牢门的钥匙握在皇帝手中”。^①而列宁赞同这种批评，其《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1914)声称：“大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需要明确自己对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态度。我们作为位于欧洲最东部和亚洲很大一部分地区的一个大国民族的成员，是绝不当忘记民族问题的巨大意义的，特别是在这个被公正地称之为‘各族人民的牢狱’的国家里……”，并睿智地把这种帝国战略所导致的民族主义问题转化为阶级问题，“我们，大俄罗斯的觉悟的无产者，是不是根本没有民族自豪感呢？当然不是！我们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我们正竭尽全力把祖国的劳动群众（即祖国十分之九的居民）的觉悟提高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程度。看到沙皇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蹂躏、压迫和侮辱我们美好的祖国，我们感到无比痛心。而使我们自豪的是，这些暴行在我们中间，在大俄罗斯人中间引起了反抗”，“我们满怀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也造就了革命阶级，证明了它能给人类提供为自由和为社会主义而战的伟大榜样”。^②更有甚者，列宁在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不久，又发表《皮季里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1918)批评道：“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特别巨大的、绝无仅有的困难，就是不得经过一个同爱国主义断然决裂的时期，即布列斯特和约的时期。这个和约引起的痛苦、怨恨和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自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期望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懂得下面这个真理：“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利益，我们承担而且应当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以及不像无产阶级那样在长期的罢工斗争中经受过严格锻炼的广大劳动群

① Астольф де Кюстин. Россия в 1839 году(La Russie en 1839). СПб.: Крига, 2008. С.449.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8-112页。

众，既不可能坚信这一革命就要到来，也不可能为这一革命无条件献身。”^①然而，即便列宁把民族主义、国际主义、阶级斗争相混合，但在提到“俄罗斯”时仍然习惯性地使用“大俄罗斯(великий русский)”，而用“小俄罗斯(Малая Русь, Малороссия)”来称呼被强行并入俄国的乌克兰(Украина)。

即使苏联在国家治理上尽量避免俄罗斯民族主义所带来的族裔矛盾，凸显超越族裔差异的阶级冲突，实行按主体民族分布的加盟共和国制度，但那也只是在形式上掩盖了俄罗斯民族和非俄罗斯民族、以及非俄罗斯民族之间的矛盾。苏共尝试通过推行阶级斗争，而非建构国民认同的手段，来推动苏联进程：这种发展模式是由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不同族裔居民去践行的，实际结果自然显示出各主体民族之间的矛盾，如在集体化运动、大清洗、二战中苏联人普遍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乌克兰和其他族裔居民的受冲击、迫害、牺牲，则远高于俄罗斯族裔。正因为如此，苏联时代在境外一直存在试图复兴“俄国”的运动。其中，1920年代成立的“青年俄国(младороссия)”，其领导人卡泽姆—别克(Александр Казем-Бек)在大清洗时代出版的《俄国、青年俄国和侨民》(1936)就声称，斯大林的行动是要用共产主义麻醉剂把俄罗斯因素从俄国社会生活中驱逐出去，而这种超越民族的国际革命正是清除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所在，或者说，斯大林这种非民族化的行动，实际上就是给苏俄革命挖掘坟墓。^②不仅如此，苏侨社会学家季马舍夫(Николай Тимашев, 1886-1970)《大撤退：共产主义在俄国的成长与衰落》(1946)认为，卫国战争伊始，斯大林就默许俄罗斯民族主义，并使其成为动员民众参加战争、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资源，并预期“俄罗斯民族已经打断共产主义这只怪物的脊椎，并且正打死它，体验到了复兴和胜利的喜悦”。^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海外“俄国”运动未必是阻碍苏俄社会进程的因素，至少是帮助俄罗斯度过艰难岁月的重要助力，并在国际性民族国家浪潮的激励下，它和境内的民族主义运动相配合，为压抑族裔认同的苏联走向解体、俄联邦由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7页。

② 转引自 Nicholas Hayes, “Kazem-Bek and the Young Russians’ Revolution”, *Slavic Review*, Vol.39, No.2, 1980.

③ Nicholas Timasheff, *The Great Retreat: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Communism in Russia*, New York: E.P. Dutton, 1946, p.415.

此自然诞生埋下了伏笔。所以，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人巧妙地使用“俄国(Россия)”和“俄罗斯(русская)”——正式将国名定为“俄罗斯联邦(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即“俄联邦(РФ)”，而非俄罗斯民族联邦(Рус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这种标志俄国民众认同发生变化的语言现象，在英语中虽不能充分显示(英语中只有“Russian”)、在法文拼写中能有些微暗示“俄国(Russie)”和“俄罗斯(Russe)”之别，但欧美斯拉夫学界还是及时关注到了这种现象：作为帝俄和苏联时代的重要社会政治现象的民族主义，被俄联邦视为最重要的历史遗产和政治动员资源，并不断地复活之。例如，同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俄罗斯民族主义作家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1938-2008)在后苏联获得的声望远胜于更多是民主人士的萨哈罗夫(Андрей Сахаров, 1921-1989)院士；同是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韦杰夫(Рой Медведев, 1925-)所获得声望，远不及同时是民族主义分子的索尔仁尼琴；完全是进攻性民族主义政治家日里诺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Жириновский, 1946-)及其所组建的自由民主党，以及同是进攻性的民族主义作家和政客爱德华·利莫诺夫(Эдуард Лимонов, 1943-)所组建的国家—布尔什维克党(Национал-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ая партия)等，虽然他们的道德情操和政见为正派人所不齿，但在社会上却持续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至今亦然。

俄罗斯帝国强盛的过程，和其借鉴欧洲现代化经验的现代文明化过程同步，为何俄国民族主义却是俄罗斯帝国强盛起来的基础、俄罗斯族裔居民自我认同的根据？对此，霍普金斯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曾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俄国高加索和东欧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的拉吕艾勒(Marlene Laruelle)，其主编《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俄联邦的重新主张》(2009)导言如是称，“自19世纪以降，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建立在对欧洲主导和西方知识殖民的感受基础之上的。这类感受所引起的‘仇富的意识形态’，是由彼得大帝改革以后的俄国人不再是自己文明的创造者的感觉所驱使的。俄国民族主义一向既仿效西方民族主义，又对抗西方民族主义”。^①问题是，如此情势居然和中国发生复杂关系？

^① Marlene Laruelle (ed.), *Russian Nationalism and the National Reassertion of Russia*, London & New York: 2009, p.4.

这种俄罗斯民族主义，19 世纪初以来就成为俄国人判断世界的依据，自然延伸到对已成为其邻居的中国的认知、判断上来：“中国”在俄国民族主义视域中，首先是和现代文明相对抗的“野蛮”、“落后”之指代，是需要文明化的对象。典型者如列宁在《对华战争》(1900)中所描述的，俄国连同英、法、德、美、日、意、奥匈八国派兵进攻中国，政府和媒体很支持皇帝派遣近六千名官兵参加这场帝国主义的对华战争(八国联军总数 1.4 万)——尼古拉二世任沙俄侵华军总司令、陆军总长库洛帕特金将军(Алексей Куропаткин, 1848-1925)为参谋长，俄国民众热烈庆祝八国联军在华的“胜利”，“主战派认为，这次战争是由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俄国人)欢呼欧洲文化击败了中国的野蛮，欢呼俄罗斯‘文明使者’在远东的新成就”，“目前俄国报刊大肆攻击中国人，叫嚣黄种人野蛮、仇视文明，俄国负有开导的使命，说什么俄国士兵去打仗是如何兴高采烈”，尽管列宁本人对此很气愤，并反驳道，“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压迫过俄国人民”。^①但是，这种“文明的俄国”有理由进攻“野蛮的中国”的论调，是俄国社会的普遍声音。更有甚者，克拉斯诺夫将军(Пётр Краснов, 1869-1947)《和中国的斗争》(1901)居然用俄罗斯民族主义情怀美化这种暴行：“我们的军人得到上帝的亲自帮助。我们保护被欺辱者、拯救受压迫者的事业是正义的，这样的战争是神圣的。在这场战争中，引导官兵行动的是上帝，而其圣洁天使保护他们不受敌人子弹的伤害……我们严厉地教训了中国人，但从俄国声望中他们看到，教训归教训，睦邻关系仍旧维持……于是，全中国和全亚洲都传遍了俄国人的好名声”；“在欧洲军队中，俄国始终走在最前面，这已深深印在中国人的脑海中。所以，和过去认为俄国人公正一样，中国人现在也崇拜俄国人的英勇”。^②令人疑惑的是，和列宁一样反对沙俄政权的普列汉诺夫(Георгий Плеханов, 1856-1918)，涉及俄国的中国因素时也没有好感：他和列宁争论土地问题时就说，“在莫斯科罗斯历史上，很遗憾，有太多的中国因素。在许多不利的历史条件影响下，包括促使俄国处于经济落后和专制统治状态的这些因素——土地所有权从地主手中逐步转到了大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319-323 页。

② Пётр Краснов. Борьба с Китаем: Популярный очерк столкнов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в 1901 году. СПб.: Русское чтение, 1901. С.71.

公、最后集中到皇帝手里——土地由他来用作满足国家需要的资源支配，但这些并非最终角色……我们不需要中国，因此我们支持农民运动，只是在破坏旧制度的尺度上，而不是在努力恢复似乎比旧制度要先进的现象的标准上”。^①即使高尔基这样伟大的作家，能如是批评，“西方人特别热心，也特别成功地猎取东方的物品——中国和日本的瓷器、铜器、古老的漆器、丝绣、图画、珐琅制品等。外国人很清楚，俄国有许多东方的艺术品，特别是远征北京之后。在那里，文明的军人对中国人的财产表现得肆无忌惮。俄国将领从那儿运回一箱箱的珍品。在满洲的冒险行动，更公开地加强了东方物品的流入，在对日战争期间，也有不少东方物品被运到俄国。很自然，因同中国的近邻关系，更促进了我国对东方艺术品的聚敛”（《不合时宜的思想》第26则（《新生活报》第97期，1918年5月23日）），但又为这些战利品从俄国流落出去而愤愤不平。

意味深长的是，俄国这些重要人物的这类论述，和俄国知识界的总体认知相一致。现代文明在俄国产生以来，历代知识分子少有赞赏和现代文明关系不甚密切的亚洲和中国。且不论果戈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屠格涅夫、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契诃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安德烈·别雷等人，往往以欧洲文明中心论的立场来论述中国和东方，就连最具世界意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政治事件而被流放到今天的土库曼斯坦时，仍有俄国优越感：“在欧洲我们是寄人篱下的仆从，在亚洲我们则成为老爷。在欧洲我们被视为是鞑靼人，在亚洲我们被认为是欧洲人。我们在亚洲作为文明传播者的使命，一定会感动我们的心灵，使命会把我们吸引到那里，但愿这个行动能造就让古罗斯再生、复活、逐步认清自己道路的俄国”（“亚洲是什么？”，《作家日记》第3章）。^②同样，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Василий Ключевский, 1841-1911）院士《俄罗斯历史教程》也主张，“历史地看，俄国当然不是亚洲，但是地理上她又不完全是欧洲。这是一个处于两个世界之间的中间国家。文化使她和欧洲紧密相连，而自然又对她产生影响，赋予她一些特色，使她要么被亚洲吸引，要么吸引亚洲”，而俄国的现代文明是亚

① Плеханов Г. Собр. сочинение. Т.10, М.-Л.: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26. С.33-36.

②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Полное сочинение 30 томах (Т.27). Л.: Мысль, 1984. С.26-28.

洲所需要的^①，虽然事实上俄国是野蛮地征服东方，并向中国和东方输出革命理论。更有甚者，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Николай Бердяев, 1874-1948)在背井离乡的情形下著述的《俄罗斯思想》(1948)仍声称，“俄罗斯民族具有强烈的弥赛亚意识”，“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国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巨大的东方—西方，它把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俄国土地的广袤无限与俄罗斯精神是相适应的，自然的地理与文化的地理也是相适应的”^②，完全屏蔽俄国拯救世界之使命的帝国主义诉求、庞大国土源自扩张和殖民主义之事实。这三位著名知识分子都表达了这样的情愫：面对亚洲，俄国人具有民族主义自豪感，并形成俄国在亚洲的使命——此乃俄罗斯帝国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认知的基础是俄罗斯自认为属于文明的欧洲人、俄国属于文明的欧洲国家，以及由此升腾出俄国中心论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他们在后苏联备受尊重，其渗透强烈国家认同的东方论述，自然成为俄联邦知识界和政界寻找俄国身份的理论资源。

帝俄时代这种藐视东方与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怀，甚至在国内战争期间和战后流离失所的俄侨言行中，同样强烈地保留着。其中，那些流寓到中国的俄国贵族和知识分子，办了不少报纸，如《满洲里通报》(1918-1920)、《战斗思想》报(1920)、《俄罗斯文字》报、《前进》报(1920)、《时报》(又称《哈尔滨时报》，1941-1945)、《曙光》报(1920-1938)、《新上海生活》(1922-1926)、《一天新闻》报(1946)、《生活新闻》报(1917-1929)、《俄罗斯先锋》报(1936-1940)、《光》报(1919-1924)、《西伯利亚生活》(1920)、《论坛》报(1922-1925)、《上海生活》(1919-1922)、《上海曙光》报(1925-1940)以及《俄罗斯之声》报(1927-1930)、《俄罗斯先锋》报(1928-1931)等，但这些报纸所载理论性文章、文学作品，少有感念中国的，更多的是以文明人眼光讨论祖国—苏俄的政治问题、寄居国的社会问题。更有甚者，流寓巴黎的俄裔音乐家德鲁格夫(Ф.Другов)，在俄侨杂志《战斗》发文“论民族主义”(1931)称，可以继续不赞同苏联，但反对以俄罗斯族裔中心论来对抗苏联，因苏联存在已是事实，这是一个拥有150多个民族的国家，若仍倡导俄罗斯民族主

① Ключевский В. Соб. соч. Т.1. М. Наука, 1987. С.65.

② 别尔嘉耶夫著：《俄罗斯思想》，雷永生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2页。

义，就无法面对包括白俄罗斯、乌克兰等扩大的俄国，主张用俄国认同替代俄罗斯民族主义，由此对苏联红军能战胜中国军队而深感自豪。^①

在苏俄时代，这种民族主义巧妙地演化成为国际主义修辞下的国家战略。一方面，在内战期间让大批华工转为军人，自然使之为新生国家的存续付出巨大牺牲；另一方面，为境内的华人开设中国学校、汉语剧院、中国人俱乐部等，增强华人对苏维埃政权的认同感，并制造中国正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话语。其中，马雅可夫斯基的许多诗篇及其诗句，如《莫斯科的中国》（“我知道，当十月革命的炮声在中国响起/阶级与阶级的厮杀就要开始/中国将向他们表明/人民并不是好惹的”）、《最好的诗》（“……/来，雅罗斯拉夫的榨油工人、纺织工人/为不认识的、亲爱的中国苦力鼓劲、叫好”）、《不要庆祝》（“汉语/充满睿智/和博大的神韵一一/每个人都知道/广州/正在进行着/我们梁赞的伊凡和安东/在十月里/曾进行的/同一种战斗”）等，以及深得布哈林、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等高度赞许的戏剧《怒吼吧，中国》（1926年特列契雅科夫编剧、费多洛夫导演在梅耶霍德剧院上演），把中国工人描述成苏联的无产阶级兄弟，以图召唤风雨飘摇的中国不是解决自己的独立、自强问题，而是加入共同反对威胁社会主义中心苏联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阵营。但是，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语境下，这种国际主义很容易转化成反苏联的世界主义：大清洗时期，大批曾为苏维埃政权浴血奋战的华人被逮捕、流放、遣送回国、甚至失踪。而苏联当局却为此制造不信任包括华人在内的亚洲移民的舆论，如1937年4月23日《真理报》发文“在苏联远东的外国间谍”——为无端驱逐中国和朝鲜移民的行为寻找“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理由，把民族主义排外行为合法化为“与间谍进行斗争”。尤其是，1937年以后，日本在中国的战事范围扩大，在苏联的战略规划中，不是切实进行国际斡旋、消除战争，更不是帮助中国抗日，而是沿俄中边界修筑军事工事，以图阻止中日战火燃烧到苏联，甚至于1941年4月13日签署《苏日中立条约》或称《苏日互不侵犯条约》：根据条约，苏联承诺尊重伪“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则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对这种违背《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之举，苏联最高苏维

① Борова. №.17-18. 1931. С.10-11.

埃主席团并未予阻止，甚至急速(4月25日)宣布生效，尽管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当时就发表声明予以严厉批驳，强调东北及外蒙古是中国领土、伪“满洲国”非法，中国政府决不承认苏日中立条约，拒绝任何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的任何决定。但战事却朝着这个条约所设方向发展：苏联时代的俄国民族主义，在中日战争问题上的举措，使中国此后的抗战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

这种混合着国家利益诉求的民族主义，在中苏对抗时期，自动地转化为社会氛围，许多著名文学家都卷入攻击中国的潮流。其中，以追求民主而在苏联和中国著称的诗人叶夫图申科(Евгений Евтушенко, 1932-)就是急先锋之一，其诗篇《在乌苏里江边的红色雪地上》(《文学报》1969年3月10日)如是书写过红卫兵“反苏”的情景：“他们梦见我们的祖国/在那里，普希金和舍甫琴科的著作被查禁/在那里，田野上生长的不是小麦/而只是语录、语录……”，——诗人不是为中国陷入“文革”灾难而忧虑。另一位著名诗人、后来成为俄国自然科学院著名教授的戈罗德尼茨基(Александр Городницкий, 1933-)，其《红卫兵进行曲》(1969)这样写红卫兵：“木犁已使我们厌倦——有卡宾枪就够了/如果我们不能到达遥远的莫斯科/那就意味着，我们爱中国还爱得不够”，——诗人把中国不正常岁月发生的事情当作敌视中国的理由。甚至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诗人科尔扎温(Наум Коржавин, 1923-)，在1973年被开除出苏联作协之前一年(1974年流亡美国)还发表诗篇《时代》(1972)：“现在的生活充实/但可能在某个时刻/停滞不前的中国/突然把长城搬到我们这里//对我们好的或不好的东西/他们一概嗤之以鼻/对所有人都威逼恐吓/不论是斯拉夫人还是其他人……”，此说宛如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泛蒙古主义》(Панмонголизм, 1897)之回音——“从马来亚的海滨到阿尔泰山，/在东方的岛屿上，/在死气沉沉的中国长城边，/头领们搜罗了大批人马。//他们如蝗虫一样不计其数，/像蝗虫一样令人憎恶/依靠非人世力量的保护，/这些部落向北方推进……”。当然，中苏关系紧张时期最富有影响力的论述是，激烈反苏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和另一位持不同政见者阿马尔里克(Андрей Амальрик, 1938-1980)之争：后者曾在境外发轰动一时之作《苏联能存续到1984年吗？》(1969)称，

“苏联需要进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但不是要反对‘美帝国主义分子’和‘反苏分子’，而是要反对民族主义分子，如华人和犹太人”，中国虽然和苏联一样是以马列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经历长期战争需要和平，“实际不然：其内部发展的逻辑特别推动中国对外扩张，而中印之战已经证实中国的扩张性。但中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会亲自介入全球战争，而会损坏苏联和美国，再以仲裁者和世界主审法官身份出现。但中国是不可能得逞的，中国领导人早就清楚这点。由此，苏联要重估中国外交。革命的残酷逻辑促使中国好战，正如中国领导人所希望的，以此解决中国糟糕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从而保证其获得当代世界的领导者位置。中国与苏联‘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之冲突的可能性，远大于和‘美帝国主义’的对抗”，“为反对苏联帝国主义，中国可能寻找和美国更密切的联系，届时许多国家依附于这种关系，虽然中国不会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превентивный удар)，但中国会用核回击讹诈苏联”；“斯大林和早期托洛茨基已经意识到，共产主义在中国获胜，苏联最终得到的不是盟友，而是一个危险的敌手”，总之，和中国相处、苏中之战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①对此，索尔仁尼琴著文《致苏联领袖们的一封信》(1973)批评阿马尔里克，但不是说他误解了苏中关系和中国，而是更强硬地按苏联官方观念批评道，中国人生性残忍，苏联不要被中国的落后状态所迷惑，苏中之间必有一战，10亿人口的中国一直觊觎西伯利亚，若苏联不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肯定要灭亡，“在最近半个世纪，我们唯一真正需要的军事行动就是防御中国，能不与中国交战更好……除中国外，地球上没人威胁、进攻我们”。^②可见，俄国对中国的认知，常被由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意识演化而来的时代意识形态所左右，从帝俄到苏联始终如一，在中苏关系紧张时期更如此，哪怕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会放弃这样的中国观。

而且，俄国学界对俄罗斯民族主义延及对中国的认知，一向缺乏深刻反

① Андрей Амальрик. Присуществует л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до 1984 года? Амстердам: Фонд им. Герцена, 1970. 作者 1965 年被拘捕不久，便考虑苏联解体问题，并致函《文学报》和《消息报》，希望刊载自己对苏联社会制度和对外关系思考之作，被拒绝；1969 年完稿后由阿姆斯特丹赫尔岑基金会刊出，作者又被捕。

②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Соб. пуб. Т.1. Ярославль: Высокая Волга, 1995. С.169-182.

省。曾任远东所历史文献学和国外汉学研究室主任的尼基福罗夫 (В.Никифоров, 1920-1990) 教授, 既按苏联意识形态研究中国问题(如《中国的败类国民党反动派》, 莫斯科大学出版社, 1953 年), 更用民族主义意识观察苏中关系(如《苏联史学家论中国问题》, 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70 年), 很少深刻检讨苏俄对于中国认知中的民族主义意识问题, 如《苏联对中国问题研究史》(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1970 年)主要是在知识论层面上描述苏俄汉学历程, 而不是论述汉学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这种情形一直存在: 苏联末期, 戈尔巴乔夫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并非是放弃了俄国民族主义, 而是因冷战格局发生巨变, 外加苏联自身改革日益陷入困境, 苏联必须与中国缓和关系。但这种缓和不是由汉学界所启动、引导的, 相反, 汉学界在这个过程中只是被动地适应形势变化。

后苏联时期俄国放弃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但曾是苏联解体关键性因素的俄罗斯民族主义, 却成为后苏联社会进程中的重要力量。鉴于俄联邦自视为欧洲一员却未得到相应的回报, 相反却遭到北约和欧盟东扩的挤压, 21 世纪伊始, 俄国放慢了欧洲化进程, 并常冲撞西方的挤压。这类情形本来就容易激发俄罗斯民族主义, 更何况从苏联到后苏联转型过程中出现太多社会矛盾, 尤其是国民对国家认同感不足并怀疑本土文化遗产, 普京—梅德韦杰夫—普京便通过复活俄罗斯民族主义资源的手段, 继续塑造俄联邦作为大国的形象。这种做法引导着社会政治精英, 如前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前总理普里马科夫和切尔诺梅尔金、提出“主权民主”概念(Суверен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的官方政治理论家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Владислав Сурков, 1964-)等, 以及杜马各大党团、各种社会组织, 包括 1990 年巴尔卡绍夫(Александр Баркашов, 1953-)建立的俄罗斯国家统一联盟(Рус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Единство)、上文提及爱德华·利莫诺夫及其“国家—布尔什维克党”等, 普遍不是积极推动国家融入世界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之路径, 而是通过民族主义动员、国家利益至上的主张, 来提升国民作为俄联邦公民的自豪感、激发其对俄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认同。对此, 曾任卡西扬诺夫政府顾问的俄国全球化研究所所长杰里亚金(Михаил Делягин, 1968-), 其《普京之后的俄国: 俄国一定会发生橙-绿色革命吗?》(2005)指出, 在俄联邦

民众意识中，苏联成了社会制度的一种重要模式，根据这种模式，俄国现代化的目标乃是“在市场关系的基础上依靠民族资本和现代技术的手段去恢复苏联”，但尝试实践这样的设想之后，“俄国却成为外来扩张的对象国，不仅失去了按某种方式协调商人和民众利益的机遇，而且在这种扩张中遇到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而俄国能实现的利益协调方式是，联合商人与民众的力量，通过保有大量的生产性资源，把它用于本国发展所需的领域，以对抗外部具有破坏性的扩张。这就是把俄国的‘民族解放战争’运用于经济领域的特有现象”。^①连杰米亚金也这样认识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足见俄罗斯民族主义若被合法化，就会为复兴俄罗斯帝国的战略提供历史依据和国民期待，从而能合法打击境内挑战俄罗斯民族中心论的少数族裔诉诸主权的要求。而这并非杰利亚金一厢情愿，普京的声望就是这样建立的——最初得益于发动车臣战争、重振俄国雄风的国策，赢得两次大选；任总理期间，大力推动政府介入的市场经济，外加第三次参加总统竞选时发布建立“欧亚联盟”之类帝国目标，最终再次获胜。

在这样的情势下，后苏联时代重建俄中关系，显然不是反思历史的结果，而是出于延续苏联末期以来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变化和俄国自身变革的需要，学界和政界精英以俄国民族主义视野观察中国的文化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特别敌视共产主义中国的索尔仁尼琴，其《崩溃中的俄国》（1998）声言，“据预言，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居世界首位，远超过俄国，而其居民则要超过俄国8倍（甚至10倍、12倍），我们如何能守住西伯利亚这块被我们忽视、得不到关心、荒无人烟的土地，特别是远东，若这些地方成为外来人的居住区，难道不是我们的罪恶吗？中国不需要战争，只需要人口输出——现在已经输出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简化外交手续，成千上万、上百万华人涌进我们的土地……经过几千年考验的中国精神是不会被摧残的”。^②姑且不论其论述中把“中国”和“西藏”分开、俄国不需要中国的经济繁荣等别有用心，以及怀疑俄中关系对俄国的负面意义。不仅如此，因其强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情怀，在《同行二百年》（2001-2002）中字里行间批评俄国

① Михаил Делягин. Россия после Путина. Неизбежна ли в России «оранжево-зелё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М.: Вече, 2005. С.13-14.

②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Россия в обвале. М.: «Русский путь», 1998. С. 32.

境内的犹太人，认为犹太人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麻烦制造者，虽然在俄国历史进程中犹太人贡献巨大。^①然而，就是这样的人物，在后苏联却成为最负声望的知识分子，普京不止一次去看望他，而其去世时获得了近乎国葬的礼遇。此外，苏联时代许多主流诗人在后苏联都默默无闻，上文提及的诗人叶甫图申科，其声望却居高不下，这并非他持续追求民主，而是从民主人士转为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有关，哪怕他本人曾声称“民族主义是道德上的死胡同”。更有意味的是，后苏联著名女作家乌利茨卡亚(Людмила Улицкая, 1943-)的重要小说《你忠实的舒里克》(2004年)第3部分这样描写中国形象：在写到1916年彼得堡一家照相馆里挂着某位亲王的照片时，便由此生发联想，“遗憾的是，亲王本人圆脸上绽着一双眯缝眼，腿也很短，就如当时彼得堡洗衣店里的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中国缺乏好感的现象远不只是这些个案，而是比较普遍的，因为后苏联社会少有检讨俄中关系中的俄国责任、学术界从未认真反省过那些经典作家文本中对中国的各种否定性叙述，包括在苏联时代积极参与反华行动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后苏联成为声望赫赫的汉学家，也并未深刻检讨过以前的汉学。其中，曾任驻华使馆参赞、科学院远东所所长的齐赫文斯基(С. Тихвинский, 1918-)院士，发表过“大汉族霸权主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著作”(《历史问题》1975年第11期)、《文件的驳斥：反对伪造俄中关系史》，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82年)等，但其后来撰写的著作《我的一生与中国》(1992)、《回到天安门——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回忆录》(2004)等，却回避甚至否认苏中矛盾中苏联方面的责任：这正是其民族主义情怀使然之，时代之巨变也无法改变之。同样，俄联邦科学院米亚斯尼科夫(Евгений Мясников, 1931-)院士，长期从事官方指定的俄中双边关系档案资料整理和分析工作，后苏联时期所发表的著作《俄中界约斟注》(1996)和《中国边疆》(2001)等，与他在苏联时代出版的力作《17世纪大清帝国和俄国》(1980)相比，在论述的思路没有本质的区别。诸如此类的情形，不一而足。

而近20年来，中国对俄国的认识的确要比过去深刻得多，尤其是对冷战时代中苏关系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尚未深入触及俄国

① 参见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Двести лет вместе. М.: Рус. путь, 2002.

民族主义及其对中国的伤害的历史和文化结构问题。相反，高调赞赏俄国作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声成为主流。^①甚至，在“思想解放”中获得“重新评价”的周作人，其充满着诸多背离历史事实的著名演讲《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1920），仍然被视为经典名篇。而该演讲是这样评价的，“俄国从前以侵略著名，但是非战的文学之多，还要推他为第一。所谓兽性的爱国主义，在俄国是极少数；那斯拉夫派的主张复古，虽然太过，所说俄国文化不以征服为基础，却是很真实的”。^②此说和事实相去甚远，已经毋庸置疑。尤其是，对苏俄抱有好感的李大钊、瞿秋白、鲁迅、茅盾等，或用国际共运视野、或用启蒙主义眼光赞赏性描述苏俄，从未认真触及苏俄共运背后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诉求、苏联国家安全战略等深层次问题：至今未引发中国学界认真反思。

实际上，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苏联学界就关注到俄国民族主义之于俄罗斯帝国和苏联发展的重要性问题，并影响到后冷战时代斯拉夫学研究。斯坦福大学教授顿诺普(John B. Dunlop)的《当代俄国民族主义的多幅面孔》(1983)和《新俄国民族主义》(1985)、扬诺夫(A. Yanov)的《俄国的新右派：当代苏联的右翼意识形态》(1978)和《俄国的挑战与2000年》(1987)、著名政治学家卡特(Stephen K. Carter)在苏联解体之际所发表的“俄国民族主义：昨天、今天、明天”(《外交事务》杂志1990年冬季号)^③、曾任美国国际战略中心国际研究委员会主席的拉克尔(Walter Zeev Laqueur, 1921-)的《黑帮：俄国极右分子的兴起》(1993)等，从不同方面揭示了民族主义在俄国的表现及其对境内外的影响。进入普京时代，欧美斯拉夫学界更注重当代俄国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高级研究人员拉吕艾勒(Marlene Laruelle)，其《在国家的名称下：当代俄国的民族主义与政治》(2009)深刻指出，“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意味着极端性、边缘性、激进性，在冲撞权力的同时，又在实践中回归社会、政治、文化和情感的正常状态。作为一种互动过程，民族主义在俄国把公民和精英的合法权

① 参见刘古昌：“不断迈上新台阶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1期；田永祥：“中俄关系的现状、特点及前景”，《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3期。

② 《晨报副刊》，1920年11月16日。

③ Stephen K. Carter, “Russian Nationalism: Yesterday, Today, Tomorrow”,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90/1991.

利融为一体，在严重的分崩离析的阶段，确保社会的内聚力(cohesion)”。^①如此论述，有效说明了该矛盾：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持续动荡，却没有如苏联那样进一步解体，反而在普京时代得到长足发展。

就是这样的复杂情势，也没能影响热忱拥抱世界的中国，大胆探索建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努力向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转化。从 1992 年 12 月“关于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到 2011 年“中俄元首莫斯科会晤联合声明”、2012 年“中国和俄联邦关于进一步深化平等信任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前后中俄几任领导人共发表 22 个联合声明、6 个联合公报，包括 1992 年双方确认有必要将彼此视为友好国家、1994 年决定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 年针对 21 世纪战略合作而建立平等和信任的伙伴关系、2001 年签订确立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相互举办对方“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等。中俄之间建立这种双边关系，意义巨大：俄联邦无需担心其东方会遭遇类似西边那样北约和欧盟的挤压，且可以用来平衡与西方的紧张关系；中国也不担心来自北方的威胁，并且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可以找到合作对象。这也就是为何在俄国会出现与世界格局变化相矛盾的情形：民族主义在二战以后的欧美、在近 20 年来的中国，都是当局要谨慎引导、妥善利用的社会现象，但在俄国却得到了鼓励。

如此一来，我们应该注意到：无论关于双边关系的公文表述得多么动人，其具体条款在俄国的实践过程中，都必须被整合进民族主义支撑下的俄罗斯帝国复兴战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必须吻合俄国民族主义，甚至汉学/中国学亦然。而中国则从假定的战略格局角度解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充满着期待。这些反差，伴随后苏联的中俄关系进程。

向现实深入的俄罗斯民族主义 ——当代俄国汉学之于俄中关系的复杂性

正如帝国化诉求在俄国历史上没有本质性改变一样，俄罗斯民族主义渗

^① Marlene Laruelle,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Russia*,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2.

透进俄中关系的情形也少有变化，俄联邦时代亦然。因此，更多是官学行为、而非纯学理性的俄国汉学/中国问题研究，也就难免受到民族主义的侵扰。即便是获得了 2010 年俄联邦国家奖的由季塔连科院士和汉学家科贝泽夫 (Артём Кобзев)、卢基扬诺夫 (Анатолий Лукьянов) 共同主编，俄国所有重要汉学机构的上百位汉学家参与，反映俄国二百年汉学历程的六卷本百科全书《中国精神文化大典》(2006-2010)^①，也并不表明俄联邦政府要把中国文化纳入俄国的普遍知识体系、改变中国文明在俄国文化系统中的边缘化地位，因为其获奖理由足以说明俄国至今仍是把关于中国的知识视为专门的领域——“要彰显这套丛书在俄国和世界汉学研究的历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所奠定的学术百科全书基础”，而不是修补了既有知识体系之欠缺。

事实亦然！当代俄中关系不断扩大和深化，多限于在国家层面上展开的政府行为，真正来自民间的互惠互利活动则困难重重。而作为主要是政府支持的汉学—中国学研究，因其也是在苏联汉学—中国学基础上转化而来的，对其民族主义诉求缺乏批判，无论是科学院东方所及其彼得堡分部中国学研究所(1956 年组建)，和科学院远东所、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喀山大学东方学系、哈巴罗夫斯克大学等传统汉学研究中心，还是人文大学、莫斯科语言大学、友谊大学等新设的汉语或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它们或整理出版俄国著名古典汉学家阿里克、王西里、罗索欣、列昂季耶夫等人对中国文化经典的翻译和诠释，以及对中国文学和艺术、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的研究成果，或编纂出版关于中国知识的百科全书和大型工具书，如著名汉学家戈尔基延科 (А.Гордиенко) 主编的《中国：文化、艺术、历史(插图百科)》(2008) 等，都很少对渗透着俄国民族主义意识的传统汉学有所革新或超越。而且，后苏联出版的主流汉学研究史著作几乎都声称，作为东西方文明交织的俄国，是世界三大汉学流派之一，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汉学研究家园，对推广中国文化扮演了关键角色，因而更少触及从汉学研究到中国学研究过程中

① Титаренко М, Кобзев А, Лукьянов А (ред.). 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М.: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6-2010г.这套辞书共六卷，依次包括中国的哲学、神话、文学(含语言和书面语)、历史思想(含政治和法律文化)、科学(含技术和军事思想、医学和教育)、艺术等。它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2012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就包括对这套丛书的翻译。

的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行为。也就是说，后苏联重振中国学，并非俄国汉学家看到中国文化在后冷战时代的魅力，而是要适应俄联邦加强对远东和东南亚战略的需要，因而对俄联邦中央和地方政府、俄罗斯东正教会等做出伤害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举动，不是批评，而是大加附和。典型案例有：沙俄时期的伊尔库茨克和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Николай Муравьёв, 1809-1881)，是迫使清政府签订《璦琿条约》(1858)和《中俄北京条约》(1860)的历史罪人(为此，清政府当时就对签字人黑龙江奕山将军革职、查办)，1891年哈巴罗夫斯克竖起纪念铜像，百年后(1992)又重新修复，2006年俄联邦中央银行发行的5000卢布纸币上的图案就源自这一新修复的铜像，2012年7月海参崴也竖起铜像，尤其是阿穆尔州府所在地的最大教堂院内居然竖立其铜像——俄罗斯东正教会视之为圣徒。相较而言，苏联对待这位“历史英雄”的态度，还是谨慎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俄国汉学的国家化行为由来已久。为了启蒙运动的需要，18世纪欧洲兴起“中国风”。彼得大帝开启俄国学习西方的风潮，也就从西方引进了汉学：俄罗斯帝国科学院延聘的欧洲专家，就包括德国学者拜耶尔(Theophilus Sigfried Bayer, 1694-1738)这类著名的汉学家(此人在俄国用拉丁文撰写了欧洲第一部《汉语语法》)。这种直接得到政府支持的汉学研究，自然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尤其是1812年反抗拿破仑战争获胜后，俄国民族主义热忱高涨，和政界、军界一样，学术界、文化界也由致力于模仿和学习西方，变为挑战、质疑西方文化。这就意外地造成那些不是出自学院，而是来自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人士，成为实用主义的汉学研究者和工作者的。其中，编纂有《汉文启蒙》(1837)的比丘林(Н. Бичурин, 1777-1853)，以第九届俄罗斯东正教会驻北京传道团长(1807-1821)的身份，履行俄罗斯帝国之代表的使命，但同时研究中国古典文化——认为中国文化经典为人们认识和理解中国，而不是拓展俄国人的思维空间，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知识、手段，为此他积极向政府、圣主教公会和知识界提供其所搜集到的信息和研究成果。这一和俄罗斯帝国东方战略相吻合的举措，意外地开始了俄国汉学走向独立，并试图平等地与西方汉学界展开对话的历程，还推动教育主管部门仿照西方的格局，使汉学从教会体制转入学院化：喀山大学创建汉语教研

室(1837)和开设满语课程(1844),意味着独立的俄国汉学教育体系开始形成。稍后(1855),在俄国政府的直接安排下,汉学中心从喀山大学迁往彼得堡大学,以适应俄罗斯帝国趁中国危机的局势,推动多方位侵略中国的东方战略。“汉学(синология)”在俄国,也因其中心转入首都而随之转化为“中国学研究(китаеведение)”,直接成为国家学术,并在教育层面上自如表达俄罗斯民族主义诉求:为了满足帝国对华外交的需要,有针对性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儒学、地理、政治、宗教、经济、人口、医学等,并培养这些方面的人才,相应的,实用性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的成果迅速增加。

这种情形正如俄国印度学奠基人之一、彼得堡帝国大学教授米纳耶夫(И.П.Минаев, 1840-1890)所说的,“在俄国,研究东方向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抽象的。我们距离东方太近了,绝对不可能抽象地研究东方。俄国利益一直与东方密切相关,我们的东方学因而也不能不体现出实用特征”。^①在这一历程中,俄国汉学越来越有别于视中国文明为世界古老文明之一的法国汉学。在整体布局上,俄国汉学与俄国对华政策和东方战略息息相关。其中,彼得堡大学培养汉、满、蒙、藏等语言人才,目的就是要满足俄国军事、外交、教会等部门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推广中国文化、展开俄中文明之比较、探求不同文明的发展规律。随着俄国扩大对华战略,这类人才供不应求,外交部便加大资助彼得堡大学培养关于中国问题的专家的力度,同时投资扩建汉语人才培养和中国研究的新基地——1899年创建海参崴东方学院——其首任院长便是彼得堡大学蒙古语教授波兹涅耶夫(Алексей Позднеев, 1851-1920),此人在开班典礼上宣称,东方学院就是要为俄国培养针对东方战略的行政及工商活动的人才。事实亦然:在实际招收的学生中,包括相当高比例的现役俄国官兵,毕业生多去安全部门、军队和教会等部门。

源自教会体制的汉学教育,变成中国学研究后,进一步服从于帝国战略需要。我们知道,1727年《恰克图条约》签署之后,俄罗斯东正教会就获得了向北京派遣传教使团的特权(天主教和新教未能得到类似机会),由此开始建立俄国式的实用汉学研究基地。相应的,这类人员在传教和汉学研究的

^① Вигасин А.А. и др.(Ред.).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до 1917 года*. М.: Вост. лит. РАН, 1997. С.15.

名义下，从事外交情报搜集和分析工作，许多这样的汉学家还主动适应汉学工作服务于国家的要求。其中，为适应俄国侵袭中国西北边疆之需，本已是声望赫赫的著名汉学家巴拉第(Палладий，即卡法罗夫 П.И.Кафаров, 1817-1878)，主动放弃从事已久的中国佛教研究，直接受外交部亚洲司领导，改为研究中国边疆史，并亲赴乌苏里江地区实地考察，为帝俄政府提供切实的情报和建议，尤其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亲赴大沽口参与俄国对华的外交行动，成为《璦琿条约》得以拟定和签订的关键人物。热心于圣经汉译的晃明(即赫拉波维茨基 М.Д.Храповицкий, 1816-1860)，积极参与中俄《天津条约》正式文本的翻译工作。作为第十二届传教士团监护官的柳比莫夫(Н.Любимов, 1808-1875)，曾在北京风俗研究上卓有成就，但任期届满回国后，便放弃学术，转职场于外交部，并升任亚洲司副司长，1844 年化名霍洛舍夫(Холошев)，以中亚商人身份潜入伊犁、塔城等地，为沙俄政府搜集情报。作为俄罗斯东正教会驻北京传教团最后一届(1858-1964)团长的卡尔波夫(Григорий Карпов, 1814-1882. 取汉名固里)，对中国宗教和风土人情之研究颇深，却积极迎合沙俄当局，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局势，与 1859 年率领外交团来华的亚历山大二世侍从武官伊格纳季耶夫(Алексей Игнатьев, 1842-1906)少将相配合，作为主要谈判人，狡诈地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经其手划归了俄国。曾为第十二届传教士团成员的扎哈劳(即扎哈罗夫 Иван Ильич Захаров, 1814-1885)，是彼得堡大学满语学教授，因其出色的汉学能力而出任俄国驻伊犁领事和总领事，1862 年亚历山大二世主持召开中俄西部划界特别会议，其被任命为中俄西段边界“划界”谈判全权代表。正是这样的“汉学家”参与，清政府遭遇俄国 30 年的胁迫和讹诈，最后还是不得不签订《勘分西北界约》，大片领土易手俄国。在中医研究方面卓有成就且多方通晓汉语文化的明常(Александр Татаринов, 1817-1886)，放弃专业而任驻塔城首任领事，成为签订《勘分西北界约》的另一重要人物。原本系彼得堡州办公厅官员的斯卡奇科夫(К.Скачков, 1821-1883.汉语名孔气或孔琪庭)，1848 年来中国在天文站工作，但在迅速掌握汉语后，转向研究中国的农村经济、海军、中医、贸易等，并取得卓越成就，此后却宁可放弃研究而转任外交部翻译、驻塔城

和天津领事……诸如此类的案例，不一而足。

汉学家出任外交官并做出诸多有违于其学者身份的言行的比例，在俄国远高于西方国家。对此，那位在中国有很高声望的米亚斯尼科夫院士却声称，“同其他学科一样，是为适应实际需要而产生的。俄中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俄中各段边界的形成以及贸易往来，皆要求专业知识和专门人才。俄国与大清帝国关系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及其所包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以及革命前俄国人文学科和社会思想的发展进程，一直影响着汉学并决定着汉学的性质”。^①这种基于现实需要的推动而发展起来的“中国学研究”，与基于热爱中国文化的汉学探讨迥然不同，导致在俄国汉学和中国研究领域真正能超越欧洲文明中心论、俄罗斯帝国意识和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的人物及著作甚少。在这样的格局中，曾任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主任的瓦西里耶夫院士（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汉名“王西里”），其力作《亚洲的当代地位：中国的进步》（1883）对中国的认知充满着矛盾：一方面说中国并非全方位落后于欧洲，中国的文学和道德哲学、社会政治制度之发达程度不亚于欧洲，“应当了解中国文学，才能看到中国人多么深入地研究了人类的许多普遍问题。在中国的各种理论中，最重要的是关于人道主义、真理、秩序、智力发展和诚实等问题的”；但另一方面却说，无需在技艺、行当、贸易等方面替中国之落后担心，相反，中国在每个方面都可以做出仔细又便宜的货品，未来全世界都可能充斥着中国商品，“中国将会占据世界的市场和行业”，只是由于当时武器装备落后，中国军队才败于欧洲，若一旦武器精良，也能精巧射击对手，并且他尤其反对重伦理秩序和尊古代圣贤的儒家文化，认为关于祭祀和崇拜的典籍，“即使是好书，也是有害的”。^②如此一来就明白：能够批评俄国汉学之不足的俄国人，是少之又少，甚至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教授格奥尔吉耶夫斯基（Сергей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51-1893）之作《研究中国的重要性》（1890）反对把中国说成是僵化的，认为这只是欧洲的表述，满足了欧洲哲学家的虚荣心，便于把历史资料强行置于先验的公式中，其实“中国人

① Мясников В.С. Проблемы и задачи изучения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Проблемы совет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Наука, 1973. С.88.

② Васильев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в Азии.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огресс. СПб., 1883. С.71, 73.

口众多，许多世纪以来，友谊的纽带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未来这种友谊可以保证全世界的和平，造福于居住在中国的各族裔”，但最终认为，“总有一天，世界上政治权力的各种合纵连横，将取决于用一贯的和平与亲密的友谊连接在一起的两个最大邻国的首肯”^①，全然不顾当时俄国正在胁迫中国、俄中之间并不存在平等和友谊之事实。

这种原本就很受意识形态影响的俄国汉学—中国研究，在苏联时代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延续了帝俄时代的学术制度，在政府财政和意识形态支持下，汉学更是趋向中国问题研究，并先后出现了科特维奇(В.Котвич, 1872-1944)、阿列克谢耶夫(В.Алексеев, 1881-1951)、康拉德(Н.Конрад, 1891-1970)、费德林(Н.Федоренко, 1912-2000)、李福清(Б.Рифтин, 1932-)、松采夫(В.Солнцев, 1928-2000)、米亚斯尼科夫、齐赫文斯基、季塔连科等20位科学院院士和通讯院士。他们和其他汉学家一道，在政府支持下，1966年9月苏联科学院在原中国学研究所基础上组建研究当代东亚问题的远东所，并从1974年开始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КНР: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идеология)年度丛刊，把民族主义和时代意识形态联结起来，在对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哲学、军事等具体问题的研究中，显示出苏联对中国认知的变化：苏联中国学的变革趋势，常受到时代的主流话语和民族主义态势的影响，而这些又加剧了政府对华决策的强硬性。^②问题是，苏联汉学家很习惯这种境遇，如戈雷金娜和利维谢奇的“过去五十年的苏联中国文学研究(1917-1967)”(1968)、沃斯克列先斯基的“苏联关于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远东问题》1981年第1期)、齐赫文斯基的“俄苏的中国文化研究概论”(《远东问题》1986年第2期)、尼基福罗夫的“苏联的中国历史研究”(《历史问题》1969年第6期)等，均赞赏苏联汉学从民族主义角度揭示中国问题。诸如此类的情形，导致中国

① Сергей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Важность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я. М.: Книга по Требованию, 2011, С.100-115.

② Мамаева Н. (ред. и сост.). Образ Кита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Панорама, 2007. С.99.

文化在苏联始终局限于汉学专业领域，而不能普及成为公共知识。^①

实际上，正因为从帝俄的汉学到苏联的中国学，无论是研究机构的创设和人才培养的目标，还是汉学家自身的研究动力，无不受到俄国民族主义的推动，从而使得汉学/中国学研究虽然逐渐摆脱了与东正教会的关系，却与官方政治始终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由此出现罗索欣(И.Россохин, 1717-1761)这样杰出的汉学家，其《资治通鉴纲目》等重要学术著作，因不是直接表达俄国民族主义诉求和帝国的现实需要，直到 1950 年代才得以面世。更多这种类型的有纯粹学术价值的汉学家著作，其命运则多是以手稿形式存世，——斯卡奇科夫《俄罗斯中国学史纲要》(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1977)附录的汉学家手稿目录达 98 页之巨；或者，另外一些著名的汉学家只能离开俄国去西方汉学机构才能获得国际声望，如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叶理绥(С.Г.Елисев, 1889-1975)本是俄国汉学家，先后在柏林大学、东京大学研习汉语和日语，1914 年回国，只是担任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副教授职务，1920 年代流寓西方后，很快成为国际著名汉学家。同样，曾为苏联科学院拉美所教授和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的潘佐夫(Алечандер Панцов, 1955-)，1999 年开始任俄亥俄首府大学教授，并出版了《布尔什维克和中国革命：1919-1927》(2000)、《毛泽东》(2006)等震动国际汉学界的著作。这样的研究格局和研究者命运的反差，显示出苏联汉学/中国学同国际汉学/中国学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却因受到由俄国民族主义转化而来的意识形态的限制，使得苏联的中国研究对国际的影响力不及西方汉学/中国学。^②

的确，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汉学研究比起苏联时期要更为繁荣、丰富，思想更为开放，取得丰硕成果。按季塔连科在 2002 年莫斯科举行的第 14 届欧洲汉学家大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时所说，“俄国每年出版关于中国研究的著作达 70 部之多。俄国汉学家分布在从莫斯科、圣彼得堡到哈巴罗夫斯克、海参崴的近 40 个学术中心”，早已是世界上名副其实的三大重要中国学研究

① 关于民族主义及其相关的意识形态问题如何影响苏联汉学研究，参见 Kirby E. Stuart, *Russian studies of China: progress and problems of Soviet sinolog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75.

② Ibid, pp.149-170.

基地之一。^①但是，他并不是在认真检讨俄国民族主义对苏联汉学之伤害性渗透的基础上来论述后苏联中国学研究的。其实，早在1989年，邓小平就当面对戈尔巴乔夫说过，在欺负中国的列强中，“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②从上文论述中可知，这与俄国以及后来苏联的汉学研究不是没有关系的，甚至可以说汉学研究已成为俄苏推动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从罗曼诺夫(Н.Романов)的《俄国科学院远东所对中国哲学之研究》(《哲学动态》1996年第5期)、格鲁宁(О.Грунин)的《俄国科学院远东所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远东问题》1996年第5期)、佩列洛莫夫等(Л.Плеломов)的《俄国科学院远东所对传统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之研究》(《远东问题》2006年第4期)^③，尤其是远东所加列诺维奇(Ю.Галенович)教授之力作《俄中关系(19世纪末—21世纪初)》(2007)(按十年进程逐一描述俄中关系发展的不同情形)，我们都难以看到俄国的汉学研究有深刻的自我反省，更不可能看到学术史整理中有对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清理。而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之所以加大对中国问题研究，是基于俄国远东地区发展的设计、俄国遭遇后冷战的西方压力等现实需要，须和中国合作，这就是季塔连科《远东的地缘政治意义：俄国、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2008)所安排的《俄国的亚洲政策》篇章中所说的，“俄国目前正处于紧要关头：我们或者展示自己的政治决心，同中国开展广泛合作，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同时参加开发中国西部及西北部)，或者屈从于‘中国威胁论’的偏见和神话。失去这个机遇，客观上就会继续保持我国亚洲部分地缘政治上的弱点，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中国正在成为远东经济巨人，俄国要进入东方的政治经济系统，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的态度。中俄经济平行发展是最好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俄国不进行经济结构改造，不发挥自己的潜力，必将沦为中国的商品市场和原料

① 转引自阎国栋：《俄国汉学史：迄于1917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8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2-293页。

③ Переломов Л., Кожин П. Изучение Роли и Места Традиций В Жизни Кита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ИДВ РАН//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4. 2006г.

供应地。最差的方案是两国经济在相当长时间内达不到高速发展，美国和西方的霸权地位越来越强，俄国将面临中国难民大量涌入俄国的危险。因此，为了俄国自身利益，也要与中国合作，达到双赢”，尤其是该书第五章“俄国—印度—中国”强调，“俄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中国亦需要一个强大的俄国”。^①

这种出于现实利益考虑而得到加强的中国学研究，包括俄国汉学界因服从国家亚太战略的需要，多番肯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социализм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ой)”的论述，同样不能掩盖其受俄罗斯民族主义诉求之影响。莫斯科卡耐基中心副主任特列宁的《俄国的中国问题》(1999)，作为近年来影响俄国政府的重要论著，从经济、社会发展、政治制度变革等多个方面研究中国问题，并提出“俄国的中国问题(Russia's China problem)”概念：中国在综合国力上明显超过俄国，这已经是俄国不可能阻挡的事实，俄中双方在经济、政治伙伴、人权等方面互动关系程度很低、互相理解很难，加上俄国遭遇来自中国的其他挑战，如远东移民问题、中国境内安全和周边国家关系复杂，对此俄国要调整对华战略，上层和下层都要灵活务实地适应变化，而不能继续固守传统信条。^②在这种情形下，后苏联汉学研究虽没有苏联时期那种意识形态限制，方法论也有很多更新，但它是根据俄国改革的现实需要而调整的，并非适应国际汉学/中国学在方法论追求细化、在价值观追求中立化等趋势。于是，那些对俄国有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如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变革等成为研究的重点，先后出版了卡尔鲁索夫(В.Карлусов)的《中国的私有企业》(1996)、诺沃谢洛娃(Л.Новоселова)的《中国的投资政治与经济改革》(1996)、冈欣(Г.Ганшин)的《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展与现实成果》(1998)、勃洛赫(О.Борох)的《当代中国经济思想》(1998)、波尔济亚科夫(В.Портыков)的《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政治》(1998)、皮沃瓦洛娃(Э.Пивоварова)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事件探索之总结》(1999)、卡克列夫(К.Какрев)的《香港：中国特区》(1999)和《台湾的政治制度》(1999)

① Михаил Титаренко.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я, Китай и другие страны Азии. М.: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8.

② Dmitri Trenin, *Russia's China problem*,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99.

等等，这些都曾影响一时，及时给俄国社会提供了关于中国改革的重要信息，却因普遍缺乏国际汉学框架和范式，今天看来更多的是史料方面价值。

由此，伴随中国在世界格局变化中的重要性快速增加，俄联邦汉学界相应的从俄国现实发展或历史教训角度关注中国历史或现实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包括齐赫文斯基的《中国走向统一和独立之路：1898-1949》(1996)、伊凡诺娃(П.Иванова)的《中国小党派为民主而战：1928-1949》(1999)、彼得罗维奇(Е.Петрович, 1946-)的《中国：从中世纪帝国到21世纪超级大国》(2007)、巴扎诺夫(Е.Бажанов)的《中国：从中央帝国到21世纪超级大国》(2007)和《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民主政治》(2010)、冈欣《被自由主义所诱惑的中国》(2009)等。其中，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出现了有创见的成果，如第34届(2008)“中国的社会与国家”(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全俄汉学研讨会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所教授卡德尔巴耶夫(А.Кадырбаев)提交的论文《忽必烈汗是征服还是统一了中国？》，重新叙述了关于成吉思汗、南宋和明代之间的历史，论述了因忽必烈汗的战功和治理国家的高超手法，把四分五裂的宋代中国统一成了疆域广大的元朝中国，即得益于蒙古统治，统一的中国才有了可能并得以突然扩大，而不是中断了中国历史。^①此论与俄国汉学界和史学界的通常认识，即所谓中国元朝是蒙古人统治欧亚大陆的一个部分，有相当大的差距。同样，鲍尼(Л.Боны)“中国城乡一体化战略：成就、问题、矛盾(2002-2011)”(《远东问题》2012年第3期)^②能准确抓住期间中国深刻变化之一是急剧的城市化，并认为这一趋势切实改变了中国社会构成，符合世界工业化历史进程，但因这个过程中土地资源被滥用和人力资源转移，使许多农村地区陷入凋敝、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当然，这种不是根据中国学术观点，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不完全为官方意识形态所囿，显示俄国汉学界在中国历史或现实中重大问题上的独立见解，是后苏联时期中国学研究中最有成效的领域，对俄国重新理解中国有很大的帮助。

然而，这种趋势并不能改变其“中国学”结构。按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

① Бокшанин А. (ред.).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xxxix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вып. 1). М.: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АН, 2009. С.56-75.

② Боны Л. Стратегия интеграции города и деревни в Китае: успехи, проблемы,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2002-2011)//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3. 2012г.

所长、《远东问题》杂志主编波尔济亚科夫教授之作“论 2009–2011 年中国对外政治的若干特点”（该刊 2012 年第 2 期）所论，美国之所以调整亚太战略，是因为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警醒了中国人，使之更积极地声索国际权力，这就引发了美国的高度紧张，美国才要加大对亚太地区的各方面部署，以阻止中国影响力的增长。^①

当然，“当代中俄关系及其发展”更是后苏联汉学界的重点论题。而这类研究，同样多立足于从俄国民族主义转化而来的地缘战略角度。1992–1998 年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的内部报告《中国改革：是榜样抑或挑战，还是对俄国的威胁》（季塔连科主编，1999 年）、《中国改革与俄国》（А·克鲁格洛夫主编，2000 年）等，逐渐放弃了苏联时期评价中国的模式，务实看待中国变革，提出为何中国经济改革能取得成效而俄国则相反、中国的改革成就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中国强大如何影响世界等等，并认为中国完成了建设强大国家的任务、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保持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维持了恰当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苏联未能做到的，值得俄国学习。但是，同时又认为，“借鉴苏俄制度”和“受益于苏俄支援”而强大起来的中国，仍提倡适度的集体主义原则，会继续成为超级强国，它是否会对俄国和世界构成威胁，这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此后，库兹涅佐夫（Е.Кузнецов）和古谢沃伊（М.Гусевой）的《中国和俄国：社会经济转型》（2007）、尼古拉耶夫（М. Николаев）的《俄国—中国：从过去的纷争到未来的和谐》（2007）、巴拉莫诺夫（В.Парамонов）的《俄国和中国在中亚：政治、经济、安全》（2008）、卢贾宁（С. Лузянин）的《位于欧亚的俄国与中国：国际—地方的俄中伙伴关系》（2009）等等，同样从俄联邦重建亚太战略的角度讨论俄中关系，而不是基于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理解与信任，来论述俄中在不同领域的竞争和合作问题，因而更多的是现实性的双边关系问题研究。

之所以造成这类状况，是因民族主义在后苏联汉学家那里并没有得到清理，以及少了新闻报刊审查制度的限制，可以尽情地吧俄罗斯帝国认同及其

^① Портяков В. О некоторых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Китая в 2009–2011 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 2012г.

认识潜入在对中俄关系的论述中。其中，那位加列诺维奇教授的《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和中国》(1998)，就体现了这种很强的实践性学科的特点，而不是表明中国学研究的精深。该作认为，中国人是不会忘记和俄国签订的诸多失去土地的条约的，中国当局把 1917 年之前或之后俄国的对华政策理解为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行为，而这种认识充斥于校园、植根于正在成长的中国人的意识之中，结果，苏联对中国的无私援助换来的是中国人的忘恩负义和党政高层的敌视，甚至向赤手空拳的苏联人开了第一枪，而当代俄国人对中国人的成见则是源于华商贸易活动。^①同样，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亚历山大·卢金，因有着强烈的俄罗斯国家认同感，其《俄国熊和中国龙》(1998)缺乏后殖民批评的自省意识，有意无意地掩盖俄中关系中的诸多历史真相，声称俄国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发生过重大战争的邻国，尽管 17 世纪末-20 世纪初有过对立，但冲突称不上是战争，基本上称得上全世界友好邻邦的典范：此论与俄苏在中国攫取大量领土和利益、小平同志关于俄国和苏联的批评意见等，南辕北辙。

更有甚者，2004 年 10 月 14 日，《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最终得以签署，持续了四十余年的中苏(俄)划界谈判有了结果，但俄国汉学界对此却未必是积极赞同的。其中，俄科学院远东所“俄国—中国”中心副主任沃斯克列先斯基(Алексей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1960-)教授曾得到中国政府高度赞许、其本人也得到中国善待(在复旦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研修、现任莫斯科一家孔子学院俄方院长)，却在为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岩下明裕教授的著作《4000 公里俄中边界问题》(2006)俄文版撰写的长篇前言“岩下明裕教授著作中的历史漩涡”中说，《尼布楚条约》是 1689 年俄国“在满洲军队(心理和和肉体双重)压力下”签订的，俄国被迫交出了阿尔巴津(即雅克萨城)以及额尔古纳河右岸、阿穆尔河(即黑龙江)上游和中游直至布列亚河两岸已被开发的土地，从而使俄国丧失了无主的土地和早已被俄国哥萨克部分开发的领土；1858 年签订的《璦琿条约》，使俄国得以收回阿穆尔河左岸地带，“因为这一地区是俄国当时在军事因素的作用下，根据《涅尔琴斯克

① [俄]加列诺维奇：《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与中国》，刘朝平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2 页。

条约》的条款而放弃的”；“《北京条约》的边界条款不能认为是不平等的，因俄国只是收回了阿穆尔河沿岸地带，同时合并了那些重新划界前属于共管、无人居住、并不处于清帝国行政管辖之下的地区”。据此，他批评岩下的著作是有意筛选一些事实、故意回避另一些事实，没有对米亚斯尼科夫的《成文条约所证实的：俄中边界外交史》（1996）、B·特卡钦科等人著作及其所提供的史料予以重视，而这些史料已指出，由于明朝（1368-1644）的扩张，从满洲发展起来的大清帝国（1644-1911）的边界，才得以越出通常被认为是中华帝国北部传统边界的长城之外，清帝国也才不得不与俄国建立联系、确认边界，即中俄两国领土的接壤并非哥萨克侵略所致，而是清帝国向北扩张的结果。此其一。其二，关于1960年代的中苏边界争端，沃斯克列先斯基声称，“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引者注）和札兰纳什科利地区军事冲突升级的责任在毛泽东，是他利用复杂的边境问题，不惜牺牲中国人和俄国人的生命，来满足其政治野心”。1991年5月16日，经过长达近三十年谈判，中苏两国签订了东段边界协定，1992年2月13日俄联邦最高苏维埃高票批准了该协定，1994年9月中俄两国元首签署联合宣言，双方承诺将严格遵守1991年协定。对此，沃斯克列先斯基却声称：“1991年协定签订得过于匆忙”，“该协定在俄国的酝酿，既没有考虑独立专家的意见，也未顾及社会舆论，特别是远东居民的意见。该协定违背了国家的民主规范，当局没有向民众讲清其政治意义，却在手续不全的情况下批准它并使之生效”，由此1999年已有人呼吁“废除”该协定，因为它把大片本来依法属于俄国的领土让给了中国，要求“在滨海地区举行全民公决，以便让滨海地区的居民有机会表达自己对于向中国出让滨海地区土地的态度”。其三，按国际通常看法，1991年协定和2004年补充协定构成了解决中俄东段边界问题的统一的国际法基础，2004年10月14日双方签署《中俄联合声明》指出，“两国就中俄边境两块未协商一致地段的边界线走向问题达成协议，是政治双赢的均衡合理的方案”，但他却声言，2005年6月国家杜马辩论会上有人批评说，这是把哈巴罗夫斯克地区这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边境地段让给了中国，其他与邻国势必会仿效中国“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呼吁国家杜马终

止该协定^①。如此研究，无助于推动两国关系和谐发展，给俄国社会制造反中国的话语提供不确切的理论、信息，更遑论促使俄国自觉实践俄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广中国文化等更高要求了。

可以说，随着汉学研究机构在俄联邦的大量增加，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主要是放弃苏联意识形态)、研究领域拓展等，以及扩大了与中国社会和西方汉学界的交流、加大了对国际汉学研究的关注，如库兹涅佐娃(И.В.Кузнецова)及时翻译了《金融时报》编辑和驻北京记者金奇(James Kyngge)《中国震撼了世界：巨人之崛起和混乱的未来、对美国的挑战》(2006)^②，这些共同促成了中国学的发展，尤其是李福清(Борис Рифтин, 1932-)加大对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搜集和整理、德米特里·沃斯克列先斯基(Дмитрий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1926-)《17世纪文献中的中国：经典文学艺术传统中的历史、哲学、社会存在之命运》(2009)、上文提及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等等，大大提高了后苏联关于“中国”的认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为在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重建过程中注重中国因素，积极顺畅地开展两国贸易、军事、文化教育和科技等方面交流，提供了必要的信心、知识和信息等。但是，俄联邦的中国学研究是在延续既有学术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俄国民族主义视野延续到汉学研究领域是自然而然的，正如“俄国第一位真正的中国史学家”格奥尔基耶夫斯基(Сергей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51-1893)的《中国的生活原则》(1888)招致索洛维约夫写作《中国与欧洲》一样，如果试图超越俄罗斯的欧洲文明论观察中国文明，就会引起俄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激烈反对。后苏联中国学仍充满着以欧洲文明为坐标系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中心论，关于中国的知识继续属于普遍体系之外的地方性知识，除了凸显中国古典文化的独特神奇性之处，现代中国仍然进入不了俄国现代学科体系。而且，

① 参见宿丰林：“关于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历史问题的再探讨：兼评俄罗斯学者的‘新观点’”（《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3期）。西伯利亚联邦大学世界通史教研室主任达秋生(В. Дацышен)教授《俄中战争：1900年满洲里》(1996)、《1900年俄中战争：向北京挺进》(1999)、《俄罗斯帝国汉语研究史》(2000/2006)、《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中关系史》(2000)、《17-20世纪西伯利亚的中国人》(2008)等也有类似主张。

② 但是，译者把原作 *China Shakes The World: A Titan's Rise and Troubled Future and the Challenge for America* 译成了《震动世界的中国》(Китай, который потряс мир. М.: АСТ, 2008)。

如此研究与俄国对中国的认知基本一致，这正是波波夫(Владимир Попов)《沧海一粟：非汉学家论中国》(2002)所强调的，“俄国一向考虑如何快速赶上西方国家，现在应该要关注的不仅是西方，而且还有东方：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有着现实且唯一成功追赶西方的若干案例”，而这类直观印象而非逻辑分析的结论，源自中国作为一只真正的亚洲雄狮(азиатский тигр)，它弥合了其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断裂，避免了社会动荡，虽然就经济发展基础而言，中俄现在处于同一个水平，但彼此发展进程似乎直接对立(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й)。^①这种矛盾性论述，与中国常说的中俄关系存在“互补性”需求相去甚远，并且是相当普遍的认知，库列诺伊(Виталий Куренной)称，“中国是被新俄罗斯思想所征服了的国家(это страна победившей новой русской идеи)”^②；对2012年中国奥运业绩，俄国评价是受益于苏联体制，而忽视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融合了市场经济因素。令人疑惑的是，中国学界至今对俄罗斯问题研究多立足于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积极论述中俄关系的意义、前景，对俄国经典作家关于中国的负面认知普遍少有检讨。

现实化的俄国民族主义：当代俄中双边关系展开的实际困难

既然俄国的民族主义诉求如此强烈，连汉学—中国学领域也无法避免其影响，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俄国当局处理双边关系或内政问题中的中国因素时，或普通国民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就更难避免受到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冲击。问题是，在俄国社会现实中的表现极其复杂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如何在日常生活层面上转化成影响中国的因素？

我们知道，伴随着后苏联的到来，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就被合法化了，俄罗斯联邦自建构伊始便把它作为社会动员的资源，并且在具体的社会进程中，结构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不断、人口下降、车臣问题演化为随时可以威胁俄罗斯族裔居民安全的恐怖主义等，这些都促成了以民族主义为诉求的党团组织不断出现，包括“俄国自由民主党”(1989年日里诺夫斯基创立)、“俄罗斯

^① Попов В. *Три капельки воды: Заметки некитаиста о Китае*. М.: Дело, 2002, С.11-12.

^② Виталий Куренной. *Китай как страна победившей русской иде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2003. №5.

民族共和国党”(1992)、“俄罗斯民族联盟”(1993年康斯坦丁·卡西莫夫斯基创立,负担光头党杂志《在杠杆下》的经费)、“国家—布尔什维克党”(1993年由爱德华·利莫诺夫和亚历山大·杜金创立)、“人民民主党”(1994年创立)、“民族前线党”(1994年创立)、“斯拉夫联盟”(1999年德米特里·杰姆什金领导)、“俄罗斯民族统一”(2000年由亚历山大·巴尔卡绍夫创立)、“自由党”(2001年由尤里·别廖耶夫创立)、“反对非法移民运动”(2002年由亚历山大·别洛夫和弗拉基米尔·巴斯马诺夫创立)、“俄罗斯民族伟大权力党”(2002年亚历山大·谢瓦斯基亚诺夫创立)、“民族—社会主义协会”(2004年德米特里·鲁米扬采夫创立)、“祖国—俄罗斯村社大会”(2006年德米特里·罗戈津创立)等。就在这些俄罗斯民族主义组织不断壮大影响力的同时,战后在英国兴起并遍及西欧、1960年代因欧洲经济衰退而又兴盛起来的“光头党(skinhead)”,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瓦解、苏联解体,在俄国也应运而生——一批青少年在苏联解体过程中为维护俄罗斯利益、保护俄罗斯族裔在独立的俄国的特殊权益,1992年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分别创办《在杠杆下》(Под поли)杂志和“骷髅会(Totenkopf)”,强烈推崇俄罗斯族裔优先论,先后支持叶利钦炮轰议会大楼(议长哈斯拉托夫是高加索人)和对车臣的战争,成员不断壮大、波及沃罗涅什和图拉等城市(1992年莫斯科只有几十人,到1999年超过两千人,到2002年全俄近四千人,2004年达七千人,2009年已近十万人^①)。实际上,“在青年文化中以行动和言语所表现出来的光头党‘风格’、‘意识形态’,要理解他们的具体言行,需要深入其内里:血液、本质、心脏、灵魂”,他们的过激行为中融合着种族主义、新纳粹主义、排犹意识、民族社会主义、白人至上论等,从言论上羞辱和行动上袭击非俄罗斯族裔的国人和移民,“光头党运动一直是后苏联俄罗斯民族主义最具原动力的部分”,它和上述其他党团组织,把国家层面的民族主

^① Тарасов А. Бритоголовие идут// Русский курьер.18 июня. 2004; Скинхеды в условиях внешнего давления: случай Набережных Челнов// А. Веховский (ред.). *Цена ненависти: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и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е расистским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м*. М.: Сова центр, 2005.С.166-174.

义演化成自己的政纲，并视之为解决俄罗斯问题的良方(saviour)。①这种情形当然会给社会关系带来紧张，催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国际社会诟病的民族主义冲突的事件。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06年5月11日刊文“‘俄罗斯民族主义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普京总统以严厉措辞警告”，列举了俄罗斯民族主义伤害外国侨民的各种情形：光头党等组织进行不同方式的暴力活动，外国侨民尤其是来自东方和原苏联国家的移民经常成为其攻击的目标，高加索人由于得不到中央政府和俄罗斯族裔人的信任，也时常受到攻击，如2006年1月莫斯科犹太人教堂有九人遭到袭击。按《俄罗斯民族主义不断上升》（《独立报》2009年5月3日）所说，据俄联邦内务部统计，2008年，有293人遭到种族主义袭击，其中122人死亡，但莫斯科人权办公室主任波德罗(Александр Бодро)认为，这个数字仅仅是冰山一角，而且许多暗杀和暴力案件是由新纳粹团伙组织或委托实施的。的确如此：2009年五一节期间，民族主义者在莫斯科北部若干地铁站举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抗议活动，高呼“移民必须离开俄国”、“俄国是俄罗斯人的俄国”、“不希望莫斯科成为犹太人聚集区，莫斯科现在已经变成了俄罗斯人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的城市，莫斯科是俄国人的城市，它应该始终如此”之类的口号。然而，这种新纳粹行为是有社会基础的，如国家杜马和地方杜马选举，“祖国”和“自由民主党”之类的党团总能借助排外(xenophobia)言行得到相应的选票，从而使这类民族主义组织不断壮大，它们的活动也成为超越个人(beyond the personal)的社会性行为。②

也就是说，合法化了的俄国民族主义，能被政府在国家层面上充分利用，殊不知，此举在加剧俄国和国际社会紧张的同时，也引发俄联邦各族裔的种族主义、促成民族之间矛盾激化，导致“民族主义情感的兴起，可能是对普京执掌克里姆林宫后，以图避免社会断裂这类棘手难题的最大挑战”。③2007

① A. Verkhovsky, “Future prospects of contemporary Russian Nationalism”, In M. Luaruelle (ed.), *Russian Nationalism and the National Reassertion of Russia*,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p.92.

② Hilary Pilkington, Elena Omel’chenko, Al’bina Garifzianova, *Russia’s skinheads: exploring and rethinking subcultural liv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1.

③ Miriam Elder, “Russian nationalism may be biggest threat to Putin’s power, experts warn”, *The Guardian*, 9 Nov, 2011.

年7月底，普京会见青年组织代表时说，“我多次反复谈到民族主义和排外性这一令人不快的尖锐问题。我多次讲过，在俄国这样的多族裔国家，民族主义和排外性的发展极具破坏性，会毁灭我们的国家。奇怪的是，书刊或互联网上常出现宣传纳粹主义的文字”，排外现象变成了大众行为。^①然而，由于俄国的政治结构，在现实生活中，俄罗斯民族主义很少被限制，相反持续得到动员。而当局却往往借助媒体，用其他修辞手段掩饰民族主义的行为及其后果，“普京重新配置政治话语和资源，造成在俄国政治现实中，普京的对手并非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分子或其他政治运动，而是车臣恐怖主义分子、爱沙尼亚法西斯主义分子、格鲁吉亚仇俄人士、乌克兰新纳粹、美利坚帝国主义、西方阴谋者，总之是各种试图破坏、分化、至少是羞辱俄国的非俄罗斯人士。这些人只是逻辑上的普京的对手，并不能组成合法的政治反对派，相反，他们被描绘成是西方的第五纵队，普京称之为潜伏在大使馆周围的豺狼般的间谍”。诸如此类用国家安全理由来描述、限定的政治纷争，自然能唤起俄罗斯民族主义。越来越多的俄国和西方观察家担心，正在兴起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克里姆林宫放松管制而从瓶子里跑出来的妖怪。俄罗斯民族主义或许会从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技术手段，演变为克里姆林宫所控制不了的社会力量。在民族主义形式上，俄国和西方的主要区别在于，当代西方主流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同这个国家有时是很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保持着某种清晰的界线。而俄国社会主流即使谴责种族主义暴力，而谴责本身与背后支持这种暴力的世界观却相关联，这是很矛盾的现象。由此，诸如极端民族主义政治评论家普罗哈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Проханов, 1938-)、新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专家亚历山大·杜金(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 1962-)等发表“俄国是俄罗斯人的国家”之类不适宜的观点，却在俄国电视黄金时段播放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辩论节目中大受欢迎。苏联时代的新种族主义理论家列夫·古米廖夫(Лев Гумилёв, 1912-1992)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民族学主张，认为世界史是由作为宇宙辐射下的生物单位的族裔之兴衰所决定的，俄罗斯族裔也由此而

^① Marlene Laruelle,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Russia*, New York: Macmillan Palgrave, 2009, pp.35-46.

兴盛，论述这种理论之作却成为俄国大中学生必读书目”。^①于是，在 2006 年胜利日阅兵仪式上，普京警告说，“有人在传播种族仇恨、极端主义、排外主义”，却不触及国家层面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在其中的催化剂作用。^②

应该说，西方斯拉夫学界和政界对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如此批评，有其现实意义和理论依据，尽管这是造成俄国和西方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而中国学界很少从理论上进行严肃讨论和批评这类现象，并且中国在俄联邦重建过程中不断发挥作用，却未能赢得俄国民族主义的尊重。苏联解体后不久，中国很多廉价商品进入俄国居民家庭，至少有效地帮助了那些底层俄国人渡过了最艰难岁月；进入 21 世纪以来，俄国人更无法拒绝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包括新年必备的圣诞树和烟花爆竹、市场上 70% 的儿童玩具等等，它们同样缓解了俄国普通居民的生活困难、丰富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些连同中国常和俄国协调一致地对待世界重大事件，却都没能改变俄国仍视中国为竞争对手、“无序国度”的主流民意，更未能促成俄国社会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角度来审视中国，进而影响到两国在能源、劳动力市场开放等方面的有效合作。

不能否认，中国在越来越成为俄国重建过程中的重要因素的同时，也日益成为俄国社会讨论内政外交问题时的关注点，就是上文所及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和意见越来越成为各种媒体的话题。然而，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副教授亚历山大·卢金(Александр Лукин, 1961-)《俄国熊看中国龙》(2003)看来，1996-2001 年间，俄国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的认可度普遍下降，并且降幅很大，以至于“过去的中国”常被忽视，而“现在的中国”被关注是因其负面形象，导致统一的中国形象被分裂成两种，即和气功、武术、佛教、道教、中医等相关联的东方古老文明的神秘主义大国，以及充满着环境污染、沙尘暴、犯罪、偷渡、偷猎、贩毒、假冒伪劣产品、人口膨胀等令人生畏的发展中国家。^③在这样的潮流中，出现了各种诋毁中国的声音：

① Andreas Umland, “Post-Soviet Nationalism and Russia’s Future”, *Global Politician*, Jun. 3, 2008.

② “Russian Nationalism playing a dangerous game”, *The Economist*, May 11, 2006.

③ [俄]亚·弗·卢金：《俄国熊看中国龙—17-20 世纪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刘卓星等译，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7 年，第 283 页。

针对香港和澳门即将回归中国的情境，《苏维埃俄罗斯报》刊发危言耸听之文“北京在收复中国领土，克里姆林宫却在挥霍俄国的土地”（1997年7月1日）说，俄国将很快陷入中国在1841-1894年间不断丧失国土的境地。而《独立报》刊文“伟大邻国的匍匐扩张”（2001年2月17日）称，“上百万中国人在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阿穆尔、赤塔和雅库特等地从事隐蔽和半隐蔽的商业性的犯罪活动……购置大量房地产、雇佣签证过期的非法劳工，从事野生植物的加工、金属和木材运输等活动”，说这些华人在违法数量上高居全部外国人之首，他们正在对俄国进行悄悄而合法地侵袭。至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俄国经济迅速复苏能否促成双方合作问题，2004年5月底6月初，俄国许多电视台播放了记者叶莲娜·马休克摄制的四集电视片《中国占领俄国》却展示出，“中国和任何一个亚洲国家一样，只崇尚武力”，中国经济发展不会给俄国经济复苏提供机遇，相反，富裕起来的中国，“通过移民从俄联邦内部占领俄国，当一些地区的大多数居民是中国人时，他们将会自动获得领土，并推动某种形式的全民公决”。更有甚者，针对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莫斯科真理报》刊文“北京继续租赁俄罗斯百万泰加林：中国人要砍光西伯利亚吗？”（2006年7月26日），把原本双方协商一致进行的贸易活动政治化，声称中国消耗了自己的森林，换来了沙尘暴的代价，现在又要染指西伯利亚森林，莫非也让这里出现类似命运？2008年奥运会、神舟系列飞船发射成功、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重大事件，塔斯社对外新闻稿只是一般性地表示祝贺，俄国各种媒体则对此充满着纠结、焦虑、担忧。曾任《消息报》副主编、1997年成为著名电视文化人的梅列钦（Леонид Млечин, 1957-）执导的文献片《中国：会统治世界吗？》（2012），以黑白和彩色对比的视觉效果，比较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与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后的中国，展示在全球经济危机中，通过学习西方而成长起来的中国，成了西方解决债务危机的希望所在，但保留俄联邦国籍却希望在美国工作的历史学博士兹罗宾（Николай Злобин）、外交学院院长巴扎诺夫（Евгений Бажанов）、政治活动家（首任俄联邦驻美大使、现为国家杜马国际关系委员会委员）弗拉基米尔·卢金（Владимир Лукин, 1937-）以及美籍俄裔汉学家潘佐夫等，作为专家在该片中发表主张，认为未来中国会主导世界，目前统治

世界的中心正从西方转到亚洲-中国，中国将成为世界遵循的案例，俄联邦要反思日益强大的中国对世界的威胁，重建俄中关系。如此塑造中国形象，可以说在俄国有相当的普遍性，甚至像《独立报》和独立电视台这类非官方媒体也经常称，中俄在世界上的角色倒转了，曾经弱势的中国已然成为世界大国，而超级大国苏联则分解成 15 个国家，俄联邦成了中国的弱小邻国，成为给中国提供能源的产地，两国贸易极不平衡。这些言论，正是俄国人所担忧的。其实，在中国尚未壮大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俄国和正在崛起的中国接触，所担忧的最主要危险是相信‘黄祸’(yellow peril)一定会发生。并且认为，若真的发生了，那么俄国的政治、经济和信息情报领域就会强烈丑化中国，说中国要威胁其国家利益，而不顾忌中国对这类表述的强烈反应”。^①如今在俄国，一个缺乏感召力的中国形象仍未有根本性改变！

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上文提及的普京长文“俄国与变化中的世界”，罕见地强调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但同时又声称“会关注中国移民问题”。这种矛盾的说法，隐含着对俄国民族主义的妥协、迎合。俄国自身人口基数小、出生率低并在加速减少，这种状况在远东地区更为突出，需要引进一定数量的移民，方可保证社会的正常发展，否则会损及这些地区居民生活的基本运行。然而，这种形势却刺激着一些俄国人用民族主义视野看待中国，并从中衍生出中国觊觎俄国领土和向俄移民的危机。苏联解体后不久，著名电影导演戈沃卢欣(Станислав Говорухин, 1936-2012)拍摄的影片《刑事犯罪的大革命》(Великая криминаль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93)就发布危言耸听的“数据”说，“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唯一希望就是我们：我们的能源、我们的土地。现在仅滨海边疆区，我们就送给他们 1500 公顷林地和土地——这就是所谓‘修直边界’。来自中国的自然扩张正在进行中(边境人口迅速中国化)。在俄国东部地区有多少中国人？近百万！这还是保守估计”。就是持这样观点的人，1995-1999 年间居然成为国家杜马文化委员会委员，并于 2000 年成为总统候选人。

实际上，“中国移民危机论”并非是后苏联突出现的，而是随着俄国占

^① Dmitri Trenin, *Russia's China Problem*, Washington D.C.: CE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99, p.40.

领越来越多的中国领土过程就产生的。其中，帝俄时代的远东地方官马克西莫夫(Александр Максимов, 1851-1896)，是出版有十卷本《在远东》(На Далеком Востоке, 1898-1902)的著名作家，其《我们在太平洋上的任务：政治评论集》(1894)坦言，来自中国的移民同俄国本地人不同，他们是没有家庭和道德观念的，仇视俄国人，一旦中俄冲突，中国移民会融入俄国，“中国移民熟悉边疆区的每一条小路、每一个山谷、每一条溪流，是俄国人的危险敌人”。^①接着，列维托夫(И.Левитов)出版的《黄种人的俄国》(1901)声称，大量的中国人和朝鲜人移民俄国，“我们看看阿穆尔流域、乌苏里边疆区、滨海州，以及贝加尔湖到满洲边境的整个地区，俄国居民极少。他们只是许多黄种人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黄种人的浪潮会淹没俄国”，出现了“黄种人的俄国(Желтая Россия)”，确信“黄种人的危险(Желтая опасность)”^②——挪用法国殖民主义经济学家罗伊-毕尤列(Leroy-Beaulieu, 1843-1916)最先提出而遭受世人诟病的概念。到了1908年，时任大臣会议主席的斯托雷平(Пётр Столыпин, 1862-1911)，在国家杜马发表演说公开声称，“俄国遥远的边境地带自然条件严酷，却很富足：盛产黄金和木材、毛皮，拥有大片适合耕种的土地。如此一来，在存在一个人口稠密的邻居的情况下，先生们，这个地带就不能荒芜着。若俄国人不赶在前面，外国人就会渗透进去，且这种渗透已经开始。若我们仍昏睡不醒，这片土地就会被外人的血汗所浇透，等我们醒来时，它或许只是名义上是俄国的”，而且诸多措辞直指中国。^③其实，19-20世纪之交，俄国加大资本主义改革，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和资金，但面对着这样的形势，俄国政界和学界人士却还要妄说贫弱到极致的中国在威胁俄国。而且，阿穆尔流域和滨海地区的当局此时还分别出台法律，禁止外国人购买俄国土地，俄中央政府也出台了禁止外国人从事官方工程承包之类的法律，以图阻止来自中国的居民和资金参与俄国的经济活动。即便如此，库洛帕特金将军《为俄罗斯人而存在的俄国：俄罗斯军

① Максимов А. Наши задачи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Полит. этюды. СПб.: тип-лит. и фототип. Бабкина, 1894. С.25.

② Левитов И. Желтая Россия. СПб.: тип. т-ва А. С. Суворина, 1900. С.50.

③ Петр Столыпин. Нам нужна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ечей П. А. Столыпина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е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совете, 1906-1911). М.: Книжный клуб Книговец, 2011. С.400.

队的任务》(1910)已凸显俄罗斯人的俄国之伟大性、俄罗斯作为伟大俄国的责任,其《俄中问题》(1913)则把这种情怀转移到中国移民问题上,称“若废除俄中边界,许可中国人和俄国人一样自由出入西伯利亚,那里很快就有可能中国化,而俄国人则要移居到乌拉尔以西的地方”。^①这类声音在帝俄经济发达、中国处于风雨飘摇状态的1910年代很流行,今天看来令人疑惑。

问题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是逐渐融合其他55个民族的,而非短短二三百年的时间强制其他民族进入中国版图的,因而人口基数大,正常情况下人口出生率也就高;俄国则因帝国急剧扩张而成,并以帝国方式治理,大量人口损失于帝国扩张和治理中,因而人口总量底,这原本是互不相干的两回事,俄罗斯民族主义却硬要把它们联系起来,甚至历经苏联时代这种关联性认知也未有根本性的改变——“国际共产主义”并没有脱离苏俄的国家利益,中国人口和移民问题常成为苏中意识形态对抗中的话题。苏联许多机构在没有掌握中国移民确切数据的情形下,就夸张性地谈中国移民威胁苏俄,尽管苏联时期连管理移民的机构也不健全。^②在民族主义合法化的俄联邦,自然就会延续这种中国移民及中国觊觎俄国土地的危机论:1994年5月,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领导人向宪法法院提出动议,要求取消《中苏国界东段协定》;1995年,议会上院副主席要求杜马重审俄中东段边界协定;1995年2月,滨海边疆区杜马主席要求政府停止东段边界勘界工作。尤其是,日里诺夫斯基在滨海边疆区视察时公开说,若是他的自由民主党不监督政府,就不可能有人来阻止中国人对该地区的入侵,“不久之后,你们将不得不选举中国人当总统,并被迫学习汉语”(《符拉迪沃斯托克新闻》1994年8月5日)。他还不顾中俄两国政府积极推动双边关系并取得许多成效的实际,坚称当代俄国的主要敌人就是美国和中国,“中国计划分阶段侵占俄国150-250万平方公里至750-1500万平方公里土地,包括乌拉尔在内。因为亲西方的政府活动,俄国的边境将有可能被工事严密的新界所取

① Алексей Куропаткин.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пб.: тип. т-ва А. С. Суворина, 1913. С. 96.

② Савенко Ю. Антикитайский синдром. Россия оказались лицом к миру с динамичной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ой Азией// Новое время. 3 авгу. 2003. №31.

代，这条新界就中国而言是以乌拉尔山为界”。^①

然而，这类主张和相关的一系列限制包括华人在内的外国移民法律法规，却未能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激活俄国经济，相反，一旦禁止中国劳动力和商品的输入，这些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生产力发展速度、经济运行等，无不受到冲击。就在中国移民为俄联邦初创时期付出艰辛之际，1995年6月28日卡耐基莫斯科中心举行的主题为《后苏联地区的安全和民族一体化问题》研讨会，诺索夫(М.Носов)发表报告《俄国的远东和中国》，列举来自中国移民的种种威胁，又无意中透露出中国人及其所输入的商品如何改变了远东居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其实，俄国由于其自身的人口结构带来的问题，的确需要大量的移民，但移民的主要来源是原苏联的中亚和高加索地区，而这些移民把在俄国就业所得的资金汇回国内。中国并不是主要的移民来源地，然而俄国社会一些最具影响力的主流媒体却不这样认为。《独立报》不断刊文负面讨论中国移民问题：“把中国人赶出门外，他们又挤到窗口”（2000年4月18日）声称，不计其数的黄皮肤华人在开垦远东国境线的全部土地，悄悄地进军俄国东部地区城市：“是的，我们是亚洲人……”（2002年8月6日）甚至说，中国就业压力很大（失业人口达两亿），“到2010年，在俄的华人达到近千万。若这个预测准确，中国人就是仅次于俄罗斯族裔的第二大民族……中国移民的大量进入，会同化当地居民，迟早会使中国目前的领土扩张成为现实”。同样，《消息报》刊文“中国人口”（2005年12月12日）称，“媒体引用知情者数据，现在俄联邦境内的华人有300-1200万，远东的华人过半是非法滞留的，他们用旅游签证合法入境，过后就‘不回家’了”。此外，光头党和自由民主党组织要求俄国延续苏联的签证制度，把几百万侨民驱逐出去（故意使用有贬义的德文词“外籍工人/Gastarbeiters”的俄语音译）。尽管这些右翼组织的主张长期困扰当局，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但仍有很大的社会号召力^②，更不要说上文提到的索尔仁尼琴《崩溃中的俄国》中关于中国移民的危言耸听之论了。

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媒体还把俄国内政与中国移民问题联系起来。2005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Лукин. Эволюция образа Китая в России и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ый запас. 2003. №.3(29).

② Shaun Walker, “The rise and rise of Russian nationalism”, *The Independent*, 3 May, 2009.

年9月5日，普京在政府、议会和地区领导人联席会议上发表关于国民优先工程的报告，即实现国民健康、高质量教育和舒适住房等目标，同时解决人口递减问题。第二年6月5日，普京发布国家鼓励生育的计划，即增加生育津贴、提高妇女生育期间的待遇、保障儿童受教育的经济基础、建立母亲基金(25万卢布)等。然而，《事实与论据》周报(2006年12月20-26日)却“及时”刊发了佐托夫(Г. Зотов)文章“地球会让几十亿中国人挤满吗？”说，“据权威数据，到2057年，地球居民至少一半是天朝帝国的公民(граждан Поднебесной)(故意使用旧俄语中对大清帝国的戏称)。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究竟要去哪儿？”还说因为在中国生二胎就要罚3000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收入的中国家庭的两年收入，但中国人还是要生孩子，尽管中国人口数量庞大，莫斯科地铁高峰期的拥挤远不如上海地铁，“如果怀的是女孩子，那就做人流”(если в животе девочка---делают аборт)，现在他们得知俄国政府出台奖励生育二胎的政策(每年1万美元)，就会趁机而入。作者还举例说，他在王府井大街上碰到的一个十来岁模样的小学生说，“爸爸妈妈答应，我们要去俄国，在那儿给我生一个小弟弟，还能得到不少钱”。作者由此断言，“用别人的钱解决自己的问题——简直是独创(оригинально)，但是中国人似乎就能够这样”。更有甚者，面对人口危机越来越威胁俄国如何存在下去的严重问题，有杜马议员、社会学家提议，若不愿意看到50年后让中国人居住在俄国的情形，就应该选择多妻制(многоженство)。而如此危言耸听之论却在另一份著名报纸《共青团真理报》上得到回应——在头版上使用巨大标题“莫斯科流行多妻制”，并配以相应的图片(2006年7月29日)。^①这种论调至今亦然，仅《远东问题》2012年所发表的诸多文章就显示出这种倾向：拉林(А. Ларин)“在俄国的中国移民和北京政治”(第1期)声称，中国极力稳固和扩大在俄国劳动力市场上的移民数量，并呼吁移民遵守俄联邦法律，以免遭受俄国强力部门和民族主义分子攻击^②；拉林和扎列斯卡亚(О.Залеская)的“中国在俄国远东的移民(1917-1938)”(第3期)进一步认

① В Москве эпидемия многоженства//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29 июля. 2006.

② Ларин А.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в России и политика Пекина// ПДВ. №1. 2012.

为，现在远东地区出现大规模的中国移民潮，只是历史延续而已^①；帕纳马列娃(А. Понамарева)和帕纳马列夫(С. Понамарев)的“俄罗斯国家安全语境下的中国移民：发展趋势和前景”(第4期)，夸大中国移民的数量，并认为中国政府把移民到俄国作为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②

本来，人口移动是全球化时代的常见现象，资金移民、教育移民、智力移民等成为许多国家发展的动力之一，并且尽力做好新移民和所在国居民的相互认同工作。而俄联邦因为自身问题和发展所需，同样需要移民。2003年普京的国情咨文就触及俄国人口问题说，不仅要靠提高出生率，更需要解决合法移民问题，“最近十年来，共有近七百万人来到俄国——主要是来自独联体国家”，由此对俄国境内一百万国籍有问题的人，“需要有效的移民政策，需要对国家有利、于人民方便的移民政策，特别是对独联体居民有利，要对那些亲近我们和我们相互了解并讲同一种语言的人有利。这是与我们有着共同俄罗斯文化的人民”。^③2005年普京的国情咨文再次重申，“国家人口的增长，必须辅以完善的移民战略。我们需要业务熟练的合法劳动力。但俄国不少企业主至今仍在使用非法劳工，因为这些无权的劳工更容易剥削”。^④由此看来，规模并不大的移民问题，是很容易通过调整政策来解决的。而且，这也成为一些有识之士的共识：叶利钦总统国策顾问派因(Эмиль Паин, 1948-)曾著文“阿穆尔河畔的非法居留者”(《消息报》1997年5月6日)称，俄国的反华情绪是苏联时期的恐惧和偏见之复活，而1990年代俄中贸易，尤其是中国移民，乃是远东消费市场的救生圈；此外，弗拉基米尔·卢金之作“俄中战略伙伴关系：预测的现实”(《远东问题》1997年第3期)、特列宁的《俄国的中国问题》(1998)等等都指出，俄中各自遵守签证制度和维持边境秩序，在俄国的华人有几百万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上文论及的季塔连科的《远东的地缘政治意义：俄国、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在谈到中国移民问题时也说，中国移民在俄国被政客人为地政治化了，实际上在俄国

① Ларин А. Залеская О.В.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1917–1938 гг.)// ПДВ. №3. 2012.

② Понамарева А., Понамарев С. Китайская иммиграц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тенденц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ДВ. № 4. 2012.

③ 《普京文集(2002–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3、30页。

④ 同上，第193页。

的中国人仅二三十万人。换句话说，若能考虑如何放弃或缓解民族主义诉求、通过政策促成移民对俄联邦的认同，不仅不会造成新移民和当地居民关系的紧张，反而会使中国移民变为俄国发展的内生资源。

同样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增加，在俄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中，越来越视中国为竞争对手，在世界各地与中国争夺战略利益。早在 1998 年，卡耐基研究中心由加内特 (Sherman Garnett) 负责的俄中关系研究小组提交的报告《有限的伙伴关系：变革中的中亚的俄中关系》(Limited Partnership) 就已看到，以不同方式转型的俄国和中国，在中亚地区和能源领域未必是合作关系，而是竞争性的，明确断言俄中关系之于俄国的意义是有限的。^①而这种政策性研究，并非只是研究者一厢情愿的担忧，而是社会性的认知。其中，著名政治学家赫拉姆奇辛 (Александр Храмчихин) 的黑色幽默“2017 年” (《旗》2006 年第 11 期)。该作虚构了一部没有具体人物的未来寓言：2007 年，俄国依据 2002 年合同加紧为中国生产 8 艘核潜艇，此举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军力，沈阳军区用这些武器对抗远东，北京军区对抗西伯利亚，“同时，大量中国人移民到西伯利亚，与当地俄联邦公民竞争，结果，从远东到贝加尔湖全部变成了中国移民的领地。中国是不管移民回迁的”，“(到)2017 年新年，在西伯利亚和远东一些地方发生了中国移民与当地俄国人冲突的事件，若干中国人死亡。这是中国移民为捍卫自己的生活 and 恢复 1689 年尼布楚条约以来中国领土完整，自然发生的”。第二天，北京要求俄国政府保护在俄联邦的中国公民，没有等到答复(这一天是周末，俄联邦公务机关是不上班的)，北京就宣布用自己的军力来保护。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组成 30 个中国步兵师渡过阿穆尔河来到这片地区，与被俄国当局监控的此地中国移民里应外合。中国空中陆战队为了“保护华人和捍卫领土完整”而占领乌兰巴托。由此爆发了中俄军事冲突，俄国出动高射火箭兵团、苏-27 战机、摩托化师应战。随着战事进展，俄国被迫进行军事动员，但兵役委员会工作瘫痪，以至于到 1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并继续往西进攻托木斯克、新西伯利亚。至此，俄国失去了 3/4 疆域，俄国领导人只能用所

^① Галенович Ю.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конец хх-начало ххi в.). М.: ИДВ РАН, 2007.

剩无几的欧洲部分国力来阻止中国的西进。无果，只得在 14 日动用核武器袭击中国西北最大的城市乌鲁木齐。而中国同样用核武器报复了下诺夫哥罗德和日热夫斯克，俄国许多城市的居民纷纷西逃。俄国军方阻击中国无济于事，克里姆林宫被迫寻求美国帮助，美军陆战队登陆秋明州、雅库金和萨哈林。但中美之间很快就如何瓜分俄国领土和资源进行谈判。作者最后断言，“没有政治家信任莫斯科，那些希望来俄国休养生息的人，会逃离俄国。相应的，不要对乌鲁木齐、日热夫斯克和下诺夫哥罗德使用核武。结果已经不会改变”。如此不合文学或其他文类的妄想，居然能刊发于俄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杂志《旗》上！

其实，不仅是政治学者这样悲观，俄国各方面精英在双边关系框架下审视俄中关系时，对其未来走向普遍不乐观，而在把中国纳入俄国所建构的世界战略格局时，俄国公共舆论更是凸显中国之威胁，尤其是不顾俄国为了发展经济而需要引进外资进入能源开发领域。2002 年俄国计划出让斯拉夫石油公司股份，中石化参与竞标，但俄第一副总理涅姆佐夫援引国家杜马中一些党团的主张说，“不能把战略资源卖给外国人尤其是不能卖给中国人”，结果斯拉夫石油公司被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和秋明石油公司收购。此举不仅直接导致俄联邦减少 10-20 亿美元收入，而且恶化了俄国内能源市场秩序。历经多年艰难谈判，2006 年俄国政府决定把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延伸到中国，俄国石油公司和中石油签约合资共同勘探和开采俄国境内石油，在中国建加工厂并在中国出售加工产品。但多年过去了，管道已建成而炼油厂项目至今仍未见到最终结果。中俄能源合作及其障碍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热点，而且乐观其成者甚少。关键性的障碍不仅仅是中国希望按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价格获得俄国能源，而俄国则要求按接近国际能源价格出售，更在于俄国用民族主义意识对待中国能源紧张的事实和趋势，意外地呼应了中国扩大能源渠道战略的高瞻远瞩。^①不仅如此，这种民族主义意识还延伸到其他领域。《消息报》刊文“中国将夺取西伯利亚水资源”（2005 年 9 月 14 日）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又人口众多，必然导致中国觊觎水资

① Linda Jakobson, *China's energy and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Russia: hopes, frustrations and uncertainties*, Stockholm :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11.

源丰富的俄国，要从西伯利亚掠夺水资源，后果是俄国有可能百万人缺水，数十家企业停业；更有甚者，《独立报》发文“天朝帝国的水政治：中国掌握的亚洲地区水控制”（2006年9月13日），用“天朝帝国(поднебесная)”概念指称中国，以凸显中国霸占全球水资源的“意向”，认为“水政治(гидрополитики)变成了当今地缘政治和地区冲突的重要手段”，“在这种语境中，中国处理和周边国家，尤其是和东南亚国家、西北交界国家的关系时，会特别充分运用水政治的手段”，因为到2015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会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而出现水资源紧张的情况，而中国是这个地区的水源国，中国自然会利用跨境水资源国的优势控制这些地区。既然是这样认识中国，那么一方面，俄国东部开发战略根本就不可能是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下进行，而是要引进欧盟、印度、日本、韩国、朝鲜等，以图降低中国在俄国远东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俄国还会延续其由来已久的帝国战略，对符合其全球战略要求、却会危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地区事务，也不会顾及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其中，2012年4月初，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企业，接受越南许诺的条件，与越南国家油气集团公司签署合作开采南海两个大型天然气田的协议，俄方将拥有合作项目中49%股权，并辩解说俄方完全是经济行为，不应该将其政治化。俄还提出希望沿用北极模式(谁先占有就归谁)解决南海争端问题，向越南出售“苏-27”、“苏-30”战机，提升越南在南海的战斗力的等。

可见，在现实层面上，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远远不敌俄罗斯民族主义及其引发的俄罗斯认同、国家利益至上等民族主义潮流的侵袭。这种态势导致俄罗斯民族主义组织和东正教信仰者指责中国快速发展经济是过于资本主义化，壮大的中国会从地缘政治上威胁俄国，出现上文论及的日里诺夫斯基所声称的“今天俄国有两个最主要对手是美国和中国，他们想消灭我们”。因此，尽管普京“俄国与变化中的世界”轻描淡写地说，“不是说我们和中国之间就没有问题。仍存在着这种或那种粗糙之处。我们在第三国的商业利益远没有协调一致，我们尚未完全安排好商品流通结构，在低水平上相互投资。我们会关注中国移民问题。”但我们还是可以明白，只要俄国民族主义被政府动员、社会进程所利用，俄国就无法切实落实与中国的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自然也就会出现季塔连科所说的那种矛盾，即“当代俄中关系最大的困难，在我看来，就是加深信任。对这个问题，按俄中一些专家的共同意见，就是因彼此缺乏信任的坚实基础，故出现‘上层关系火热，而下层冷淡’（отношения наверху горячие, а внизу-холодные）的状况，文化领域的交流甚少且很不深入，普通民众对战略伙伴的成就知之甚少。俄国远东许多人不知道作家鲁迅和艺术家齐白石，不清楚邓小平和秦始皇。而中国许多人知道的只是一些苏联歌曲，记得的还是苏联的一些电影，对当代俄国则不了解；青年人之间的关系，远不如老年人之间那样密切。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邻居的理解、对邻居形象的塑造，与我们两国之间所需要的真正信任关系，根本不匹配。人们之间彼此的隔阂在加大，人们之间的关系停滞不前，有时仇恨还会增长。在中国，有人认为，俄国有着‘来自中国威胁的神话’，‘黄祸危险神话’和‘中国扩张的神话’；在俄国，也有对应的说法”。^①其实，具体的情况远比这复杂：中俄彼此陌生、俄国对中国缺乏信任，更重要的是，俄联邦立足于在俄国民族主义基础上重建帝国，而不是建设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这就导致中俄之间除了在经济方面浅层次的互补之外，在更大的国际战略层面，在俄国看来是彼此竞争的。^②在如此背景下，一年一度的俄中联合公报/声明所产生的实际能量，远不及中美之间没有这种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正常的国家关系之成效；尽管汉学研究已有很大进步，也很难促使俄国社会积极、正面地看待中国；尽管中国努力通过经济互惠和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加强协调来加强中俄关系，却没能使俄国去建构有亲和力的中国形象。要成为世界大国和强国的导向，影响了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华的具体决策。

总之，在地缘政治上，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比起苏联时代，更能正视俄中关系的客观重要性，双方在诸多领域存有一定的互补性协作；1990年代末以来还认识到俄中同属转型国家，经常面临着发达国家挤压。因此，两国

① Титаренко М. (ред.).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условиях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М.: ИДВ РАН, 2005. С.12.

② Nidhi Sinha,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Russia and China, 1985-2000: a comparative analysis*, VDM, 2010.

政府适时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框架内、二十国集团以及其他国际性或地区性组织内加强合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然而，中俄关系却未能如风雨兼程的中美关系那样深刻影响到彼此的生活。其中关键原因之一是，俄中关系需要经由俄国民族主义框架的过滤。尽管经过了罗斯—俄罗斯帝国—苏联—后苏联的漫长变迁历程，但俄国至今也很难说已经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洗礼。这就使得融合了俄罗斯东正教信仰和帝国诉求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因其渗透入各类经典作家文本、大众的社会观念、国民的审美方式等各方面，并且少被检讨、批判，反而进化为俄国认同的重要来源，成为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重建过程中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普遍的社会共识。造成这种情势的原因，首先是因俄罗斯民族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俄国当下正在兴盛的民族主义根源于苏联之前、苏联和后苏联：好几个世纪之前就出现的莫斯科—第三罗马，是世界历史上一种特殊的俄罗斯使命；1930年代之后，俄罗斯民族主义始终是苏联意识形态中与西方信仰相对抗的重要因素；今天的各种俄国民族主义运动理念经常源于西方，类似于19世纪初，渗透有现代文明中心论之嫌”。^①进而，政府能自如地把民族主义作为行政动员的庞大资源，议会党团和社会团体用它来标示自己的爱国，学术界积极发掘其历史遗产，媒体和社会又热衷彰显之。在这种民族主义的氛围中，那些积极论述中国文化意义的主张，包括1833-1849年间任国民部部长的乌瓦洛夫伯爵(Сергей Уваров, 1786-1855)、斯拉夫派理论家霍米亚科夫(Алексей Хомяков, 1804-1860)和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等，曾通过研究中国文化来反思西方及俄国学习西方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实际上之于俄国是很有价值，却很少得到切实重视。例如，托尔斯泰“中国的贤哲”就认为，中国是不追求“进步”而贴近大自然生活的国度，“中国人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不像我们欧洲人。他们知道我们为何生活，但不仿照我们的生活。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更好。他们以非同寻常的劳动技术，和在一小块土地上劳作，却生产出比我们在大十倍的土地上更好、更多的东西”^②；其“进步和教育的果实”(1862)更是认为，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土地上养

^① Andreas Umland, “Post-Soviet Nationalism and Russia’s Future”, *Global Politician*, Jun.3, 2008.

^② 《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70页。

育着几亿人口，这个事实足以驳倒所谓的“进步”理论；其“何谓艺术？”（通常汉译“艺术论”）通过中国儒家的审美观和诗学，看到 19-20 世纪之交西方的现代主义和颓废主义带来文学艺术的伦理道德退化，看出了贝多芬音乐和莎士比亚戏剧所表现出来的市民道德危机。然而，在俄国民族主义主导的俄联邦社会进程中，这些经典作家关于中国和东方的正面论述，在后苏联时代未能充分转化为俄国探索和发展俄中关系的精神资源；其他一些经典作家创作中所张扬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情愫，反而成为主流社会的国家认同、民族历史自豪感、国家利益至上之根据。相应的，政府和圣主教公会通过“复活”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时期那些所谓“俄罗斯民族英雄”，以增强俄国人的自豪感，而有些“英雄”曾严重伤害中国、俄国远东地区亚洲族裔居民。更有甚者，有的俄国人还激烈批评中华民族主义已成为 1990 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认为大汉族主义导致了在中国诸多地方的族群冲突，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威胁到俄国和世界。^①在这样的氛围中，俄方实施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及中国的期待那就自然而然了；而且，俄国的深层文化原因、制度性保障，俄中关系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因素，切实左右着俄国社会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即使当局出于战略利益考虑，把中国纳入其双边关系的“优先方向”，也只是在特殊时期生效（如在阻止西亚北非动乱局势的蔓延过程中，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挥了超常作用），致使俄国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与中国的期待和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实际要求，相差甚远。

意味深长的是，对俄联邦的社会建构作用甚大的中国，在俄国获得这样的境遇，与俄国的整体社会进程却是出乎意料地一致：俄国有着丰富的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种自然资源，有可用于现代化问题思考的丰厚的人文资产，有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最丰富的外源性现代化经验，也有追求融入现代世界的民意等，却因为强大的民族主义思潮，没有培育出接纳中国和世界的国家胸怀，成为受全球化冲击最大的国家之一，以至于俄国民族主义在实践层面折损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实际成效，堪比在俄联邦进程中，国民和国家实际获得远不及东欧一些国家融入欧盟那样明显。如此一来我们可以

^① 参见 Москалев А. Проблема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в КНР. Сб. Восток-Россия-Запад: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 Памятник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1. С.508-525.

说，20年来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只是在军备贸易、边境划定、处理一些重大国际事务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在移民、双边贸易、能源合作、华商利益保护等现实性问题上解决得并非如意；至于如何建立统一的市场，以及在关税、货币等方面开展合作，尤其是建立自由贸易区、推动经济一体化、构建类似欧盟那样的合作机制等，将是更遥远的话题。^①

当然，本文无意否定俄国历史进程以及在俄中双边关系上双方所做出的努力及其成效，正如俄国那些伟大作家深切期望自己的国家能更好地对待国民、积极建设社会、改善制度方面的不足等等，从而深刻叙述各自所理解的“俄罗斯问题”，而特别敬重列夫·托尔斯泰之类伟大作家的本文作者也期望俄联邦能更好地认识“中国问题”和“俄国问题”，并通过克制和克服不同层面的民族主义，以切实深化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包容全球化时代五彩缤纷的世界、不同于俄国的中国。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s of Peter the Great, Czars of Russia started enforcing Western models of social development eagerly and rapidly, thus making Russian a strong and prosperous empire. This stimulated Russian elites among high levels of society to make every effort to build a powerful Empire, and created tremendous pressure on the lower classes and the intelligentsia and brought up strong appeals for “Russian nationalism”. But the huge Russian Empire started its rapid formation after a large-scale expansion in the 17th century which led to the pluralistic ethnic composition in its territory and religious complexity of its population. For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this country, Russian nationalism was promoted by the Empire to the level of a national ideology named “Russian nationalism”. The Russian Empire became stronger after incorporating some aspects of modern European civilization and at

^① 参见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经由和谐发展走向地区稳定：‘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用提纲”，《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4期；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21世纪的中国和俄罗斯：地区挑战与机遇——‘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提纲”，《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

the same time more territory-disputes with China occurred, there were complex collision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on cultural attribution, values, identity, spiritual pursuit and so on. Therefore, Russian nationalism became one of the important bases for understanding China problem and dealing with Sino-Russian relations during the Imperial Russia and the Soviet era.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ssia in post-Soviet period, Russian nationalism was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which was as well extended to the field of Russian-Chinese relations: Russian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Russia is not a temporary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understanding, attitudes, emotions, evaluation of China, but represents conscious acts that have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basis, including China's image shaped by the mass media, Sinology research in intelligentsia circles, understanding and handling of the Russian-Chinese bilateral relations by politicians. These acts are not limited by the Sino-Russian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but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cultural and spiritual spheres it leads to the damage of China's hope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Sino-Russian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Key Words】 Nationalism, Russian Empire identity, sinology studies, bilateral relations

【Аннотация】 Со времён реформ Петра Великого царские династии усиленно и быстро внедряли западные модел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 целью укрепления и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ния процветанию России. Это стимулировало хороше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высших слоёв обще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однако оказывало огромное давление на низшие классы 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ю, и породило глубокие потребности в «русском национализме». Однако огромн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 стала быстро формироваться после масштабной экспансии в 17 в.,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плюрализму этнического состава и сложности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населения страны, для эффекти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этой страной рус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новь был возведён империей на уровень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ологии под названием «рус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Русская империя после принятия некоторых аспекто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стала ещё более сильны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и стало происходить всё больше и больше споров с приграничными территориями и Китаем, происходили сложные столкновения с Китаем в сфере культурных атрибуций, ценностных ориентаци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ей, духовных потребностей, рус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период рус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и советских времён превратился в один из важных факторов понимания проблем Китая и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этот национализм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ой из важных движущих сил, а такж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ился на сферу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рус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является далеко не временным эмоциональным выражением поним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 эмоций, оценки Россией Китая, а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созн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имеющие под собо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ания 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ую базу, в том числе имидж Китая, сформированный в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си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кругах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понимание и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политик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Эти действия не могут ограничивать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 этим в культурной и духовной сферах они приводят к крушению русскими надежд китайцев на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всесторонне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Национализм,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и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двусторонние отношения

(责任编辑 陈大维)

日本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二手车交易研究*

阎德学 黄灏**

【内容提要】日本是汽车生产大国，日本生产的汽车在质量、性能、节能环保等各方面均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当前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大量消费日本汽车。同时，日本的二手汽车也因自身质优价廉的特点，在国际市场上备受青睐。特别是对于汽车产业尚未实现现代化的俄罗斯来说，日本二手车更是一度成为俄罗斯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绝大多数居民的首选。然而，俄罗斯为了本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多次提高进口汽车关税，推行贸易保护措施，加上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使得日本二手车的对俄出口陷入困境。目前，日本二手车的对俄出口正处于一个逐步恢复的阶段，但是昔日的辉煌似乎很难再现。不过，由于俄罗斯汽车产业的现代化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可以预见在俄罗斯完成汽车产业现代化之前，其远东地区仍将是日本二手车的重要出口市场。

【关键词】日本 俄罗斯远东地区 二手车出口 汽车产业政策

【中图分类号】F470.472(51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4-0156-(36)

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寄予了较多关注，准确地指出俄罗斯内政外交存在的问题，像是在为俄罗斯体制转型把脉，并为其开出

* 本文为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第四期研究项目“日俄经贸关系及日本对俄战略”的阶段性成果。

** 阎德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黄灏，华东师范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2009级本科生。

疗病药方。进入21世纪，日本对于普京的执政，更是表现出一种赞许的态度。日本似乎寄予某种期待，或许想趁着俄罗斯在社会体制转型、经济一度陷入困境之际，利用其迫切期望得到经济和技术援助的心理，顺利解决横亘在两国之间的北方四岛领土归属的难题。但是，自2006年起，日本《外交蓝皮书》第一次将“北方领土问题与和平条约谈判”列入“日俄关系”的首要问题进行阐述：“关于日俄间最大悬案的北方领土问题，在迎来战后60年的今天，两国的立场存在隔阂。日本政府坚持一贯方针，即，解决日本固有领土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之后，再缔结和平条约，以此实现日俄关系的完全正常化；日本将继续与俄方进行不屈不挠的谈判。”^①其后，俄总统的登岛视察愈发加剧了两国间这一结构性障碍。然而，正如中日关系当前处于“政冷经热”的状态，目前的日俄关系也可以用“政冷经热”来形容，尤其是日本向俄远东地区出口二手车堪称一个典型案例。

日俄两国虽然存在领土争端，然而日本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二手车贸易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反而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犹如迸发的火焰直冲云霄。2008年，日本更是创造了对俄出口56.3万辆二手车的年度最高记录。其后，由于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俄罗斯采取提高进口二手车关税的措施，日本对俄出口的二手车数量骤减，2009年当年的交易量只有5.3万辆，不足2008年交易量的1/10。近年来，日本每年向俄罗斯出口二手车的数量均在10万辆以上。虽说昔日的辉煌早已成为不可复制的美好回忆，但是目前的状态亦可谓回归到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阶段。

当前，为了实现国内汽车产业的现代化，俄罗斯也采用了当初日本汽车产业发展的路径，积极引进外资以及美欧日等先进的汽车技术，并采取政府补贴、贸易保护，通过提高关税等手段来限制日本等国的二手车进口，发展本国的汽车产业。然而，俄罗斯能否顺利完成经济上的“结构改革”，实现包括汽车产业在内的现代化目标，是一个值得长期关注的课题。

本文由以下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日本二手车的海外出口所作的综述研究，主要介绍日本最初向苏（俄）出口二手车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阐述

^① [日]外务省：《外交蓝皮书》（2006年版），第二章“地区国别外交”部分，参见日本外务省网页，<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

日本对俄出口二手车的市场变迁以及对俄出口骤减的背景因素。第三部分重点分析日本二手车对俄出口的市场前景,包括日本二手车的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市场、俄罗斯汽车产业现代化以及日本二手车对俄出口的最新形态和动向。最后从日俄两国现代化的相似经历来预测俄罗斯汽车产业的现代化前景及其对于日本二手车出口的影响。

一、日本二手车的海外出口

(一) 日本二手车出口简史

日本是汽车生产大国,新车生产数量一度占据世界新车产量的三成,而且日本汽车的性能、质量和节能环保已得到世界公认,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在大量使用着日本品牌的汽车。同时,日本二手车在国际市场上也颇受欢迎,主要原因是其良好的性能为世人所认可。譬如,同一品牌的日本汽车,比起海外工厂生产的汽车,人们更认可在日本国内经日本工人之手组装起来的汽车。而且,日本人使用汽车较为爱护,与欧美国家的二手车相比,日本二手车受损较少,品质更优。^①此外,日本二手车价格便宜,车内配置更为丰富,状态良好,车龄不长。比如乘用车的使用年限,日本是9.96年(2000年)^②,美国是14.5年(1997年),瑞典约17年。因此,日本二手车更受海外市场的欢迎,出口到全世界160多个国家。

然而在日本,直到1995年5月之前,凡是价值超过5万日元的二手车,都会成为出口贸易管理规定的指定商品,只有根据有关规定,接受日本汽车评定协会的检查,并获得该协会认可的二手车出口检查标准合格证之后,才能得到通产省的出口许可。观察该协会的二手车检查数量(参照表1),可以看出,自1975-1987年,日本二手车的出口最多不到6万辆,而在1988年之后剧

① [日]日本横滨贸易株式会社“海外市场”主页, <http://www.jpucar.com/export/market.html>

② 在日本,二手车一般要根据车龄来分类。依据新车上牌登记后的使用年限,分为老年式(1-3年)、中年式(3-6年)、低年式(6-9年)。使用年限越长,市场价值越低。除了人气车型之外,低年式的二手车在日本没有市场,所以,对于低年式的汽车通常都解体处理。可是,低年式二手车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仍可继续使用,存在着市场价值,因此,也就没做解体处理而是向海外出口。中年式的二手车虽然存在国内市场,但是出口海外利润更高,所以也向海外出口。

增，到1990-1994年，每年有16万-19万辆的二手车接受出口检查。其中，1988年以后出口倍增的原因是其对新西兰的出口迅速增长。新西兰与日本一样，汽车都是左侧通行（右方向盘）。1988年，新西兰进口关税降低，日本出口新西兰的二手车也随之剧增。此外，当时正值日本步入泡沫经济的繁荣时期，仅1990年新车的销售数量就有近1,350万辆，以旧换新淘汰下来的二手车数量也自然大为增加。

表1 日本汽车评定协会出口二手车检查数量变迁（1975-1994年）

| 年度 | 检查数量（辆） | 年度 | 检查数量（辆） |
|------|---------|------|---------|
| 1975 | 14,605 | 1985 | 42,227 |
| 1976 | 14,802 | 1986 | 29,699 |
| 1977 | 24,596 | 1987 | 36,260 |
| 1978 | 50,264 | 1988 | 77,984 |
| 1979 | 39,243 | 1989 | 135,550 |
| 1980 | 58,666 | 1990 | 167,980 |
| 1981 | 42,966 | 1991 | 163,293 |
| 1982 | 47,752 | 1992 | 180,362 |
| 1983 | 48,304 | 1993 | 166,960 |
| 1984 | 58,789 | 1994 | 187,496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财团法人日本汽车评定协会（<http://www.jaai.or.jp/>）的统计数据自制。

1995年5月之后，日本放松了出口管制，多数二手车不再需要出口认可，也就没有必要接受日本汽车评定协会的检查，结果导致在该协会检查的二手车数量骤减。必须接受检查的二手车，是超过5万日元的车辆，而5万日元以下的、出国人员携带的以及船舶和飞机乘务人员的私用车辆，都不包括在检查对象之内。同时，5万日元以下的二手车，有不少被当做零部件出口。据说还有利用货船走私出口二手车的现象，其数量大约为15-20万辆。

自1995年起（参照表2），通过正规手续向海外出口的二手车数量每年递增10万辆，到2000年已经达到年出口约70万辆，接近日本当年报废车辆的14%，也就是说，日本当时每7.3辆报废车中就有一辆用于出口。2006-2008年，由于向俄罗斯远东地区出口的二手车数量激增，使得日本二手车出口数

量突破百万大关，2008年更是创下了近135万辆的历史记录。2009年，由于多种消极因素的作用，出现了近50%的大幅回落，当年出口约68万辆（参见图1）。之后几年逐渐有所恢复，至2011年全年出口约86万辆，预计2012的出口数量将在80万辆左右。

表2 1995-2011年度日本二手车出口数量统计

| 年度 | 出口数量(千辆) | 年度 | 出口数量(千辆) |
|------|----------|------|----------|
| 1995 | 223 | 2004 | 835 |
| 1996 | 359 | 2005 | 940 |
| 1997 | 438 | 2006 | 1,137 |
| 1998 | 474 | 2007 | 1,229 |
| 1999 | 597 | 2008 | 1347 |
| 2000 | 700 | 2009 | 676 |
| 2001 | 545 | 2010 | 838 |
| 2002 | 604 | 2011 | 856 |
| 2003 | 713 | 2012 | 129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日本二手车海外市场研究会、财团法人日本汽车评定协会（<http://www.exguide.jp/>）的统计制作。注：2012年的数据为1月和2月的统计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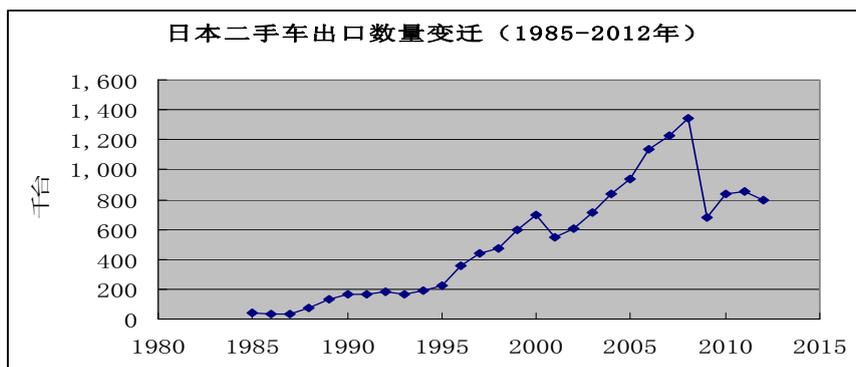


图1 日本二手车出口数量变迁 (1985-2012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日本二手车海外市场研究会、财团法人日本汽车评定协会（<http://www.exguide.jp/>）的统计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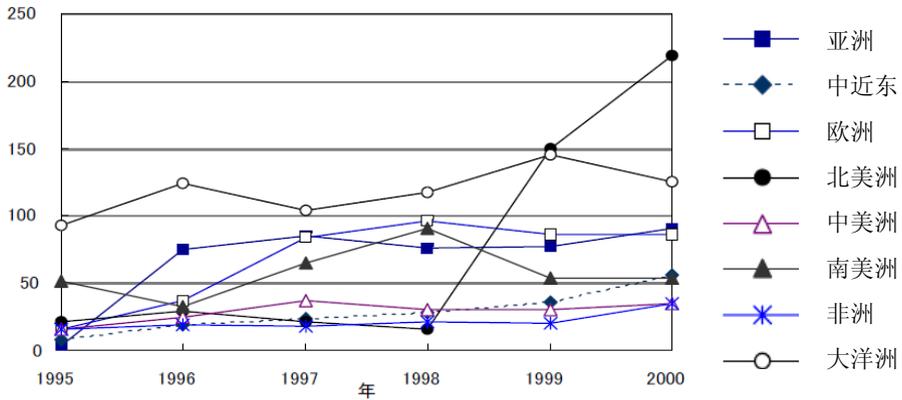


图2 从地区看日本二手车出口的数量变迁 (1995-2000年)

资料来源：中古車輸出海外マーケット研究会，<http://www.exguide.jp/>

图2显示的是2000年之前日本向世界各地出口二手车的数量变化。出现巨幅增长势头的是北美洲地区，日本向该地区的二手车出口量从1998年以前的1.5-2.9万辆增加到1999年的大约15万辆，到了2000年，更是跃升为22万辆。出口数量较多的是大洋洲地区，一直保持在10-15万辆之间。而对近邻亚洲地区的出口为7-9万辆，向欧洲出口约为10万辆。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二手车出口的数量和对象均发生了显著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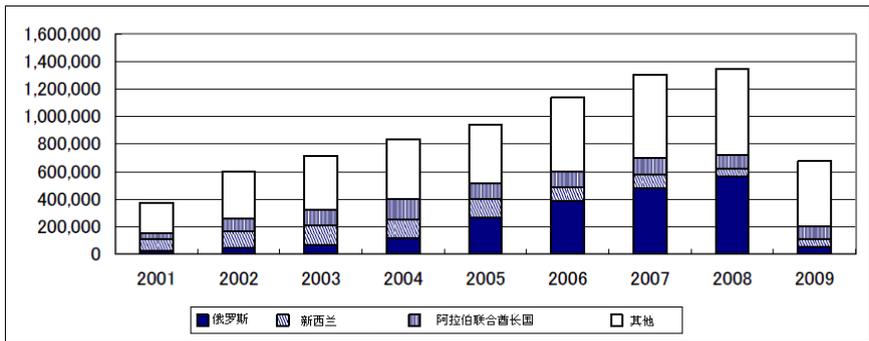


图3 主要国家进口日本二手车的质量变化 (2001-2009年)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

如图3所示，俄罗斯、新西兰和阿拉伯成为日本二手车出口的重要对象国，三国的交易量占到全部数量的50%左右。其他国家如智利、南非和肯尼亚

亚等，也大量进口日本二手车。而日本周边的亚洲国家都不在排行榜的前列。同时，如表3所示，日本二手车的出口对象国几乎遍及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

表3 日本二手车出口对象国的数量变迁

| 年 度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
| 出口对象国的数量 | 158 | 167 | 180 | 180 | 173 | 178 | 181 | 196 | 182 |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

（二）日本二手车对苏（俄）出口之初

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产二手车的出口势头迅猛，遍及世界各地。可是，80年代中期签署的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升值，使得日本二手车在海外失去了价格优势，陷入了停滞状态。如表1所示，1985年的出口量为42,227辆，广场协议签署后的1986年，骤减为29,699辆，1987年只有36,260辆，都未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可是，1988年以后出现了两大新变化：其一，对新西兰的出口量剧增，而在1980年以前没有向新西兰的出口记录，1986年仅有415辆，1987年也不过1,168辆，然而到了1988年剧增为27,988辆，1989年为63,828辆，1990年为78,157辆。其后，新西兰一直在进口日本二手车的排行榜上保持着第2-4名的位置。其二，随着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推行改革，日本二手车对前苏联的出口开始增加。在1988年以前，几乎没有对苏出口的车检记录，可是到了1989年，突然冒出1,302辆，1990年达到11,477辆，1991年为20,936辆，其后的出口数量一路攀升。自2005年起，俄罗斯跃升为日本二手车的第一大进口国，除了2009年跌至第4位，其他年份一直雄踞日本二手车出口对象国排行榜的榜首。

自从日本开展二手车对苏（俄）出口贸易之后，除了前面介绍的通过出口车检之后开展的正常出口业务以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就是作为携带行李的二手车出口，即携带出口。所谓携带出口，就是苏（俄）船员等外籍人员将二手车作为携带行李带回本国时，按照规定只要向海关提交车辆注销登记证明和发票，5万日元以下的二手车就可以免检出关。向前苏联出口的日本二手车中，这种携带出口占有非常大的比例。关于这一点，可以通

过当时日本的新闻报道来做一下了解。^①

1988年9月28日的《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二手车在苏联备受欢迎，从新潟港个人进口——5万日元以下，车检到期的车占多半”。这则报道反映，当时从日本新潟港驶往苏联的货船上，装载的几乎都是5万日元以下、车检到期的二手车，买家多数是苏联船员。报道还说，当时新潟市内的某个二手车经销商，自1987年10月左右始有苏联船员来购买二手车，当初每月只销售1、2辆，到了1988年8月就卖到20辆。这是日本国内第一次报道关于向苏联出口二手车的情况。随后，1989年6月15日的《朝日新闻》以“苏联船员乐购二手车，卖家真心欢迎”为题，报道了当时小名浜港的苏联船员购买二手车和二手车的出口情况。根据横滨海关小名浜分部的信息，苏联船员购买二手车是从1988年秋天开始的，当初每个月仅销售几辆，可是进入1989年以后数量剧增。总体来说，可携带出口的二手车受到苏联船员的欢迎，价格在1.5-2万日元的二手车最为畅销。

关于向前苏联出口二手车的动向，日本的《日经流通新闻》、《北海道新闻》、《读卖新闻》以及《北日本新闻》等多家报纸均有相关报道。根据日本媒体的这些新闻报道可以大致推断出，北海道和新潟地区是自1987年，横滨是自1988年，开始向前苏联出口二手车的。关于日本二手车开始销往苏联，以及随后急速增长的理由，日本北海学园大学的阿部新和浅妻裕总结出以下三点原因^②：

第一，当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得自由化得以发展，人们对乘用车的需求显著提高，而苏联国产乘用车价高量少的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当时苏联国产车的价格普遍很高，譬如小型“莫斯科人”大约6,000卢布（当时约合130万日元），“伏尔加”大约8,000卢布（约172万日元），而且乘用车的生产数量根本无法满足民众日益旺盛的需求。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从订购到提车需要等上一年时间。因此苏联海员购回的二手车很容易在国内市场

① [日]浅妻裕：新聞報道に見る中古車輸出事業の歴史、『月刊整備界』38巻13号，2007年12月，第68-72頁。

② [日]阿部新・浅妻裕：中古車輸出市場の形成と発展に関する予備的考察，『北海学園大学経済論集』第55巻第3号，2007年12月，第75-76頁。

上顺利成交。

第二，苏联国内的关税制度发生了变化。1988年之前，国外车辆入境，要按照汽车排量每cc缴纳5卢布（约1,100日元）的关税，如排量是1500cc的汽车就要缴纳7,500卢布（约161万日元）的关税。从1988年开始，关税降为原来的两成，同样1500cc排量的汽车只需缴纳1,500卢布（约32万日元）。

第三，日本国内的二手车和报废车市场出现了变化。1985年以后，由于日元升值，日本二手车的出口数量也受到牵连，一度出现萎缩。恰在此时，苏联作为一条新的销售渠道，开始受到日本二手车出口商的重视。

此外，日本经济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以旧换新淘汰下来的汽车数量大增，1989-1991年报废车辆增加了15%，仅1991年的报废汽车就高达530万辆。随之而来的是报废汽车的处理成本增加，以及废铁收购价格的回落。这些现实问题促使日本人开始思考：这些迅速淘汰下来的汽车与其在国内作为废品处理，莫如作为二手车向海外出口，岂不更能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同时，人们也意识到，无论多么有效地利用，二手车终将有一天会变成废品，这是现代化带来的一个严峻课题。

日本向苏联（俄罗斯）出口二手车之初，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旺盛的携带出口。从区域经济的视角来看，岛国日本与苏（俄）远东地区隔海相望，严重缺乏工业原料和燃料，却拥有发达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而俄罗斯远东地区拥有丰富的木材、水产和矿产资源，但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却严重落后。所以日苏（俄）之间具有基本相适的贸易结构，即，日本对苏（俄）出口机械设备和钢铁产品，而苏（俄）对日出口工业用原料和燃料，这种相互补充的贸易结构，基本形成了日苏（俄）贸易结构的主体。在这种互补型贸易结构的作用下，上世纪80、90年代，日本对苏（俄）出口机械设备和钢铁产品，并从苏（俄）进口大量的木材和水产资源。这样一来，位于环日本海经济圈的日本各大城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间的海上物流通道日益繁忙。而且，从地理位置来说，日俄之间的贸易利用濒临日本海的小樽、新潟、富山等港口，相比利用太平洋沿岸的港湾更为便利。可是相对来说，当时日本从苏（俄）进口的物资更多，而苏（俄）的货船多数是空仓返回。于是，日本二手车的携带出口也就受到了关注。

日本学者浅妻裕对1990-1992年间的日本4家经济类报纸进行了调查，发现日本向苏（俄）出口二手车的初期，伴随着交易量的增长，日本国内相关地区的新闻报道数量也增加了。譬如在有关调研对象的19篇报道中，新潟县有6篇，北海道有5篇，富山县和石川县各2篇，青森县、神奈川县、岛根县和福冈县各1篇。结果不言而喻，从苏（俄）进口木材和水产资源较多的日本海一侧的地区，对于向苏（俄）出口二手车的报道也多，也就意味着携带出口二手车的兴盛。^①

二手车的携带出口数量在日本并没有现成的全国数据或者各港口的统计数据。日本学者阿部新和浅妻裕根据富山港（富山县）和小樽港（北海道）的相关新闻报道中的数据，制成了图4。从图4可以看出，日本开始向苏（俄）出口二手车之际，富山县的出口非常旺盛。不过，北海道小樽港的携带出口数量在1993年为38,693辆，到1994年就已经超过了富山港的携带出口数量。主要原因是俄罗斯萨哈林州对日本北海道地区开展了二手车购入之旅的活动，使得俄罗斯游客直接涌向北海道一些城市的二手车交易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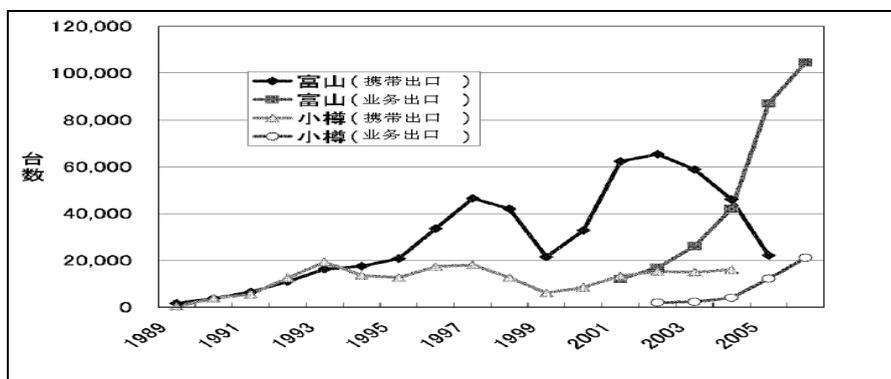


图4 富山港和小樽港的携带出口与业务出口

资料来源：引用日本学者阿部新、浅妻裕的统计图表。

而且，日本也有灵活的应对措施。譬如，虽然规定为5万日元以下的二手车才能携带出口，但在实际成交中有相当数量的10万日元左右的二手车都

① [日]浅妻裕：新聞報道に見る中古車輸出事業の歴史，『月刊整備界』 38 卷 13 号，2007 年 12 月，第 68-72 頁。

得到了放行。俄罗斯萨哈林州的日本购车之旅，使得大量二手车涌向俄罗斯，促使俄罗斯海关不得不于1994年提高了二手车的进口关税，由以往每cc13日元提高到657日元，使得由北海道地区携带出口的二手车数量持续低迷。到了2004年，由观光客携带出口的二手车份额几乎消失殆尽。据北海道函馆海关统计，2004年1月-6月，虽然俄罗斯的船舶入港持续增加，但是船员和旅客携带出口的二手车却较上年同期减少了一成。可是，自从1994年俄罗斯提高关税以后，富山县反而成为向俄罗斯出口二手车的重要据点。譬如《北国新闻》2003年4月4日报道，当时日本携带出口的二手车，有三、四成是经由富山县出口的。

有趣的是，在俄罗斯提高二手车进口关税的翌年，日本就出台了放宽出口贸易管理的规定。有关二手车出口贸易的规定有两点变更：一是废除出口车检制度，二是关于携带出口，以往的规定是一人只许携带一辆不超过5万日元的二手车，而且在出口时必须提交报废车辆销户登记证明和金属车牌的归还手续。修改后的规定为，只要合计不超过30万日元，就没有数量限制，而且登记证明、购买收据以及购买数量等，只需要口头确认即可。因此，在1995年5月日本放宽了出口管理规定之后，富山港携带出口的二手车数量大幅增加，在小樽港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由于向苏（俄）携带出口二手车的价格都在5万日元以下，在日本国内等同于废品，这类二手车的大量出口，也给当时北海道地区从事报废汽车解体工作的从业者带来了危机感。因为携带出口的二手车增加，意味着他们收购二手车的费用也会水涨船高，极有可能危及到业界的存亡。因此，业界决定，团结一致，改变策略，以对苏（俄）出口二手汽车的零配件为今后的主攻方向。

二、日本二手车的对俄出口

（一）从统计数据看日本二手车的对俄出口

日本于2001年4月1日起，在对外贸易统计上设置了二手车统计商品序号，由此可以区分是新车还是二手车的出口，也就可以汇总出二手车的出口

数辆。日本向俄出口的二手车数量及其所占日本二手车出口的市场份额如表4所示。从中可以看出，自2001年至2008年，日本向全世界出口的二手车数量逐年激增，2008年达到创纪录的1,346,742辆，2009年以后则数量骤减，目前正处于恢复阶段。具体来看对俄罗斯的出口情况。2001年大约2.6万辆，在全日本二手车出口的市场份额中尚不足5%。随后几年，日本向俄罗斯出口的二手车数量剧增，2004年超过10万辆，2005年的市场份额超过20%，到了2008年，向俄罗斯出口的二手车占到二手车出口总量的41.8%，数量达到563,296辆。上述统计数字有一点需要追加说明，由于在2005年7月之前，日本向俄罗斯出口的二手车很多都是携带出口的，而以随行行李携带出关的二手车是正常贸易统计数据无法涵盖的。直到2005年7月，日本出台了“配合汽车回收法的出口贸易管理条例修正案”，不允许二手车作为随行行李携带出口，自此，携带出口的二手车便销声匿迹了。至此，日本出口二手车的统计数据方才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而2005年6月以前统计的对俄出口的二手车数量以及所占市场份额，由于没能包括携带出口的数据，因此实际数字应该高于表2所显示的数据。

表4 日本向俄罗斯出口的二手车数量及其所占出口市场份额

| 年度 | 向俄罗斯出口 (千辆) | 向全世界出口 (千辆) | 出口市场份额 (百分比) |
|------|----------------|----------------|-----------------|
| 2001 | 26 | 545 | 4.8 |
| 2002 | 43 | 604 | 7.1 |
| 2003 | 68 | 713 | 9.5 |
| 2004 | 120 | 835 | 14.4 |
| 2005 | 269 | 940 | 28.6 |
| 2006 | 390 | 1137 | 34.3 |
| 2007 | 479 | 1229 | 39.0 |
| 2008 | 563 | 1347 | 41.8 |
| 2009 | 53 | 676 | 2.8 |
| 2010 | 105 | 838 | 12.5 |
| 2011 | 111 | 856 | 13.0 |

资料出处：根据日本二手车海外市场研究会（<http://www.exguide.jp/>）提供的数据统计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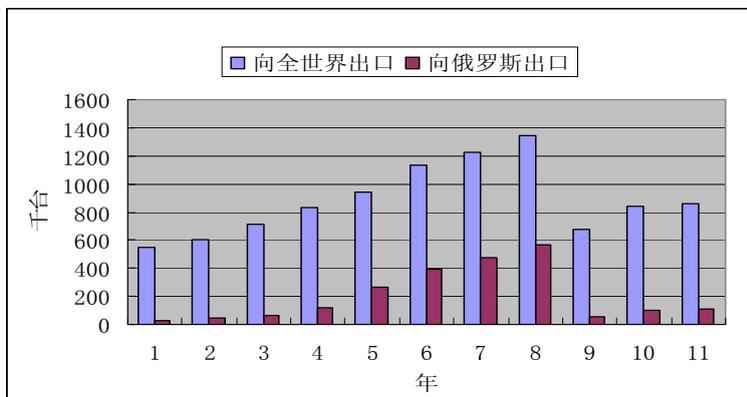


图5 日本向全世界和俄罗斯出口二手车的数量变迁（2001-2011年）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二手车海外市场研究会（<http://www.exguide.jp/>）提供的数据统计制作。

此外，最引人注目的是2009年的动向。日本2009年对俄出口的二手车，无论是数量（约5.3万辆），还是所占市场份额（约2.8%），都有超大幅度的萎缩。通过图5更能直观地看出日本对俄出口二手车的数量变迁以及所占市场份额的情况。

日本对俄出口二手车的单价也随着出口数量的增加而出现了大幅攀升。2001年的出口单价近30万日元，到了2007年已达到50万日元，几乎上涨了一倍。以富山县射水市的出口商调研信息为例，日本对俄出口的二手车平均价格在65万日元左右，其波动幅度在40万-100万日元之间，几乎没有20万、30万日元的二手车出口。^①同一时期日本二手车的进口大国新西兰，也是从2001年不足30万日元的单价，上涨到近50万日元。可以说，截至2008年夏季，以俄罗斯为首，日本向全世界出口的二手车单价都出现了暴涨，达到了一个峰值。可是，同年秋季以后，形势急转直下，日本出口的二手车单价开始回落。当然，二手车的出口单价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直接因素包括：拍卖二手车的国内市场动向、进口国的汽车市场动向、关税以及汇率等因素。间接原因有：废旧钢材的市场动向、国内新车市场动向、运费等因素。因此，2008

① [日]阿部新·浅妻裕：中古車輸出市場の形成と発展に関する予備的考察，『北海学園大学経済論集』第55卷第3号，2007年12月，第65頁。

年夏季之前的单价暴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样，其后二手车单价的回落也是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所造成的。但是，俄罗斯本身进口二手车的环境发生了剧变，在这当中构成了主要因素。稍后将对此作进一步剖析。

表5 日本二手车重要出口对象国的位次变迁

| 位次 | 2011年 | 2010年 | 2009年 | 2008年 | 2007年 | 2006年 | 2005年 | 2004年 |
|----|-------|-------|-------|-------|-------|-------|-------|-------|
| 1 | 俄罗斯 | 俄罗斯 | 阿联酋 | 俄罗斯 | 俄罗斯 | 俄罗斯 | 俄罗斯 | 阿联酋 |
| 2 | 阿联酋 | 阿联酋 | 新西兰 | 智利 | 阿联酋 | 阿联酋 | 新西兰 | 新西兰 |
| 3 | 智利 | 智利 | 南非 | 阿联酋 | 新西兰 | 新西兰 | 阿联酋 | 俄罗斯 |
| 4 | 新西兰 | 新西兰 | 俄罗斯 | 新西兰 | 智利 | 智利 | 智利 | 英国 |
| 5 | 南非 | 南非 | 智利 | 南非 | 肯尼亚 | 哈萨克 | 英国 | 南非 |
| 6 | 肯尼亚 | 肯尼亚 | 肯尼亚 | 肯尼亚 | 南非 | 巴基斯坦 | 南非 | 菲律宾 |
| 7 | 斯里兰卡 | 孟加拉 | 孟加拉 | 秘鲁 | 秘鲁 | 南非 | 菲律宾 | 智利 |
| 8 | 巴基斯坦 | 斯里兰卡 | 菲律宾 | 孟加拉 | 菲律宾 | 秘鲁 | 秘鲁 | 秘鲁 |
| 9 | 蒙古 | 菲律宾 | 秘鲁 | 蒙古 | 新加坡 | 斯里兰卡 | 肯尼亚 | 塞浦路斯 |
| 10 | 乌干达 | 马来西亚 | 马来西亚 | 新加坡 | 英国 | 英国 | 斯里兰卡 | 斯里兰卡 |
| 11 | 吉尔吉斯 | 乌干达 | 泰国 | 乌干达 | 巴基斯坦 | 肯尼亚 | 马来西亚 | 肯尼亚 |
| 12 | 马来西亚 | 坦桑尼亚 | 乌干达 | 马来西亚 | 孟加拉 | 菲律宾 | 哈萨克 | 牙买加 |

资料出处：日本二手车出口海外市场研究会（<http://www.exguide.jp/>）的统计。

关于俄罗斯在日本二手车出口市场中的重要性，在表5日本海外二手车市场的排名变化中可以一览无遗。从表5可以看出，自从2005年俄罗斯跃居日本二手车重要出口对象国第一位之后，除了2009年以外，俄罗斯始终是进口日本二手车最多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其进口数量在2005-2008年超过第2位国家2-5倍。可是到了2009年，俄罗斯则骤降至第4位，2010年至今虽然得以重新登顶，但是进口数量的领先优势已不再明显。因此，无论从表4、图5，还是表5，都反映出2009年对于日本的二手车市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年，不仅出口俄罗斯的二手车数量有了巨大回落，其销售总量也回到2004年的水平，至今仍处于恢复的过程中。

（二）日本二手车对俄出口数量骤减的背景

在日本向俄罗斯出口二手车的历史上，出现过两次较大的波动，第一次是1998年，第二次是2009年。实际上，两次波动的大背景都是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导致日本出口俄罗斯二手车数量减少，尤以2009年为甚。

1998年出现的第一次波动，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造成的全球性经济危

机所引起的。对于俄罗斯来说，危机加剧了政府长期债务与预算赤字，而与危机相伴的是其国内领导人的继承问题。^①结果，1998年的经济危机导致卢布大幅贬值，卢布兑美元汇率由6.2:1跌至20.65:1。当卢布突然贬值时，危机前成功渗透到俄国内市场的进口消费品首当其冲，受到了致命打击，进口量暴跌。^②于是，俄罗斯国内的经济危机很快就影响到日俄二手车的交易方面。譬如，就日本对俄出口的主要地区富山县来说，该地区自1998年3月起就受到卢布贬值的影响，9月以后的出口数量更是大幅度地回落，只维持在上一年度同月出口数量的10%左右。^③该县的二手车出口商也由危机前的180家减少到1999年的70家左右。^④当地办理对俄出口二手车的“富山县对俄车辆管理协会”的会员也由1997年的56个减少到2000年的42个。此外，北海道小樽市的出口商也由鼎盛时期的100家左右减少到20家左右。^⑤不过，到了2001年，由卢布贬值危机造成的影响就宣告结束了。

关于2009年出现的第二次大幅度波动的主要原因，日本《通商白皮书》中的分析最为言简意赅：“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再加上俄罗斯政府大幅度地提高关税和对国产车采取优惠措施，导致日本出口俄罗斯的汽车数量在2009年大幅回落。”^⑥

俄罗斯经济历经制度变迁所伴生的低迷，虽然1998年的财政和金融危机之后，呈现出连续10年增长的势头，然而到了2008年上半年，俄罗斯再次经历原油价格暴涨带来的经济困境。随后的原油价格下跌，以及同时发生的“雷曼风暴”，给俄罗斯经济造成超乎想象的冲击。俄罗斯经济由原先7%-8%的增长率陡然陷入低谷，2009年的增长率骤降为负7.9%。当然，由于这是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受到影响的国家不只是俄罗斯。但问题在于，俄罗斯经济的大起大落在世界上十分罕见。而且，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同为新兴金砖国家（BRICS）的中国和印度却维持了坚实的经济增长，2009年的GDP分

① T·科尔顿：“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政治领袖”，《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2期，第26页。

② 斯蒂芬·赫德兰：“金融危机后的俄罗斯”，《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6期，第73页。

③ [日]北日本新聞，1998年10月31日，1999年3月19日。

④ [日]北日本新聞，1999年2月28日。

⑤ [日]北海道新聞，1999年8月12日。

⑥ [日]『通商白書 2012』，第1章世界经济の動向，第144頁。

别增长了9.1%和5.7%，而与俄罗斯一直并驾齐驱的巴西，尚能稳住阵脚，仅下降了0.2%。此外，一些依靠原油出口的国家，如沙特、挪威、哈萨克斯坦等，即使遭遇原油价格大幅下跌，其衰退程度也不及俄罗斯那般严重。唯有俄罗斯呈现急剧衰落之势，因此自然会产生忧惧心理，担心从赶超（catch-up）军团中掉队甚至遭到孤立。^①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之后，俄罗斯依赖石油资源的经济结构在应对世界市场变化中的脆弱性充分暴露出来了。俄罗斯政府再次意识到，为了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现代化和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必不可少。梅德韦杰夫总统2009年9月发表的论文《前进，俄罗斯！》及其2009年11月在国家杜马所作的年度国情咨文演说，提出了俄罗斯要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梅德韦杰夫指出俄罗斯存在的问题是：第一，依赖资源出口的原始经济结构；第二，慢性贪污的蔓延；第三，社会中存在的家长意识，即：国民不是自己解决问题，而是表现出依赖国家和外国等他者的态度。梅德韦杰夫表示：为了克服上述问题，俄罗斯需要再次进行“现代化”，其能否成功关系到俄罗斯在世界中的生存。^②作为推进现代化的一种手段，俄罗斯像其他国家一样，也对国内汽车制造厂商加以保护，同时对进口乘用车实施严厉的关税措施。^③

根据普京2008年12月发布的“关于改变某些机动车关税”的命令，2009年1月12日，俄罗斯为了保护国内汽车企业，对进口车辆实施为期9个月的暂定汽车进口关税，提高征税额度。世界舆论认为，这是俄罗斯贸易保护主义的象征。此次关税提高的车辆有：重型车辆（拖拉机）、卡车以及乘用车。以排量2000cc的乘用车为例，采取这项措施后，二手乘用车的关税平均提高了大约2倍，而卡车大约是原来的3倍。与新车相比，二手车被课以更高的关税。对于二手车来说，有三点强化措施：一是提高了税率，二是大幅增加了针对排量的关税额度，三是提高了规定车龄的课税起点（从7年提高到5年）。

① 久保庭真彰：“俄罗斯经济的转折点与‘俄罗斯病’”，《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第41页。

② <http://www.kremlin.ru/news/5413>；<http://www.kremlin.ru/transcripts/5979>

③ 斯蒂芬·赫德兰：“金融危机后的俄罗斯”，《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6期，第82页。

①虽然税率根据汽车的品种和车龄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是总体的上涨幅度达到10%-120%，也就是说，一辆二手车要涨价几万甚至100多万日元。

其实，为了保护国内的汽车制造企业以及国外品牌汽车的组装企业，俄联邦政府于2008年12月出台了一揽子的支持计划，主要包括国家担保、资金支持、降低车辆运输费用等。俄罗斯对国内汽车制造业的支持总额达200亿美元，包括价值115亿卢布的“石油换旧车”的计划。对于汽车运输成本高昂的远东地区，俄政府决定取消国内汽车的铁路运费，甚至为居民支付部分购车费来刺激消费国产车。②譬如，自2008年12月起，利用银行车贷购买俄罗斯生产的35万卢布以下的汽车（含国外企业），国家将负担部分利率。2008年12月时，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的利率为13%，国家负担三分之二（约为8.7%）。2009年3月，俄政府会议根据普京总理的提案，决定筹措20亿卢布用于支付俄罗斯铁路向远东地区运输国产车的费用，相当于为每辆国产车支付8万卢布的运费。以往在远东地区购买俄罗斯欧洲地区生产的国产新车，因为运输成本等原因，购车费用要高出俄罗斯其他地区。这一政策的出台，使远东地区的居民可以用与俄罗斯其他地区居民相同的支出来购买国产车。

然而，俄政府提高进口汽车关税的措施，却导致了俄罗斯远东沿海多个地区，从2008年12月至2009年1月相继发生民众示威游行。示威民众抗议政府提高进口二手车的关税。2009年1月12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大约有100名市民参加了抗议集会，他们主要是日本二手车进口行业的从业者。当地治安当局以集会未得到许可为由拘留了其中大约10人。而最激烈的抗议行动发生在2008年12月14日。当时，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市民听说政府打算出台针对日本车的禁止进口右置方向盘汽车的法案，于是大约有6000名市民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游行，并用几百辆汽车封锁了高速公路的出入口，导致城市交通一度陷入瘫痪。根据日本外务省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日本中心统计，当地大约60万人口中有4万人从事二手车进口业务。提高二手车关税，直接受到冲击

① [日]竹内啓介・浅妻裕：急変する日中間中古車・中古零部件流通——俄罗斯の政治経済情勢に着目して、『北海学園大学経済論集』第57巻第2号，2009年9月，第50-51頁。

② [日]俄罗斯通信社：ロシア、外国車の輸入関税引き上げに，2009年12月1日，<http://jp.rian.ru/analytics/economics/20090112/119433751.html>

的便是这些从业人员。在日本二手车占行驶车辆9成多的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市，2008年12月21日也发生了反对提高二手车进口关税的抗议集会。当然也有例外，远东的阿穆尔州州长就在同一天表态，号召政府职员们卖掉进口车换购国产车。^①

另一方面，对于俄政府出台的国产汽车保护措施，俄罗斯多数的汽车企业都欣然表示支持，并期待这些措施能够实实在在地帮助到他们。为了抗衡该措施的反对者，他们也举行了集会游行，用以支持联邦政府的决定。

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由于日本车的性能良好，很受当地人追捧，大街上行驶的车辆95%都是日本车。可是，由于关税的提高，日本汽车的进口数量出现了锐减。2009年3月俄罗斯远东海关公布的数据表明，日本汽车的进口数量骤减为上年同期的大约20%，二手车交易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甚至出现了失业人员。^②2009年，由于关税的提高和内需的减弱，俄罗斯的汽车进口与2008年相比大幅回落，2009年1-8月乘用车的新车进口只有33,144辆，与上年度同期相比，减少了70.6%，二手车进口只有11,710辆，减少了95.5%。可是，通过提高关税来进行保护的国内汽车生产并没有因此而振兴起来。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统计，2009年1-8月，俄罗斯乘用车的生产数量只有369,000辆，较上年同期减少62.6%。^③

2009年10月9日，根据俄联邦政府第805号决定——“延长对特定汽车进口关税的施行期限”，上述提高进口汽车关税的临时措施到期后不但没有停止执行，反而又延长了9个月。而且，由于俄罗斯车市规模继续缩水，本土车企经营状况起色不大，俄罗斯工业贸易部汽车产业主任拉赫玛诺夫表示，该国对进口车辆征收的高额关税在2014或2015年之前不会降低。^④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对俄出口二手车的环境依然严峻。

① [日]サハリンでも輸入中古車の関税上げ反対集会，北海道新聞，2008年12月22日。

② [日]共同社：口極東、輸入車関税引き上げに抗議 日本の中古車激減，2009年4月19日。http://condominium.at.webry.info/200904/article_4.html

③ [日]日本貿易振興機構：自動車関税引き上げを9カ月延長，通商弘報，2009年10月13日。

④ 田雪冬：“俄国汽车进口高关税可能松动 有望年内入世”，《中国汽车报》，2011年1月18日。

表6 俄罗斯汽车进口关税的变化

| | 旧关税（2002年） | 新关税（2009年） |
|---------------------------|-------------------|-------------------|
| 2,000cc乘用车 （新车） | 25%，但每cc不低于1.8欧元 | 30%，但每cc不低于2.15欧元 |
| 2,000cc乘用车 （二手车，不超过5年） | 25%，但每cc不低于0.55欧元 | 35%，但每cc不低于2.15欧元 |
| 2,000cc乘用车 （二手车，超过5年） | 25%，但每cc不低于0.55欧元 | 每cc为4欧元 |
| 2,000cc乘用车 （二手车，超过7年） | 每cc为2.2欧元 | 每cc为4欧元 |

资料来源：Ernst&Young (CIS), “An Overview of the Russian and CIS automotive industry”, February 2012, [http://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Russian_and_CIS_automotive_industry/\\$FILE/Russia%20Automotive_2012.pdf](http://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Russian_and_CIS_automotive_industry/$FILE/Russia%20Automotive_2012.pdf)

其实，2009年日本向俄罗斯出口二手车数量骤减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从2008年11月14日起，俄罗斯对进口车体开始征收最低5,000欧元的税款，导致分解二手车出口（constructor）的进口费用大增。所谓分解二手车出口（constructor），就是将二手车分解后作为零部件出口、在进口国再组装的方式。2003年，俄罗斯提高了汽车进口关税（参见表6），以车龄是否超过7年为界，没有超过7年的二手车（除特别医疗车辆），不管气缸容积多大，一律按25%征税；超过7年的二手车，则根据气缸容积来征税。例如，1800cc价格为100万日元的二手车，7年以下只需25万日元的关税，超过7年的就要缴纳48万日元的关税。于是，日本业界就掀起了分解二手车出口的热潮。就是将车龄高的二手车在日本分解为车体、发动机、变速器等多个部件后出口，在俄罗斯按照关税较低的零部件办理通关手续，然后在当地组装成二手车进行交易。根据日本学者阿部新的调查，在2007年的时候，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内十四、五家分解二手车的组装工厂。^①可是到了2008年11月，由于俄罗斯设置了最低课税额，削弱了解析二手车出口优势，也导致了日本二手车出口数量的减少。阿部新于2008年12月对富山县进行了调查，发现在关税设置前的11月上旬还有分解二手车出口的紧急出口业务，其后就消失不见了。^②

① [日]阿部新：俄罗斯向け分解中古車の輸出について、『月刊整備界』39巻9号，2008年9月，第30-33頁。

② [日]阿部新：貿易統計から見る中古車輸出輸出市場の動き、『月刊整備界』40巻4号，2009年4月，第28-32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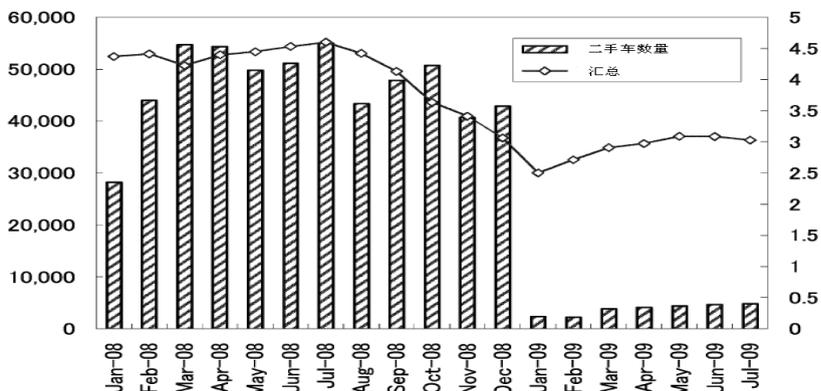


图6 卢布对日元汇率与日本二手车出口数量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学者竹内启介、浅妻裕的统计图表。

最后一个原因，是由于2008年8月以后严重的经济危机造成汽车市场的迅速萎缩，导致俄罗斯国内的汽车需求减少，日本二手车的出口自然受到了波及。特别是俄罗斯的经济严重依赖一次性能源的出口，加上石油等资源行情骤跌，引起了卢布的贬值，也就导致日本出口环境的恶化。图6显示了汇率与出口数量的关系。^①可是我们发现，此次卢布的持续贬值与日本出口俄罗斯二手车的数量减少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因为俄罗斯提高关税的措施导致了日本二手车的紧急出口，增加了出口数量，从而抵消了卢布贬值的影响。

三、日本二手车对俄出口展望

（一）俄罗斯远东与西伯利亚地区的日本二手车市场

俄罗斯远东地区占到俄罗斯国土面积的1/3多，然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的居民却不足700万，市场规模比较小。对于俄罗斯人来说，远东地区并不是他们向往的地方，有许多俄罗斯人一辈子都没有到访过这个地区。可是，日本人认为，远东地区距离日本很近，该地区的居民非常了解日本，对日本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性给予了很高评价。为此，日本以北海道等濒临日

① [日]竹内启介·浅妻裕：急変する日ロ間中古車・中古零部件流通——ロシアの政治経済情勢に着目して、『北海学園大学経済論集』第57巻第2号，2009年9月，第50頁。

本海的地区为中心，向俄远东地区出口二手车、农产品、日用品等商品，开展双边贸易。^①虽然日本人对俄罗斯抱有亲近感的不多，但是根据日本内阁2005年8月进行的“外交舆论调查”，俄国人对日本抱有好感的人较多，他们认为日本是一个技术先进、具有丰富传统文化的国家。尤其是远东地区的俄国人，对日本具有更高的认可度。

日本二手车绝大多数是通过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或者纳霍德卡港进口的。在前苏联时期，符拉迪沃斯托克是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基地，禁止外国人进入，所以前苏联与日本的贸易往来都是经由纳霍德卡进行的。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种限制随之解除，纳霍德卡港的地位慢慢被符拉迪沃斯托克所取代，从日本进口的二手车多数由符拉迪沃斯托克入关。

中谷勇介是“日本国际汽车回收研究组织”的成员，他于2006年6月考察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据他观察，行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大街上的汽车多数是日本车。当地是右侧通行，可是左置方向盘的汽车为数很少。曾经随处可见的俄罗斯国产车，也只限于公车，早已退居为配角地位。当地收入水平高的阶层最偏爱的是四轮驱动的“丰田陆地巡洋舰”，这已成为一种财富和身份的象征。由于当地有丰田汽车的经销商，左方向盘的雷克萨斯LX470也并不罕见。许多日本人一直存在着这样的认识误区，以为在日本已无人问津的二手车才会出口俄罗斯，然而实际上，在家用轿车方面，不仅经常可见与日本同步的车型，甚至还能看到最新款的丰田品牌汽车。这一现象说明，随着石油、天然气价格走高，俄罗斯经济快速回暖，民众的购买力自然得到提升。中谷勇介同时还发现，虽然富裕阶层的队伍在不断地扩大，可是当地的基础设施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市中心的道路上经常出现交通滞行及拥堵现象，有的地区大气污染也比较严重。虽然前苏联时代的道路建设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道路维护远远没有跟上。路面坑洼不平处得不到及时的修补，过往车辆不得不减速慢行。因此导致交通堵塞频发，令当地政府头痛不已。面对这样糟糕的路况，四轮驱动的日本车自然成为不二之选，理所当然地备

① [日]『通商白書 2012』，第1章第2節6(1)ロシア経済。

受欢迎。^①另一位学者浅妻裕在该市调研时也得出相同的结论，认为当地大街上行驶的车辆有9成以上是日本车。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郊外还有一个叫“green-corner”的二手车销售市场，通常有上万的日本二手车在此待售。^②实际上，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像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萨哈林等城市，大街上行驶的车辆有八、九成都是从日本进口的二手车。

不仅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日本二手车大量增加，2005年以后，每年有超过20万辆的日本车由滨海边疆区向西伯利亚输送，导致西伯利亚地区的车辆也大大增加，甚至还发生了因为金属车牌数字不足，而将原来的地区号码由25升为125的情况。^③新西伯利亚是俄罗斯第三大城市，拥有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日本二手车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后，经过西伯利亚大铁路向西输送到这里。中谷勇介2006年11月对新西伯利亚市调研后发现，这座城市的大街上行驶的车辆，日本二手车的比例接近五成，其他的多为“拉达”、“莫斯科人”等俄罗斯国产车。他在街头亲自做了现场统计，结果表明日本二手车约占46%，其后他又咨询了当地的二手车业者，得到的回答是40%多，两组数据间得到了相互印证。而且，该市的日本二手车过半数为丰田品牌。当地的二手车零部件业者和二手车业者认为，丰田车品牌号召力强，许多俄国人就是专奔二手丰田车而来的。不仅是二手车市场，从日本进口的左置方向盘“丰田花冠”和RAV4等新车也非常热销。当然，在该市欧美品牌的汽车也同样受欢迎。关于卡车方面，虽然能看到中小型右方向盘的二手卡车，但数量远不如远东地区。而大型卡车，则主要是沃尔沃和MAN等欧洲品牌形成领军优势，俄罗斯国产的卡车也很多。^④对此，中谷勇介做出分析，认为这是由于新西伯利亚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因为新西伯利亚位于俄罗斯中部，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将远东地区的日本二手车输送到这里，同时也将莫斯科及其以西的欧洲左方向盘的二手车和新车运达这里。当地二手车业者认为，新西伯

① [日]中谷勇介：ロシア極東地域での中古車をめぐる動き、『月刊整備界』37巻10号，2006年9月，第38-41頁。

② [日]浅妻裕：ロシアの乗用車市場と関税政策の動向、『月刊整備界』37巻9号，2006年8月，第42-45頁。

③ 同上。

④ [日]中谷勇介：ロシア内陸地域における中古車をめぐる動き、『月刊整備界』38巻4号，2007年4月，第42-45頁。

利亚以西的车里雅宾斯克是日本二手车的终点线。也就是说，车里雅宾斯克以东地区是喜好日本二手车的地区。^①确实，在莫斯科街头几乎看不到日本二手车。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大型二手车及零部件销售商不仅货源充足，而且业务精熟。从汽车装潢到汽车零部件以及二手车的零部件，应有尽有，而且所有商品都通过电子数据管理。每个零部件都有条形码，上面标有车型、年代、型号等，一目了然。此外，搁放零部件的货架也标有条形码和数字，商品完全实现了电子化。销售时，只要用扫描仪读取条形码就可以实时确认库存情况。这种高水平的系统化，绝不次于日本。^②同时，市内大型销售商都可通过因特网来检索在库数据和订购商品。多数二手车以及零部件都有照片，让顾客感到放心。经营该网站的是俄罗斯最有实力的日本二手车信息情报网站 **Japancar.ru** 公司。**Japancar.ru** 公司成立于2001年，为销售日本车和日本车二手车零部件的业者提供网络服务。与该公司签订合同后，可以为销售商设立独立网址，从因特网上检索商品的在库信息。在2006年的时候，已有15家日本销售商与该公司签订了合同，然而真正运作的只有9家左右。

2009年是日本对俄出口二手车最不景气的一年。当时，俄罗斯滨海边疆区还有其他几个港口从事日本二手车的进口业务，但仍以符拉迪沃斯托克港的进口量最多。日本学者浅妻裕在当年4月底考察了该市日本二手车的进口情况。当他看到港口周边的保税仓库之后，立刻认识到严酷的现实。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商业港周边有6个保税仓库，其中一个是因为汽车进口数量的增加而于2008年刚刚建成的。在往昔，这些立体式的保税仓库，任何时候放眼望去，都是密密麻麻的日本二手车的天下。可是在这次考察中，浅妻裕发现，仓库顶层已经不见了汽车的踪影，唯有底层还残存着相当数量的被扣押的汽车。这些车辆是在俄罗斯提高汽车关税之前进口的，因为没有缴税而遭到扣押。一般来说，车辆进口两个月后还未办理规定手续，远东海关就对车辆进

① [日]中谷勇介：ロシア内陸地域における中古車をめぐる動き，『月刊整備界』38卷4号，2007年4月，第42-45頁。

② 日本劳动成本很高，较为重视市场价值较高的二手车零部件的销售。为了获得利润，必须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为提高附加值，必须提高二手车零部件的认可度，而提高认可度的关键在于通过电子化来提高库存商品的管理效率。

行拍卖。可见有不少车辆都没有办理相关手续。^①浅妻裕又考察了距离该市约3公里的大型二手车市场“green-corner”。该市场位于丘陵地带，不仅出售乘用车，还出售卡车、吊车和叉车。现在，场地上停放着11,000-12,000辆车，可是顾客稀少，以至于连场内的通道都显得格外宽阔，完全不同于以往车水马龙的热闹场面。当地的销售商认为，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销售前景很不乐观，有赚头的是排量1500cc的二手车，每辆大概有200-300美元的利润。高于这个排量的二手车均无利润可言。由于以往的库存很多，销售商必须尽早将车卖出回笼资金。为此，多数二手车都开始降价甚至是亏本促销，降价幅度平均为2,000美元左右。因为在世界金融危机影响最盛之时，俄罗斯不仅提高了进口车关税，而且当地银行也提高了购车贷款利率，在这种雪上加霜式的双重打击下，商家采取这样的应对方式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该市场以往还有众多的西伯利亚大买家光顾，使得其同时兼具强大的批发功能。可是目前，该市场的业务95%都是依靠零售。因为西伯利亚的买家担心，俄政府为了限制日本二手车，会将右置方向盘的汽车改为左置方向盘。由于转手西伯利亚经销商的渠道已日益收窄，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部分销售商只得自己直接将车运往西伯利亚去销售。“规模小的销售商在清理了库存之后离开了，销售巨头们也在逐步收缩退却，网络销售也同样低迷。当地利用网络销售的二手车销售商，多数开始转变销售策略，改为进口和销售二手车零部件以及建设机械。”^②

进入2010年以后，日本向俄罗斯远东地区出口的二手车开始出现恢复迹象。到了2010年6、7月间，俄罗斯再度跃升为日本二手车出口对象国的第一位。2010年夏天，“日本Russia & NIS贸易会”的调研人员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他们看到的是密密麻麻停满日本车的场地，以及保税仓库完全饱和的景象，不由得感叹道，“日本车在远东地区确实深受当地民众的欢迎，可以确信日本二手车贸易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复活了。”^③在俄罗斯对进口汽车提高关

① [日]浅妻裕：ロシア極東地域における中古車・中古零部件輸入の現状、『月刊整備界』40巻6号，2009年6月，第24-28頁。

② 同上。

③ [日]齋藤大輔：悩める極東中古車ビジネス—アクセルとブレーキの間で、『ロシアNIS調査月報』2010年11月号，<http://www.rotobo.or.jp/publication/monthly/m201011.html>

税过了一年十个月之后，日本二手车的进口基地符拉迪沃斯托克恢复了活力。尽管世界经济依然不景气，但日本对俄远东地区出口的二手车，却一扫2009年的颓废之气，显示出有力度的复苏和光明的前景。出口数量已经恢复到最盛时期四分之一的水平，并且，二手车分解出口（constructor）也有了新的方式，带动了出口数量的提升。同时，日本业者也在积极谋划在俄远东地区开拓新的基地。虽然二手车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卸货，但是日本业者根据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环境和当地消费者的喜好变化，开始在远东地区进行长远的布局。譬如，日本的“札幌本田集团”已将目光转向了萨哈林州，并在南萨哈林斯克市设立驻在员事务所。^①而日本海沿岸的日本地方自治机构，像新潟县（2009年7月，联络员事务所）、岛根县（2009年9月，岛根县商务支援中心）、鸟取县（2010年2月，鸟取县俄罗斯商务支援中心）、富山县（2010年5月，富山县商务支援办公室），秋田县（2010年5月，秋田县俄罗斯商务支援中心）等，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设立了商务办事机构，为包括二手车出口在内的日本对俄贸易提供更为坚实的保障。

然而，危机意识强烈的日本业者仍然对2009年的情形心存余悸。虽然2010年夏天以后，日本二手车的对俄出口出现了恢复景象，但他们仍然担心俄罗斯国内的商务环境。他们认为对俄出口二手车的环境已日趋严酷，俄罗斯国内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令他们备受煎熬。譬如，“2010年俄罗斯出台了汽车登记新标准，令日本业者普遍担忧俄是否会禁止日本二手车的进口。俄罗斯政府明确表示将分阶段提高进口汽车的关税，再次加深了日本业界的忧虑。”^②当前，日本二手车出口业者可谓处于忧喜参半的状态之中，一方面为景气恢复带来的出口数量的增加而高兴，另一方面又为俄罗斯国内将限制二手车的传言而担忧。总而言之，虽然2008年的盛况恐难再现，但是，自2010年至2012年上半年，日本二手车对俄远东地区的出口数量却在稳步增长。

（二）俄罗斯汽车产业的现代化战略

影响日本二手车对俄出口的另一大“对手”就是俄罗斯国内汽车产业的

① [日]後藤正弘：サハリンから見えてくるロシア自動車市場の将来，『ロシア NIS 調査月報』2010年11月号，<http://www.rotobo.or.jp/publication/monthly/m201011.html>

② [日]齋藤大輔：悩める極東中古車ビジネス—アクセルとブレーキの間で，『ロシア NIS 調査月報』2010年11月号，<http://www.rotobo.or.jp/publication/monthly/m201011.html>

发展。俄罗斯政府已认识到本国经济过多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对国际油价波动过于敏感的缺点。为克服自身经济的缺陷，俄政府将培育高附加值、能对抗国际油价波动的产业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提出。为达成这一战略目标，俄政府对国内汽车产业寄予厚望，并从十多年前就采取各种优惠扶持措施，一心要帮助汽车产业实现现代化。首先，俄政府对来俄投资生产汽车的外资企业提供进口关税方面的优惠措施，寄希望于由外资主导达成国内汽车产业的现代化。由于迟迟达不到理想效果，俄政府为此几番调整优惠措施的内容。

1998年2月5日，俄总统签署关于“发展本国汽车工业吸引外资”的第135号命令，为生产现代交通工具以及汽车零部件的工程项目、包括有外国投资者参与的大型工程项目，提供国家支持，并颁布“投资合同制度”。该措施的主要内容有：（1）投资额在最初5年内超过15亿卢布的汽车或者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只要投资者与俄政府签订投资合同就享受优惠措施。（2）在项目实施期间（最长7年内），俄国国内的项目生产基地作为保税仓库，生产的产品享受俄罗斯自产商品同等待遇。（3）签订投资合同的投资者有义务使得零部件本地化水平在5年内达到50%。

在上述措施面前，国外许多汽车企业显示出跃跃欲试的参与热情，但最终都因为零部件本地化5年内须达到50%的条款过于苛刻而止步不前。最后，只有福特公司一家与俄政府签订了合同，并在列宁格勒州建厂，于2002年7月开始生产福特“福克斯”汽车。然而，合同规定的“生产开始后5年内零部件本地化水平达到50%”却无法实现。在俄罗斯国内难以采购零部件的主要理由是：（1）俄罗斯当地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企业的技术水平低下；（2）福特当地工厂最初的生产能力为每年25,000台，规模太小，外资零部件企业不愿追随福特公司进入俄罗斯市场。^①

在此期间，随着俄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他们对汽车的需求快速增长，但是俄罗斯国产车的技术仍停留在较低水平，于是自2002年起，俄市场再度出现二手车进口热，其价格与俄国产车相当，成为俄生产者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为此，俄罗斯规定对二手车实行统一的25%的关税，为期7年，来保护

① [日]坂口泉：ロシアの自動車産業の近代化，『ロシアの近代化・エネルギー・環境』，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2012年3月，第144頁。

国内汽车产业的发展。其实，为了振兴国内的汽车产业，俄罗斯政府曾多次对进口二手车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譬如，（1）要求所有上路行驶的车辆，包括乘用车、巴士、卡车、拖拉机的技术规格以及检查方法和安全规格标准必须符合俄罗斯国家的规格标准。（2）从2002年12月起，禁止尾气排放不符合“欧1”标准的巴士和卡车的进口。尤其是2002年10月的提高进口关税、2003年7月废除个人进口二手车享受的低关税措施，导致日本二手车进口数量的降低以及二手车价格的暴涨，一度引发了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居民的抗议游行。俄政府担心的是，民众选择了日本车，就不会再考虑开国产车了。不管怎样，日本二手车已经深深影响着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①

与此同时，俄政府认识到“投资合同制度”不符合现实国情，没能对汽车产业现代化作出贡献，因此，从2004年开始降低零部件本地化的标准，实施了新的优惠措施——“工业组装措施”。所谓工业组装措施，就是满足一定条件的整车工厂以及零部件工厂（包括俄资与外资），享受零部件以及原材料进口关税优惠。2005年3月29日，俄政府颁布第166号令，“为保障工业组装项目，调整进口汽车零部件的关税”。同年4月中旬，俄联邦工业和能源部以及相关部门下达了具体规定的共同指令。根据该指令，认定为工业组装的工厂必须达到三个条件：（1）准备期限，即生产准备就绪所需时间，如焊接、油漆、车身组装等，在产工厂为18个月，新建工厂为30个月；（2）生产能力，若为两班制生产，每年生产不低于2.5万辆；（3）配套自给率，组装生产过程调试完毕后，经过24个月，进口零部件数量降低10%，42个月后再降10%，54个月后再降10%（即，10年内减少30%的进口零部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增加零部件本地化，也可以支付正常的关税，进口所需的零部件。关税的降低标准根据零部件种类不同而有所差异，像发动机、变速箱、消音器、车座等60-70种零部件的税率为零，其他零部件关税从高于10%降为3-5%。再加上零部件本地化的限制大幅降低，2003-2004年以后，俄罗斯乘用车市场以倍增之势发展。许多外资整车企业决定在俄投资生产。2011年之初，符合俄罗斯工业组装措施并在当地投资生产的外国整车企业，除了

① [日]相田裕之：ロシア極東マイクロビジネス支援，経済産業省ロシア・NIS室，2003年9月，www.rotobo.or.jp/events/micro/No.6.htm

福特之外，还有丰田、日产、GM、VW、PSA/三菱汽车、雷诺、现代等汽车厂商。此外，外国零部件企业，像丰田纺织、Johnson Controls、Bosal、Magna等，也与俄政府签订了有关工业组装措施的协定。

为了振兴国内汽车产业、保障工业组装措施的落实，俄政府对于进口二手车的限制也日益升级。自2006年10月29日起，进口二手车必须符合“欧2”标准。2008年1月1日起执行严格的“欧3”标准，2010年1月1日起，“欧4”标准开始适用，并计划自2014年1月1日起采用“欧5”标准。尤其是针对日本二手车的进口，俄政府向来持反对态度，2006年普京政府准备对日本二手车的流入采取限制措施，却激起了远东地区居民的强烈抗议。因为二手车的改装工业是该地区重要的产业之一。^①俄政府曾酝酿过两项限制措施：一是禁止右置方向盘汽车的进口，这项措施至今尚未实施；二是拟于2009年9月起规定，禁止没有VIN编号（Vehicle Identification Number，17位的车辆识别号）的车辆通行，这就意味着只有11位车辆识别号的日产二手车将被挡在国门之外。不过，该措施于2010年9月在俄政府高官会议上被撤销。^②俄政府的上述限制措施，曾一度对日本的二手车出口业界，尤其是俄罗斯远东和环日本海地区的进出口商造成一定程度的恐慌。由于上述措施并未正式实施，因此，对于日本二手车的出口数量没有造成实际上的负面效果。

工业组装措施的实施效果是，有众多的外国汽车企业开始在俄国生产汽车，但外国汽车企业的俄国工厂零部件本地化率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譬如，VW在2010年秋天时，零部件本地化率只有39%，Tiguan为22%，Fabia Octavia约为9%。^③而且，国内采购的零部件多为座椅、车灯、减震器、车用玻璃、轮胎、蓄电池等低端产品，像发动机、变速箱、电子元件等复杂的高价零部件，几乎没有在当地采购。零部件本地化率没有达到预期增长的最大理由仍然是俄罗斯当地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企业的技术水平太低，特别是原材料的品质很差。以钢板为例，俄罗斯国内竟然没有一家钢铁厂能生产令外国汽车企

① 《俄罗斯报》：“俄罗斯人喜欢日本二手汽车”，2006年8月1日，http://www.crc.Mof.com.gov.cn/crweb/scoc/info/Article.jsp?a_no=38888&col_no=238

② [日]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中古車の現地輸入規則および留意点：ロシア向け輸出，2010年11月，http://www.jetro.go.jp/world/russia_cis/ru/qa/01/04A-041114

③ RBCdaily, 7 Sep.2010, <http://www.rbcdaily.ru>

业满意的钢板。虽然也有外资零部件企业进入俄罗斯，但数量太少，无法促进零部件本地化率大幅提升。也就是说，工业组装措施确实吸引了外国整车企业和一次性零部件企业，对俄罗斯汽车产业上游的现代化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对其下游产业的现代化并没有贡献。

为此，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初，俄工业和贸易部开始酝酿新的工业组装措施，2011年2月，关于新工业组装措施的多部门共同指令公布生效。新工业组装措施协定（有效期8年）的缔结条件较以往严格很多，主要内容包括：（1）协定生效后4年内必须年产30万辆汽车；（2）零部件本地化率在协定生效后第4年达到30%以上，第5年40%以上，第6年60%；（3）整车的30%必须装备国产发动机以及变速箱；（4）除组装、喷漆、焊接生产线之外，协定生效后4年以内必须安装冲压生产线；（5）协定生效后4年内设置R&D中心。满足上述条件的汽车生产企业可与旧工业组装措施规定的一样，享受组装用零部件的进口关税优惠。新工业组装措施也适用于零部件企业。零部件企业根据适用条件有所差异，但多数零部件企业必须在2015年或2018年之前完成零部件本地化率45%的要求（电器零部件、电子元件、安全带等在2015年之前达到30%即可）。目前已有AvtoVAZ/IzhAvto/雷诺日产联合、福特/Sollers联合、VW、GM等4组企业按照新工业组装措施与俄政府达成了协议。

对于新工业组装措施，坂口泉研究员认为：通过新工业组装措施来实现俄罗斯汽车产业现代化的可能性不高，该措施只是将汽车产业的顶端（整车组装部门）以及最靠近顶端的产业纳入现代化视野，与其下游部门的现代化并无联系。再综合考虑其他因素，也只能得出相同的判断。^①其他的因素主要有：（1）俄罗斯乘用车市场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2000年至2008年，俄罗斯国内汽车销售势头迅猛。然而，2008年9月之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俄国内汽车销售市场一改以往的热销局面，2009年的销售数量只有2008年的一半左右。当时，由于油价低迷、经济危机等信息的泛滥给消费者心理带来很大不安，限制了购买乘用车等高价耐用消费品的热情。而且，俄联邦的财政预算过度依赖石油领域，对于油价低迷的感受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因此

① [日]坂口泉：ロシアの自動車産業の近代化，『ロシアの近代化・エネルギー・環境』，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2012年3月，第149-153頁。

无法保证俄罗斯的汽车市场今后不再出现2009年那样的诡异波动。(2) 加入WTO之后市场的变化。2012年8月22日，俄罗斯正式加入WTO之后，乘用车（新车）进口关税将由现在的30%降为25%，经过7年时间的过渡，最终降到15%。而俄罗斯乘用车市场本来的特点就是车型丰富、小量销售。关税降低之后，进口车非常容易适应俄罗斯乘用车市场的特点，将对俄国内的外资企业构成巨大挑战。

此外，在俄投资的外国企业，像AvtoVAZ和雷诺日产、Sollers和福特等，在俄生产面临的重大问题都是筹措资金问题，没有巨额资金的支持，它们很难实现既定的生产计划。^①在一段时间内限制俄罗斯汽车产业发展的，还有国内道路的问题。日本学者认为，俄罗斯患上了“不合格道路病症”。虽然俄罗斯道路全长53.7万公里，但柏油路只占67.4%，由俄联邦政府管理的仅有5万公里，各都市管理的近50万公里。这种客观情势必然限制国内汽车产业的发展。为此，俄政府制定了道路特别发展规划，计划在2015年以前出资50兆卢布整修老路，并将道路延长至60万公里。^②

最近一两年来，在俄罗斯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其国内汽车行业出现了较好的发展势头。根据俄罗斯欧洲商业协会（AEB）的统计（2012年1月12日），2011年俄罗斯国内新车，包括乘用车与小型商用车（LCV）的销售数量比上一年增加了38.7%，达到2,653,408辆，虽然没有达到历史上最高年份2008年290万辆的记录，但却超过了2011年初预想的240万-250万辆。而且，俄罗斯国内的汽车业者普遍认为，到2015年，俄国内汽车销量将达到300万辆。请参考图7。^③2011年9月，普京总理在俄罗斯沃洛格达州出席统一俄罗斯党的会议时表示，他完全赞同专家关于到2015年至2016年俄罗斯有能力成为欧洲最大的汽车市场的预测。^④

① [日]坂口泉：ロシアの自動車産業の近代化，『ロシアの近代化・エネルギー・環境』，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2012年3月，第153頁。

② [日]吉田信美：ロシア自動車市場の推移と現状、そして今後，JAMAGAZINE，2008年11月号，<http://www.jama.or.jp/lib/jamagazine/200811/04.html>

③ [日]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ロシアの自動車部品産業，調査レポート，2012年7月，https://www.jetro.go.jp/world/russia_cis/ru/reports/07001016

④ 新华网莫斯科2011年9月5日电：“普京预计五年后俄将成为欧洲最大汽车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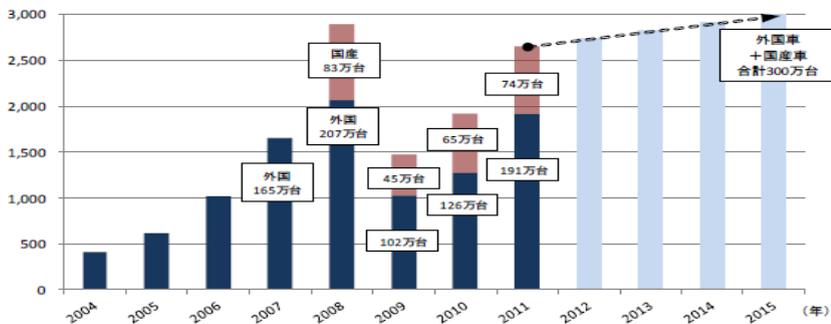


图7 俄罗斯外国与国产乘用车销售业绩与展望 (2004-2015年)

说明：2007年前只含国外品牌汽车，2008年后含国产车；2012年以后是预测值。

资料出处：https://www.jetro.go.jp/world/russia_cis/ru/reports/07001016

俄罗斯为解决国内经济过度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的局面，一项重要战略举措是发展国内的汽车产业，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为国外汽车企业在俄国生产创造良好的环境。可以说，俄罗斯发展国内汽车产业的政策具有长期的战略性，不会轻易动摇。而且，俄罗斯又是一个军需产业大国。长期来看，它很有可能在汽车生产技术方面发挥出自己的优势，但是从短期来看，技术落后的局面较难改变。由于发展国内汽车产业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一项国家战略，在这一形势下，俄罗斯必然要采取提高关税等措施来限制包括二手车在内的汽车进口。有鉴于此，对于俄罗斯不断延长提高汽车关税的时间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过，俄罗斯加入WTO后，关税必然相应降低（参照表7），但对于二手车进口市场来说，恐怕还会出台新的措施加以限制。

表7 俄罗斯入世（WTO）后轻型车辆进口关税的变化

| 2011年 | 2012年 | 2013年 | 2014年 | 2015年 | 2016年 | 2017年 | 2018年 |
|-------|-------|-------|-------|-------|-------|-------|-------|
| 30.0% | 25.0% | 25.0% | 25.0% | 22.5% | 20.0% | 17.5% | 15.0% |

资料来源：Ernst&Young(CIS), “An Overview of the Russian and CIS automotive industry”, February 2012, [http://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Russian_and_CIS_automotive_industry/\\$FILE/Russia %20Automotive_2012.pdf](http://www.ey.com/Publication/vwLUAssets/Russian_and_CIS_automotive_industry/$FILE/Russia%20Automotive_2012.pdf)

（三）日本二手车对俄出口的新形态

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受到关税提高和全球经济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日本二手车的销售一度出现大幅回落，目前正处于恢复阶段。然而，该地区组装日本二手车与二手零部件的进口却一直处于相对坚挺的状态，这为日本二手车的对俄出口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

早在1990年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与日本石川县领导人会谈时，俄方就指出：“最近从日本进口的二手车，一旦发生故障，因为没有维修零部件，就成为大件垃圾。我们不喜欢路上跑的车辆都是不能维修的。”^①因此，日本北陆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决定举办产业展示会，并于1991年7月在伊尔库茨克市体育中心举办了大规模的展示会，日本二手车以及二手零部件也在会上展出。其后，日本二手车零部件慢慢扩大了销路，不仅在远东、西伯利亚和黑海地区，就连莫斯科也有销售网络。

随着日本二手车零部件市场的逐渐成熟，俄远东地区的汽车解体产业也逐渐形成规模。该地区的汽车解体业者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收购当地的报废汽车进行解体的业者；第二类是从日本进口二手车零部件的业者；第三类是从日本进口分解的二手汽车在当地进行解体的业者。可是，2009年以后，第一类业者也开始从日本进口解体汽车拆解后出售二手零部件。^②因为日本业界有一个判断，认为经济低迷反而有利于提升低价位的二手车零部件和翻新零部件的需求。^③其实，最直接的动因是近年来俄罗斯汽车零部件市场一直呈现两位数的增长。虽然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二手车零部件市场因为保有车辆的长期使用和车辆维修的需要，仍呈现出活力。这对于日本的汽车零部件业者而言（包括二手零部件业者）是一个长期的利好（请参考表8）。况且俄罗斯道路情况很糟，建设迟缓，所以对于维修零部件的需求更多。

表8 2000-2011年俄罗斯国内汽车零部件销售额（单位：亿元）

| 年份 | 国内品牌销售额 | 外国品牌销售额 | 销售总额 | 变动（%） |
|------|---------|---------|------|-------|
| 2007 | 145 | 105 | 250 | — |
| 2008 | 140 | 148 | 288 | 15.2 |
| 2009 | 130 | 191 | 321 | 11.5 |
| 2010 | 120 | 260 | 380 | 18.4 |
| 2011 | 110 | 327 | 437 | 15 |

资料来源：“The Emerging Component Market in Russia”，http://www.pwc.ru/en_RU/ru/automotive/assets/pwc_automotive_component_suppliers_database

① [日]平岩幸弘：中古車・中古部品輸出ビジネスの先駆け，『月刊整備界』第37卷13号，2006年12月，第46-48頁。

② [日]浅妻裕：ロシア極東地域における中古車・中古部品輸入の現状，『月刊整備界カーメンテナンスマネジメント』第40卷4号，2009年6月，第24-28頁。

③ [日]中谷勇介：自動車のハイテク化と中古部品の可能性，『月刊整備界』第40卷7号，2009年7月，第24-27頁。

此外，一个更为重大的利好条件是：随着俄罗斯国内汽车产业的现代化发展，特别是在俄政府颁布的工业组装措施中，对外资汽车企业的零部件本地化率有着硬性规定，同时也通过降低关税（由以往的5-20%降为0-5%）等措施，为汽车零部件市场提供发展契机。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汽车厂商纷纷开始在俄投资生产汽车，譬如丰田自2007年12月、日产从2009年6月，开始在圣彼得堡组装生产汽车。接着，三菱、五十铃等汽车厂商也进驻俄罗斯西部。日本汽车企业（包括日本二手车出口业者）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认为俄罗斯远东地区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必须长期关注俄政府对于远东地区的战略举措。由于当地从事日本二手车交易的人口众多，俄政府对于进口二手车的限制措施将带来他们的失业，给当地经济的发展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最稳妥的方式是培育当地的汽车产业。同时，日本汽车企业也看到，2011年12月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承认了俄罗斯的WTO成员国地位，2012年8月俄罗斯正式加入WTO以后，必然会下调汽车关税，这对包括日本二手车出口在内的日本汽车业者是一个利好因素。

2011年，丰田、五十铃、马自达等日本汽车厂商相继准备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设立生产基地。丰田汽车计划在远东地区，利用日本进口的零部件，组装人气很高的SUV车。^①当日本知名汽车厂商纷纷进驻俄罗斯之际，有着强烈团队精神的日本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业界当然不会单打独斗，他们会共同参与俄罗斯国内汽车市场，形成日本汽车品牌在俄罗斯的整体影响力。

结 语

普林斯顿大学西里尔·E·布莱克教授曾经牵头组织多位美国学者，对日俄两国的现代化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认为，日俄两国的共同特征是：为了实现现代化，领导人拥有通过公私机构进行社会动员的能力，包括集中进行政治控制和协调的能力、管理资源并支持经济增长的能力、鼓励社会互

① [日]阿部新：最近の中古車輸出市場の動きについて、『月刊自動車リサイクル』第12号，2012年3月，第56-65頁。

相依赖的能力以及通过研究和教育来产生和分配知识的能力。^①罗伯特·吉尔平则认为，“发展型国家资本主义”是日本政治经济体系的本质特性，在这个体系当中，政府官僚、执政的自民党和大企业三方组成的统治联盟，为实现赶超西方的目标，采取了贸易保护、出口导向和其他政策来迅速实现工业化。尤其是日本通产省和其他政府部门，为支持重点产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提供了诸如进口保护、政府大量补贴和低成本融资等产业政策，迅速推动了工业化和高科技部门的发展。再加上日本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卓越的企业管理和创业精神，以及杰出的教育体系，一并构成了日本现代化成功的主要原因。^②

借助布莱克、吉尔平等人的理论，来分析日俄两国汽车产业的现代化历程，会发现日本汽车产业现代化的成功，显然是受益于国家实施的产业政策。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提出发展日本自主品牌的政策，鼓励日本汽车企业引进欧美技术来发展自己的企业。结果到了50年代末期，就形成了自主生产、技术开发的模式，到了1980年就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并打造了丰田、日产、本田等世界知名的汽车品牌。正是有了这些基础，才使得日本二手车也同样受到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欢迎。

同样，当前的俄罗斯为了实现汽车产业现代化，也采用类似于当初日本汽车产业发展的路径，积极引进外资以及美欧日等国先进的汽车技术，并采取政府补贴、贸易保护，通过提高关税等手段来限制日本等国的二手车进口，发展本国的汽车产业。然而，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俄罗斯经济转型，面临着内外两个方向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挑战包括世界范围各大经济体的增长减速、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延续以及美国的“页岩气”革命，直接冲击着俄罗斯最可依赖的能源贸易；来自内部的挑战包括政治与社会的稳定、总体治理水平的下降、商业环境亟需改善等，而首要任务是完成经济的现代化。^③

① [美]西里尔·E·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4-43页，第436-437页。

② [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杨宇光、杨炯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42-145页。

③ 余南平、李秋悦：“后金融危机时代俄罗斯经济转型评估”，《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3期，第170页。

从世界范围来看，汽车产业正出现结构性危机。譬如，当今全世界汽车生产能力达1亿辆，而需求只有5、6千万辆，巨大的过剩压力，使得汽车产业面临着优胜劣败的选择。同时，全球能源的枯竭和环境保护政策，又迫使汽车产业必须开发下一代的汽车，到底是选择混合动力汽车还是选择电动汽车还没有答案，而且今后研发的主体也许是电机产业或者是能源产业以及其他产业。这些不确定因素都构成了俄罗斯汽车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俄罗斯最终能否顺利完成经济上的“结构改革”，实现包括汽车产业在内的现代化战略目标，是值得长期关注的一个课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利用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加以阐释和证明。然而，也正因为有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在俄罗斯尚未成长为汽车大国之前，日本二手车（包括二手车零部件）在俄罗斯依然存在一定的市场，但是2008年那样的辉煌恐怕已一去不复返了。

【Abstract】Japan is a leading country in the field of car production and has gained worldwide reputation thanks to its cars' quality, performance, energy 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ies. At present, almost all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have mass consumption of Japanese cars. Meanwhile, Japanese used-cars are also popular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because of their excellent quality and reasonable price. Especially in Russia, which has not modernized its automobile industry yet, Japanese used cars had for a time became the first choice for most residents in Russian Far East and Siberia. However, the export of Japanese used-cars to Russia started facing some problems due to the rise of tariffs and trade protection measures by the Russian government to protect its own automobile industry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Right now, export of Japanese used-cars to Russia is in a recovery phase but the former enormous exporting figures could hardly repeated. Nevertheless, due to the uncertain factor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ssian automobile industry, it can be foreseen that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modernization of Russian automobile industry, Russian Far East will still be an important market for Japanese used-cars.

【Key Words】 Japan, Russian Far East region, export of used-cars, automobile industry policy

【Аннотация】 Япония является страной-производителем автомобилей, произведённые в Японии автомобили получили мировое признание по многим аспектам: качество,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ость, энергосберегательные технологии и технологии защиты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почти во всех странах и регионах отмечается массовое эксплуатация японских автомобилей. Между тем, подержанные японские автомобили в силу таких преимуществ, как хорошее качество и низкая стоимость, также стали популярны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рынке. В частност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ещё не проводивше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в автомобиль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и японские подержанные автомобили стали приоритетным выбором для подавляюще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жителей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и и Сибири. Однако с целью развит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автомобиль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я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поднимала тарифы на импортные автомобили, осуществляла меры торговой защиты, это в сочетании с воздействием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привело к тому, что экспорт японских подержанных автомобилей в Россию оказался в беде.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экспорт японских подержанных автомобилей в Россию находится в стадии постепенног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но, кажется, трудно будет снова увидеть былую ситуацию.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из-за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множества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ей в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автомобильной индустрии в России, можно предположить, что до завершени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автомобиль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и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будет оставаться важным экспортным рынком для японских подержанных автомобиле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Япония,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регион России, экспорт подержанных автомобилей, политика автомобиль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责任编辑 常喆)

非传统安全与俄罗斯外交

气候政治的俄罗斯因素

——俄罗斯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立场、问题与前景

姜睿*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俄罗斯在国际气候合作中的影响被广泛忽视。俄罗斯曾经是《京都议定书》得以生效的关键性促成力量；未来数年俄罗斯仍将是世界性的能源大国；其累计的高额碳信用额度引起了欧盟和美国的担忧；其拥有的强大的碳隔离能力如若不善加管理，则有可能从碳库转化成碳源，给全球的气候变化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俄罗斯在国际气候合作中的立场有何变化？受到那些因素的影响？存在哪些问题？在后京都气候框架中又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通过对近年来俄罗斯气候领域的具体分析，将可以找到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

【关键词】俄罗斯 气候政治 国际气候合作 京都议定书

【中图分类号】D829.1(51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4-0192-(17)

导言

气候危机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气候问题不仅局限于科技领域，而且也涉及经济、政治等领域，成为当前困扰人类社会的重大危机，因而日益显现出其特有的、必须各国联手共同应对的性质。^①气

* 姜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讲师，博士。

① 于宏源：“气候变化与全球安全治理：基于问卷的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6期，第19页。

候危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对于气候问题的讨论已经成为国际高层政治对话的经常性议题，国际气候制度的讨论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欧盟、美国、中国、印度等成为媒体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这些国家与地区对于气候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各不相同，欧盟和美国一直在推动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设置自己的减排目标，而中印等国则以经济发展需要能源消耗为由，对硬性减排指标表示反对。美国政府由于难以说服国会议员通过减排协议而面临国内的政治挑战。

与其他大国不同，俄罗斯似乎一直游离于国际社会的焦点之外，在气候政治中表现出超然的态度，在各国博弈中表现不够活跃，其立场和地位被媒体和学界广泛忽视。俄罗斯作为世界能源大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曾经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在今后的全球气候框架中又将占据什么样的位置？本文拟通过对相关问题的分析，对此作出初步判断。

一、国际气候合作中俄罗斯所持立场及其影响因素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全球气候合作的主要通道和机制。公约达成以来的 20 年里，世界各国围绕其有效实施开展了艰辛而曲折的谈判。1997 年达成（2005 年批准）的《京都议定书》初步设定了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机制，但围绕这一机制的谈判屡遭挫折。公约框架下国际气候谈判的不利局面显示，联合国机制在规制全球气候合作方面仍存在不少障碍。然而，虽然公约之外也出现了多种与气候变化主体相关的多边机制，但到目前为止，尚不存在以这些机制取代公约的可能性。^①因此，本文所界定的国际气候制度主要是指在公约主线下形成的机制，而《京都议定书》是二十年来这一机制的核心。

基于此，可以把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大致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②：1990 年至 1994 年是第一阶段，在此期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并正

① 高翔、王文涛、戴彦德：“气候公约外多边机制对气候公约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第 4 期，第 59 页。

② 陈迎：“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及对中国谈判立场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第 2 期，第 52 页。

式生效；1995 年到 2005 年是第二阶段，《京都议定书》经历了坎坷的谈判和批准过程；2005 年以来是第三阶段，国际力量围绕后京都问题展开博弈，其间，经历了“巴厘岛路线图”、坎昆会议、哥本哈根谈判、“德班平台”等重要过程。本文将分析国际气候制度构建过程中俄罗斯所扮演的角色，进一步分析其所持立场及主要的影响因素。

在分析俄罗斯意愿和立场之前，我们有必要厘清影响一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决定因素都有哪些。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经济、环境与政治（“民主—环境”假说）三个角度来分析一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决定性因素。斯普林茨（Detlef Sprinz）和瓦托伦塔（Tapani Vaahtoranta）^①认为，一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生态脆弱性与减缓成本，并据此提出了“以利益为基础”的分析模式，把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各国划分为“推动者”、“拖后腿者”、“中间摇摆者”与“旁观者”四种类型。具体可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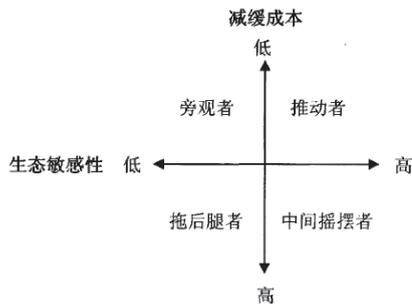


图 1 不同国家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立场分类

资料来源：Detlef Sprinz, Tapani Vaahtoranta, “The Interest-Based Explana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8, No.1, Winter, 1994, p.81. 转引自孙超：“前行中的困顿：京都时代与后京都时代的俄罗斯气候环境外交”，《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6 期，第 96 页。

福克纳(Robert Falkner)^②、巴雷特(Scott Barrett)^③，以及罗伯茨(Timmons

① Detlef Sprinz, Tapani Vaahtoranta, “The Interest-Based Explan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8, No.1, 1994, pp.77-105.

② Robert Falkner, “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7, No.4, 2005, pp.585-599.

③ Scott Barrett, *Why Cooperate? The Incentive to Supply Global Public Goo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Roberts)^①等学者从参与国际环境条约的角度入手探讨一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意愿和行为。康格尔顿(Roger Congleton)^②、施泰因(Jana Stein)^③等学者则从民主制度的角度对一国参与全球气候合作的立场进行探析。中国学者刘昌义^④对于国际环境治理的研究进行了详尽的综述,并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减排成本是影响各国减排意愿和行动的的决定性因素。

相比较而言,经济因素对于一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意愿的影响更具有决定性。经济因素具体又可以细化为:生态脆弱性、减排成本、排放强度、排放拐点(是否越过排放峰值)、低碳经济优势等要素。依据图1,并结合其他影响要素,我们基本可以判断一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要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动态变化的。因此,一个国家的立场也会有阶段性的相应改变。此外,并非是这些要素的真实数值在影响一个国家的立场和意愿,更多的时候是一个国家对这些要素的判断与认知在影响一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立场。如果其认知有错误,自然会使这个国家扮演不该扮演的角色,如果其认知有较大的变化,则其立场自然会有断裂和转型。

总体来看,与其他大国不同,俄罗斯在国际气候环境外交中呈现出浓厚的矛盾色彩,并表现出鲜明的“断裂与延续”的特点:即断裂的立场和连续的利益战略。^⑤俄罗斯在国际气候合作中表现的立场呈现不规则的跳跃式的变化,其扮演的角色在“旁观者”这个主旋律中掺杂着“推动者”和“拖后腿者”的跳跃音符。

“旁观者”是俄罗斯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立场的主线。这种立场尤其鲜明地展现在其批准《京都议定书》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在其批准议定书之后,

① Timmons Roberts, “Who Ratifies Environmental Treaties and Why? Institutionalism, Structuralism and Participation by 192 Nations in 22 Treatie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4, No.3, 2004, pp.22-64.

② Roger Congleton, “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Pollution Control”, *Review of Economic and Statistics*, Vol.74, No.3, 1992, pp.412-421.

③ Jana Ste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Ratific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and the Kyoto Protocol”,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2, No.2, 2008, pp.243-268.

④ 刘昌义:“各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4期。

⑤ 孙超:“前行中的困顿:京都时代与后京都时代的俄罗斯气候环境外交”,《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6期,第89页。

在一个短时期内也表现得较为明显。俄罗斯对于气候变暖的科学依据持质疑态度^①，同时认为，即使气温上升，带给俄罗斯的利也多于其弊。因此，俄罗斯对于自身生态脆弱性的认知判定结果是处于较低水平，而一国的生态脆弱性越低，该国减排温室气体并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意愿就越低。此外，俄罗斯的碳排放水平在苏联解体后锐减，并连续多年保持在历史较低水平，其认知中的减排成本也处于较低水平，因此，俄罗斯可以轻松地完成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任务。而且，俄罗斯已经越过了碳排放峰值。由于以上因素的影响，俄罗斯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意愿不高。它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利用能源资源大国的地位，促进本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部门的迅猛增长上。所以，俄罗斯迟迟不肯签署《京都议定书》。2003年年底，俄罗斯总统高级顾问还曾在国际会议上宣布，俄罗斯不会签署旨在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协议的现有文本。

俄罗斯批准《京都议定书》的行为彰显了其作为“推动者”的角色。但事实表明，这并非俄罗斯的真正立场，仅仅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一种异常表现。2004年11月5日，普京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这一旨在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议定书正式成为俄罗斯的法律文本。《京都议定书》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对经济活动的监管不再是各国政府的专属领域，而成为各国政府间协定的对象。议定书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形式强制要求发达国家进行减排，规定主要工业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12年前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考虑到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该议定书确立了“共同但带有区别的责任”等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则，以及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机制等三个实现减排的灵活机制。根据规定，《京都议定书》生效的前提是，它必须由附件B中1990年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的至少55个缔约方批准。^②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是美国，其1990年的碳排放量就占到全球碳排放量的近34%。但美国政府借口减排将阻碍美国经济的发展以及要求发展中国家也相应承担减排责任，最终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

① 孙超：“前行中的困顿：京都时代与后京都时代的俄罗斯气候环境外交”，《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6期，第91页。

② Кузнецовой К.В. Глобальное потепление климата и меры, предпринимаемы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сообществом. <http://www.bibliofond.ru/view.aspx?id=485338>

签字，不接受任何捆绑目标的限制。虽然欧盟、日本等126个国家已经批准了议定书，但其排放量总额离议定书的要求仍有距离。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也不在议定书规定的减排国家之列。而能源大国俄罗斯199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到世界总排放量的16.4%，因而俄罗斯对议定书的批准在当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①。曾有学者评价说，对议定书的批准是俄罗斯在冷战结束后，在事关全人类利益的国际合作中第一次呈现出正义者和引领者的姿态。^②然而，事实的背后隐藏着不同的驱动因素。当时，欧盟为了竭力避免议定书胎死腹中，曾与俄罗斯进行了密切协商。欧盟从地缘政治经济的角度对俄罗斯施压，把俄罗斯是否批准议定书与欧盟是否支持俄罗斯加入WTO，以及是否支持俄欧能源合作等问题挂钩，促使俄罗斯改变其“旁观者”的立场，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而当时的“别斯兰事件”使得俄罗斯的形象受损，俄罗斯也需要一个契机重新塑造其国际形象。在内外压力之下，俄罗斯终于下定决心，在国际气候合作中，从一直扮演的“旁观者”，突变而成了“推动者”。

由于对国际气候合作决定性因素的认知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因此在批准议定书这一积极举措之后不久，俄罗斯又重新回到了“旁观者”的主线上。在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之前，媒体发现俄罗斯对于谈判持中立立场，对推卸或者承担责任这两者都不感兴趣，对于热门的气候话题也保持超然态度。正如俄媒体所指出的：“俄罗斯仍然游离于全球社会之外，好像我们生活在其他星球”^③。然而，随着俄罗斯极端气候现象频发，气候问题日益突出，以及经济转型加速，能源强度提升，其对国际气候合作影响因素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首先，俄罗斯认可了其环境的脆弱性，而且其人均碳排放量也在不断上升，因此，俄罗斯的立场从“旁观者”向立场较为积极的区间靠近，介于“中间摇摆者”和“拖后腿者”之间。俄罗斯在哥本哈根谈判中最显著的发展，是明确了把其气候政策和其自身经济利益联系起来。梅德韦杰夫在哥本哈根峰会的讲话中谈到俄罗斯2020年前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

① Nikitina Elena, “Russia: climate policy form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during the 1990s”, *Climate Policy*, 2001, No.1, pp.289-308.

② Constantin Holzer (周游): “影响俄罗斯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因素分析”, 《社会科学辑刊》, 2010年第2期, 第95页。

③ Запасная Планета// Ведомости. <http://www.vedomosti.ru/newspaper/article/2009/12/07/220653>

减少25%的减排目标时说：“我们削减碳排放并不是因为法律约束的协定。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这对我们有利。”俄环境和自然资源部长尤里·特鲁涅夫（Юрий Трутнев）也指出，气候保护与俄罗斯的经济利益紧密相关：“我们需要有更高的能源效率，否则最终我们将不再具有竞争力……”^①。

俄罗斯企图在参与国际气候合作中获取更多经济收益的意图日益鲜明，并主导了俄罗斯近年来的立场。在坎昆会议上，尽管日本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延续《京都议定书》。但当时俄罗斯尚未打算废除《京都议定书》，俄罗斯谈判官员表示，希望能够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继续使用该国在第一承诺期尚未用完的“排放权”。但是，俄罗斯希望延续“排放权”的主张，遭到了欧盟的反对。俄罗斯政府始终认为俄罗斯应当从附件一的国家名单中删除，因而在谈判中不时设置障碍。2011年底的德班会议上，俄罗斯已经明确表示不承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减排目标。“德班平台”的建立和发展，威胁和终结了《京都议定书》和《长期合作行动》的谈判。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一样，俄罗斯也想从《京都议定书》和《长期合作行动》跳跃到“德班平台”上，以摆脱《京都议定书》和《长期合作行动》中规定的减排目标和其他义务。尽管俄罗斯在国际场合并未积极带头公开反对，但其立场已经日益清晰。

二、俄罗斯参与国际气候合作面临的问题

如前所述，俄罗斯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立场反映了其“实用主义”的本质，同时也受到一些错误认知的误导。以下提到的俄罗斯在参与国际气候合作中面临的问题及其进一步发展，将有可能在未来改变俄罗斯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使其产生微调甚至突变。

首先，俄罗斯减排温室气体缺乏动力，能源强度进一步高企。由于苏联解体带来的经济收缩和混乱，在1990年到2002年之间，俄罗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急剧下降，给俄罗斯留下了相对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空间，俄罗斯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来限制排放就可以满足《京都议定书》的要求。这使得俄

^① Тепло, Еще Теплее//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http://www.rg.ru/2010/01/11/trutnev.html>

罗斯拥有了大量可转移的碳排放信用（carbon credit），即所谓“热空气”（hot air）^①。俄罗斯可以选择出售这些富余的信用，或者利用它们来应对未来的减排义务，而不需要在实际行动上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的规模。显然，批准议定书可以使俄罗斯向其他国家出售大量的排放信用，吸引外国投资，给本国经济发展带来良好机遇。因此，外界将俄罗斯参与议定书的行为理解为一种投资行为，其目的在于为企业和政府获取利益，而不是采取有效的国际行动来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时间的巧合掩盖了俄罗斯温室气体排放的长期趋势。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重工业崩溃与《京都议定书》基准年（1990年）的巧合，对解释俄罗斯和其他转型经济体的温室气体排放趋势产生显著影响，可能会造成误导。因为1990年刚好是俄罗斯温室气体排放最高的时候，这一时间上的巧合恰恰掩盖了俄罗斯减排的长期趋势。工业化背景下的前苏联经历了碳排放量迅速增长时期——其1950年CO₂排放量为2亿吨碳，到1968年达到6亿吨，^②其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同期的中国和美国，^③从20世纪初开始直到解体，前苏联一直是世界上第二大碳排放国。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仍是世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从总量来看，虽然自1992年以来俄罗斯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幅度下降，但仍居世界第四位，仅次于美国、中国和印度。从人均排放量来看，俄罗斯的数额也非常高，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几乎比中国高出四倍，未来数年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人均温室气体排放国。

《京都议定书》要求附件一国家在2012年前限制其排放量。附件一国家承诺，在2008-2012年期间，碳排放量要从1990年的水平平均减少约4%，不同的国家也被允许设立不同的减排目标。1990年以来，大多数国家都增加了排放量，从而不得不大力延缓碳排放量的增长。与大多数发达国家不同，作为前苏联解体后经济活动下降的结果，俄罗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显著减少，在1990年至1997年期间，碳排放量减少了34%。虽然经济复苏使得其温室气

① 当预期基础排放量低于京都目标时，一国可以在几乎没有任何成本的情况下销售其剩余的排放配额，这些剩余的排放配额通常被称为“热空气”。

② 任国玉、徐影、罗勇：“世界各国CO₂排放历史和现状”，《气象科技》，2002年第6期，第130页。

③ Boden, T.A., G. Marland, R.J. Andres,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Fossil-Fuel CO₂ Emissions”, http://cdiac.ornl.gov/trends/emis/tre_coun.html

体排放量又有所增加，但俄罗斯仍然无需采取任何缓解措施就可以符合京都目标。因为其上限是根据前苏联最高排放量的基数计算的，俄罗斯实际上没有受到任何真正的上限限制，因此也就缺少动力去减少其排放量。^①

俄罗斯的能源强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一倍左右。油气、化工、有色冶金、钢铁等部门是俄罗斯工业的主体，所排放的温室气体相当一部分来自其巨大的石油产业，特别是其天然气产业。^②而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外消费量巨大，大量的出口运输活动由作为销售方的俄罗斯来承担，相应地也就增加了俄罗斯国内所承担的碳排放量。俄罗斯是一个能源大国，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和出口国，其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出口约占全世界天然气出口的15%，仅次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还是世界第二大原油生产国和出口国。此外，俄罗斯也是世界第六大煤炭生产国^③。预计未来数年俄仍将保持其能源超级大国地位，其碳排放总量及人均排放量仍将居于世界前列。

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俄罗斯经济在 2009 年收缩了 7.9%。^④由于官方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发布一般滞后两年左右，专家粗略测算，经济危机导致 2009 年俄罗斯温室气体的排放比 1990 年的排放水平低 38%左右。也可以说，俄罗斯碳排放的这种变化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对俄罗斯的排放趋势的影响将有可能持续到 2020 年。

其次，俄所拥有的高额碳信用引起碳政治领域高度关注，俄罗斯高额的碳信用有可能会威胁到总量管制和交易体系（Cap and trade system）。《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在2012年前的温室气体减排设置了捆绑式目标。根据规定，污染排放低于规定指标的国家，可以向排放超出限制的国家出售未使用完的配额。由于俄罗斯的京都目标是稳定在1990年的排放水平，因而积累了巨大的碳信用额盈余，可以依据议定书出售多余的排放配额。这些排放配额对于减排成本高昂的国家有很大的吸引力。从他国购买排放配额的成本要

① Elena Lioubimtseva, "Russia's Role In The Post-2012 Climate Change Policy: Key Contradictions And Uncertainties", <http://forumonpublicpolicy.com/spring2010.vol2010/spring2010archive/Lioubimtseva.pdf>.p.6

② "Climate change, Russia Country Paper", http://hdr.undp.org/en/reports/global/hdr2007-8/papers/Perelet_Renat_Pegov_Yulkin.pdf.pp. 9-10

③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0*. IEA. <http://www.worldenergyoutlook.org/>

④ Росстат 2010.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счета: валовой внутренний продукт, http://www.gks.ru/free_doc/new_site/vvp/tab3.xls

显著低于改进工业技术的成本。在降低收购国减排成本的同时，出售碳信用额度也将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与此同时，作为国际碳市场的后来者，俄罗斯有 6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AAU, Assigned Amount Unit）^①可供出售。欧盟和美国担心俄罗斯可能会控制未来总量管制和交易体系，滥发碳信用额度冲击市场，导致碳价崩盘。^②而碳价过低则意味着污染的门槛下降，对新资源和新能源的投资将难以起到应有的促进减排的作用。俄罗斯如何处理大量的富余碳排放配额，是否出售以及通过什么方式出售，这个问题引起了碳政治领域的高度关注。俄罗斯对碳排放配额的销售计划很有可能会影响英美欲主导的碳交易金融市场的利益分配。

以上问题触及到俄罗斯参与国际气候政治领域博弈的核心利益，欧盟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是否容许俄罗斯在国际气候合作中充分发挥这种先天优势，使得俄罗斯尽得能源资源大国的利益，而无须像其他大国一样为减排付出巨大的成本？是否容许俄罗斯通过碳信用在金融市场中轻易地分其杯中羹？以及这种顾虑在多大程度上会引起欧美国家的掣肘和报复？这些态势的进展无疑将会和俄罗斯对国际气候合作决定性因素的认知结合在一起，对其立场产生深远影响。

三、俄罗斯气候环境变化的态势及其影响

近年来，俄罗斯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表现得日益明显，而其气候环境恶化的巨大外部性^③也将为本国和世界各国所了解。这将使得俄罗斯未来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立场更为鲜明，并有可能在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在国

① 作为碳减排合作机制之一的国际排放贸易机制（ETS）规定，采用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的模式，在设置排放量上限基础上对发达国家分发“分配数量单位”（AAU=1 吨二氧化碳当量），如果某国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其配额，则可以通过碳交易所进行转让。

② 俄联储：2012 年俄罗斯将签发 1 亿吨 ERU，<http://www.gdrcarbon.com/gjxw/gjxw/201203/764.html>

③ 所谓外部性，是指某一个体的经济行为影响了其他个体，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气候环境具有全球性的外部性问题，具体论述可参考 Nicholas Ster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际气候制度构建中发挥比目前更为积极的作用。

气候变化对俄罗斯的负面影响日益显著。俄罗斯具有独特的自然经济地理状况。由于俄罗斯的国土规模和地理分散性，全球气候变化预计会对其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例如富饶农业土地的增加以及严寒冬天的缩短、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等等。同时，气温上升将为俄罗斯在北冰洋和西伯利亚地区开辟航道、开掘资源提供新的可能性。^①到2025年，俄罗斯采暖季节的持续时间预计将缩短5%。目前能够威胁到冬季作物生长的寒冷冬天已很少见。在许多地区，植被生长时间增加了5至10天。大田作物的生长期也延长了。由于气候变化，俄罗斯西南部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Stavropol）的粮食产量增加了30%。

然而，在分析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时，明确区分现在的情况和未来的趋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俄罗斯境内大多数地区来说，预计气候变化对其产生的影响都将从微弱的积极影响转变为显著的负面影响。气候变化将对俄罗斯几乎所有经济领域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那些直接取决于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的领域，例如农业、林业、供水系统、建筑和工程建设，以及在多年冻土区的交通基础设施等，显然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的。对于俄罗斯南部和邻近地区来说，水则成为全球气候变化中对俄罗斯最具破坏性的因素。俄罗斯正经历着越来越不稳定的天气反常，预计在采暖季节期间及其之后会更频繁地经历异常温暖和寒冷的天气，以及霜冻、强风和大雪。为了减轻这种不稳定天气的影响，可能需要消耗额外的能源和燃料资源，而这正好抵消了总体变暖趋势可能导致的任何燃料的节省。降水量的变化是另一个未知且同样难以抵御的因素，因而加固水坝和其他水电设施是使国土免遭自然灾害侵袭的必要手段。冻土融化、水位升高以及洪水都对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如管道）的承载力提出了挑战，最终有可能会破坏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和运输。铺设了大量管道的俄罗斯北部地区将因此而受到威胁。

如果管理不善，俄罗斯潜力巨大的碳库（carbon pool）将转化为碳源（sources of carbon）。这种气候变化的巨大外部性将给俄罗斯的国内气候政策施加更大的国际压力。

① 张昕，“碳政治中的俄罗斯”，<http://www.china-review.com/gath.asp?id=24415>

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森林既可以作为温室气体的储藏库和吸收源，又可能因毁林、森林退化、火灾等，成为温室气体的排放源。^①研究表明，森林每生长1立方米蓄积量，平均能吸收1.83吨二氧化碳，释放1.62吨氧气。近年来，由于森林砍伐和森林火灾，其固碳减排的能力受到大幅度的削弱。据统计，2000-2010年期间，森林碳汇因砍伐、火灾以及退化而每年减少约5亿吨，森林成为继能源、工业之后全球第三大温室气体排放源。^②俄罗斯具有很强的碳隔离能力，国内排放量的四分之一都被俄罗斯领土上的森林、湿地、牧场和耕地所吸收。俄罗斯的寒带森林是世界上最大的森林地区。俄罗斯森林中含有约56.3亿吨的植被碳页（carbon in vegetation），这种碳的相当一部分目前冻结在占超过俄罗斯领土60%的冻土中的泥炭里。俄罗斯拥有近一半北半球的陆地碳。俄罗斯的天然森林资源在全球碳循环与气候变化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缺乏对森林资源的管理，进行森林砍伐，抑或发生气候变化，如日益频繁的森林火灾、冻土湿地和土壤的退化，相关的环境过程可能把这些重要的碳汇转变成碳源，并将大大加快目前的变暖趋势。^③俄罗斯联邦林业署副署长维克托·马斯利亚科夫2009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第十三届世界林业大会全体会议上说：“各种评估表明，俄罗斯每年的非法森林砍伐量在1500万至2000万立方米之间。”同时，国际社会对木材资源的需求不断上升，俄罗斯的森林将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而且其不同和独特的生物多样性也受到威胁。森林火灾也对俄罗斯的森林碳库造成了很大威胁。2010年入夏以来，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经历了少见的高温干旱天气，发生了严重的森林和泥炭地火灾。世界自然基金会俄罗斯分会指出，俄罗斯的森林大火有可能会加剧全球变暖趋势，因为森林火灾会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专家认为，由于泥炭地是碳的天然储存地，在发生火灾时，泥炭地历经千百年积累的大量二氧化碳也会得到释放并进入大气

① 黄东：“森林碳汇：后京都时代减排的重要途径”，《林业经济》，2008年第10期，第12页。

② 国家林业局：“俄罗斯森林大火恐加剧全球变暖”，<http://www.bcs.gov.cn/cms/viewarticle/6421>

③ Elena Lioubimtseva, “Russia’s Role in the Post-2012 Climate Change Policy: Key Contradictions and Uncertainties”.

层。^①此外，随着全球温度的持续上升，局部的永久冻土融化以及持续增强的干燥气候，有可能释放越来越多的温室气体到大气中，将目前的碳汇变成碳源，从而进一步推动全球变暖。俄罗斯西伯利亚冻土带所蕴藏的碳，相当于其他土壤中所含碳的数十倍，在冻土带融化时，这些碳会在微生物作用下以二氧化碳的形式释放到大气中，从而加速全球气候变暖。研究人员预测，西伯利亚冻土带的碳释放出来，将会导致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一倍，这将使全球变暖的速度大大超过此前气候模型的预测。^②

四、俄罗斯政府对策及其障碍

从对俄罗斯碳库的概述中可以得知，全球气候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俄罗斯气候政策的影响。梅德韦杰夫2009年签署了俄联邦气候变化基本原则（Climate Doctrin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即俄政府考虑应对气候变化利害的全球性，考虑制定与实现气候政策时国家利益的优先性，气候政策的明确性与信息公开性，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调查项目范围内的行动必要性，气候变化导致的损失与利益的全面性，来自气候变化否定性结果的预防性等六项原则。^③这表明，俄罗斯政府首次承认气候变化是俄罗斯经济发展和安全的一个重大威胁，也承认了俄罗斯气候变化的全球外部性问题。

俄罗斯政府气候政策的落实还面临较大障碍，表现在俄罗斯存在着较严重的能源浪费现象，其潜在的减排能力大大超过官方公布的目标，即不具备低碳经济的发展优势。非低碳能源及低效技术的随意使用，使俄罗斯遭遇到日益严重的气候恶化带来的惩罚。据专家估计，俄罗斯的气候变暖程度将超过世界平均指标。目前，俄罗斯能耗水平超出世界平均水平近一倍，有近三分之一的燃料能源未得到有效利用。麦肯锡进行了一项关于“俄罗斯能源效率”（Энергоэффективная Россия）的项目研究，结果表明，

① 世界自然基金会：“俄森林大火可能加剧全球变暖”，<http://www.cstle.com.cn/show.asp?id=1173>

② “西伯利亚冻土融化可能加速全球变暖”，<http://www.jrdili.com/Article/ShowInfo.asp?InfoID=478>

③ 范纯：“俄罗斯环境政策评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6期，第19页。

俄罗斯潜在的减排量大大超过其官方许诺的数量。在采取适当措施的前提下,相较于1990年水平,到2020年,俄罗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可下降42%,2030年可下降54%。即使目前不采取任何措施,俄罗斯也可实现在2020年下降31%、2030年下降27%。这个数量也比官方公布的数量要高。^①

从另一角度来看,俄罗斯的减排潜力仍然很大,这主要是由于其低水平的能效和巨大的尚未开发的可再生能源的潜力。^②根据麦肯锡的研究,如果俄罗斯在2020-2030年间更换工业设备,则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强度在2020年将比2007年降低40%,2030年将比2007年降低64%。正如研究所表明的,俄罗斯可能会进一步在不影响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提下,实施一系列措施,提高能源效率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数量。有学者指出,1990年以来俄罗斯的能耗下降并非是因为俄罗斯政府在工业产能现代化改造上的投入,而主要来源于旧有设备利用率的提高。可见,俄罗斯经济以低成本提高能效的空间仍然很大。^③俄罗斯社会生态联盟(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оюз)认为,到2020年,俄罗斯应该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保持在危机前2007年的水平(比1990年的水平下降35%),并可以采取减少排放量,以使2050年俄罗斯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的水平减少80%。^④然而,气候恶劣、能源价格被低估、节能意识淡薄,以及能源工业管理不善等因素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善,俄罗斯一直大力倡导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并非一日之功^⑤。提高能源效率、避免能源浪费,进而保护环境,对于俄罗斯来说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① Каков реаль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России по снижению выбросов парниковых газов?, http://www.ruseu.ru/alimov_15110

② 阿莱克桑德拉·诺维克娃、安娜·库普、玛丽亚·夏米纳:“俄罗斯的承诺与现行政策——以能源效率政策抑制碳排放”,孙宁编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1期第68页。

③ 同上,第63页。

④ Каков реаль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России по снижению выбросов парниковых газов?

⑤ 戚文海、矫萍:“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俄罗斯加强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1年第1期,第7页。

结语

俄罗斯气候政策都是基于适应性原则，而不是针对预防气候变化本身，且其政策体系是“矛盾”而“实用”的。^①有学者指出，俄罗斯的排放趋势不太可能因加入国际气候体制而受到限制，但近年来俄罗斯出台了一系列能源政策，如果这些政策能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对抑制温室气体排放还是会产生一定效果的，尽管这些政策的出台并不是为了减排而是为了改善俄罗斯国家竞争力和经济绩效。^②

由此可见，俄罗斯对于 2012 年以后的国际协定所持的立场显然更多地受到其国家经济利益的影响，而不是希望为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做出有益的贡献。“实用主义”作为俄罗斯政治的重要原则，在其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过程中也将表现得日益明显。同时，俄罗斯在全球气候环境多边合作中的单边立场将有可能使得俄罗斯的外交陷入困顿局面。^③

展望后京都气候制度构建的前景，俄罗斯作为世界第四大碳排放国和最大的陆地碳汇国家，在未来国际气候合作中发挥作用的潜力还有待发掘。可以预见的是，俄罗斯的立场将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然而，还有一些因素阻碍俄罗斯在国际气候制度构建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做出应有的承诺。除了国际政治博弈、内部能源效率低下之外，俄罗斯自身主观方面还存在限制因素。俄罗斯过度强调自身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推脱其所应负的国际责任。国际气候谈判从表面上看是各个国家围绕减排展开多重博弈，究其实质则是各国为了维护本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展开的利益争斗。俄罗斯自认为其减排规模已经居世界领先地位，其森林碳库优越的碳隔离能力在优化全球生态环境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要求国际社会考虑俄罗斯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俄罗斯强调自身的经济地理特征——幅员广阔、地处纬度较高地区、气候过于寒冷——因而能源消耗和排放量也相应会更多。以此为由，反对将

① Constantin Holzer (周游): “影响俄罗斯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因素分析”, 第 95 页。

② 阿莱克桑德拉·诺维克娃、安娜·库普、玛丽亚·夏米纳: “俄罗斯的承诺与现行政策——以能源效率政策抑制碳排放”, 第 68 页。

③ 孙超: “前行中的困顿: 京都时代与后京都时代的俄罗斯气候环境外交”, 《俄罗斯研究》, 2010 年第 6 期, 第 100 页。

俄罗斯列为附件一国家，不愿承担捆绑式的目标限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一再公开表态不参加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同时还支持由有约束力的协议转到建立另一个新协议。

总之，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固然重要，可长远看来，人类的共同利益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此外，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问题具有不可逆的特征，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伤害和损失或者是不可逆转的，或者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和成本才能有所弥补。^①俄罗斯能否突破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未来的国际气候合作中发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有的作用，还有待继续观察。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Russia's influ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has been widely ignored. Russia once was a key contributing force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Kyoto Protocol"; Russia in the next few years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major energy power of the world; Russia's accumulated high carbon credits have aroused concern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s own powerful carbon isolation capability, if not managed well, may turn from carbon pool into carbon source, influence of which on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can not be ignored. What changes are there in Russia's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The influence of which factors has it experienced? What are the problems? What role would it play within the post-Kyoto climate framework? Through a specific analysis of Russia's actions in the field of climate changes in recent years we will be able to find the answer to the above questions.

【Key Words】 Russia, climat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Kyoto Protocol

【 Аннотация 】 В течение долгого времени влияние России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климатическ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широко игнорировалось.

^① 于宏源：“气候变化与全球安全治理：基于问卷的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6期，第32页。

Россия когда-то была ключевой силой,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вшей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ю «Киотского протокола»; в последующие несколько лет Россия будет оставаться крупнейшей в мире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державой; накопленные ею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е углеродные кредиты вызывали обеспокоенность в Европейском Союзе и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ах; отсутствие долж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мощной углеродной изоляцией,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евращения из углеродного пула в источник углерода оказало огром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глобальное изменение климата. Какие изменения произошли в позиции России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климатическ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Ощутила на себе влияние каких факторов? Какие существуют проблемы? Какую роль будет играть в пост-Киотской системе?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конкрет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в климатиче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в течение последних лет мы сможем найти ответы на вышеупомянутые вопросы.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я, климат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кли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Киотский протокол

(责任编辑 孙超)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2年第4期

(总第176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冯绍雷

出版：《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排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 公开发行 ·

定价：20.00元